



拉丁美洲的 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



1959—1976 马列主义经验的几种类型

〔美〕威廉·E·拉特利夫著

商务印书馆

拉丁美洲的
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
(1959年—1976年)
——马列主义经验的几种类型

〔美〕威廉·E·拉特利夫著

王槐挺 樊庭 王明杰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CASTROISM AND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1959—1976

The varieties of Marxist-Leninist experience

by William E. Ratliff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 C.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1976

内部发行

**拉丁美洲的
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

(1959年—1976年)

——马列主义经验的几种类型

〔美〕威廉·E·拉特利夫著

王槐挺 樊庭 王明杰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2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咸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9 5/8 195千字

1979年 月第1版 1976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统一书号：3017·230 定价：0.75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国际共产党事务年鉴》负责拉丁美洲地区的编辑威廉·E·拉特利夫所写，1976年11月由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协会和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收入它们的“政策研究丛书”出版。全书共分七章，内容主要介绍拉丁美洲各式各样自称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历史、纲领、路线、策略、斗争和彼此之间的分歧和对立等情况，论述了苏联、中国和古巴三国对这些党和组织的政策和态度，以及与这些党和组织关系的演变。着重介绍了各党所执行的路线、各种游击战的成效，以及“卡斯特罗主义”特别是格瓦拉在拉美地区的影响。

作者从维护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为美国统治阶级制定拉美地区的政策提供依据，收集了拉美地区自称为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活动的大量资料，并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指出苏联对拉美地区的渗透和影响是比较大的，说明拉美地区目前虽处于“相对沉寂”，“然而一些自称马列主义的组织将来在全国而且在国际上制造纷乱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一旦时机到来，他们“恢复活动的可能性将会显著增加”。这本书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拉美地区的情况，是有参考价值的。

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许多观点是明显错误的，如说斯大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对德政策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对

蒋介石的统战政策是“机会主义”；诬蔑中国“分裂拉美各国共产党”，“对拉美的分析和政策最不现实”，为苏修分裂国际共运开脱罪责，等等。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此段文字在原文中较为模糊，疑似为“编者按”或类似说明性文字）

目 录

序	3
引言	11
第一章 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共和国	19
苏联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	30
小结	39
第二章 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古巴	41
卡斯特罗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初期	42
古巴从卡斯特罗主义后退	50
古巴对其他国家革命的支持	55
古巴和社会主义世界	61
小结	67
第三章 拉丁美洲的亲苏党	72
背景	72
党的组织	76
党的活动	79
战略和策略	85
对批评者的攻击	102
小结	109

第四章 拉丁美洲的亲华组织	114
背景	114
战略和策略	116
对马列主义对手的批判	122
小结	127
第五章 卡斯特罗主义:农村游击战	129
背景	129
战略和策略	133
小结	171
第六章 卡斯特罗主义:城市游击战	175
城市游击组织的战略和战术	175
阿夫拉姆·纪廉的战略	192
小结	200
第七章 智利的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	204
共产党	206
左派革命运动	222
社会党	233
共产党人和卡斯特罗分子之间的关系	236
小结	245
结论	249
附录:	255
一、拉丁美洲共产党会议(哈瓦那, 1964年11月)	255
二、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1967年7至8月)	259
三、革命协调委员会的建立(1974年2月)	271
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共产党会议(1975年6月)	281

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中苏争端，使世界各地左派革命者进入了一个激烈冲突、竞争的新时代。过去几十年中共产国际（1919年——1943年）和共产党情报局（1947年——1956年）培育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致上还是团结一致的，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连一点团结的痕迹也没有了。被放逐的列昂·托洛茨基和铁托的南斯拉夫，过去曾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提出过挑战，但这种挑战与196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各种各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的反抗行为比较起来，就大为逊色了。

各种重大事件和对立的学说在拉丁美洲的马列主义者中引起的分歧，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大。这种分歧的产生，深深受到中苏冲突和党内权力斗争的影响，前者提出了重大战略、策略问题，而后者（虽略低一级，但有时却同样重要）则是由于个人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以及为了争夺领导权而引起的。这种分歧的产生也还受到古巴革命政府的活动和目标的影响，这个政府建立于1959年，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在不少拉丁美洲人士看来，似乎古巴人才懂得如何去争取民族独立和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战略和策略，而不是他们自己当地的共产党（或其他政党）。

本书谈到的那些政党和组织，分别属于——至少是松散

地属于——马列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两大体系：共产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属于第一类的倒不成什么问题。它们就是在几十年中一贯自觉地紧跟苏联共产党的那些政党和组织，这种紧跟起初是在共产国际范围之内，后来则是以不那么正式、但同样说明问题的方式进行的，例如作为一个被承认的代表团参加了1969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六十年代出现的亲华政党和组织，都是根据它们自己发表的声明来划分的。对有些亲华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可以说是一种承认，而这些党是本书作为亲华党来研究的主要组织。但是，由于使用“亲华”或“毛主义”等词实际上是对拉美党而不是对中国党作出的一种评价，所以下面也要提到几个声称要坚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但没有得到北京公开承认的组织。

“卡斯特罗主义”这个词就稍微复杂一点了。卡斯特罗自称是共产党人，但是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卡斯特罗主义在作为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点上——这是本书主要关心的问题——既不同于亲苏党，也不同于亲华党在它们各自特定时期所采取的方式。卡斯特罗道路有它自己的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并不完全来源于六十年代卡斯特罗路线的主要创始人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德布雷。的确，卡斯特罗在表示赞成1968年苏联集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后，就逐渐离开了拉美其他卡斯特罗分子。1975年6月，这位古巴总理当上了有二十四个亲苏共产党参加的会议的东道主，并签署了一项和现行的卡斯特罗路线和亲华路线有显著差异的宣言，此举（连同他七十年代初期发表的种种声明和政策）毫不含糊地把他自己

置于亲苏阵营之中。为了使人们不把作为革命领袖的卡斯特罗其人和卡斯特罗主义等同起来，我在本书中把卡斯特罗主义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全部用了小写。^①

读者可能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又没有把书中的“毛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词中的第一个字母改成小写呢？回答是：对拉美大多数毛主义组织来说，毛和中国共产党人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指导力量，而且影响极大；而我认为，在本书研究的这许多年里，卡斯特罗和古巴共产党人在这个地区的卡斯特罗分子中则恰恰没有取得这样的地位。有一种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些被认为是毛主义者的人大都公开承认，（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里的）中国战略、策略在他们分析情况和制订政策中起了主要作用。而大多数被认为是卡斯特罗分子的人——特别是那些在近几年中搞实际活动的人——就不承认得到过卡斯特罗和古巴经验的好处。这是颇有道理的。从实际的意义上看，要是大事渲染他们的运动受到国际影响来冲淡自己民族主义者的形象，那岂不太愚蠢了。不但如此，这样做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就象论述卡斯特罗主义的那一章所显示的那样）卡斯特罗派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发展成了和卡斯特罗这个名字很不相干的、自具特点的东西。最后，虽然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比卡斯特罗主义这个词被滥用得更加厉害，但要证明这个论断则超出了本书研究的范围，所以我就保留了大家公认的大写形式。

本书主要研究 1959 年到 1976 年期间那些企图在拉丁美

① 按照英文习惯，所有姓名和以人定名的主义第一个字母都应大写。
——译者

洲取得政权或发挥影响的共产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战略、策略和活动,并着重讲 1964 年到 1973 年这段分歧最大的期间的情况。本书一开始是一篇非常简短的、描述性的(必然也是概括性的)引言,介绍马列主义政党在拉丁美洲活动的背景情况。第一、二章讲的是对拉美马列主义者有深刻影响的三个共产党国家——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回顾了它们对拉丁美洲的态度和政策。这些内容为后面论述拉美共产党人和卡斯特罗分子的各章提供了重要背景。第三、四章写的是 1959 年到 1976 年间拉丁美洲公开的亲苏党和亲华党的情况。首先讲亲苏党,而且讲得比其他党更详细一些,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它们比它们的毛主义对手重要得多。通过介绍共产党组织的大小,它们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活动,以及它们的革命战略和策略,作者想在这两章中把这几年来这些党的情况勾画出一幅总的图景。并不打算对任何一个党的历史作非常详尽的叙述,也不打算对每一个党的历史都来一个部分的介绍。恰恰相反,我首先集中叙述了那些在它们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严重时刻的最重要的党,同时也不时地集中叙述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党,它们或者面临着某种特殊问题,或者足以说明某种一般的特点。最终的目标是——有时候用讲述文件的办法——给处于这个多事之秋的拉美共产主义思想和经验的各种变种描绘出一幅总的图画。

第五、六章讨论了卡斯特罗派组织和受卡斯特罗派影响的组织,叙述了它们的农村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并介绍了它们的背景。第七章专讲智利,评述了在人民联盟时期(1970 年——1973 年)强大的共产党和形形色色的卡斯特罗派组

织——首先是“左派革命运动”——之间的冲突。正文后面有四个附录，提供了更多关于马列主义政党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四个重要会议的材料。

共产党人和卡斯特罗分子是 1959 年至 1976 年期间拉丁美洲最重要的、自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本书在下文中不打算着重予以研究，但至少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许多这类马列主义者，尤其是卡斯特罗分子，对列宁的了解真是少得可怜，对马克思则更是一窍不通。全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伯特伦·D·沃尔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澄清了一大堆混乱不堪的术语。他写道：

马克思的原著、思想和事迹都被淹没在一堆又一堆的评注材料、普及读物、过于简单的简易读物以及肤浅的理论读物中了，而写这些东西是为了制造进行论战用的信条，并且每一条都贴上马克思的名字。有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天知道有多少种正统！）修正主义，（又有多少不同类型的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赫鲁晓夫主义，铁托主义，毛主义，还有象复兴主义、^① 纳赛尔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这样一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就学术研究而论，我们自可不必对这些主义进行严肃的探讨，然而它们对政治行动和政治情感的影响，则真可能是非常严重的！^②

但这种术语上的混乱状况还只是一个开始。许多一度严

^① 复兴主义(Baathism)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鼓吹的一种主义，主张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自由和社会主义”。——译者

^② 伯特伦·沃尔夫：《马克思主义：一种学说生命中的一百年》，纽约，戴尔出版社，1964年版，第 xv 页。

格地用于分析问题的词汇,现在已经有了其他的意思,又带有价值见解的色彩,因而在一般用法中如果说还没有成为骗人的字眼的话,也已经是毫无用处了。几十年来,“资产阶级”这个词已经变成不怎么用来指一个阶级,而是用来表示藐视或鄙视的形容词了。C·S·刘易斯写道: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人说他是“资产阶级”,但那时这个词通常是指:“不是贵族化的,因而是平民化的”。等到他年纪大一些的时候,这个词的意思已经变成“不是无产阶级的,因而是寄生的、反动的”了。^①这两种用法对于资产阶级的含义都没有讲出多少道理来,而在现代史上资产阶级无可争辩是最有影响的阶级之一。“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也被作为贬义词而到处乱用,如果说这两个词在一般用法中的分析价值还没有丧失殆尽的话,也已大大降低。

本书研究的各个组织经常使用而且滥用得最厉害的字眼要算是“革命”、“人民”和“民主”了。在拉丁美洲,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府到1964年建立的巴西右翼军事政权都自称是“革命”政府,至于各种“革命”党和其他组织所包括的范围就更广了。从表面看,“人民”似乎应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体居民。然而在马列主义者的用法中,这个词通常是指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人——人们指望他们出于既定的阶级利益而支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策。有时候,就象绕圈子似的,“人民”是指那些拥护马列主义者所认可的政党和政策并代表人民利益的那些人,那怕有时他们并不占全体居民的多数。在1973年3月智利议会选举

^① C·S·刘易斯:《字的研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1页。

以后，智利共产党控制的一家报纸在报道选举结果时就用了后一种说法作为标题：“人民：百分之四十三。反动腐朽势力：百分之五十五。”

最后，试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民主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民主，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二者的区别是，前者是“资产阶级”或“假”民主，后者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人民”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被认为是骗人的东西，少数人利用欺骗性的选举制度去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甚至使人受了骗还感觉不出来。与之相比，人民民主则被说成是这样一种制度：绝大多数人用它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强迫过去的剥削者服从自己的意志，直至后者被完全消灭为止。

在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人民一般是通过公共集会、报刊和定期选举，来表达他们对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意见，表示他们对政治领导人的支持或反对。严重地或经常地侵犯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可能会导致选举中的失败，甚至可能导致地方性或全国性领导层的意外变更，就象1973年在智利以及1974年在美国所发生的那种极其引人注目的变更那样。马克思是第一个认识到在实行普选制的国家中有可能通过投票选举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晚年也特别相信在欧洲和美国存在着这种可能性。^①在本书所研究的这段时期中，有许多共产党强调这条道路(譬如智利和意大利的党)，而其他遵循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精神的党则公然地嘲笑那些认为“资产阶级”选举真

^① 沃尔夫：《马克思主义》，第12章。

能推进人民利益的人。而这些人之中就有 1975 年年中的那位葡萄牙共产党领袖。^① 就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家也能注意到，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全国性的政治领袖从来都不是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因为人民投票不被认为是衡量人民意志的最好的方法。要是多少还搞一点选举的话，那也仅仅是为了批准由自称是人民先锋队执政的共产党制定的法令，或者从党所同意的候选人中作出选择。

由于已经在这里提出并且评论了这些术语问题，在下文中凡是上下文清楚地表明这些词汇表达的是上面提到的党或个人的观点的地方，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把那些带有色彩或会引起争论的词加上引号以示区别了。

本书基本上是我多年来为《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写稿并担任其负责拉美地区的编辑的成果，书中有一部分就是我为年鉴撰写的文章的某些段落。大部分研究工作是我 1958 年、1970 年和 1972 年到拉丁美洲旅行时进行的，同时也是我对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拉美馆长约瑟夫·W·宾加曼为该馆选择的丰富的原始材料进行研究的结果，而我在过去四年中又曾不时地充当这位馆长的顾问。

全书中引用得最多的资料有：多伦多版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采用其他版本时另外注明）及其《情况通报》；古巴共产党的机关报《格拉玛报》（除特别注明的外，均指英文版周刊）。除了专门说明的以外，所有西班牙文和中文引文都是由我自己译成英文的。

^① 见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对意大利新闻记者奥利阿娜·法拉齐发表的评论，载于《纽约时报杂志》，1975 年 7 月 13 日。

引 言

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对拉丁美洲产生的深刻影响，有将近五百年的时间，但其中首先而且在某些方面来说至今也还是最重要的影响，乃是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政府。这两个政府控制、支配这个地区的生活，在有些国家里竟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到十八世纪，特别是在北美殖民地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后，伊比利亚半岛人对拉美的统治开始衰落。随着一个又一个拉美国家取得独立，到十九世纪初，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直接的控制已经完全结束。然而在独立以后很久，殖民地时代的道德准则、法律、风俗、习惯，多半还是原封未动。其中有些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受到过猛烈攻击而仍被保留下来，今天正受到许多改良者和所有革命者的袭击。

十九、二十世纪，拉丁美洲出现了新的力量，为近几十年来发生的许多次戏剧性对抗准备好了舞台。欧洲和北美的工业革命和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给拉丁美洲带来了广泛的外国投资，扩大了欧洲权益以及后来的美国权益在整个地区的影响。由于出口经济的发展和某种程度的国内工业化，在有些国家则还由于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这个地区产生了城市工人阶级，出现了政治上有进取性的城市中等阶级或中等阶层。

到 1960 年,许多拉美国家已经渡过了许多个激荡着民族主义热潮、政治、经济和社会进行了重大变革的不平凡的年头。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开始使古巴革命激进化。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发生了看来是很彻底的革命。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有些国家工业化发展迅速,农村人口正以空前的规模流入城市。总的说来,这些变化有助于增强社会中等阶层的力量,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有助于增强下层阶层的力量。同时传统统治势力的政治、经济权力也相应地有所削弱。五十年代中期和后期,一个又一个军政铁腕人物被推翻了,出现了看来是非常良好的前景,可以在温和的左派政治领袖们领导下进行更多、更大的改革了。

但是在许多国家里,当人们看到很难解决传统结构和基本发展问题的时候,原来那种认为可以和平地、有条不紊地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乐观情绪——六十年代初期反映在争取进步联盟里的那种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认真的、得到国内和国际上坚强支持的改革,还不能完全、迅速、持久地解决各种重大问题。(当然,在有些国家里,甚至连进行极少几项重大改革的打算都几乎没有。)总的说来,社会各阶级及农村和城市人口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条件上的差别顽固地存在着。由于管理不善和贪污腐化,宝贵的资源被浪费了。在有些国家,教育水平太低,交通条件太差,市场和信贷设施陈旧,使农村改革无法进行。有些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危地马拉——面临着一种挑战,人们要求把基本上全是文盲的印第安居民吸收到国家系统中去。农村中的贫困和不满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农业工人大量离开农

村,在多数大城市中出现棚户区,越来越多的人迫切要求提供公共设施、解决住房问题和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政治煽动家们常常利用这些问题,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使其他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的是拉丁美洲惊人的出生率——这是全世界人口持续增长最快的地方,其结果是整个人口的平均年令变得越来越小,而人们的不满情绪却往往变得越来越大。他们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要求得到工作并迅速进行社会改革。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人得出结论说,单靠中等阶层即民族资产阶级搞些改良是很不够的,务必要在他们自己或和他们差不多的人领导下进行一次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在各国进行活动并程度不同地取得了一些成就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就成了左派的一部分。就连比较温和的马列主义组织(通常是亲苏党),也遭到大多数罗马天主教会和工农以上所有社会各阶级中一部分人的反对,特别是遭到各国占有土地的比较保守的阶层的反对。大多数国家的军队对马列主义组织都是敌视的。尽管有些国家的军方愿意和共产党合作(如1968年后的秘鲁),只有在一个国家里——智利——他们参加了马列主义者控制的最高层政府,并在一次大危机中保证了它的生存。外国政府和拉美商界对马列主义者一般都没有什么好感。有些国家(如在福布斯·伯纳姆统治下的圭亚那)则逼着马列主义者提出比他们的主要政治对手的纲领还要“进步”或革命的纲领。与之同时,传统、民众的思想方式、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有时纯粹是沙文主义),加上许多其他因素,又似乎使各种倾向的马列主义者对许多拉美人来说变得比过去要好接受些了,有时甚至是可

取的了。

首先，拉美历史上最重要的政府基本上都是独裁者政府，都程度不同地把社会所有成员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阿兹特克人王朝和印加人王朝时期是这样，整个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是这样，一直到今天古巴卡斯特罗政权和巴拉圭斯特罗斯纳政权这样一些很不相同的当代政权的时代还是这样。甚至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智利民主制度，也带有高度的国家经济控制的色彩。因此，马列主义组织提出的某些政策，拉美人并不感到那么特别，更不必说感到可恶了。这和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应是很不相同的。

第二，许多具有不同甚至相反政治信仰的拉美人，往往用人们谥之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眼光来观察国内和国际问题。因此，许多比较温和的政党以及有些军队领袖发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声明和政策，和马列主义者的主张很相像，所不同的不过是教条主义味道没有那么重而已。

第三，近年来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高涨，这在各国政府对外国政府和商业企业的活动和权益所采取的官方态度上表现得很清楚。本地区某些比较温和的领袖发表的过火批评，其中有些无疑是出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这决不是拉丁美洲独有的东西——的考虑。普遍存在着一种批判现状的气氛，马列主义者的呼吁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从十六世纪输入殖民制度开始，经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一直到今天，拉美人一向强烈地受到外国思想和事件的影响。就是那个马列主义各种意识形态中最带有拉美色彩的卡斯特罗主义，也是在1967年由一个法国人加以系统化后

才在理论上趋于完整的。^①

有几种学说在十九世纪传到了拉丁美洲，其中就有社会主义。大部分是由被卷入了马克思的第一国际（1864年——1874年）和巴黎公社（1871年）的旋涡的（或是受到它们影响的）欧洲移民带来的。由于他们的努力，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拉美出现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1919年列宁创建了共产国际，紧接着第一批共产党就建立起来了。在列宁于1924年1月去世以前，六个国家（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乌拉圭、巴西和危地马拉）已经建立了党。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前，南美各国以及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有了党的组织。

在共产国际成立后的四十年中（尽管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挑战以及存在着一些内部争吵），拉美党是忠于世界共产主义的“故乡”——苏联的。六十年代以前，拉美共产主义真个是有如“磐石之固”。自然，在那些年代里，拉美共产党人从苏联进口了他们的学说和大部分政策，而且他们的命运也常常更多地是由苏联的战略家而不是由他们本国的党的领袖们决定的。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年月里，他们总是首先想把工人和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虽然他们也几次企图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他们从未打算进行持久的农村和城市游击战。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命令其成员党抛弃它们从第六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罗利·E·波皮诺所著《拉丁美洲国际共运史（1917年—1963年）》，伦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64年版，特别是其中的第二、三章，这两章的分析和我的分析很相似。还可参阅罗伯特·J·亚历山大的《拉丁美洲共产主义》，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市，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章。

次代表大会(1928年)以来一直执行的孤立主义政策,转而执行“人民阵线”路线。这条新路线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得以完全参与本国的政治生活。它首先被应用于智利,对1937年激进党总统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的当选起了很大作用。此后几年,共产党和形形色色的政府进行了合作,这种合作使他们在六十年代一再受到指责,说他们都是机会主义者,已经变成了那些“机构”的一部分。

在四十年代中期冷战开始以前,共产党在整个拉美总的说来是势力最强大的时代,无论在有组织的工人中和在占有的政治代表席位上来说情况都是这样。在这个时期,以墨西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维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此人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总是和苏联完全一致的——为首的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在整个中、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二十个共和国中,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共产党人被选进了全国立法机构,其中以巴西、智利、古巴和厄瓜多尔得票最多。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1943年的内阁里就有共产党人参加(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任不管部部长,六十年代菲德尔·卡斯特罗又给了他同样的职位),1944年的内阁里也有共产党人。厄瓜多尔的三人临时政务会中——这个政务会在1944年把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捧上了总统宝座——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另外还有一个共产党员在贝拉斯科内阁里任职。1946年到1947年的几个月中,共产党人在智利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总统的九人内阁中占了三个席位。但是随着四十年代后期苏美关系恶化,大多

数拉美国家中共产党的力量都开始削弱了。

在此后十年中，个别国家的共产党也有过相当大的影响，如在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于1958年被推翻以后不久的委内瑞拉，然而这种影响的规模不是遍及全洲的。可是，有两个国家共产党的影响特别大，必须提一提。在危地马拉，共产党影响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有了显著的增长；但随着1954年哈科沃·阿本斯总统之被推翻，这种影响也结束了。在古巴，1958年以前对反巴蒂斯塔斗争的共产党人一般还都是袖手旁观的，到1959年就显露头角了。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能在新政府中起领导作用，但是他们的重要性却增加了。因而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成员中爆发了第一批脱党事件，紧接着又发生了把脱党分子逮捕入狱的事件，这在为卡斯特罗日后的政治路线定调和决定方向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1959年卡斯特罗定居下来的时候，简直没有什么理由能使人相信共产党人在此后十五年中竟会变得如此活跃和爱好争论。



第一章 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拉美各国卡斯特罗分子和共产党人在 1959 年到 1976 年期间实行的政策和进行的活动各不相同（而且常常互相抵触），这是因为各国、各党的条件不同，同时也是由于受到国际大国和国际事件的影响，特别是受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古巴和美国政策影响的结果。本章主要论述苏联和中国的作用，作者打算通过本章和下一章关于古巴的论述，为在后面各章对拉美共产党人和卡斯特罗分子进行分析打下基础。

苏 联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四十多年中，苏联共产党对拉丁美洲或拉美共产党人仅只时断时续地表现出一些兴趣，尽管有时它对他们抱有希望。从二十年代到 1959 年古巴革命取得胜利这些年中，苏联和少数几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又破裂了），但是在外交或经济上都没有什么重要建树。苏共通过共产国际对制订拉美各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 1928 年以后制订那些狭隘的好斗的政策中以及在建立 1935 年发起的人民阵线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苏共对拉美共产党人的政策，只在很少几个国家（如三十

年代中期的巴西和智利,以及五十年代初期的危地马拉)的整个政治事务中产生过重大影响。

苏共对拉美的真正兴趣,是从 1959 年开始的。苏联领导人对卡斯特罗迅速地采纳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对他所取得的胜利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古巴的成功似乎证明了“地理宿命论”的错误,表明了即使“美帝国主义”近在咫尺,民族革命斗争也能得到成功。巴西雅尼奥·夸德罗斯在选举中得胜(1960 年 10 月),以及这个地区出现的他们认为是迅速增长的反美主义新情况,使他们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然而,1962 年在古巴设置苏联导弹一举,引起了拉美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对苏联的反感,而撤除导弹在极左派看来又是向美国投降。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威信降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冷战开始以来的最低点。

几种革命道路 在 1959 年到 1976 年的整个期间,苏联都认为不可能提出一条适用于所有拉美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道路。苏联发言人(和拉美共产党领袖们)一再声明,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可以根据本国的情况,自由地进行武装斗争或非武装(“和平的”)斗争,或把两种斗争结合起来。总的说来,苏联设想拉美走的将是非武装斗争道路,因而强调必须增加党在有组织的工人中的影响,并建立广泛的民族阵线。

可是,任何把这种非武装斗争道路和中国—古巴式的武装斗争道路并列起来的做法,都会模糊苏联政策所具有的很大程度的灵活性。在 1959 年到 1976 年期间,苏联清楚地说过,在某些条件下拉丁美洲进行武装斗争是必要的。这种说法——在某些国家里这是对古巴人和中国人的显得更加革命

的建议故意作出的反应——曾经在六十年代中期非常公开地发表过。在巴西发生了推翻若奥·古拉特左派政府的军事政变以后几个月，一位苏联理论家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写道：“对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分析证明，在独裁者和外国垄断势力的傀儡当权的国家里，在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斗争中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建立游击队，这两种措施结合起来构成了一条完全合理的行动方针。”^①

《真理报》1965年12月的一篇社论，谈到了对“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给以各种帮助和援助的国际主义义务”。^②这个口头支援在1966年1月在哈瓦那召开的三大洲会议上又得到了重申。苏联的四十人代表团团长夏·拉·拉希多夫在1966年1月7日说，“苏联人民一向支持人民战争——各被压迫民族的武装斗争，一直都在给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和帮助。”他再次保证要与“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爱国者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傀儡、争取自由的武装斗争，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③

拉美各国政府对三大洲会议和苏联在会上所起的作用反应迅速，态度鲜明。2月2日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就苏联、共产党中国和古巴在会上保证要对“本半球共产党颠覆活动给

① A·M·西伏罗勃夫：“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见《共产党人》杂志1964年8月号。英译文载于J·格雷戈里·奥斯瓦德所著《苏联对现代拉丁美洲的看法》（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76页。

② 《情况通报》（布拉格），第64期，第7页，1966年。

③ 《第一次亚非拉人民团结会议及其打算》（拉瓦列的报道），美洲国家组织于1966年11月28日在华盛顿出版，英文版，第二卷，第65、71页。拉希多夫当时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以财政、政治和军事援助”^①提出了指名谴责。五天以后，十八位拉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给吴丹秘书长的一封信中，指责三大洲会议及其意图“恶毒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该信谴责了会议的目的——“鼓励和促进用暴力改变各国政府及其基本政治机构，从而侵犯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这封信还攻击了：鼓吹武力颠覆，在哈瓦那设立旨在协调这种颠覆活动的常设机构，以及某些没有被点名的联合国会员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它特别攻击了《总宣言》的一个章节，这一节宣布“进步”政府有“权利和义务”为颠覆活动提供“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援”。苏联立即对这封信作出了正式答复，这表明几乎没有什么人不知道没有被点名的会员国指的究竟是谁。^②

拉美对苏联参加三大洲会议的反应，恰巧是发生在苏联对扩大与拉美各国政府的经济、政治关系越来越感兴趣的时候，也是好几个亲苏的拉美党正决定要退出游击战的时候。这个反应对苏联转而采取温和的拉美路线可能起了一定作用。在此后几年，苏联作出了很大努力来改善它和某些国家（例如哥伦比亚）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而在不久以前，它还保证要协助颠覆这些国家。

^① 引自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 1966 年 2 月 2 日决议，见上书第 275—77 页。此决议得到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哥斯达黎加、海地、萨尔瓦多、厄瓜多尔、阿根廷、巴拿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巴拉圭、危地马拉、巴西、墨西哥、乌拉圭和智利的支持。

^② 引自拉美代表 1966 年 2 月 7 日的信，见上书第 279—80 页。除美国和墨西哥以外，所有那些国家（见前注）都在信上签了字。关于苏联 1966 年 2 月 19 日的反应，见同书第 289—90 页。

到 1968 年,在古巴和拉美各地卡斯特罗分子的(大多是间接的)猛烈攻击下,苏联已经采取了反对“输出革命”的强硬立场。维克多·伏尔斯基在他登载在 1968 年 3 月 19 日《真理报》上的文章中,就此发表了长篇评论:

古巴自己就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社会主义的。这是对那些叫嚷“输出革命”的人的最好的回答。同时,也正是由于苏联的存在,才有可能作出这样的选择。苏联已经并且还继续在为古巴提供全面的支援和帮助,这就决定了使用军队扼杀革命和进行经济封锁的尝试注定要遭到失败。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的朋友和敌人都曾经有机会亲自看到,苏联并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而是始终坚决捍卫各国人民实行自决的权利。

毫无问题,每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有关国家人民的内部事务。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从外面移入革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只有在革命思想在这个国家已经成熟并最终为大多数人所掌握的情况下,革命才能胜利,革命的成果才能得到巩固。

但是,同样非常明显的是,没有一个解放运动,没有一次真正的革命,即使是在民族的土壤里成熟起来的运动或革命,可以是或者应该是孤立的或闭关主义的。革命思想所固有的国际主义本身,就强烈地提出了为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的问题,以及一切正在为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实现共同的理想而斗争的国际革命力量必须联合起来的问题。拉美历史上有许多——从新生国家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联合斗争,到

今天的保卫革命古巴运动——出色的团结的例子。^①

1971年4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苏共三十四次代表大会^②上说，许多拉美国家正在发生“伟大的变化”，他特别提到了玻利维亚（领导人是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1971年8月被推翻）、智利（领导人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1973年9月被推翻）和秘鲁（领导人是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1975年8月被推翻）。1973年末，《消息报》发表文章，为苏联和拉美“新型”军政府（如秘鲁、厄瓜多尔和巴拿马政府）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辩解，这些军政府正试图消灭帝国主义的“可耻统治，并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变革”。文章说，“许多拉美国家的领导集团〔正〕要求从根本上重新审查”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③

对中国和古巴的态度 当中苏分裂在六十年代初期公开化时，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拉丁美洲也有些看得出来。由于当时苏联在拉美没有多少大使馆，在其他方面的联系也不很多，苏联的反华立场通常不是由苏联代表而是由亲苏的共产党提出来的。亲苏党对中国的批判——在整个争论期间

① 引自奥斯瓦德所著《苏联和拉丁美洲》第67—68页。尽管如此，许多拉美政府还是指责苏联官员在1968年以前和以后干涉它们国家的事务。在1959年到1973年期间，至少有五十四名苏联官方代表被拉美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各国驱逐出境的数字是：智利，二十名；哥伦比亚，五名；玻利维亚，二名；厄瓜多尔，三名；墨西哥，九名；阿根廷，六名；乌拉圭，八名；巴西，十一名。见詹姆斯·D·西伯奇所著《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存在》，纽约，克兰——拉萨克公司，1974年版，第28—29页。

② 应为二十四次代表大会。——译者

③ 罗伯特·H·唐纳森引自1973年12月5日《消息报》，英译文载《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1973)》，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4年版，第95页。

这种批判的内容没有多大变化——在智利共产党的机关报《世纪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这是一篇谈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回顾了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经过，并对中国“最近的令人痛心的历史”作了评论。（评论内容略去）在委内瑞拉和危地马拉等几个国家，共产党没有受中苏分歧的影响而分裂成为两派。在这些国家里，对中国的攻击保持在最低限度，或者根本没有。

苏联对古巴政府的态度以及和古巴政府的关系问题，比起对中国的态度问题要复杂得多。尽管苏古关系在六十年代初期特别是1962年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时，发生了一些困难，但是这种困难总是——至少在表面上——被遮掩过去了，就象1964年11月在拉美共产党会议上所发生的那样。然而到六十年代中期，古巴政府和苏联的关系紧张起来了，当时古巴正以更大的决心号召在拉美各地进行游击战争，而苏联则向相反方向变化。和古巴的争论首先是拉美各国究竟应走什么革命道路的问题，当然苏联努力增加与拉美的政治、经济联系也使古巴感到苦恼。

于1967到1968年达到了顶点的苏古争端，没有象中苏冲突那样直截了当。对古巴的攻击，是用拉美和欧洲的亲苏的共产党人——有时候是在苏联公开赞同下——对古巴进行评论（此种评论常常是间接的）这种方法进行的，或者用苏联及其同盟者指责卡斯特罗所大加赞扬的游击队是“极左”、“小资产阶级”，甚至于是“毛主义”组织这种方式进行的。争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问题：（1）关于古巴要求大多数拉美国家立即按古巴模式展开农村游击战的号召；（2）关于古

巴对亲苏党，特别是委内瑞拉共产党的攻击，以及对它们提出的说它们没有站在革命斗争前列的指责；(3)关于苏联集团和卡斯特罗称之为拉美“寡头统治者”进行的、旨在导致——有时确实导致了——建立外交、经济关系的接触；以及(4)古巴的种种内部政策。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在1968年1月到2月审讯和监禁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卡斯特罗上台前的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和他的所谓亲苏小宗派时都涉及到了。

苏联俄文版《新时代》杂志在一期增刊上刊载了格瓦拉日记的摘要。苏联人在他们写的引言中强调玻利维亚游击队没有任何群众支持，并且论证说格瓦拉本人在他去世前好几个月就对他能否取得成功非常悲观。引言在结尾中引用了列宁警告革命起义的一句话：我们不需要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钢铁部队的有节奏的进军。^①

接着第二个月，《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长文，批判那些仅仅因为他们当时不愿全都给游击战以最大重视就否认共产党先锋作用的人：

拉丁美洲没有任何一个党否认革命斗争的武装道路这一马列主义主张。但是他们确实拒绝认为可以人为地在一个国家引起革命的论点，而且把不考虑各国的民族特点和特殊条件而把拉丁美洲看成是完全一样的观点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背离。^②

① 《新时代》(莫斯科)，1968年10月18日。列宁的话是直接从英文译过来的。——译者

② 《真理报》(莫斯科)，1968年11月20日。

可是到 1968 年底,在卡斯特罗表示支持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苏古关系就开始好转了。他们的关系在两年中间变得如此之亲密,很多从前支持古巴革命的人都公开表示担心卡斯特罗已经“卖身投靠”俄国人了。^①七十年代初期,苏古关系稳步发展。1972 年 7 月,古巴被接纳为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正式成员国,这表明已经把古巴吸收到苏联经济集团里去了。1973 年 1 月 3 日宣布了苏联曾主动向古巴政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包括五项内容的一揽子经济计划,卡斯特罗已经接受了这些协议。在 1975 年中到 1976 年初,两国关系达到了最高点(见本书第 2 章)。

对智利的态度及其后果 七十年代初期的苏联拉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利发生的情况。一位俄国分析家在 1971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苏联的观点。他写道:人民联盟 1970 年取得的胜利,“作为对拉美帝国主义体系的一次革命性打击,其意义仅次于古巴革命的胜利。”^② 1971 年末,苏共负责与世界各地不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的官员鲍里斯·波诺马廖夫从智利经验中总结了六条“基本教训”,其中的五条是:(1)和“机会主义的断言”相反,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和指导力量”;(2)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团结是重要的;(3)“坚持民主的政府”能够“和平地取得政权”;(4)革命必须有效地获得群众支持才能保卫自己,由于革命是在

^① 例如委内瑞拉著名的“卡斯特罗派”游击队员道格拉斯·布拉沃,详见本书第 5 章。并见 K.S. 卡罗尔所著《当权的游击队员:古巴革命的道路》,纽约,希尔—王出版社,1970 年版。

^② V.G. 斯毕林语,转引自列昂·古雷和莫里斯·罗森堡所著《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渗透》(迈阿密),迈阿密大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 97 页。

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所以重大的变化将是逐渐发生的；以及(5) 国际上对阿连德政府的声援防止了外国对智利的干涉。^① 第二年初，人民联盟政府被认为是“最清楚地体现了”拉美共产党人的使命，即：“团结一切进步、民主势力，并领导他们为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将结束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大庄园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斗争。”^②

由于1973年9月11日发生了推翻阿连德政府的军事政变，苏联断绝了和圣地亚哥政府的关系，并在次年一年中对智利事件的“教训”进行了估计。开初，苏联分析家只是坚持说，政变并不能象许多左派和“极左派”批评家所说的那样，证明在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③ 1974年初，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著名成员A·索波列夫总结了智利经验，得出了若干结论，其中有：(1)显然，“取得政权比保持政权要容易些”；(2)萨尔瓦多·阿连德1970年当选并就任总统，标志着“反帝、反寡头”革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了优势，实现了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3)团结“民主”势力结成左派联盟的重要性再次得到了证实，尽管人民联盟政府内部存在着冲突这一事实表明必须对建立联合政府的思想进行更深入的分析；(4)和工人和中等阶级的联盟在放任自流中解体了；(5)人民联盟政府的方向是对的，但在建立象俄国1917年的苏维埃这样关系重大的“吸收一切人参加的群众组织”方

^① 见波诺马廖夫的评论，转引自《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渗透》第100—101页。

^② 《新时代》(莫斯科)，1972年2月。

^③ 例如《真理报》(莫斯科)主要政治评论员尤里·茹可夫在1973年9月29日莫斯科电视谈话中就说过这样的话。

面,走得太慢了;(6)这些群众组织和国家宪法发生冲突时,前者应该得到优先考虑;(7)极左力量的反对严重地削弱了革命的努力;(8)革命和反革命力量在一定阶段发生对抗是不可避免的;(9)共产党必须设立“迫使剥削阶级服从人民意志”所需要的机构,从而使革命进程不可逆转;以及(10)恰当地、实际地应用这些普遍原则,并不总是很容易的。^①

鲍·波诺马廖夫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在国际上传播的分析文章,这篇文章和他1971年的估价就很不一样了。在他得出的结论中,包括了以下几点:(1)这是“在一个长时期中革命‘和平’发展的第一个例子”,“从完善革命战略、策略的角度来看,对马列主义者是非常宝贵的”;(2)革命力量必须采取比智利更为坚决的行动,以“剥夺旧政权的重要权力杠杆”,如军队和新闻宣传工具;(3)只有在起先锋作用的共产党人准备对反革命活动采取“最坚决”的斗争方式,从而使敌人不敢设法中止革命进程时,和平道路才能得到保证;(4)是反对势力首先违反宪法,因而革命者除了采取合乎宪法的手段外,同时还应该采取不合乎宪法的手段使他们就范;以及(5)在政治上取得初步成就以后,经济便成了“夺取革命胜利的主要战场”。但是,波诺马廖夫和索波列夫一样,也没有对智利革命者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什么明确的、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②

七十年代初期拉美发生的种种事件,特别是人民联盟政

^① 见A·索波列夫关于智利阶级斗争的经验和问题的讨论,载于《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杂志,1974年3—4月号。

^② 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17卷,第6期(1974年6月)。关于苏联对智利军事政变的后果的分析,可参阅《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渗透》第107—120页。

府之被推翻，使苏联分析家对拉美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采取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发表了比较富有战斗性的理论声明。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分析可能最终证明对意大利、法国和葡萄牙共产党会有直接价值，但它并不反映苏联在七十年代中期与拉美各国政府关系的总的倾向，而是恰恰相反。苏联 1976 年初对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并不比七十年代开始时更富有战斗性，实际上还不及六十年代中期的政策路线。1973 年 9 月以后，苏联更加努力扩大与拉美各国政府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不管这些政府的思想倾向如何。苏联报刊以及世界工会联合会等国际外围组织反对智利政府的宣传运动，与苏联和巴西、玻利维亚右派政府及阿根廷庇隆夫妇政权之间的越来越广泛的联系比较起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苏联领袖们显然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大可能出现重要的革命形势，要是有什么变革的话，也不大可能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发起，而很可能是由变得越来越激进和富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等阶级和军方发起的。同时，苏联继续保持着和共产党的联系，以期有朝一日这些党能象 1974 年到 1975 年的葡萄牙共产党那样进入舞台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 1959 年到 1976 年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在影响拉美人（或赢得他们的同情）所作出的努力中，强调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反对国内反动派的）“革命”和（主要是为了肃清国内事务中的外国影响的）“反帝斗争”。这两个提法

在这个民族主义高涨以及伴随而来的“民族独立”呼声很高的时期，各种信仰的拉丁美洲人都对它很感兴趣。

在五十年代，中国对拉美革命的支持总的说来是低调的，其目标首先在于：通过对现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它们实施重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从而削弱反动派的阵地。中国在五十年代发表的评论，重点在于介绍中国经验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些方面：（1）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获取对无产阶级的最大支持以反对主要敌人；（2）1949年后的几年中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3）在五十年代初期建立的“四大阶级”的政府，利用民族资产阶级起促进作用的潜力；以及（4）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所作的贡献。到1960年，中国人主要通过进行“人民”或“文化”外交——“把进行情报、思想、人员和文化交流作为执行外交政策的一个有组织的联合兵种”^①——开始为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拉丁美洲人所知道。

武装斗争和人民战争 在六十年代，而不是更早的时候，武装斗争成了中国为拉丁美洲提出的主要路线。1957年，中国人曾不加评论地报道了古巴共产党——当时叫人民社会党——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武装斗争的消息。^②在巴蒂斯塔垮台以前四个月，中国主要外事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武装斗争在拉丁美洲“还不是基本的斗争形式”，虽然在“亲美的反动政权”统治的国家里或美帝国主义“直接进行军

^① 理查德·L·沃克：“亚洲文化外交日益增长的作用”，载于乔治·L·安德森所编《问题和冲突》一书，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5页。

^② 见清海：“在战斗中的古巴”，《世界知识》（北京），1957年9月20日，第14页。

事干涉或阴谋发动反动政变”的地方，它可能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①甚至连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9年1月到达哈瓦那也没有能使中国人相信拉丁美洲进行游击战的条件已经成熟。在1959年，中国的理论家们鼓吹的武装斗争，通常都是针对海地、尼加拉瓜、巴拉圭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国的独裁政府的。在其他国家，通过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非武装斗争被认为是恰当的。^②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在1960年开始号召在许多拉美国家进行武装斗争，尽管在好几年中，他们和古巴人都同意推广古巴经验作为拉美人的榜样。1960年11月，切·格瓦拉和中国李先念副总理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说：

中国方面对古巴人民坚持团结，坚持武装斗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推翻巴蒂斯塔反动独裁统治的伟大胜利表示钦佩和高兴，并且认为，古巴人民的斗争和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特别是拉丁美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树立了一个榜样。^③

这是格瓦拉发表《游击战》一书后不久发生的事。此后三年，中国人和大多数古巴领导人的关系都很亲密，这部分地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导弹危机期间曾经强烈地谴责了苏联侵犯古巴

① 言金：“目前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特点”，《世界知识》，1958年8月20日，第16—18页。

② 《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基本特点》，见《国际问题研究》（北京），1959年5月，第10—18页。1959年1月以后，古巴共产党企图用中国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解释卡斯特罗的胜利并影响这位古巴新领袖的政策，见威廉·E·拉特利夫：《中国共产党的国内统一战线及其在拉美的应用（1921年—1971年）》，哲学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1974年，第5章。

③ 《北京周报》，1960年12月13日，第41页。

的主权。中国人出版了一系列古巴革命著作，包括卡斯特罗的两个《哈瓦那宣言》以及格瓦拉后来写的比较短的《游击战：一种手段》——后来古巴人自己承认，第二本书是为第三世界各国革命者写的。^①古巴政府报道说，它进口和出版了几十万本中国革命著作，在古巴和整个拉丁美洲发行。

1964年11月在哈瓦那召开的拉丁美洲共产党会议，证明是中古关系以及中国对拉美革命态度的转折点。没有任何中国人，没有任何拉美亲华组织被邀请去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的最后公报公开号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保持团结——当时中国人已经断定，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须和世界各地许多共产党内占据重要岗位的“修正主义者”决裂——这就表明了它在中苏争端中同情苏联一方。

1965年2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国在中苏争端中的欧洲盟友——警告古巴人不要“掉入修正主义的陷阱”。^②3月13日，卡斯特罗在一篇演说中第一次公开指责争端是“拜占庭式的争吵”。1966年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三大洲会议上在全世界革命组织面前对中国人发动了攻击。中古关系爆发了危机。中国和古巴领导人在年初对骂了几阵以后，中国批评的焦点移到了古巴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个问题上。早先被掩盖或缩小了的中国道路和古巴道路之间的分歧（包括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统一战线的广度和重要性、游击战战略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成了争论中的重要问题。中国人的批评通常是用两种形式间接地提出的：（1）发表世界各地

① 《世界报》（哈瓦那），1968年5月7日。

② 《人民之声报》（地拉那），1965年2月16日。

亲华党的批评性声明；以及(2)强调他们自己的革命经验对拉丁美洲人是适用的。第一种办法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日发表亲华的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对雷吉斯·德布雷的《革命的革命？》一书的批判文章。文章说，这本书是“反马列主义的”，是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并把“所有厌恶修正主义的老实人”都引入“歧途、阴沟和死胡同”的“反革命大骗局”。^①第二种办法的典型表现是硬说拉美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已经认识到：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对拉美人民有着普遍的实际意义，是拉美人民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②

在六十年代中期和后期一切以毛为中心的日子里，中国人坚持说：现在的拉美政府是反动的、半封建的，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苏联领导人是“社会帝国主义分子”；亲苏的共产党人是“修正主义分子”，已经向那些骗人的、专搞改良主义的政党屈膝投降；而卡斯特罗派民族主义者则是些“极左分子”，他们依靠的是“一帮好说大话、行为轻率的三剑客式的英雄好汉，指望这些人能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干出惊天动地的奇迹”。^③

在古巴革命于1959年取得胜利以后的八年中间，中国共产党人对切·格瓦拉有一种特殊的好感。这位阿根廷——古

① 《北京周报》，1968年7月26日。

② 《北京周报》，1968年2月2日，第29页。

③ 这一句引自亲华的锡兰共产党的一个文件，见《北京周报》，1968年6月21日，第14页。在1966到1968年间，锡兰共产党经常是中国立场的发言人。

巴游击专家几次访问北京都受到了热烈欢迎，他的文章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发行到第三世界的各个角落。卡斯特罗在六十年代中期滑到修正主义阵营也没有损害格瓦拉在北京的名誉。正当中国和卡斯特罗之间的争吵在1966年2月处于高潮的时候，一篇登载在《北京周报》上以便流传全世界的声明说：判断“古巴离开革命道路有多远或多深”的重要办法之一，是看一看“古巴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埃·切·格瓦拉已经退出了古巴政治舞台”。^①但是格瓦拉作为最杰出的“小资产阶级冒险家”于1966年到1967年在玻利维亚重新出现，使中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态度。1972年3月，周恩来告诉智利社会党总书记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说，格瓦拉作为一个革命者使他感到钦佩，但是他认为格瓦拉没有发动群众进行战争，因而在战略上是不正确的。^②

1969年，中国的评论开始发生变化，到1972年年中，对拉丁美洲的新政策出现了。中国人对大多数国家的革命者立即夺取政权，已经远不象对促进“第三世界团结”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那么关切了。1971年3月，中国在一项重要政策性声明中宣称：拉丁美洲“出现了为保卫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而联合斗争的新局面”。^③中国领导人满意地指出，许多政府——无论是个别地说或整个地说——在很多问题上对美国政策都有意见，其中包括经济投资和近海领

^① 引自亲华的锡兰共产党的声明，见《北京周报》，1966年2月25日，第24页。

^② 见阿尔塔米拉诺1972年3月15日在北京接见法新社记者时的谈话。

^③ 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载于《北京周报》，1971年3月19日，第7页。

海权的问题。七十年代初期,在南美,智利和秘鲁正在带头批评美国,在中美带头的是巴拿马。

同时,中国人论证说(就是在智利人民联盟时期他们也是这么说的),拉丁美洲唯一的真正革命政府是古巴政府,因为只有卡斯特罗才摧毁了他的国家的旧政治结构,并建立了保卫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军队。中国人还论证说,“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取得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①周恩来在他和墨西哥城《至上报》编辑的一次受到广泛宣扬的谈话中也讲到了这一点,并在几个国家里引起了一阵短暂的批评的浪潮。可是,就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阶段中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这一事实所提示的那样,许多拉美政治领袖都没有把这些“理论性的声明”当作一种严重威胁;他们指出,周恩来曾经声明,“各国人民必须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自己起来干革命”。^②

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 中国从1949年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拉美政策——主要是开展文化或“人民”外交——是很合适的,能够在这个一向被美国控制的、还不可能和它发生重要政治、经济接触的地区给各式各样的人留下印象。到1960年,有些拉美左派人士把中国经验看作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样板和鼓舞力量。这些人及其他一些人——他们中有很多人

① 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载于《北京周报》,1971年3月19日,第5页。

② 和《至上报》(墨西哥城)编辑胡利奥·谢雷尔·加西亚的谈话,1971年9月5日。当中国在1973年保持了和智利军事统治者的关系时,它决心要和拉美国家建立正式关系的意图就表现得很清楚了。到1975年初,除了古巴以外,它又已经和智利、秘鲁、墨西哥、圭亚那和巴西建立了外交关系。

到中国去旅行过——极力主张和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接纳北京政府参加联合国。可是，正当这个政策取得显著成就的时候，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和苏联越来越严重的争吵）使中国改变了态度。由于中国在此后几年中越来越强调武装斗争，以及它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这些国内计划方面受到了挫折，拉丁美洲各方面人士对人民共和国的兴趣显著下降了。

中国共产党对许多从事游击战争的革命组织的吸引力，以1960年到1965年这个阶段为最大。这种吸引力是由于：中国发表了支持暴力革命的声明，并提供了训练和资助游击战士的某些积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之间总的说来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以及那些不受苏联约束的拉美革命者对苏联在1962年导弹危机期间“出卖”古巴感到失望。可是，到六十年代中期产生的几个因素使中国在大多数拉美革命者中的地位受到很大损害。这些因素是：中国决定集中力量分裂拉美各国共产党，借以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中国和古巴的争端愈演愈烈，因而在大多数拉美游击队员心目中中国人的威信降低了，亲华组织也被排除在西半球革命者的会议之外；中国坚持拉美各国按照中国的处方准备和进行“人民战争”，因而排除了在多数国家立即进行武装斗争以及参加某些卡斯特罗式的活动的可能性。

中国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分裂亲苏党，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成了中国的基本目标。这震动了一些共产党，对一些国家的学生也产生了影响。但大多数拉美共产党人仍旧留在亲苏党内，而亲华派往往证明是不稳定的，在内政上不起

作用。可是它们确实“证明”了中国人所说的整个西半球都存在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马列主义”力量，而且随时可用来充当中苏争端中中国立场的发言人。

六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化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走出了孤立主义的深渊，规模空前地卷入了国际事务之中。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在世界各地都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的速度和程度可能以拉丁美洲为最大。发生这种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有三：(1)在国际上对北京政府的承认迅速增长时，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的外交关系又重新发生了兴趣；(2)许多拉美政府由于民族主义高涨和其他原因而采取了越来越独立的态度，它们对于同世界各地发展贸易和其他联系有了兴趣；以及(3)美国对华政策突然改变，这一方面解除了长期感受的抵制中国和拉美国家建立独立关系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鼓励了拉美各国政府摆脱美国不再受美国政策的束缚。

周恩来在七十年代初告诉访问中国的几位美国客人说，中国将继续支持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①随着时间的过去，已经很清楚这不是一般地指中国在六十年代支持的那些组织，而是指对美国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独立并参加了——不管是多么松散地参加了——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统一战线”的那些政府。

到1976年初，中国人已经和各式各样的南美政府——从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领导的秘鲁左派军政权到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的智利右派军政权——建立了关

^① 和《至上报》编辑胡利奥·谢雷尔·加西亚的谈话，1971年9月5日；并见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的谈话，《日报》(墨西哥城)，1972年3月16日。

系。可是大多数拉美政治领导人都同意前智利总统候选人拉达米罗·托米奇在1972年说的话：很少拉美人愿意用北京发言人来代替华盛顿发言人。^① 1973年后，由于中国和智利军政府关系密切，中国和几个拉美国家的关系笼上了一些阴影。

中古关系在1966年处于低点，此后有所好转，到七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立即承认了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和反对安哥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关系又大大恶化了。在安哥拉问题上，中国人事实上指责了苏联“从拉丁美洲”派去“雇佣军〔即古巴人〕侵略安哥拉”。^②

小 结

在拉丁美洲，1959年到1976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时是逐渐地有时是突然地改变自己的政策，因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古巴及西半球各式各样的马列主义组织的关系，也随着发生了变化。各党的路线部分地是在研究了拉美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订的。尽管有关大国发表了种种崇高的声明，说它们的政策如何科学、正确，体现了革命的利他主义，然而，这些政策却常常主要是根据它们自己的变化多端的私利决定的。由于忙于处理种种国

^① 和本书作者的谈话，圣地亚哥，1972年5月24日。如要了解更多情况，可参阅我的两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对拉丁美洲的文化外交（1949年——1960年）”，载于《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第46卷，第3期（1969年2月），第53—79页；“共产党中国和拉丁美洲”，载于《亚洲概览》第12卷，第10期（1972年10月），第846—63页。本章一部分材料是从这两篇文章中引来的。

^② 《北京周报》，1976年3月12日，第21页。

际、国内的急务，它们对本地区的革命潜力只作了肤浅的分析，这也引起了本地区的党在忠于谁的问题上发生变化。总的说来，这两个大国的不同的分析和不同的国家利益，主要反映在对待盟友和取得政权的道路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上。

苏联对拉丁美洲的分析，和中国(或古巴)相比，总的说来要现实得多，受思想上的、革命的偏见的影晌要小得多。这部分地是由于苏联推行了它在中苏争端中形成的国际总路线，由于它的国内情况要比中国安定得多，也(显然)由于苏联对拉美的情况以及对各国共产党的力量或潜力的估计要正确一些。在六十年代中期和后期它们最最与众不同的年份中，中国(和古巴)的分析和政策最不现实。在这些年头，国内国际条件使中国(和古巴)把它自己的革命经验这个过于简单化的模式说成在国际上也是适用的。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些世界大国已经程度不同地采用了比较灵活的路线，它们把主要力量放在和越来越多的拉美政府建立传统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上，而同时继续在整个地区进行偷偷摸摸的活动，并对那些企图在经过选择的几个拉美国家中推翻其政府的革命者给予一定的口头上的、有时是物质上的支持。

第二章 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 古 巴

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古巴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从他们在 1959 年取得胜利起，古巴领导人就怂恿拉美革命者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不同的时期，这个号召的紧迫程度及其适用范围都不一样。有两个时期，鼓吹农村游击战最为利害。第一次是六十年代初期，切·格瓦拉的《游击战》（1960 年）和卡斯特罗的《第二个哈瓦那宣言》（1962 年）都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古巴对武装斗争的热情，由于 1964 年末在哈瓦那召开苏联共产党和拉美共产党会议而受到了一些约束，但在此后两年中，它又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劲头更加高涨起来。支持拉美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二个也是最紧张的时期是 1966 年到 1968 年。这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他 1967 年 3 月 13 日和 8 月 10 日的演说中、以及同年 7、8 月在哈瓦那召开的拉美团结组织会议的声明中极富戏剧性提出来的。对武装斗争作理论上说明的，主要有雷吉斯·德布雷写的名为《革命的革命？》（1967 年）的半官方政治小册子和切·格瓦拉写的几篇短文。1966 年到 1967 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非常引人注目地执行了这条理论路线。在此后的年份中，卡斯特罗在选择他应该支持哪些拉美游击队和采用何种游击战方面，是越来越严

格了。

卡斯特罗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初期

作为夺取政权的一种道路的所谓“卡斯特罗主义”，其初期(1959年到1968年)的含义是古巴革命领导人决定的。其粗略内容，最重要的是格瓦拉《游击战》一书中最早所提出的。格瓦拉说，古巴革命对“美洲革命运动的方式”作出了“三个基本贡献”，即表明(1)“人民力量可以战胜反动军队”；(2)“并不一定需要等待一切革命条件都成熟，起义中心可以创造这些条件”；以及(3)“在不发达的美洲武装斗争的战场基本上应该在农村”。^①头两条据说是为了驳斥不敢开展斗争的革命家和假革命家的失败主义态度的；第三条是一个战略概念，把美洲农村居民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提到了应有的高度。隔了几段，格瓦拉又写道：“某一政府通过人民协商的形式而上台，不管它是不是骗局，至少表面上还是维护了宪法的尊严，游击队由于不是所有合法斗争手段都用完了，所以不能发动游击战。”^②前面的三条在六十年代卡斯特罗主义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个警告则几乎在格瓦拉的书刚刚印完时就被人们忘记了，直到七十年代才又在不讲格瓦拉名字的情况下被拣了起来。

菲德尔·卡斯特罗 1962年2月4日发表的《第二个哈瓦

^① 切·格瓦拉：《游击战》(波哥大)，战斗的青春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中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译者)

^② 《游击战》，中译本，第12页。——译者

那宣言》，是他在头几年中发表的关于古巴道路的最重要的声明。这篇演说是革命的宣言，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卡斯特罗主义”因素，尽管和格瓦拉的那本书一样，它在某些方面和 1967 年充分发展了的提法还是不太一样。卡斯特罗在演说中论证说，在许多拉美国家里，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问道，革命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发生呢？

在美国垄断控制越厉害、寡头势力的剥削越残忍、工农群众的处境越无法忍受的那些国家里，政权必然更加严酷，必然经常实施戒严令，群众的一切不满表示遭受武力镇压，民主道路完全堵塞，统治阶级的残酷本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暴露无遗。那时，才是爆发人民革命的时机。^①

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卡斯特罗说：

在那些人民无路可走的地方，在那些工人和农民受到残酷镇压的地方，在那些美国垄断组织统治特别强的地方，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应该懂得，使人民沉醉于以为现在或将来可以用合法手段推翻统治阶级的徒然无益的如意幻想，那是不适当的，也是不正确的……^②

这两点声明和格瓦拉关于必须一切合法斗争手段都已用完，然后才采取游击战的警告，似乎是差不多的。最大的不同是，到 1962 年，古巴政府早就在积极支持企图推翻卡斯特罗原来的盟友、委内瑞拉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古巴人民致美洲和世界各国人民”，载于《革命事业》杂志（哈瓦那），第 5 卷（1962 年），第 16、22 页。

② 同上，第 23 页。

的游击队员了。

卡斯特罗进一步指出，在美洲不发达国家里，工人阶级“一般说来……是比较弱小的”，但农民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一支潜在力量。然而，由于农民没有文化、闭塞，这就“需要工人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政治领导，没有这点，他们就不能自己单独地展开斗争并赢得胜利”。^① 在这里没有清楚地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或马列主义政党的作用。

《游击战：一种手段》（1963年）在某些方面来说是格瓦拉对拉丁美洲革命的战略战术最全面最成熟的分析。在这本书里，他重申了（他在《游击战》一书中所说的）古巴革命三条基本经验，并长篇地引用了卡斯特罗的《第二个哈瓦那宣言》，从而为他的分析奠定了基础。他接着指出，游击战是“人民战争”，必须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和群众支持才能取得胜利。格瓦拉相信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里客观因素都是非常有利的，虽然并非所有国家游击战的条件都已成熟。^② 他引证卡斯特罗的《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革命斗争不能由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而必须由工人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来领导。格瓦拉接着讲到了“马列主义政党的领袖”，这就又涉及了两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他谈论了游击中心在发动革命中的作用，并且指出了建立游击基地

① 《革命事业》杂志（哈瓦那），第5卷（1962年），第22页。

② 见《游击战：一种手段》，载于《社会主义古巴》（哈瓦那），第3卷，第25期（1963年9月），第1—17页。格瓦拉在1964年12月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的一篇谈话中说，“在美洲，各国人民解放的道路——这也将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里都将用武装斗争来开辟。”转引自迈克尔·洛伊所著《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3年版，第86页。

的必要性。^①

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许多思想，在雷吉斯·德布雷写的《革命的革命？》中得到了发展（有人则说是遭到了歪曲）。这本书是政府支持的美洲之家出版社于1967年1月在哈瓦那出版的。据古巴版“引言”说，德布雷访问了好几个拉美国家的革命者，在这本书出版前不久又在古巴停留了一年多。在古巴期间，他可以看到没有发表的文件，并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等革命领导人谈了很久。“没有一个报道古巴革命的其他作家，能够看到这么多历史研究的素材和资料。”^②德布雷在法文版“引言”里声明说，书中提出的方针，首先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方针。^③

德布雷在这本书里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反驳那种认为古巴革命在西半球不能重复的“危险观点”——他自己也一度有过这种看法。德布雷认为，古巴革命斗争的技术、战术甚至战略原理，为其他争取民族解放的拉美国家提供了一个革命的样板。古巴革命是“通过它极为有利的农村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是靠一支“机动战略部队”，这支部队是人民军和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④

此书用很大篇幅谴责了“进口的政治计划，这些计划乔装

① 格瓦拉：《游击战》，第10、13—14页。

② 引自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为雷吉斯·德布雷的《革命的革命？》一书写的“引言”（哈瓦那），美洲之家出版社，1967年版，第9—10页。据K.S.卡罗尔说，德布雷是在“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下讨论后”写下这本书的，卡斯特罗还“亲自修改和校正了校样”。见卡罗尔写的《当权的游击队员》，第374页。

③ 德布雷：《革命的革命？》（巴黎），罗斯佩罗出版社，1967年版，第10页。

④ 德布雷：《革命的革命？》，西班牙文版，第20页。

成军事路线，被应用于和产生这些概念极不相同的历史环境。武装自卫就属于这种情况，此种概念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去理解武装宣传和游击基地，并最后把游击队当作党的和平时期的组织的一个附件那样从属于党。”^①德布雷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之所以能够有效地领导了古巴革命，正是由于他避免了这些“进口货”，并“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就地〔创造了〕适合于当地地理条件的一种军事理论规则”。^②德布雷一心想把古巴树立为拉美人的样板，以致于严重地歪曲了古巴革命的事实真相，也严重地曲解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第三世界其他革命者的著作和经验。当他有一次承认一本不是古巴人写的著作（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也适用于拉丁美洲时，他认为“幸运”的是古巴人当时并不知道有这部论著，他们是通过自己不断的摸索才学会书中阐明的那些原则的。^③

在书的结尾，德布雷得出结论说：

拉丁美洲革命及其先锋队——古巴革命——从而为国际革命运动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在一定条件下，政治进程是不能和军事进

① 德布雷：《革命的革命？》，西班牙文版，第20页。

② 同上，第16页。

③ 见上书第16页和其他地方。德布雷是一个对他认为错了或不同意他观点的人经常表示公开蔑视的辩论家。当美国《每月评论》杂志的编辑对秘鲁左派革命运动的经验作了他不以为然的解释时，他写道：现在还谈不上他们的文章究竟是“更加阴险呢还是更加可笑”。他还说他们的“不屈不挠的天真的做法”已经接近于“高超的传播假消息的艺术”了。见上书第49页。实际上，这种评价用到他自己身上倒要恰当得多。格瓦拉远不象他那样不屑学习非拉美国家的经验。见格瓦拉1959年的一次谈话，载于罗兰多·博纳奇和内尔松·巴尔德斯的《切·埃尔内斯托·格瓦拉选集》，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出版社，1969年版，第368页。

程区分开来的；两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组织就是人民军队，这个军队的核心是游击部队。先锋党可以以游击中心这种形式存在。游击队就是孕育中的党。^①

这种把军事放在政治之上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游击队员中完全没有统一的政治观点。德布雷说，和古巴当时的情况不同的是，现在的新游击指挥部的意识形态，很清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战士大多数都来自共产党。那些对马列主义准备不足的人，将在人民战争中向和他们进行面对面斗争的敌人学习。当德布雷说“在目前，主要的着重点必须放在发展游击战上，而不是放在加强现有的政党或创造新的政党上”，他是在忠实地阐述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7年所持的立场。^②

在1967年，卡斯特罗认为，谁是拉丁美洲的“真革命”，是根据他对游击战的态度和他在推动群众前进中作出的努力来判断的。所以真革命要末参加或支持本国或他国的游击战，要末在支持外国游击战的同时积极准备在本国进行游击战。“假革命”（在卡斯特罗看来，这个称号适用于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共产党人，特别是委内瑞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本书将在以后详细讨论）则反对、阻碍或积极破坏本国的游击活动，并程度不同地企图与“寡头统治”和“帝国主义”进行合作。假革

① 德布雷：《革命的革命？》，西班牙文版，第90页。

② 见上书，第99、90、94、97页。利奥·休伯曼和保罗·斯威齐合编的《雷吉斯·德布雷与拉美革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8年版），是评论德布雷和他阐述的卡斯特罗道路的集子中写得最好的一本，大都是由同意他的长远的社会主义目标的人写的。并见刘易斯·福伊尔的“新原始主义：被疏远的知识分子的新马克思主义”，载于他写的《马克思和知识分子》一书，（纽约州加登城，铁锚书店，1969年版），第216—28页。

命满足于把积极的革命行动推迟到整个群众已经具有足够的觉悟的时候再去进行。^① 可是，在认为任何拉美国家都不能“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同时，卡斯特罗在1967年8月10日承认，“没有人会如此宗派主义地、会如此教条主义地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人们必须在明天就出动并夺取枪支”。^②

照卡斯特罗的意见，必将成为革命运动核心的游击队，必须一身兼有政治指挥权和军事指挥权。最重要的是，政治领导权不能仅由城市里的党的官员来掌握，尽管象古巴在拉美团结组织会议上提出的报告所说的那样，“革命军是在农村中组织起来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斗争的领导不应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指挥。恰巧相反，无产阶级思想，甚至无产阶级最好的干部，都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列。”^③

1967年3月13日，卡斯特罗在讨论委内瑞拉的游击活动和指责委内瑞拉共产党的过程中说：并不是所有无产阶级政党都牢牢地记住了自己的革命义务。因此他警告说：

假如在哪个国家里，那些自称为共产党的人不知道如何去履行自己的责任的话，那么我们就将支持那些不自称为共产党员但在战斗中和斗争中却表现得象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样的人。因为具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倾向的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总是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今

① 见卡斯特罗1967年3月13日和8月10日的演说，分别载于3月19日和8月20日的《格拉玛报》(哈瓦那)。卡斯特罗在发表在意大利共产党1967年9月22日的《再生》周刊上的一篇谈话中强调了革命首创精神的重要性，引文见下文。

② 《格拉玛报》(哈瓦那)，1967年8月20日。

③ 引自拉美团结组织会议发表的正式英译本。

天自豪地自称为马列主义者的许多人中间，有很多就是通过革命斗争才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①

在整个拉美团结组织会议期间，可以多次明显地看到非常强调“反帝斗争”的拉美特点，常常弄到抹煞马列主义因素的程度。古巴代表团在会上作的长篇报告谈到了马克思和列宁，但着重讲的是拉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以及从西蒙·博利瓦尔到何塞·马蒂再到切·格瓦拉这些美洲革命家。古巴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在博利瓦尔和卡斯特罗的巨幅画像前致了开幕词，又在格瓦拉的巨幅画像前宣布大会闭幕。

拉美团结组织会议的召开，引起了对这个阶段中卡斯特罗主义的国际方面的注意，但是这次哈瓦那会议和古巴在1967年发表的大多数声明，都没有能清楚无误地说出格瓦拉在他去世前一个阶段中最为关切的事情中的一件事。这就是在本半球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对本大陆斗争的关切。在通过他的著作和个人的努力把玻利维亚变成美洲的越南、致力于发展和普及本大陆革命概念，格瓦拉起的作用比任何其他理论家都要大。这个战略，拉美从事武装斗争的游击队员和理论家们早就提出过（其中有道格拉斯·布拉沃和阿夫拉姆·纪廉），当然格瓦拉在1967年之所以坚持这条路线，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和对国际形势发展作出的估计中——特别是从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和非洲的接触中、从1965年美国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伴之而来的革命

^① 《格拉玛报》（哈瓦那），1967年3月19日。

的失败中、以及从越南战争事件中——认识到他应该这样做。在格瓦拉看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要有一支国际战士部队，在重要战略地区牢固地建立游击中心，才能使整个拉美得到解放。

古巴从卡斯特罗主义后退

尽管古巴官方把 1968 年命名为“英雄的游击队员年”，但这一年开始出现了一条较为灵活的路线，并对游击队的美化也有所节制。发生这种变化很可能是由于卡斯特罗必须把他的大部分时间和资源用来解决古巴越来越难维持的经济问题，由于他希望避免与苏联发生进一步的冲突（这种冲突可能危及苏联向古巴继续提供性命攸关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他认识到了卡斯特罗路线在拉美国家一再遭到了失败。更重要的是，由于格瓦拉已经死了，游击中心路线的热烈鼓吹者已经不能再积极参加制订政策的工作了。

卡斯特罗在 1968 年 4 月说，在古巴革命期间，对城市组织所起的作用给的荣誉太少了。关于这些被低估了的力量，卡斯特罗说，“我们相信，到时候所有这些事情都应该说清楚，一切都应该放到它应占的位置上。”^① 这一年晚些时候，西蒙·托雷斯和胡利奥·阿龙德（只说他们是两位“古巴革命者”）在解释了由于“特殊的原因”他们没有能“更加及时地”提出批评以后，他们严厉地批判了德布雷的许多提法，而在此以前这些

^① 《格拉玛报》（哈瓦那），1968 年 4 月 14 日。

提法一直是得到古巴官方和非官方发言人的支持的。^①对于德布雷把“资产阶级的”城市和“革命者的”农村并列起来的提法，他们说：

所谓属于同一实体的、在那里人人看上去都差不多的“城市”和“平原”，这种东西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正好相反。“城市”是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德布雷自称研究过古巴经验（他曾经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这种研究），但如果他连这一点都不知道，那人们只好说他什么都没有弄懂。

他们还攻击德布雷忽略了政治活动，攻击他作出的“人民军队将成为党的核心，而不是相反”的结论。据托雷斯和阿龙德说，当时古巴发生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在古巴，游击中心并没有创造党，相反，是一个具有使它区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非常明确的特点的政治组织——七·二六运动，建立了游击队。”^②

1968年9月，德布雷本人开始从《革命的革命？》的比较极端的立场后退了。他在从玻利维亚卡米里监狱中发出的一封信中说，他的引起争论的著作，不过是一本“政治小册子”，写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在革命的武装斗争高潮正在到来的

① 托雷斯和阿龙德：“德布雷和古巴经验”，载于休伯曼和斯威齐合编的《雷吉斯·德布雷与拉美革命》，第44—62页。一则编者按说，虽然作者们是古巴的革命者，“他们在这篇批判中提出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古巴共产党或古巴领导的立场”（第44页）。这话是在古巴（至少可以说是）严格限制对革命政策发表意见的自由那段时期内说的，这差不多就等于说，政府非正式地赞同这些观点。就是在美国，政府机构也常常提出这样的否认，虽然大家都知道这种否认不是真的。

② 同上，第50—51、57页。

地方,也仅仅在这些地方,对排除影响这个高潮到来的心理、理论和实际障碍出一分力”。他承认“处于最简单、最概要状态的所谓中心论”,“当然是一种乌托邦思想”,但他坚持说“人民战争”可不是乌托邦。^①德布雷在玻利维亚的牢房里认识到,在同盟军问题上,革命者有许多东西要向毛泽东学习。在讨论了中国历史经验以后,德布雷说:

在总体上把握住每一个形势、每一个历史关头的同时,还必须用二和三来进行分析:战略上的二和策略上的三。这里,我们发现了左倾主义的根本错误:见二不见三。因为如果只有两个阵营,那么自然就只有两个实体——劳工和资本,以及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不错,阵营是只有两个,但却存在着三种力量,如果革命阵营想取得胜利,那就必须扩大到能包括革命成败所系的关键力量,这种关键力量可能是农民,也可能是小资产阶级,也可能是农民加上小资产阶级。左倾主义者——他们是二元论者和摩尼主义者——无法实现成功的同盟军政策。制订正确政策的基础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极端势力。”^②

德布雷在1971年获释后发表的一篇谈话中承认,《革命的革命?》颇有一些肤浅的论战味道,他承认对拉美的情况还有待

① 致休伯曼和斯威齐的信,发表在1969年2月的《每月评论》(纽约)上。

② 雷吉斯·德布雷:《狱中写作》,纽约,兰多姆出版社,1973年版,第125—26页。最后一句话引自《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1年版,第4卷,第171页。(在引用毛主席的话时,原文中把“顽固势力”改成了“极端势力”。——译者)

于作出比他所提出的分析更加认真的分析。^①

在 1969 年，古巴从坚持在整个拉丁美洲搞游击战的立场向后退的迹象更加清楚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年中发表的、在两年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一篇声明里宣布：

我们并没有感到不耐烦。我们一点也不着急。我们将等待和注视着那些〔拉美〕国家一个个地和过去决裂，一个个地起来进行他们的革命。……我们必须等多久呢？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当然任何人都应该因此而认为我们必须等那么久。^②

很可能是由于采取了这种立场——在措辞上和拉美几个亲苏的共产党采取的并在 1967 年受到卡斯特罗攻击的立场相仿——所以在年中停止了哈瓦那对委内瑞拉和智利革命者的定期广播。

在拉美团结组织时期如此一心一意地支持了游击战以后，在对那些不执行他们路线的人进行了如此过份的指责以后，古巴领袖们在他们向后退的几年中显然感到很不自在。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处于防御地位，就象委内瑞拉共产党的领袖们在 1966 年后从游击战进行“策略上的退却”期间所感到的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委内瑞拉游击队员这次在古巴的窘境中也出了名。就象卡斯特罗在几年前攻击委内瑞拉共产党一样，道格拉斯·布拉沃——他很可能是拉丁美洲最有名的游击队领导人，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他也是古巴人所特

① 《终点》(圣地亚哥)，1971 年 1 月 5 日。

② 1969 年 7 月 14 日的讲话，载于 1969 年 7 月 20 日的《格拉玛报》(哈瓦那)。

别喜爱的人——对卡斯特罗进行了攻击，说这位古巴领袖已经卖身投靠苏联。在一些次要的卡斯特罗派游击队提出了类似的指责以后，卡斯特罗在1970年4月进行了反击：

古巴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拒绝为革命运动提供支援。但这不能和对随便什么假革命〔或〕革命的破坏者——那些本来有机会发动革命战争，〔但〕却破坏并毁灭了这种机会的人——提供支援混为一谈。……

那种假革命自然不能指望从古巴得到任何帮助。啊！可是象切这样的革命者，象切这样准备战斗和牺牲的革命者，这样的革命者永远可以指望从古巴得到援助。^①

然后，他又说了下面一段话，为极不相同的运动和拉美现政府打开了古巴援助之门：

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只要有为了从那个帝国主义手中把他们的人民解放出来而准备进行斗争的战士存在，古巴革命就将给予支持。……当我们说支持一个革命运动的时候，我们应该说，这种支持并不一定专门是给游击运动的，而是包括任何真诚地实行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一种有把它的国家从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政策的政府。不管这个政府是通过什么道路取得政权的，古巴都将给以支持。^②

1972年6月中旬，《格拉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阐明了古巴对拉美各国政府的态度，这种态度到七十年代中期还是继续有效的。社论说：“我国愿意和那些独立的、愿意用实现

① 《格拉玛报》（哈瓦那），1970年5月3日。

② 同上。

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实际步骤来表明和证明它们的行为的政府建立关系。”^①

1975年1月在哈瓦那和墨西哥记者谈话的那个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拉美团结组织时代的那个暴躁的革命者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了。他在这次谈话中说：古巴革命向拉美人证明了“抵抗帝国主义”是可能的。但是，在拉丁美洲还看不到立即进行古巴那样的彻底革命的前景，因为革命的客观条件虽已具备，但革命的主观条件还不成熟，尽管墨西哥、巴拿马、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发生了“积极的、演进的变化”。在1975年6月在哈瓦那召开的共产党会议上，以及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76年2月于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古巴明确地表明了它和拉美的亲苏政策是一致的。^②

古巴对其他国家革命的支持

从游击队员在古巴取得政权开始，所谓的“输出革命”立即就成了卡斯特罗主义中引起争论的主要问题。1962年2月14日，即卡斯特罗发表《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十天以后，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就在他的政府成立三周年的那一天指责委内瑞拉游击队员“通过共产党俄国设在哈瓦那的分支机构从俄国获得武器和经费”。^③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委

^① 《格拉玛报》(哈瓦那),1972年6月18日。

^② 分别见1975年1月10日《至上报》(墨西哥城)和1976年3月7日《格拉玛报》(哈瓦那)。

^③ 引自美洲国家组织特别安全协商委员会发表的《初步的总报告》(华盛顿),美洲国家组织,1962年版,第41页。

员会在 1963 年 12 月就贝坦科尔特政府对古巴的指责作了调查以后,在 1964 年初提出报告说,“委内瑞拉共和国已经成为一系列行动的目标,这些行动是古巴政府发起和指挥的,其目的是要用恐怖活动、袭击和游击战等手段公然颠覆委内瑞拉组织机构,并推翻委内瑞拉民主政府。”^① 这个报告导致了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长们在 1964 年 7 月对古巴实行外交、经济制裁,其结果是,古巴和墨西哥以外的所有拉美国家之间的正式关系破裂了。

1974 年 11 月,美洲国家组织第一次采取正式步骤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尽管乌拉圭等国的代表控诉说古巴继续在支持各种形式的颠覆活动,但大多数外长都认为已不宜对古巴继续实行制裁。取消制裁的决议没有得到为通过这个决议所必须的三分之二票数的同意,所以尽管拉美各国政府都越来越无视这个 1964 年的决议,它在 1974 年年底还仍然有效。直到 1975 年 7 月,美洲国家组织才正式取消了制裁。

1975 年 1 月,古巴副总理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试图在输出革命和援助革命之间划一条界线:

我们常常讲要援助革命,但从来没有说要输出革命。每当不可能用民主的办法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特别是每当这种改革由于美国和中央情报局的干涉而受到阻挠的时候,古巴决不放弃它和那些希望实现这种改革的人进行合作的权利和义务。举例来说,象巴拉圭这种情况,

^① “第九次外交部长协商会议决议”,载于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出版的《美洲国家关系》(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72 年 10 月 10 日,第 189—93 页。

我们可以不派遣武装部队而为革命者提供援助。而对智利,自然我们将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援助那里的革命者,以便推翻皮诺切特政府。^①

罗德里格斯说古巴领导人没有谈论过要输出革命,这是对的,但事实是他们曾经企图这么干。他们1959年最初相当天真而不成功的努力,是针对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的独裁者的。最重要的一次尝试是1966年到1967年由格瓦拉领导的玻利维亚暴动。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他为格瓦拉日记写的引言中说,格瓦拉身边带的一个“小小的由有经验的游击战士组成的核心小组,差不多全是他在马埃斯特腊山时的同志”。格瓦拉和古巴人的领导作用,在1967年缴获和发表的全部游击队员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②此外,玻利维亚互相竞争的主要左派人士在有一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格瓦拉没有给他们和其他玻利维亚人任何领导作战的机会。格瓦拉日记本身就证明,在许多时候,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建立的民族解放军内大多数游击队员都是古巴人(例如,在6月初,二十五个队员中有十七个是古巴人),日记也证明了没有农民的支持,得到玻利维亚其他方面的支持也极少。

同时,古巴对外国革命者的援助,是多年来更加重要得多的争论的问题。古巴领导人早就笼统地承认过给外国革命者

^① 《日报》(墨西哥城),1975年1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声明:“没有任何人能够输出革命或者用战争把革命强加于人。”但是他又说,“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各国人民起来革命,将来完全是属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格拉玛报》(哈瓦那),1976年3月7日。

^② 见丹尼尔·詹姆斯编的《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全部日记及其他缴获文件》,纽约,斯坦——戴伊出版社,1968年。这本书收入了格瓦拉和他的三个古巴助手的全部日记。

提供援助。例如，1964年11月拉美共产党会议就允诺要给几个国家的游击队提供“积极的支援”。1967年5月18日，在人们发现几个古巴人参加了游击队在委内瑞拉海岸的登陆行动以后，一向很少发表声明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它发出的一个文件里说：“我们被指控帮助了革命运动，十分正确，我们正在并将继续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所有革命运动提供援助，只要它们提出这种要求。”声明争辩说，美国是拉丁美洲真正的侵略者，而古巴的帮助不过是为了使拉丁美洲人能够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手中把他们自己解放出来。^① 1970年4月22日，卡斯特罗在回答道格拉斯·布拉沃和其他拉美游击队员关于古巴已经停止支援革命者的指责时说（见前面的引语），真正的革命者永远可以指望从古巴得到支援。古巴和拉美游击队在此后几年中的最重要的接触，发生在阿连德时期的智利。

古巴在1975年下半年采取了行动（这对许多观察家来说是没有料想到的），表明它是履行它对真正的革命者作出的这个诺言的；它向安哥拉派遣了一万二千名军队，去帮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革命斗争。1975年10月初，古巴驻联合国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谈到这件事时说，由于“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对安哥拉进行“可耻的干涉”，古巴的“基本责任就是向安哥拉人民提供为保证他们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完全的主权所必需的任何援助”。^② 当这个行动正在安哥拉进行的时候，《古巴共和国宪法》颁布了（1976年2月），阐

^① 《格拉玛报》（哈瓦那），1967年5月21日。

^② 里卡多·阿拉尔孔的话，载于《格拉玛报》（哈瓦那），1975年10月26日。

述了古巴为世界各地革命者提供援助的官方立场。根据新宪法(第十二条),古巴“恪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各国人民战斗团结的原则”,“承认武装抵抗侵略、征服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合法性;并认为向被进攻者和争取解放的各国人民提供帮助是它的国际主义权利和义务”。^① 1976年5月底,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在墨西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详细阐述了古巴的新政策。据墨西哥城《至上报》日报报道,罗德里格斯在5月27日说,只有在遭到外国侵略的国家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古巴才会出兵拉丁美洲。他又说,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古巴也不是非进行干涉不可。在作出决定以前,古巴政府将研究是什么类型的侵略,谁在受到进攻,在国际事务中是个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古巴的行动将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六十年代初期,古巴建立了游击队训练营,主要中心设在马埃斯特腊山的米纳斯德尔弗里奥。美国中央情报局1965年4月报告说,配备了苏联顾问的古巴情报总局,在1960年到1964年间单单给委内瑞拉游击队提供的经费就有一百多万美元。在1967年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开会期间,《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古巴情报总局“现在每月花费一百一十万美元支援加紧进行的拉美游击战”,“大部分经费〔都用于〕训练暴动者,自从卡斯特罗上台以来,大约有三千名拉美人已经在哈瓦那接受了训练,并且已回到自己的国家”。^② 从六十年代中

^① 《格拉玛报》(哈瓦那),1976年3月7日。

^②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见美国国会众议院美洲事务小组委员会出版的《拉丁美洲共产主义》(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5年版,第120—23页。《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卡尔·T·罗恩写的,1967年6月18日发表。还可参阅胡安·德奥尼斯发表在1967年8月2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据有些估计说,受过训练的游击队员的数字是好几个三千。

期开始,对训练非洲革命者也给予了认真的注意。^①

在六十年代末,古巴情报总局一个名叫奥尔兰多·卡斯特罗·伊达尔戈的叛逃者报告说,曼努埃拉·皮涅罗领导的情报总局,负责为受训者提供经费、情报训练、假文件、旅行安排和联络,而古巴革命武装部队则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②

据卡斯特罗·伊达尔戈说,自从1967年和1968年游击队受挫以来,对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有可能成为学员的人审查得更加仔细了。同时,受到苏联越来越大的影响的古巴官员,已经决定不向外国革命组织派遣古巴军事领导人,除非那里的斗争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当地的领袖又向古巴人发出这种邀请。就象上文所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自己在1970年4月22日就说过,有必要对自称为革命者的人进行比过去更加仔细、更加严格的审查,因为有些不配得到古巴援助的“骗子”就设法得到过相当多的援助。^③一位于1971年下半年在伦敦叛逃的古巴情报官员说,圣地亚哥(智利)是古巴支持拉美革命者的新基地。这立即遭到阿连德政府的否认。尽管如此,智利在阿连德时期确实是卡斯特罗派的一个活动

^① 切·格瓦拉在到玻利维亚作战以前,自己就到非洲去过。据报道,到1976年初,在安哥拉、刚果(布)、坦桑尼亚、几内亚、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比绍)、索马里和塞拉勒窝内都有数量不等的古巴军队;见《华盛顿明星晚报》,1976年1月23日。

^② 前情报总局官员奥尔兰多·卡斯特罗·伊达尔戈的这番话,是从他在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1969年10月16日作证时说的话中找出来的,载于《美国受到来自加勒比海的共产党威胁》(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9年版;第二十部分,也载于比较通俗的《为非德尔当间谍》一书,迈阿密,迈阿密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1974年12月,皮涅罗被任命为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美洲处处长。

^③ 《格拉玛报》(哈瓦那),1970年5月3日;并见上文。

中心,这一方面是由于智利左派革命运动很有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许多卡斯特罗派民族主义者从附近的拉美国家——特别是从乌拉圭、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西——涌到了这个国家。

古巴和社会主义世界

在 1959 年到 1976 年期间,古巴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关系比它和拉美国家的关系要复杂得多。然而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除对古巴的拉美政策和对拉美马列主义政党及其战略有影响者外,不是这里研究主要关心的问题。因此,本节和本书其他有关部分,只能简单地讨论一下。

在 1959 年到 1962 年 10 月、11 月导弹危机这段时期内,除了 1962 年初卡斯特罗对执行苏联路线的老共产党人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进行清洗而使苏古关系出现一些紧张外,古巴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态度总的说来是越来越热的。苏联对美国禁止装运进攻性武器的舰只驶往古巴的反应,加上从岛上撤走导弹一举,产生了几重要的反响:(1) 古巴政府对苏联单方面做出的决定十分恼火,对苏联的许诺及苏联意图的怀疑,似乎在六十年代后来的整整几年影响着古巴的判断和政策。可是,由于古巴对苏联和东欧的依赖越来越深,而且认识到将来还须要它更多的援助,古巴虽然受到这样的耻辱也没有和苏联决裂。(2) 在许多古巴人的心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由于中国在导弹危机期间和以后对卡斯特的政策给予了广泛的、无保留的支持而上升了。然而,尽管许多古巴人赞成中国的革命总路线而不赞成苏联的总路线,中国人

无法满足古巴政府的经济和军事需要。(3) 苏联对古巴政府的“背叛”，也使许多拉美革命者(包括有些共产党人)对苏联履行它所承担的革命允诺所抱的幻想破灭了。这种情况在好几年中加强了卡斯特罗派和新兴的亲华革命势力在拉美的地位。

在此后的十五个月中，卡斯特罗在1963年4至5月和1964年1月到苏联去了两次(但没有到中国去)，得到了苏联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以固定的高价购买古巴食糖、以及保证提供防御性援助的诺言；在苏联，卡斯特罗在一些意识形态声明上签了字——这些声明可以被解释为在中苏争端中赞成苏联立场。尽管发生了这些情况，古巴对中苏争端的立场在1964年11月哈瓦那共产党会议以前一直是处于矛盾状态的。这次会议，古巴只邀请能够为苏联接受的共产党参加，它欢迎苏联派观察员出席而没有欢迎中国派观察员，它还接受了苏联提出的在会后发表的公报。^①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他摆出的亲苏姿态。

在卡斯特罗两次访苏和1964年哈瓦那会议以后，虽然他没有公开宣布他赞成哪一方，中国人对他自己所作的承诺越来越迟疑了。(从中国的观点看，拒绝介入冲突，拒绝谴责混进革命队伍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本身就是亲苏立场。)就象上一章所讲的，1966年古巴和中国发生了严重分裂。两国各自在1967年召回了大使，从而在四年之间没有高级外交关系。古苏关系就象在其他章节讲到的那样，在1966年也开始走下坡路，到1967年至1968年达到了低潮。

^① 公报首先由塔斯社于1965年1月18日发表；全文收入了附录一。

在这个十年中，古巴领导人在整个国际事务中，猜疑态度越来越增长，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苏古、中古关系问题。这种态度最清楚地反映在1967年8月10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对拉美团结组织会议代表发表的演说中，在这次演说中，这位古巴总理攻击了世界上许多不同类型的组织，据他说这些组织正在阴谋反对他，反对古巴革命，反对他演说那天听众所代表的游击队以及其他拉美游击队。他的谴责针对着(1)美国政府，据他说美国政府应对派遣从事颠复古巴革命和暗杀他的活动的中央情报局特务负责(八个被指控为这种特务的古巴人在会上示众了)；(2)所有的拉美国家(墨西哥除外)，这些国家在美洲国家组织里曾原谅美国在本半球进行的“侵略”，却在最近响应委内瑞拉劳尔·莱昂尼总统在1967年6月提出的指责，谴责“古巴的侵略”；(3)委内瑞拉共产党，它“背叛”了委内瑞拉革命，据说还正在为其他拉美共产党发动的对古巴的攻击充当先锋；(4)其他未被点名的拉美共产党，它们的思想非常陈旧，非常教条，已经不再是革命的了；(5)那些“社会主义”政府(没有点名，但人们认为指的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府)，它们为拉美“寡头统治”提供援助，因而使游击队的活动更加困难；以及(6)古巴的一个“小宗派”，它一向都“系统地反对所有的革命思想，反对我国人民最深刻、最诚挚、最纯洁的革命态度，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以及所有一切思想”。^①在8月10日，卡斯特罗甚至没有费心重申他正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古政策。

然后在1968年8月，使卡斯特罗在拉美各地的追随者相

^① 《格拉玛报》(哈瓦那)，1967年8月20日。

当不安的是，卡斯特罗以有批判地赞同在苏联领导下入侵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而重新加入亲苏阵营。8月23日，卡斯特罗这样来为他的立场辩解：(1)“任何开始得到帝国主义报刊的赞扬、支持或热烈鼓掌的事情，很自然开始引起我们的怀疑。”(2)“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正在走向反革命，走向资本主义，正在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我们认为必须绝对地不惜一切代价采取这种或那种办法阻止这种事件发生。”(3)苏联和参与这一事件的东欧国家“作出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只能从政治观点而不能从法律观点来解释。毫无合法性可言。……唯一的理由只能是这个简单的政治事实：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走向反革命，而这严重地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①

中苏在乌苏里江发生边界冲突以后不到几个星期，在1969年年中召开的一次国际共产党会议上，一位重要的古巴领导人使他的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站到了苏联的后面，虽然他还没有指名谴责中国。“我们在这个讲坛上宣布，”他说，“在任何决定性的对抗中——不管是苏联在面临帝国主义阴谋把某些国家拉出社会主义体系的危险时采取的行动所引起的对抗，还是由于来自无论何处的对苏联人民的挑衅或侵略引起的对抗——古巴都将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②

在六十年代后期，在总的国际政策问题上，古巴人同意中国领导人的意见的时候比他们同意苏联领导人意见的时候要

① 《格拉玛报》(哈瓦那)，1968年8月25日。

②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1969年5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的讲话；见《格拉玛报》(哈瓦那)，1969年6月15日。

多得多,虽然这一点任何一个有关的党都很少指出。举例说,在国际上,中国人和古巴人在下列问题上都程度不同地反对苏联的观点和立场:(1)在大多数国家里采用非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2)“和平共处”;(3)关于世界基本矛盾,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不发达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才是基本矛盾,而不是苏联所说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4)关于限制和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协定,至少在当前条件下是这样;以及(5)关于援助拉美“寡头政治”。古巴之所以拒绝和中国站在一起,似乎主要是由于古巴需要广泛的经济、军事援助——这是中国人无法提供的——以及古巴担心拉美武装革命的鼓吹者可能把中国道路而不是把古巴道路作为榜样。

就象在别处指出过的那样,从1970年到1976年上半年本书写作时,古巴和苏联的关系变得比任何时候都亲热。这种亲热劲在菲德尔·卡斯特罗1973年1月3日宣布的五点经济协定里体现出来了。该协定(1)规定原定于1959年到1973年1月偿还的苏联给古巴的贷款(估计在四十亿美元以上,还不包括军事援助在内),将延期到1986年开始偿还,二十五年内还清,不计利息;(2)提供贷款,用来支付古巴在1973年至1975年期间对苏贸易中将出现的贸易逆差,此项贷款从1986年开始偿还,在二十五年中还清,不计利息;(3)列出了双边贸易及广泛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合作的项目;以及(4)保证从1973年到1980年苏联将以每磅十一分的价格购买古巴食糖,以每吨五千美元的价格购买古巴镍、钴产品。此外,还提供了新贷款,主要用于镍工业和其他方面的投资,在

二十五年内还清,按“极低的利率”计算利息。^①古巴在拉美共产党1975年6月的声明上签字,标志着卡斯特罗在政治上已经完全重新加入了苏联阵营。他在1976年2月25日向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说中说,苏联社会充满了“乐观、胜利和信心”,在“物质、社会、道德各方面都在不断前进”。他称赞苏联鼓舞了世界各地所有的真正革命者,保卫了小国的独立,捍卫了世界和平,并为全人类点燃了人道主义的希望。在国际关系上,苏联是“执行国际主义、互相谅解、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的模范”。在和古巴政府的交往中,苏联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东西,从来没有提出什么条件或者企图告诉古巴人应该做什么。“在长久以来一直受私利和实力支配的国际关系史上,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一个强国和一个弱国之间有过这样的兄弟般的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有这样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②

如果说到1976年初古巴对苏联的颂扬已经是异乎寻常地热烈的话,那么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评却是非常严厉、毫不留情的。1975年6月拉美共产党的声明,其中包含了从1966年中古冲突达到高潮以来对中国人提出的第一次明确的指名谴责,古巴人也是同意的。但真正使古巴批评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动肝火的,是中国在1975年末和1976年

① 《格拉玛报》(哈瓦那),1973年1月14日,并见1月21日该报。关于古巴欠下的苏联经济债务数额的估计,引自1973年1月5日《纽约时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70年4月22日承认,十年中古巴从苏联得到了价值十五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见《格拉玛报》,1970年5月3日。

② 《格拉玛报》(哈瓦那),1976年4月7日。

初执行的安哥拉政策，这比中国保持它和智利军政府的关系更加使古巴人脑火。《格拉玛报》1976年1月27日的社论说，“安哥拉事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世界揭示了毛主义者和各国人民取得独立、主权、平等和进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结成可耻的联盟”。2月17日的社论说，终于“假面具掉下来了”，全世界都看到“毛主义者和最疯狂的帝国主义者、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和平的敌人以及各国人民解放和进步的敌人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是一致的”。卡斯特罗在向苏共代表大会发表的讲话中宣布，“真正的历史决不是由反动分子、中伤者、阴谋分子或叛徒写成的，不管他们是叫法西斯主义者、资产阶级还是毛主义者，因为历史本身将把他们全都扫除掉”。^①

小 结

古巴对拉美的分析，和中国的分析一样，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六十年代初广泛支持游击战，到六十年代中期和后期教条地坚持只能按照一个国家的单一样板搞革命，最后到七十年代则执行一条灵活得多的路线。古巴在头十年中实行的那些政策，部分地是由于受到（来自美国的）国际压力，同时也由于（共产党世界内部）存在着竞争，但这首先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的革命观的反映。这位古巴领袖是个不耐烦的革命者。（亲苏和亲华的共产党人常常说他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虽然他们都鼓吹武装斗争，卡斯特罗对革命战争的看法和

^① 1月27日和2月17日的社论分别见2月8日和2月29日的《格拉玛报》；卡斯特罗的演说见3月7日的《格拉玛报》。

毛泽东是很不相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夺取政权中成功地应用的那些革命斗争的诀窍（进行政治训练，对军事行动实行明确的政治领导，用统一战线争取群众支持以孤立敌人），古巴革命者常常故意置之不顾。^①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来说，他们对“主观”因素（如人的觉悟，个人的决心，行动之勇敢）比对“客观”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掌握的物资，等等）强调得更利害。举例来说，1967年9月在意大利共产党一家周刊上发表了卡斯特罗的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中，卡斯特罗强调了革命积极性的重要。他说，即使有的国家不具备有利的客观条件，真正的革命者也很可能发动革命。（他说古巴当时的客观条件就不是都是有利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很好的客观条件，但是没有真正的革命者，革命也不可能发生。^②

这话有它很正确的一面。在一个昏天黑地、危机四伏的国家里，如果有一个组织严密的优秀分子的革命小组（这是卡斯特罗分子所向往的）采取无与伦比的果断行动，是完全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如果这个小组能象1917年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做的，以及五十年代后期卡斯特罗自己所做的那样提出一个温和的短期纲领以争取群众的支援的话，这个革命进程的前景就更好了。）但是卡斯特罗分子把革命积极性强调

① 这种倾向从卡斯特罗在1959年至1960年间对国内工业象对在古巴的外国工业一样实行国有化这种做法上表现出来。具有共产党性质的人民社会党引用中国共产党的例子争辩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的技术应该加以利用。可参看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的《革命团结、人民团结和阶级斗争》和其他文章，《今日报》（哈瓦那），1960年8月19日。

② 《再生》，罗马，1967年9月22日。

得过分了，特别在 1967 年更是如此。古巴领导人几乎完全不顾各国具体条件，提出了一个委内瑞拉游击队领导人道格拉斯·布拉沃恰当地称之为革命的“教条主义小处方”这样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卡斯特罗派的发言人曾经敦促使用温和的口号（他们当时不相信这种办法）来争取人民大众的暂时支持，而是支持一条看上去正直、诚实但明摆着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路线。在这个统一战线问题上，古巴的立场和苏联及中国的立场是断然不同的，苏中都反对在这个阶段中在大多数拉美国家立即进行武装斗争。苏联路线主张在可能的地方应该广泛参加国家事务；中国路线（即使在最教条的时期）认识到有必要通过政治行动建立起群众基础；而古巴战略则指望一小队游击队员（小马达）大打武装的前卫战，用这个办法把群众（大马达）发动起来，这显然是优秀分子向往的路线。

应该指出，在本书写作期间，在与拉美社会各阶层结成统一战线和进行合作问题上，古巴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卡斯特罗自己在 1959 年以前的战略就是争取古巴人民的广泛支持，当时他也赢得了这种支持。可是到《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发表的时候（1962 年），卡斯特罗却转而反对人们谈论很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了。在古巴，不顾具有共产党性质的人民社会党的强烈告诫，这个阶层已经在国有化中被化光了。在国际上，古巴也开始支援企图用暴力推翻委内瑞拉民主选举产生的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武装集团；卡斯特罗对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的不信任，在《第二个哈瓦那宣言》中从理论上表露出来了。

这十年中的后五年，是农村游击中心的黄金时代。游击

中心亦即公认的优秀分子先锋队(列宁早在 1902 年就宣布有必要组织这样的先锋队),它原来没有群众的支持而想在斗争中获得这种支持。游击中心的目标是争取拉美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拉美不成熟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给古巴人的目标投上了不真实的辉光。召开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的目的,本来是想把拉美所有“真正的革命者”——即那些能够团结群众的人——的代表联合起来,但是卡斯特罗发表的闭幕词几乎把会议变成了偏执狂病情研究会。由于卡斯特罗在六十年代后期到 1975 年中对拉美条件在看法上发生了变化,以及由于他的政府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国内国际压力,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受到的压力,古巴政府在比过去广泛得多的拉美人士身上看到了一些革命潜力。

起源于古巴革命的(然而歪曲了古巴经验的)、专门从事农村斗争的拉美团结组织时期的卡斯特罗主义,在有些国家证明是无效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对游击队员们简直是一个灾难。尽管如此,卡斯特罗派农村游击队仍然对六十年代后期出现在乌拉圭、巴西、阿根廷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城市游击队产生过重大影响,为它们提供有成效的和没有成效的作战方式的例子。主要由南美战士自己发展起来的城市游击斗争,得到了卡斯特罗不同程度的支持。到 1976 年,古巴外交政策中的卡斯特罗主义因素和拉美团结组织年代比较起来已经是微不足道了。这样说当然不是否认在七十年代中期古巴对几个拉美政府采取的公开敌视态度。

古巴干涉安哥拉,与其说是输出革命(就象在格瓦拉领导下在玻利维亚发生的那样),倒不如说是大规模的帮助。这和

六十年代初期向委内瑞拉游击队提供援助在性质上是相似的,不过是规模不同而已。确实,这个干涉在许多方面和北越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卷入南越是差不多的,只有这一点不一样:古巴人在安哥拉(就象美国人在越南那样)是置身于远离家乡的汪洋大海之中。到1976年初,古巴参与这场外国“民族解放战争”,已经在许多拉美人士中引起了默默的关切,再加上古巴支持波多黎各独立,古巴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又重新公开紧张起来了。

第三章 拉丁美洲的亲苏党

拉丁美洲所有的马列主义组织，在 1959 年到 1976 年的整个阶段或部分时间里，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苏联、中国和古巴政府的政策和活动的影响。但这些组织的立场、成功和失败，主要还是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本章将综合国际、国内因素，对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拉美各种自称为共产党的组织的发展和活动作一些研究。

背 景

亲苏的共产党是 1959 年至 1976 年间拉美马列主义组织中为数最多、种类最杂、但是并非总是最重要的组织。在大多数国家里，这些党的组织和领导，实质上就是 1959 年前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争取拉美共产党人友谊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也没有引起公开反苏。但是，中苏争端一起来，这些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只有几年的联系，跟它们和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中结成的亲密关系以及由之而得到的种种好处，是无法相比的。

拉美共产党有一些很突出的特点：在整个历史上，它们在国际关系上一向效忠并听命于苏联，在内政问题上也乐于接受苏联的指导。1951 年，一位著名的智共小说家写道：“对

苏联的爱，是人们在世界上所能够热爱的一切东西的总和，是所有伟大的感情、所有最纯洁、最高尚的感情的总和。……我不知道人们怎么能设想今天竟会有爱自己祖国而不同时以最深厚的感情热爱苏联的真正的爱国者。”^① 这样的阿谀奉承在 1945 年前是司空见惯的，但在 1959 年到 1976 年间已经很少看到了，虽然也有乌拉圭共产党这样的例子出现——这个党是如此热心支持 1968 年苏联侵捷，以致于刚刚访问过乌拉圭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吉乌利亚诺·佩杰泰写出这样的话：乌拉圭共产党简直“比天主教教皇的天主教味道还重”。^② 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说，在形容智利共产党以及智共和苏联的关系时，他比较喜欢用“sovietinchas”（苏联迷）这个词，而不大喜欢用“prosovieticos”（亲苏分子），因为第一个词带有狂慕者或支持者的意思。^③ 虽然亲苏党里也有少数反对苏联路线的，但这种极少的例外反而着重说明了该党整个服从于苏联意志的程度。只有具有强烈的独立倾向的墨西哥共产党以及具有强烈的卡斯特罗主义倾向的多米尼加共产党拒不赞同苏联等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尽管这种占领最后导致了委内端拉共产党的分裂。只有多米尼加共产党一个党拒绝在 1969 年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主要文件上签字，虽然有几个党对文件中有些地方表示了保留意见。

① 这位小说家就是豪尔赫·阿马多(Jorge Amado)，见他写的《和平世界》(里约热内卢，胜利出版社，1952年版)，第 16—17 页。英译文见波皮诺所著《拉丁美洲国际共运史》，第 167 页。

② 佩杰泰的评论发表于《行动报》(蒙得维的亚)，1968 年 11 月 6 日。

③ 《世纪报》(圣地亚哥)，1973 年 2 月 1 日。

在 1959 至 1976 年间，拉美共产党人在国内问题上一般都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这样说可能是很准确的，但是对这句话必须恰如其分地理解其含义。差不多所有著名的拉美共产党领导人，都是由于苏共的训练和支持才得有这样的地位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自由有多大（有时候是相当大的），一般说是有限的。当他们走得太远的时候，苏共就进行干涉，以使他们痛改前非或是从党内开除出去。受纪律处分最多的是那些亲华的持不同政见的党员，在实际上，这些分子在感到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对他们的努力无动于衷时就主动退党，另外组织对立的新党。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论。在有些国家，如巴西和秘鲁，重要的党员也和其他具有亲华观点的党员一起被开除出党了。可是发生过两起情况必须特别提一下：六十年代中期的巴拉圭事件和 1968 年到 1970 年间的委内瑞拉事件。

1965 年，巴拉圭共产党在苏联共产党支持下成立了由亲苏派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 1967 年把巴拉圭共产党总书记奥斯卡·克雷德特开除出党了。对这个多年的领袖提出的罪状是，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亲华分子心慈手软，在处理党内事务时飞扬跋扈、独断专行。1968 年 2 月，克雷德特致电菲德尔·卡斯特罗，支持卡斯特罗对古巴亲苏“小宗派”提出起诉，同时趁此机会谴责了苏联干涉他自己的党的事务。^①委内瑞拉共产党的党内冲突，是随着委共表示赞成侵占捷克

^① 关于克雷德特事件，见《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1966)年》〔以下简称《共务年鉴》〕(斯坦福市，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66 年版)，第 243—44 页；《共务年鉴(1968 年)》，第 463—65 页；《共务年鉴(1969 年)》，第 659—63 页。关于古巴“小宗派”事件，见《共务年鉴(1969 年)》，第 191—92 页。

斯洛伐克而公开化的。这种冲突首先在大家称之为委内瑞拉的罗赫尔·加劳迪的特奥多罗·佩特科夫的两本书里表露出来。佩特科夫指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指责苏联破坏一次富有成果的地方分权、富灵活性、面向国内的社会主义试验。他在书中说，委内瑞拉共产党是官僚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他请求党修改或者放弃它对革命阶段、阶级联盟、共产党的先锋作用、言论自由以及民主集中制的错误解释。到1970年末委共分裂的时候，佩特科夫已经有五名委共政治局委员、二十二名中央委员、相当一部分党员以及绝大多数共青团员加入到他的行列了。苏共则积极支持以党的总书记赫苏斯·法利亚为首的“忠诚的”委共党员。^①

在六十年代拉美共产党发生分裂时，大多数老资格的共产党领导人——大多数党的领导人都是老资格——都有种种理由要保持他们对莫斯科的忠心。绝大多数人都明显地喜欢苏联领导人通常鼓励的那种温和的国内战略，而不大喜欢中国人和古巴人建议的比较激进的战略。这种偏爱是从他们在

^① 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最重要的攻击之一，是A·莫西涅夫的一篇长文，此文登载于1970年10月20日的《真理报》（莫斯科），委共《人民论坛报》11月5日曾予转载。鲁道夫·希廖泼尼可夫——劳尔·卡斯特罗在1968年曾指责他干涉古巴内政——一到加拉加斯，《真理报》这篇文章马上就出现了。人们普遍地把他的委内瑞拉之行解释为苏联干涉委共事务。1970年12月以前一直是委共中央委员及苏联外围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埃莱亚萨·迪亚斯·兰赫尔写道：委共领袖们是在接到苏联发出的信号后才采取措施对付佩特科夫的。见我编的《拉美共产主义事务年鉴》（斯坦福市，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2年版）中写的一篇文章，第158—67页。

关于苏联在1919年到五十年代干涉拉美共产党事务的实例，见罗伯特·J·亚历山大写的“中苏分裂对拉美共产主义的影响”载于唐纳德·E·赫尔曼编的《拉美共潮》（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5—38页。

苏联受到的训练和在拉丁美洲得到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此外，有些领导人曾在过去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或是现在的苏联国际外围组织（如世界工会联合会或世界和平理事会）里担任要职。大多数高级党员以及一些中级党员有的已经到欧洲和苏联免费旅行过，有的则期望能够作这么一次旅行。党的领导人在国内碰到麻烦时，过去都可以在苏联集团国家里找到舒适的避难所。苏共曾对他们的党提供过训练和其他实实在在的援助。所以拉美共产党人在中苏、古苏争端爆发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发他们转而起来反对苏联。

党的组织

在本书研究的这些年间，在包括圭亚那（1966年前一直是英国属地英属圭亚那）在内的整个加勒比海地区、中美及南美的共和国里，都有和苏联共产党保持着关系的拉美共产党——它们大多在中苏争端中公开亲苏。在这些年中，党的人数、力量及其成就的变化情况，国与国间有很大不同，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相差也很悬殊。

有没有合法地位，对衡量1959年到1976年期间的拉美亲苏党并无多大意义。有些党在整个阶段或大部分时间都是合法的，可以进行活动，而其他一些党则是不合法的，被强制取缔的。大多数党的情况是处于两者之间。有几个党在整个阶段或大部分时间是合法的，但在选举等活动中则受到限制；其他的一些党，有的是不合法的，有的被禁止，有的被宣布为非法，但都可以比较自由地参与国家事务。以下面几个党为列：

(1) 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共产党，这两个党在整个时期都是合法的，但是却受国家法规的限制，不能充分参加国家事务。

(2) 智利和乌拉圭共产党，这两个党在十七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南美最活跃、最重要的党，在1973年以前两党都是合法的。

(3) 委内瑞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共产党，这些党在大约一半时间内都是合法的，虽然这种合法的实际意义在各国差别极大。（例如，可以比较一下六十年代初期阿共受到的种种限制和七十年代委共享的种种自由。）

(4) 哥斯达黎加、巴西和秘鲁共产党，这些党在整个时期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非法地位，但有时却能相当自由地进行活动，并取得不小的成效，巴西党在六十年代初期以及其他两党在七十年代就是这样。

(5) 海地、危地马拉和巴拉圭共产党，这些党在整个时期都是受到严格取缔的。

要想弄清本书探讨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大小特别不容易。大多数党都不公布它们的党员人数；即使公布了，所说的数字也是很值得怀疑的。任何争取扩大自己影响和提高自己在全国的名声的党都很容易夸大自己的党员数字。有时候，公布的数字显然是互相矛盾或不确切的，或简直是不可能的，或者是这些情况兼而有之。^①即使这些数字是准确的，也无疑包括

^① 例如，刘易斯·科尔巴兰在1972年初宣称智利共产党有“二十五万左右”党员（《世纪报》[圣地亚哥]，2月13日），而奥尔兰多·米利亚斯在三个月后则说有十二万党员（见上报，5月21日）。

许多(也许半数以上)挂名党员在内。有的党常常只是简单地宣布党员人数已增加了百分之多少,也不讲基数是多少,或者说在某一阶段内已经增加了多少人。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在本书研究期间大多每年公布一次各国共产党党员的估计数字。虽然情报研究司的数字不过是猜想数字,是一些有资格的观察家——甚至是国务院的人——对其准确性提出了怀疑的数字,这些数字还是给人们提供 1959 年到 1974 年间各个

表一：拉美各国共产党党员估计数字

国 家	1959	1963	1966	1969	1973
阿 根 廷	70—80,000	40—50,000	60,000	60,000	70,000
玻利维亚	4,000	4—5,000	4,000	4,000	1,500
巴 西	50,000	30,000	20,000	15,000	6,000
智 利	20—25,000	25—30,000	30,000	45,000	120,000
哥伦比亚	5,000	10—12,000	10,000	8,000	10,000
哥斯达黎加	300	300	450	600	1,000
厄瓜多尔	1,000	2—3,000	1,000	750	500
萨尔瓦多	1,000	500	200	200	125
危地马拉	1,200	1,300	1,000	750	750
洪都拉斯	400	2,000	1,300	300	300
墨 西 哥	5,000	3,000	5,000	5,000	5,000
尼加拉瓜	200	2—300	200	200	100
巴 拿 马	—	3—500	500	250	500
巴 拉 圭	500	3—4,000	5,000	5,000	3,500
秘 鲁	6,000	8—9,000	2,000	2,000	2,000
乌 拉 圭	5,000	10,000	15,000	21,000	22,000
委内瑞拉	40,000	30,000	10,000	5,000	8,000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世界各国共产党组织之实力》(华盛顿，1960年，1964年、1967年、1970年、1974年版)。

时期拉美各国共产党规模大小最系统的印象。^①

和本书要讨论的其他“无产阶级先锋队”一样，这些党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它们在城市建立中心点作为基地，有时也报道说它们的基层党员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工人党员。（智利和乌拉圭共产党在1970年宣称各有百分之六十八和百分之七十三的工人党员）这些党对农民问题讲了不少道理，但是不到农民中去开展广泛的有效的的工作，这部分地是因为农村中非共产党或反共产党的影响往往要大一些，政治组织工作比城市也要难做一些。

党的活动

大多数拉美共产党都把自己最大的注意力放在工人和知识分子身上，特别是放在工会和大学里的工人、知识分子身上。考虑到这些党的规模，应该说通过它们的努力在有些国家取得的效果是很不简单的，在有些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取得了勉强的胜利。

劳工运动 许多通常互相联系的因素决定了拉美亲苏党组织劳工运动的成就。这些因素是：(1)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某一地区的工业化程度；(2)人员从农业地区流入城市；(3)工人的“无产阶级”觉悟水平；(4)工人加入工会的程度；(5)是否还有其他强大的非共产党或反共产党的劳工运动存在；(6)

^① 在二十六年中每年出版一次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组织之实力》，在1974年停出了。从1966年开始出版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和中央情报局的《全国基本情报资料》中可以找到这些年来的估计数字。

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团结还是存在冲突的；(7)现政府究竟给共产党及其劳工领袖多少自由；(8)共产党控制的劳工组织在全国取得有影响的地位后生产率达到的高度；以及(9)国际上对这个党的劳工运动支持或反对到什么程度，是什么样的支持或反对。

在智利、乌拉圭和秘鲁，亲苏的共产党在这个时期极其广泛和有效地参加了正式组织的工会活动。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圭亚那和哥斯达黎加，共产党的作用就差一点，但仍然值得注意。虽然其他一些国家（如萨尔瓦多）的亲苏劳工运动在将来可能会变得重要起来，但在1959年到1976年还很难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并对其重要性加以准确的估量。

在乌拉圭，乌拉圭共产党控制了从1964年到1973年整个期间起作用的两大主要工会——乌拉圭工人中心以及1966年成立的全国工人大会。虽然全国工人大会的多数会员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乌拉圭共产党控制了大会的决策机构。大会在1973年年中被宣布为非法以前，主要用号召全国大罢工和工人停工的办法积极反对政府的经济和劳工政策。在乌拉圭游击活动最频繁的那几年，特别是在1969年和1971年间，有一个富于战斗性的派别对乌共领袖们的控制提出了挑战，但是始终没有能实现接管。1966年和1968年，乌拉圭政府就它所说的苏联大使馆官员插手劳工事务一事将使馆官员驱逐出境。1969年，全国工人大会书记恩里克·帕斯托里诺被任命为苏联外围组织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主席，他是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个拉丁美洲人。到1976年他还继续担任着这个

职务。

在秘鲁，秘鲁共产党在 1968 年组织了秘鲁总工会。到 1972 年，总工会和早就成立的秘鲁工人联合会已经差不多大了。1973 年自称有三十五万会员的秘鲁总工会，在会外必须面对新成立的秘鲁革命工人中央组织这个受政府支持的竞争者，在会内又受到一些极端分子的反对。总工会听命于秘鲁共产党，总的说来支持秘鲁军政府的政策，但对于秘鲁革命工人中央组织和政府的一个组织，即更早建立的、到 1976 年几乎已经停止活动的声援社会动员全国组织，则表示严重的保留，它显然把这两个组织看作是在秘鲁人民中和它争夺影响的竞争者。

其他一些国家的亲苏党在全国劳工运动中的影响要小一些。在阿根廷，主要工会组织总工会是庇隆主义分子领导的。阿根廷共产党控制了一个小得多的工会统一运动，它主要在科尔多瓦和门多萨活动。在玻利维亚，两个主要工会的影响，是随着由较同情党或由不很同情党的总统起来而时起时落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在玻利维亚矿工联合会和玻利维亚工人中心中很活跃，但是没有能控制住这两个组织。在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共产党控制了哥伦比亚工人工会联合会。这个联合会自称在六十年代中期有十五万左右会员，到 1975 年增至二十多万人。但是应该指出，在七十年代中期，这个组织内部发生了很大纠纷，这种纠纷起于倾向中国的独立革命工人运动。^①

^① 见丹尼尔·普雷莫：“哥伦比亚”，《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1976 年）》，第 457 页。

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共产党控制了委内瑞拉工人统一联合会。这个工会虽小，但在全国工会运动中很活跃。1970年委内瑞拉共产党发生分裂，工人统一联合会也因此受到削弱。在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共产党是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和几个农村小工会的主要力量。联合会自称在七十年代中期有六万党员。在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控制着一个小小的哥斯达黎加总工会。在圭亚那，契迪·贾根的人民进步党的工会活动，主要是由圭亚那农业工人工会在糖业工人中开展的。

青年运动 拉美马列主义者对他们国家的青年非常注意，对大学生尤其如此。这些学生不但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有些人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在国家事务中发生影响。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他们的活动从领导游击斗争到在全国立法机构中供职。不但如此，特别在国立大学里（与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不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按照左倾的——常常是马列主义的——思想思考问题、主张采取有力的政治行动分子。他们常常充满空想，没有等待的耐心，不愿受制约人的职责的约束。

许多国家具有形形色色马列主义思想的学生，还由于一些其他因素而得到了帮助。作为拉丁美洲几十年来进行大学改革的结果，有些国家实行的大学自治使校园成为执法军官无法进入的避难所。此外，由于大多数大学实行“联合政府”的原则，使学生在管理机构中有着强有力的发言权，马列主义活动分子有时就能用威吓教员或不让开除“职业学生”——即那些在学校呆了十年、十多年主要搞政治鼓动的人——的办法来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

对于学生易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特点，拉美马列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和实践中都注意到了。已故的中美亲苏党员和诗人罗克·达尔顿·加西亚在1966年说过，拉美工人参加革命斗争往往行动滞缓，而学生“对社会政治问题〔则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性”。^①这种现象使有些“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正统党员感到不安，达尔顿本人就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可是，不管这是否是隐患，拉美共产党人还是不顾一切利用了这一人力资源。一位亲苏的委内瑞拉党员竟然吹嘘说，他的党能够在二十四小时内动员二万名加拉加斯学生，并“把他们送到所有的斗争前线”。^②

亲苏的共产党人一向都能成功地接触智利、委内瑞拉和乌拉圭的青年，然而在哥伦比亚等几个国家，共产党只是有时候和在局部地方有些影响。学生工作（一般都是由党的青年组织负责的）做得如何，常常决定于和大学里的非共产党组织的竞争情况，但同样重要地决定于和其他马列主义组织是合作还是冲突。

六十年代中期共产党用游击战反对贝坦科尔特和莱昂内尔政府，委内瑞拉作出了重要榜样。在那些年代，委内瑞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特别对赞成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大学生更是如此；青年联盟和左派革命运动的青年组织联合在一起，控制了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许多政治活动。六十年代后期，在委内瑞拉共产党放弃游击道路之后，

① 引自《青年学生与拉美革命》，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9卷，第3期（1966年3月），第55页。

② 爱德华·马查多的话，见《新人民之声报》（加拉加斯），1968年5月3日。

委内瑞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左派革命运动青年组织也决裂了，但青年联盟有时单独有时则和其他左派组织一起在大学里保持了它的支配地位。1970年末，青年联盟控制了委内瑞拉八个大学中心联合会中的五个。可是委内瑞拉共产党在1970年年底分裂的时候，大多数年轻人都抛弃了亲苏的委共而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列。

在乌拉圭，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在乌拉圭大学生联合会中起很大的有时甚至是支配的作用。它还在中学生中进行工作，并支持工人罢工和停工。和它的母党一样，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对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活跃在乌拉圭的城市游击队持温和的批评态度。1973年它被政府禁止而停止了活动。

在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在大学政治中能发挥一些影响，但有时因为联盟成员之间发生争论以及它和它的母党哥伦比亚共产党之间意见分歧而使它的影响受到削弱。许多青年都反对哥共支持苏联在1968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在“极左”分子影响下，青年联盟在参加选举等问题上也反对哥共。在七十年代，哥共一再批评左派青年不团结，矛头主要是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毛主义者的。

在其他拉美国家也有亲苏的青年团体，尽管它们的作用常常由于组织小以及左派学生中存在不和而受到了限制。在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由于六十年代后期激烈的内部斗争而陷于四分五裂；到1975年，联合会稍为恢复了一些元气，声称拥有将近六万会员，但还远远不及庇隆主义青年组织。在墨西哥1968年学生大罢课中，亲苏的共产党青年组织

在发动和结束罢课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圭亚那、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共产党的青年团体有一定的影响。圭亚那进步青年组织一向是契迪·贾根的主要支持力量。

战略和策略

拉美各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程度不同地取决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的国际政策，以及各国在各个时期具有的极其不同的条件和革命时机。考虑到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的复杂情况，考虑到对马列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马列主义水平也很不一样，对亲苏组织和其他组织发表各种各样不同的而且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分析，就不足为怪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这些分歧通常都被故意缩小了，其原因是：(1)亲苏党有时积极参加游击行动，而苏联对一些国家的武装斗争表示愿意赞同，对另外一些国家则准备加以原谅；(2)中国人赞成拉美革命走“古巴道路”，还没有开始号召建立亲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党；以及(3)古巴人当时发出的在拉美进行武装斗争的号召，不象后来那样绝对化。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三方都各自提出自己独特的战略，简直要把其他两方逐出革命阵营。七十年代中期，马列主义政党的党内冲突减少了，但是并没有消失。

在争论最烈的那些年分中，亲苏党一般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比其他马列主义者有着更大的灵活性。他们能够较快地使自己的政策适应于新的情况，但是(从一种敌对的观点看来)也可以说他们有时候是突然从一条路线跳到另一条路线，

缺乏毛主义者和卡斯特罗分子的政策中清楚反映出来的坚持性、信心和忠于原则的精神。下面几页将通过探讨亲苏党对四个基本问题——革命的性质和阶段，取得政权的道路，革命领导权和统一战线——采取的态度和进行的活动，讲一讲亲苏党的立场。

革命的几个阶段 亲苏党差不多总是号召分两个阶段进行革命：第一阶段实行推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即寡头、半封建、垄断资本势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民族解放革命，第二阶段建立社会主义。这种路线的一个典型声明，在乌拉圭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决议（1970年12月）中表现出来。总决议宣称，必须认识到拉美的社会经济变革是由“两个阶段，即反帝和社会主义阶段组成的”，这两个阶段必须加以区别，但它们又是“同一个继续革命过程”中的组成部分。^①

取得政权的道路 据亲苏党的看法，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可以通过武装斗争、非武装斗争、或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相结合这三种方式实现。党的官员们选择非武装道路的时候，常常因为受到毛主义和卡斯特罗派组织的批评而处于守势，因此就一再声明，对任何一种斗争形式都不能机械地全盘否定。

非武装斗争 非武装斗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活动（有如上述）和参加选举。只要允许，亲苏党几乎全都参加选举。如果由于法律上的障碍他们不能公开参加，他们常常花很大力气同其他政治团体一起采取联合行

^① 《学习》杂志（蒙得维的亚），1971年1月—2月。

动（一般只有小团体愿意和他们结合）；所以共产党候选人往往是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旗帜下寻求并偶尔取得一些职位的。从1959年到1976年，在大约一半拉美国家里都有共产党人先后被选担任公职，虽然他们在地方、省和全国的政务或立法机构中取得的不过是几个象征性的席位。

尽管许多亲苏的共产党执行的基本上是一条非武装斗争路线，在斗争中很少或者毫无成果，但有两个党在全国选举中总能得到很多群众支持，有三个党在民族解放革命中采取协同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下面就谈谈拉美共产党实行非武装斗争道路的最重要的情况。智利党的经验，本书第七章将作详细讨论，这里就不谈了。

契迪·贾根等人于1950年建立的圭亚那人民进步党，在拉美的亲苏党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在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这个党宣布它是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民族主义党。可是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这个党因为思想和种族上的分歧而开始分裂，结果又组织了一个对立的人民全国大会党，由福布斯·伯纳姆领导。从1957年到1964年，人民进步党是英属圭亚那的执政党。在1964年选举中，人民进步党得票最多（百分之四十六）。但是英国政府通过一条新法律，规定立法机构必须根据比例代表制组成。由于没有其他党愿意和基本上全是印度人组成的人民进步党共事，已经成为主要反对党的人民全国大会党就和保守的联合力量党共同组织了统一战线政府。人民全国大会党在1966年（国家改称圭亚那时）主持了独立庆典，从那时起到1976年，该党一直统治这个国家。人民进步党在1968年得到百分之三十

七的选票，1973年得到的选票为百分之二十六，尽管贾根指责说在选举中发生了许多不正当的行为，并在1976年年中以前一直抵制参加议会的一切活动。虽然人民进步党的一些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是马列主义者，而且党的国际政策也总是和苏联的国际政策一致的，但大多数基层党员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1969年契迪·贾根采取明确措施和苏共结成联盟以前，人民进步党一直没有被正式接纳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1969年以后，苏联领袖们才承认它是真正的共产党。贾根在采取这个行动以前，显然没有告诉大多数党的官员并取得他们的同意，所以接着发生了一些退党和开除出党事件。

许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推出候选人竞选政治职务。从下面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一些共产党参加竞选活动的性质和重要性。

除圭亚那以外，最重要的非武装斗争道路的试验，发生在智利和乌拉圭。在1958年的选举中乌拉圭共产党赢得了百分之二·六的选票，在此后十三年中慢慢地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者。1962年，共产党带头组织了左派解放阵线。这是几个左派小组织结成的集团，在1971年广泛阵线成立以前，一直是充当乌共参加全国选举活动的主要工具。左派解放阵线从来没有拉走民族党(白党)和左右乌拉圭政治达几十年之久的红党多少选票；1962年左派解放阵线得了百分之三·五的票，1966年得百分之五·七。1970年智利人民联盟的经验大大鼓舞了乌拉圭共产党，因而它在1971年加入了广泛阵线(左派政党、运动和左派人士的联盟，比起左派解放阵线来，

在乌拉圭人民中代表的面要广得多),参加范围很大的统一战线。1971年乌共采纳了广泛阵线的纲领,作为自己的最低纲领。它的目标包括:(1)取消政府对付图帕马罗斯游击队的安全措施;(2)在所有教育机构中实现充分自治;(3)实行土地改革;(4)对银行和对外贸易实行国有化;(5)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断绝往来;(6)和一切国家建立商务和外交关系;(7)结束物价和收入的控制;以及(8)恢复警察的“民事”职能。^①1971年初,共和国大学进行的调查表明,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的选民准备投广泛阵线的票。可是,在进行了一阵得到图帕马罗斯暗中支持的竞选活动以后,广泛阵线在11月28日的选举中只得到百分之十八的选票,这在多方阻拦选举少数党候选人的选举制度下,已经是相当可观的票数了。在这个总数中,左派解放阵线得票百分之六·一;乌拉圭共产党的几个最高级官员,包括总书记罗德内·阿里斯门迪在内,被选进了全国议会。

阿根廷共产党在1959年到1976年间在议会里没有多少席位,因为阿根廷的文官政府只是偶尔出现的,共产党很少能在选举中自由地提出自己的候选人。1958年2月,阿共支持阿图罗·弗朗迪西(在1958年到1962年间当权)竞选总统,但是这位新总统上台后不久完全改变了他的竞选诺言,因此该党又转而起来反对这位新总统。阿根廷共产党在1962年3月的选举中支持了庇隆主义候选人,并在使阿图罗·伊利亚得以上台的1963年7月总统选举中,号召人民不要参加投

^① 见广泛阵线纲领,载于1971年2月18日的《人民报》(蒙得维的亚),以及广泛阵线总统候选人利瓦尔·塞雷尼将军的声明,载于同年8月26日的《人民报》。

票。(伊利亚在 1963 年到 1966 年执政。)在 1973 年 3 月举行的下一次选举中,阿根廷共产党参加了革命人民联盟,这个联盟共得了百分之七·四的选票。有两名共产党员当上了众议员,然而在他们当选以前人们很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在 1973 年 8 月举行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阿根廷共产党决定在下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支持胡安·庇隆竞选总统。

委内瑞拉共产党积极参加了推翻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政府的活动(1958 年 1 月斗争取得胜利)。在 1958 年 12 月的选举中,它强烈反对民主行动党的总统候选人。为了使他落选,支持了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海军上将——1958 年统治这个国家的临时政务会的首脑——为总统候选人,但是没有当选。在这次选举中,委共在全国共得百分之四·八的票,但在联邦区却得了百分之十六·五的票,比民主行动党还要多。委共和贝坦科尔特政府(1959 年—1964 年)的关系越来越坏,于是他们和人们称之为左派革命运动的民主行动党内的不满分子一起搞城市恐怖活动,结果在 1962 年 5 月被“暂时取消”了合法地位。这末一来,委共干脆就公开走上反政府的游击战道路。1967 年 4 月,委共决定“暂时”不搞游击战,争取重新获得合法地位。1969 年 3 月,它又得到了合法地位。委共在前进联盟的旗帜下参加了 1968 年的选举,仅仅得了百分之二·八的票。1970 年,委共的力量由于内讧而严重地削弱了,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决裂出去另外组织了社会主义运动。^①在 1973 年 12 月的选举中,委共得票百分之一·

^① 关于 1970 年的分裂,见《拉美共产主义事务年鉴》中我写的关于委内瑞拉的那一章,第 158—67 页。

一,社会主义运动得票百分之五·二。

在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共产党由于存在着全国阵线的协议(自1958年起开始实行,一直到1974年都具有约束力)而不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因为协议规定只有自由党或保守党党员才能参加选举,担任公职。1968年对协议进行了修改,规定其他党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参加省议会和市政会的竞选。六十年代初期,哥伦比亚共产党曾设法做自由党左翼的工作,特别是在1962年到1967年之间在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领导下离开自由党而单独行动的自由革命运动内部做工作来影响选举。当1967年洛佩斯·米切尔森带着大多数自由革命运动成员重新和自由党人携手合作时,哥共就只能和剩下来的一帮持不同政见者——人民自由革命运动——共事了。虽然在1970年哥共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参加省议会和市政会的选举(但它没有参加全部省市的选举),它必须通过人民自由革命运动——自由党分裂出去的小派别——才能竞选全国议会的席位。人民自由革命运动在一些非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得到了百分之二·一的选票,它只给了哥共三个全国议会(共二百零四席)、六个省议会(共四百零六席)和一百个市政会(共七千六百九十七席)席位。在总统选举中,哥共力主弃权。1972年哥共得到八个省议会席位和一百零四个市政会席位。在1974年选举中,哥共通过全国反对党联盟在各级参加了竞选,联盟得了百分之二·六的票,给了哥共两个下院席位。

在墨西哥,墨西哥共产党由于党员人数(约五千人)大大低于参加选举必须具备的最低数字(七万五千人)而未能参加

竞选。在立法机构中有几个亲共的社会主义人民党席位(社会主义人民党的领袖叫维森廷·隆巴多·托莱达诺,是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担任苏联外围组织拉美劳工联盟的头头,在他1968年逝世前一直是这个党的领导人)。在1959年到1974年间,社会主义人民党在这个只提供含糊的投票数字的制度中平均得票百分之一左右,1968年票数最多,有百分之二·三。^①

在哥斯达黎加,非法的共产党——人民先锋党——在六十年代初期支持其他党派和阵线,在1962年有一个同情者被选进了全国立法机构。在1966年的选举中,人民先锋党设法组织了一个阵线,但这个阵线在投票之前就被立法院取缔了。人民先锋党的缔造者和总书记曼努埃尔·莫拉在1970年作为社会行动党的候选人被选进了国会。1974年他作为社会行动党的候选人竞选总统,大约得票百分之二。

在秘鲁,共产党人在1968年推翻民选的(但已不再受人民欢迎的)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政府的政变发生以前,一直以其他党派的身份或以阵线的名义参加选举(很少成果)。这个亲苏党在政变后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一个能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初步措施的人民政府。1969年初公布的秘鲁共产党章程说,秘共的目标是“把秘鲁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消灭一切封建残余;结束种族和民族歧视;以及剥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权力”。^②在对

^① 关于墨西哥的投票数字,见唐纳德·马布里所著《墨西哥的国家行动党》,(锡拉丘兹,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70—73页。

^② 见1968年11月1日《团结报》(利马);以及《秘鲁共产党章程》(利马,1969年版)。

胡安·贝拉斯科将军领导的政变进行了一段批评以后，秘共发现军政府领导人实施的政策就是他们通常期望“人民政府”能够实施的那些政策。因此从1969年初开始，秘鲁亲苏的共产党人就积极支持贝拉斯科政府发动的、后来又于1975年末1976年初在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领导下继续进行的“反帝反寡头革命”的大多数政策。秘共曾在1973年11月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它对军政府的范围广泛的支持作了说明，这种支持一直到1976年还在继续。

武装斗争——智利、圭亚那、乌拉圭共产党是非武装道路的主要实践者，而武装道路的主要发言人则有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党，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更是如此。1965年末，一位危地马拉高级共产党员写道，由于拉美统治者和美帝国主义越来越蛮横地抗拒实行变革，“显然使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得不采取能在今天推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的现实的道路——用武装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暴力和反动行动”。^①危地马拉劳动党总书记在1966年下半年发表的一篇重要分析文章中说，危地马拉共产党人相信，危地马拉存在着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虽然主观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主观条件是在武装斗争过程中逐步成熟的。1965年3月，这位官员报道说，危地马拉劳动党已经决定，武装斗争采取的形式将是

革命的人民战争，而不是短暂的武装起义或是创造使战争无法进一步发展的孤立的小块游击抵抗区。……进行

^① 何塞·曼努埃尔·福尔图尼：“拉丁美洲的革命变得更困难了吗？”，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8卷，第8期（1965年8月），第39—40页。

革命的人民战争是以具备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这些条件将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成熟起来，也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些条件，才能从组织上、政治上和军事上使人民军队作好举行最后起义并夺取胜利的准备。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进一步指出了该国武装斗争的两个特点：战争的持久性——战争将接连经过几个阶段；以及战争的人民性——人民认识到事业的正义性，将越来越支持战争并逐渐参加进来。^①可是中央委员会 1966 年 6 月的决议又号召“把政治、武装、经济和社会斗争恰当地结合起来”。^②这种同时采取和平和暴力策略的做法，在危地马拉劳动党党员中间引起了争论，也引起了劳动党和这个国家的两个主要游击组织——起义军和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争论。劳动党失掉了起义军的合作（以及六十年代中期对起义军的相当大的控制），第一次显露出危地马拉亲苏路线和卡斯特罗路线的明显区别。^③

委内瑞拉共产党只搞了很少几年武装斗争，但是事实证明，它的经验在六十年代后期对拉美所有马列主义者都有特殊的意义。委内瑞拉共产党人在推翻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时（1958 年 1 月）以及此后一段时期，在国家事务中曾

① 贝尔纳多·阿尔瓦拉多·蒙松：“危地马拉革命的几个问题”，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 9 卷，第 10 期（1966 年 10 月），第 42 页。

② 何塞·曼努埃尔·福尔图尼：“政治形势与革命策略”，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 10 卷，第 2 期（1967 年 2 月），第 61 页。

③ 本书第五章讨论了这次分裂。雷吉斯·德布雷除了古巴以外只赞扬过一个拉美共产党，即危地马拉劳动党。他说劳动党在 1965 年“得到了新生并恢复了活力”；见德布雷《革命的革命？》，西班牙文版，第 34 页。

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从民选的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政府(1959年到1964年)就职那天起,它就反对这个政府。在进行了几年激烈的批评和城市恐怖活动以后,委共在1964年4月感到必须把农村游击队或游击战作为主要斗争形式。卡洛斯·洛佩斯在1964年下半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报道说,委共中央委员会在1964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

仔细地研究了把武装斗争和其他斗争形式对立起来的思想,并得出结论说,这是一种表面的、学究式的而不是辩证的态度。阶级斗争的经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罢工、农民争取贷款的斗争、或是为反对某些措施而进行的抗议运动,虽然都是以最最和平的方式开始,但却总是在敌人使用的暴力中结束的。

在洛佩斯看来,

为了收到进行各种形式斗争的综合效果(这反过来又促进主要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必须利用多种斗争形式,使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同时我们强调,武装斗争从根本上来说也必须是群众斗争,必须把武装斗争理解为群众斗争的最高表现。^①

委内瑞拉共产党与左派革命运动合作,通过民族解放军开展了军事活动,并在开初几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可是到1965年末,有些委共领导人开始认为,把重点放在游击战上并不能实现共产党的目标。接着花了好几年时间摆脱游击战,这在政治局和各级党组织中引起了一些冲突。1966年4

^① 洛佩斯:“委内瑞拉共产党和目前形势”,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7卷,第10期(1964年10月),第25、26页。

月，包括委共政治局委员道格拉斯·布拉沃在内的五位游击队领导人总揽一切问题的决定权以后，委共丧失了对民族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控制。1966年5月，布拉沃被清除出政治局，1967年4月，又在委共中央全会上被开除出党。

委共在公开声明中引用了列宁的语录来证明退出游击战是正确的，在内部文件中又利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威来说服在战场上的游击队员。^① 1968年，特奥多罗·佩特科夫向委内瑞拉人保证说，对委共来说，“武装行动仍旧是主要的方法，因为没有任何革命、没有任何民主变革能不经过武装行动而得到实现”，但是由于游击战缺乏群众支持，委共已决定“主要通过选举活动着重进行政治方面的斗争”。^②

虽然海地和巴拉圭共产党（它们的大多数党员都在流放中）等几个亲苏党在七十年代还强调有必要立即开展武装斗争，但大多数拉美共产党已经基本上或完全改搞非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相结合 有些亲苏的共产党人极力为同时使用“一切斗争形式”辩护，特别是其他国家的革命者这样做的时候更是如此，尽管这种辩护常常带来一些问题。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1966年3月到4月），罗德内·阿里斯门迪说，

在整个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都在使用一切方法进行斗争（根据不同情况，有的是同时有的是交替使用这些方法）

^① 关于第一种例子，见胡安·罗德里格斯的文章，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10卷，第9期（1967年9月），第81页。关于第二种例子，见《内幕新闻》（加拉加斯），第38期（1967年2月）。

^② 见“委内瑞拉选举前的气候”——特奥多罗·佩特科夫访问记，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11卷，第4期（1968年4月），第62页。

——合法的或非法的，议会里或议会外的，造反或游击战的。……随着斗争的扩大，各国人民〔认识到列宁要求〕精通适合实际条件的一切斗争形式，正在克服刻板地把各种不同斗争形式对立起来的思想。^①

在本书研究的大部分时间里，哥伦比亚共产党都极力主张使用所有的斗争形式。^②哥共在1966年到1967年就操纵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尽管哥共在后期已经不那么强调武装斗争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甚至主张参加1970年的大选，但在投票以后两天又重新搞起零星的军事行动。^③有几个党有时候也想采用这种路线。

革命的领导权和革命的同盟军 正如在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上亲苏党中有种种不同的立场一样，在领导权和革命力量的组成问题上也有相当大的灵活性。问题是要避免走到“右”的和“左”的极端。前者是由于同盟军过于广泛，使共产党人有可能无法掌握革命方向。后者则会导致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孤立，使他们无从建立广泛的革命阵线。在六十年代初期，大多数拉美党常常发现自己被孤立于重大的革命运动甚至改良运动之外，而不是在领导这些运动。1962年夏天，

① 《情况通报》，第74到77期（合订本）（1966年），第103—104页。

② 关于这种立场的代表性声明，见哥共总书记希尔维托·维埃拉的两篇文章：“哥伦比亚军国主义的增长和共产党的路线”，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6卷，第4期（1963年4月），第17—19页；和“列宁——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革命战略家”，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13卷，第5期（1970年5月），特别是第22页。

③ 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参加选举号召书，载于1970年4月9日的《无产者之声报》（波哥大）。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组织了一个讨论会，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共产党的官员们参加了这个讨论会。会上的发言一再表明共产党人对这种孤立很重视。许多领导人公开承认，党内关于取得政权的道路和统一战线的争论、群众缺乏革命观点、以及其他左派政党不愿和共产党人进行合作——这些因素使共产党取得广泛的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前景变得非常遥远。讨论会结束前的总结发言，强调了共产党人有责任建立“民主力量”的广泛阵线。总结发言在再次说明工人最可靠的同盟军是农民的同时，也号召必须根据各国具体情况从学生、自由职业者、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中吸取力量。工人阶级必须领导统一战线。但为了领导，本身必须统一。无产阶级在艰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威信，终将使它能够取得领导权。^①

一位著名的危地马拉共产党人在1964年初写的文章中——很明显，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把它的许多方面应用于整个拉丁美洲——承认共产党在大多数国家的工人和农民中都没有力量。作者承认，近几年来，危地马拉大多数革命行动，都是城市中等阶层搞的。接着他总结说，“在思想上和阶级地位上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城市中等阶层，显然将如古巴经验所已经证明的那样在拉丁美洲革命中起重要作用，而且不单是在反帝阶段是这样。”同时，这些阶层带来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行动方法，所以他们就不可能永远是无产阶

^① 见讨论会发言节录，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布拉格)，第6卷，第1期(1963年1月)，第67—83页；A·M·鲁勉采夫的结束语，见第81—82页。

级的同盟军。^①

在1965年,这种自我批评的气氛达到了顶点。危地马拉共产党领导人何塞·曼努埃尔·福尔图尼试图解释为什么拉美无产阶级先锋队“落后”了,而且一般都不起多大作用。他写道:有些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例如,(特别在1928年到1935年期间)共产国际曾把一套刻板的公式硬加给拉美共产党人,结果形成了“教条主义和狭隘性”。虽然共产国际在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条比较有创造性的路线,但拉美共产党人仍然受到“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束缚。拉美党的许多政策,都是错误地完全为不成熟的、不发达的城市工人阶级制订的,“没有什么用”,它们对农业劳动者和中等阶层则很少或毫不注意。它们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在目前就是不能在反帝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此外,党至今也没有能使人民看到社会主义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没有能很好处理宗教、知识分子、文学和艺术问题。^②一位巴西领导人补充说,“把共产党人说成是极权主义统治和不民主统治的支持者,至今还是反共宣传中一个中心的、并非总是不起作用的论点”,这一点在拉丁美洲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严重。^③

一年以后,上述观点中的若干条又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出

① 乌戈·巴里奥斯·克莱:“革命形势和危地马拉人民的解放斗争”,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7卷,第3期(1964年3月),第19页。

② 福尔图尼:“拉丁美洲的革命变得更困难了吗?”,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8卷,第8期(1965年8月),第42—44页。并见路易斯·菲格罗亚:“拉美工人阶级运动的几个问题”,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9卷,第3期(1966年3月),第64页。

③ 佩德罗·莫塔·利马:“革命进程与拉美民主”,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8卷,第8期(1965年8月),第50页。

现了。这一次是一位著名的萨尔瓦多共产党人写的。罗克·达尔顿在论述拉美革命中的青年学生时写道，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说，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社会先锋，因而“不管它目前的政治觉悟水平如何，不管它在特定时期参加具体政治斗争的程度如何”，它“总是最进步的阶级”。可是在许多拉美国家里，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领导阶级。同时，越来越清楚的是，资产阶级不能起到它在欧洲起过的作用。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公众领导真空”，使军队、知识分子、学生、官僚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能够在“更长时期”内起到比他们在欧洲起过的“更大更独立的政治作用”。在安第斯山脉上段的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里，学生“常常是革命先锋队中最积极最活动的部分，是把当时的革命压力传送到在客观上对斗争感兴趣的其他社会集团和阶级的一种社会起爆剂（或催化剂）”。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唤醒工人阶级，启发他们觉悟，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当先锋队作用暂时由学生或其他非无产阶级阶层承当起来的时候，必须迅速地把群众吸收到斗争中来，以免被孤立甚至遭到失败。先锋队是“发动群众斗争这个‘大引擎’的‘小引擎’”。^①同时，实际上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理论上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之间的差别，也由智利共产党的一位著名劳工领袖提出来了。^②

① 达尔顿：《青年学生与拉美革命》，第53—61页。可把这句话和德布雷提到的劳尔·卡斯特罗的一句话作一个比较。他把游击中心说成是“发动群众这个‘大马达’的‘小马达’”。见德布雷：《革命的革命？》，西班牙文版，第69页。

② 菲格罗亚：《拉美工人阶级运动的几个问题》，第64页。这位智利工人统一工会主席警告说，共产党人不要老是绝对地讲“应该”怎么样，弄得自己也以为“应该”发生的事好象真的已经发生了一样。

随后几年,当需要进行重大的结构革命的时候,许多亲苏的共产党人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方面变得越来越直言不讳了。1968年3月,苏联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维克多·伏尔斯基,发表了一篇关于拉美各国人民斗争“新阶段”的文章。这篇文章最初登载在3月19日的《真理报》上,接着在拉美各地亲苏报刊上全文或摘要转载,得到了这些报刊的赞同。文章说,

拉美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现在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五十年代,当资本主义总危机正在发展的时候,劳动人民还相信有可能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实现进步的社会变革,相信民族资产阶级的建设潜力,还愿意在许多方面支持和追随它。现在,有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被寡头集团和军方压垮,其他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已被古巴革命吓倒,它们再也不能独立地进行任何认真的社会、经济改革了。更加明显的是,这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斗争才能得到实现。在目前阶段,进步力量,首先是共产党,正前所未有地赋予自己一个基本任务,这就是在各国人民的这场斗争中取得完全的领导权,并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对寡头统治和帝国主义、并主张进步和民主的一切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毋需多说,伏尔斯基继续写道,拉美各国的条件远不是相同的,所以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和技巧,使每个国家的劳动人民都能够把民族特点考虑进去。在有些拉美国家(智利、墨西哥、乌拉圭、哥斯达黎加等国),可以看到民主势力的斗争正在活跃起来;尽管进度非常缓慢,这些

势力正在得到巩固；顽强的阶级搏斗正在发展。在其他国家里，特别是在发生政变以后，反动的亲帝国主义势力已经成功地暂时削弱了解放运动的力量。^①

对批评者的攻击

好多亲苏党的国内政策，受到了许多马列主义组织——毛主义者、卡斯特罗派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挑战。与前三种组织的争论，通常是在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上最清楚地反映出来，虽然也涉及其他有关问题。特别是毛主义者和卡斯特罗分子，加上很快就变成“卡斯特罗派”的一些著名的民族主义政党（如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和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在1959年到1976年期间的许多年份中，都坚持在几乎是整个拉丁美洲执行一条（亲苏党还不打算马上赞同的）把武装斗争作为根本的或唯一的斗争形式的路线。这些组织的论点和行动，对许多大学生以至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许多青年成员都很有吸引力。当同情武装斗争的情绪在一个共产党内，如六十年代初期的委内瑞拉共产党，很强烈的时候，亲苏党和卡斯特罗派组织之间的争论就缓和了。至少有两个国家（委内瑞拉和危地马拉），党内亲华分子分裂出去另组新党的努力遭到了挫折。

^① V·V·伏尔斯基：“人民斗争的新阶段”，载于J·格雷戈里·奥斯瓦德和安东尼·J·斯特罗维尔合编的《苏联与拉丁美洲》（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0年版），第69页。

对当地马列主义团体的挑战，许多国家的亲苏党都是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反应的，主要看对手根基和力量如何。大多数国家没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即使有也没有多大作用，“托派”这个词不过是共产党人随便咒骂毛主义者、卡斯特罗分子以及其他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的骂人话。有时也对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活动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论。这些评论一般都是批评性的，就如阿根廷的亲苏党对那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军发表的评论那样。但有时这种评论意味着谨慎的支持，如秘鲁共产党在鼓励乌戈·布兰科领导的库斯科省拉孔本雄山谷农民组织的一些早期活动和夺地活动时说的话就是这样。^①

亲华组织的问题就很不一样了。在大多数国家里，他们原先大都是(最后成了“亲苏党”的)老党的成员。持不同政见的党员通常都在党内鼓吹中国路线，最后不是他们被开除出党，就是他们自己把他们的亲苏对手“开除”出党。由此而产生的两个政党对中苏争端中提出的基本问题，意见都是分歧的，其中有些问题和它们国家的国内条件毫无关系。最重要的分歧有：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为了成功地进行革命所必须具备的党的领导的性质，以及统一战线的规模。有时候亲苏党也试图驳斥毛主义者的论点——他们说这些论点在人民中间散布混乱——但他们常常只是故意置之不理，或者用对他们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来作为回答。例如在秘鲁等几个国家，毛主义者就受到过这样的指责：(象毛泽东那样)想成为伟大

^① 前一种例子，见《新时代》杂志(莫斯科)第28期(1972年)。第二种例子，见1962年11月7日的《团结报》(利马)。

人物,有个人野心,私卷党款潜逃,向警察告密。1970年,智利共产党总书记把亲华的智利革命共产党说成是一个小得可怜的“小集团”,“尽管组织这个集团的四个坏蛋成天向共产党人狂吠不休”,这个小集团还是“成不了什么气候”。^①

亲苏的共产党人通常都认为卡斯特罗派民族主义者比起毛主义者来是更严重的威胁,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在有些国家里,亲苏党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受到古巴鼓舞而新建立起来的组织^②之间的分歧,很早就发生了,但是没有立即发展到两条路线的鼓吹者进行严重的公开争论的地步。^③就象在前面讲到的那样,关于能否实行武装斗争的完全相反的意见,在1964年11月拉美共产党哈瓦那会议上作了讨论。后来亲苏党表示同意说,应该给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拉圭和海地的“自由战士”以“积极的支援”,算是勉强达成了一种暂时解决办法。但是这个暂时解决办法没有能维持多久。

1965年6月,秘鲁左派革命运动——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中分裂出来的、带有某些毛主义色彩的卡斯特罗派小派别——发动只持续半年的游击战,结果使游击队受到很大伤亡。秘鲁共产党在批评了左派革命运动采取反共姿态以后说:

在一个人民过着贫困生活并遭到地主暴力压迫的国家

① 路易斯·科尔巴兰,《世纪报》(圣地亚哥),1970年12月15日。

② Cuban-inspired groups,也可译为“在古巴策动下建立起来的组织”。——译者

③ 关于早期的谨慎的批评,参见希尔维托·比埃拉所作“哥伦比亚军国主义的增长和共产党的路线”一文,载于1963年4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布拉格)第18—19页,并参见乌戈·巴里奥斯·克莱的“革命形势”一文,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7卷,第3期(1964年3月),特别是第22页。

里，游击斗争是能够赢得人民的同情的。但是只有在存在比较成熟的革命客观条件的情况下，这种同情才能加以利用并发展成为积极的支持。游击运动成功发展的第二个条件是，领导游击斗争的政治组织必须要有较高的组织水平和觉悟。^①

1967年是亲苏党和包括菲德尔本人在内的卡斯特罗分子在全大陆范围内关系最紧张的时期。^②开初，亲苏党对古巴人、德布雷和他们本国的卡斯特罗派的攻击，故意置之不理。但是在1967年3月13日卡斯特罗发表了刺人的演说以后，委内瑞拉共产党——卡斯特罗发怒的主要目标——作出了激烈的反应。3月15日，委共政治局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卡斯特罗“不负责任的骄横态度”，声称委内瑞拉共产党人“不承认任何人〔对它〕有监护权，不管他的革命功劳有多大。”声明强烈反对卡斯特罗关于委内瑞拉共产党人是“怕死鬼”的指责，责备这位古巴领袖有一种“使人不愉快的倾向”——认为世界上就“只有他一个人是大胆、勇敢的”。政治局接着宣布，它拒绝“菲德尔·卡斯特罗自封的‘教皇’地位。卡斯特罗认为，应该由他一个人而不能由任何其他人来决定，在拉美什么是革命的以及什么是不革命的。我们坚决不承认他有权这样做”。最后，由于卡斯特的傲慢，委共对争论已经变成“无疑将使敌人感到高兴的令人讨厌的论战”而表示遗憾。^③

① 塞萨尔·莱瓦诺：“秘鲁游击斗争的教训”，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9卷，第9期（1966年9月），第50页。重点是原文里就有的。

② 卡斯特罗派的立场在下一章说明。

③ 政治局的声明转引自罗伯特·J·亚历山大的《委内瑞拉共产党》（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69年版），第203—204页。

有些拉美共产党人试图使越来越激烈的争论凉却下来。1967年7月，智利共产党总书记写道：古巴革命“表明小资产阶级在为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蕴藏着很大的革命勇气”。他接着说：

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联系。有许多使它们结合到一起的东西，也有许多使它们分开来的东西。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有时候容易对工人和共产党估计过低，容易倾向于民族主义、盲动和恐怖行动，有时甚至倾向于反共、反苏。同时，他们也比较容易悲观失望和犯主观主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革命的，所以无产阶级主要还是要和他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和他们的错误作斗争。这两种倾向目前正在争夺运动的领导权。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竞争只是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但是如果干出什么事情来加剧这种竞争或者把这两种倾向推向“决一死战”的话，那么唯一得到好处的将是帝国主义。^①

科尔巴兰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个月，拉美团结组织会议就在哈瓦那召开了。在大约两个星期内，亲苏党处于挨批的地位。^②接着，亲苏党奋起反击，有些党的矛头直指古巴领导人，但大多数党都是（用几乎不加掩饰的伊索式的语言）批判“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阿根廷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鲁道夫·吉奥迪谴责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指责他们坚持拉

^① 路易斯·科尔巴兰：“拉美反帝力量的联合”，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10卷，第7期（1967年7月），第48页。

^② 关于拉美团结组织会议，参见附录二。

美国家必须“超越土地革命、反帝革命、民主革命这些阶段而直接搞社会主义”。他也谴责了“毛主义者和有关潮流”——后者指的是卡斯特罗分子——的“极端冒险主义”。^① 委内瑞拉共产党人则批评了本国“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分子和其他左倾组织”搞恐怖活动，因为他们试图“完全用先锋行动来创造人为的刺激，以便从上面来发动群众”，也因为他们“否认真正的革命工作在于创造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主、客观政治和组织条件”。^② 另外还发表了两篇较长、较详细的批判文章。一篇是鲁道夫·吉奥迪的《不可能有什么革命的革命》，这篇文章攻击了德布雷写的书，强调了群众支持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作用的重要性。还有一篇是赫拉尔多·温苏埃塔写的《拉丁美洲革命》，这篇文章得出结论说：

从德布雷的整个思想意识和全部思想来看，他是想把我们的劳工和革命运动推回到我们早就超越过了的阶段，即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阶段，也即非阶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在我们的时代，对任何公开赞扬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人，都应该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把他们放在“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③

在所有的亲苏党中，只有乌拉圭的党在拉美团结组织会

① 见 1967 年 10 月 25 日《真理报》（莫斯科）。当“有关潮流”和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种侮辱就是有双重目的的了。

② 政治局 1967 年 1 月的声明，载于《情况通报》第 94 期（1967 年）。

③ 温苏埃塔：《世纪报》（圣地亚哥），1968 年 2 月 4 日。这位墨西哥共产党主要理论家的长篇批判文章分三次发表在智利共产党的《世纪报》上：1968 年 1 月 21 日、1 月 28 日和 2 月 4 日。吉奥迪的《不可能有什么革命的革命》是 1967 年 9 月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安特奥出版社出版的。

议期间避免公开批评卡斯特罗和卡斯特罗分子。其部分原因可能是乌拉圭所处的情况特殊——它是个城市国家，似乎不大可能发生农村游击战。此外，也可能在苏古关系最紧张的阶段，阿里斯门迪正在为弥补苏联及亲苏党和古巴及卡斯特罗派组织之间的分歧而搭桥引线。

1968年，特别是古巴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下的人侵捷克表示赞同以后，亲苏党和卡斯特罗之间的争论开始缓和了。但并不是所有共产党都已不再为国内卡斯特罗分子制造的问题而苦恼，这一点在专讲智利的那一章里还要讲到。

有些卡斯特罗派民族主义组织经常搞恐怖活动、暗杀和绑架。这些“极左”行动始终受到亲苏党的抵制甚至谴责，主要理由是(如果讲明理由的话)，这种行动为人民群众所厌恶，反而起相反的作用。委内瑞拉共产党政治局在1967年1月发表的一篇典型的亲苏党声明中断言，“只有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人，对自己进行持久斗争的能力没有信心的人”，才搞“个人恐怖活动”。这种方法与“革命策略完全不同，〔是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对群众运动有很大的危害性”。政治局接着说，“几十年以前，列宁用真正的革命者所具有的辩证方法揭示了恐怖主义的消极面。列宁说，杀死沙皇并不能杀死这个制度。他们总是能找到一个更坏的沙皇的。^①就连上面讲过的支持在大多数拉美国家搞武装斗争的罗德内·阿里斯门迪也在1970年说，列宁本人就“把恐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群众斗争作了对照，说恐怖主义是达不到目的

^① 译自《情况通报》第94期(1967年)；并参见阿根廷共产党的决议，载于《新世纪》(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年12月，第411页。

的”。^①

小 结

在拉美马列主义组织中，亲苏党是以寿命长、（在 1959 年到 1976 年期间）战略策略比较灵活、以及一般都无所作为而引人注意的。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以后，有几个党（如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的党）开展了和卡斯特罗派组织搞的斗争很相似的武装斗争，有时候就是和这些组织合作干的。许多人自称他们相信在将来什么时候总还是要搞武装斗争的。但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大多数亲苏党在它们为获得全国影响以及最终夺取政权的努力中，着重搞的还是非武装斗争——主要是工人、学生运动及竞选活动。

亲苏党认识到自己在群众中缺乏足够的支持，无法独自取得政权，所以一般都鼓吹结成广泛统一战线。这个战略，智利在 1956 年到 1973 年期间在人民行动阵线以及后来的人民联盟中执行得都很成功。1971 年初阿连德总统就职不久，在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共产党领导人参加的圣地亚哥会议上对这项政策进行了总结。智利共产党的理论家奥尔兰多·米利亚斯告诉各国党的官员说，智利经验中的某些特点应该“加以考虑，尽管各国革命运动各有其独特之处”。根据米利亚斯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上发表的评论，

^① “列宁——革命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的领袖”，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 13 卷，第 5 期（1970 年 5 月），第 95 页。阿里斯门迪在提出一般看法的同时，无疑也是在间接地讲他本国的图帕马罗斯游击队不久前搞的绑架和各种恐怖活动。

这些特点包括：

发挥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共产党和社会党结成同盟，把工人阶级组织到一个工会中心，动员农民实现激进的土地改革，在反帝、反寡头纲领的基础上结成广泛的民族、民主革命联盟，加强那些在实现迫切要求的斗争中能团结各方面人士的居民群众性组织（如房客委员会），以及为实现教育改革而斗争。^①

实际上，在这期间智利经验对大多数拉美共产党来说关系都不大。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其他共产党（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也只有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在高度发达、十分成熟的政治制度中取得过类似的影响和经验。只有一个国家，即相当强大的共产党能在工人和学生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的乌拉圭，才差不多有这种可能。乌拉圭左派人士和左派组织，主要是由于受到智利人民联盟胜利的鼓舞，在1970年末为了参加1971年11月28日的总统选举而结成了一个所谓广泛阵线。虽然乌拉圭政治史上这支独一无二的力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得票百分之十八），但要想取得智利那样的胜利，那还是相差很远。在其他国家里，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谈论多半还停留在理论上。就是在人民联盟得胜后加紧了统一战线活动的七十年代，在别的国家也没有能建立共产党人参加的真正广泛的统一战线。可是，1973年9月阿连德政府之被推翻，也并没有结束其他拉美亲苏党的统一战线活动。

在1959年到1976年间，拉美大多数共产党在本国都没

^① “拉丁美洲：解放斗争与工人阶级”，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14卷，第7期（1971年7月），第75—76页。

有多大影响。原因很多,其中有:(1)它们的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及各种力量说是能正确的(甚至“科学的”)解释,但实际上没有做到;(2)它们总是过高估计某些社会阶层的现有革命觉悟,因而模糊了当前的现实和未来希望之间的区别;(3)它们受到社会上强大的传统力量的反对,特别是军方和教会方面的反对;(4)存在着其他组织,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更得人心,更能影响人,提出的改良方案有更大的号召力;(5)社会中、下层大多数人士,包括共产党人擅自代表他们说话的无产阶级在内,对它们都是敌视、怀疑或漠不关心的;(6)人们担心苏联可能干涉西半球事务,从1962年导弹危机中,以及苏联对古巴内部事务越来越大的影响中(特别在发生了与1970年甘蔗收获有关的经济挫折和混乱以后),人们都看到了这种危险;(7)存在着卡斯特罗派变种和毛主义变种的“超级革命派”的批评与竞争;以及(8)受到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权益的反对,特别是美国经济、政治权益的反对。

另一方面,它们的活动也不是毫无成果的。它们为了取得一定影响(在工人和大学生中最成功)而作出的努力,国内、国际条件给了程度不同的帮助。这些条件包括:(1)在拉美人民面临的一大堆问题中,许多问题都没有找到大家同意、证明有效的共产主义以外的解决办法;(2)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取得胜利后,总的气氛对它们有利;(3)卡斯特罗用共产主义的纲领消灭存在已久的不平等现象并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4)古巴成功地对抗“美帝国主义”;(5)苏联愿意在古巴遭到“美国佬”威胁时向古巴提供经济和防御援助;以及(6)拉美政府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独立行动的增大,特别在七十年

代更是如此。

在拉美马列主义组织中，亲苏党比较善于根据正在变化着的国内、国际条件来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同时设法避免它们认为是温和的改良主义的右倾极端以及超级革命主义的左倾极端。它们对潜在的长期同盟军、特别是短期同盟军的立场，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化着，因而被右的和极左的敌人和对手指责为搞机会主义。

关于机会主义——也就是不顾原则地使自己适应于各种不同情况——的指责，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比许多共产党的敌人认识到的还要复杂得多。在几十年中，有些共产党确实愿意而且也比较善于和各式各样的政治领袖人物——从右派军事领导人及军事独裁者到左派改良主义者或革命者——和睦相处。然而就是这一“不顾原则”容易被人接受的机会主义消极性引起麻烦。尽管许多批评者都说共产党领袖们建立联盟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救他们自己的命”，或者从现存社会里捞一些好处，然而，要想判定共产党任何一个具体立场的动机如何，却并非总是很容易的事。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无疑是共产党作出的许多决定的一个重要考虑，但这种特性远不是共产党人所独有的。共产党人不一定比其他政治领袖更加贪脏枉法，但是他们大声表白他们是如何为了革命目标和革命道德才这么干的，这种做法，常常使他们显得比其他人更加虚伪。

共产党人回答他们的批评者经常用一种老一套的办法。人们常常注意到，共产党人就是靠着他们的机会主义（和其他本事），才在最困难的环境中非常成功地保存了他们的政治组

织的。如果共产党的长期目标,应该说是历史使命,是在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话,那么当党受到威胁时,共产党领袖仍不惜用任何手段来保存党,就非但不是可干可不干的事,简直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了。根据这条道理,世界各国共产党人过去和他们称之为“法西斯”的人进行了合作。例如,苏联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对三十年代初期希特勒的勃起就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则在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初期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结成了统一战线,而这个人是他们多年来称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到后来,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搞的机会主义可以不算是机会主义;他可以引用历史经验来支持他的论点,说他非但不是放弃原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一定否认他放弃原则),他这么做是为了保存党,使它免于进行那不可避免的摊牌。谁对他进行诽谤,不过是表明他们自己在道德上已经(用马列主义术语讲)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而已。^①

^① 一个叫欧多西奥·拉维内斯的原共产国际在智利的代理人,曾经在几十年前描绘过如何在拉美故意使用机会主义策略。拉维内斯的文章是写给那些对共产党的策略和道德几乎没有什么了解的读者看的,文章中讲到共产党在和共产党人士打交道时使用的欺骗、讹诈、恐吓以及收买手段。他可能描绘了一幅过于肮脏的图景,但他批评的实质是正确的。见欧多西奥·拉维内斯写的《延安方式》(1951年纽约版;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格林伍德出版社曾在1972年重印了这本书),第148—58页。并见以《大骗局》为题出版的西班牙文版(圣地亚哥,和平出版社,1954年版),第72—88页。拉维内斯在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里(1970年9月20日),收回了他说过的一句引起了不少争论的话:他的这些策略是向毛泽东学来的。但他对中国人的影响则坚持他原来的立场。

第四章 拉丁美洲的亲华组织

在五十年代，许多拉美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关系都很融洽。但是，正如前面讲到的那样，到了六十年代，中苏冲突和他们所处的国内环境，迫使这些拉美领导人作出抉择：或者是继续保持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好关系，或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端中接受苏联路线。大多数领导人都决定与苏联为伍，但有一些人却没有这样做。

背 景

早在1963年末中国共产党号召在全世界建立“马列主义”政党之前，第一个亲华党已于1962年在巴西成立了。此后几年中，相继建立亲华党和亲华组织的国家有厄瓜多尔（1963年），智利（1964年），秘鲁（1964年），玻利维亚（1965年）和哥伦比亚（1965年）。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无论在这个阶段的什么时候，大约总有十二到二十五个组织公然表示亲华（发誓要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或者明确地同情中国和鼓吹毛主义政策的人。但大多数党组织的规模都很小，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党员。而且就连这样小的党，有时还分裂成两三派。只有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秘鲁，积极亲华的人一直比亲苏的要多。

一般说来，毛主义组织是由已经得到公认的共产党中的年轻人或这些党的青年组织的成员组成的。他们对本党在国内问题上的战略和策略早已灰心丧气，对苏联的国际政策，尤其是对 1962 年导弹危机中苏联的“投降”行径，也已大失所望。有些组织还吸收了其他左派团体的成员。有两个毛主义组织的成立，是因为共产党的官员失去了苏联的支持，被撤掉了长期以来一直担任的党的领导职务，所以在他们的领导下，（在巴西）建立了一个亲华党，（在巴拉圭）建立了一个非常同情中国人的党。在有几起党的分裂事件中，和思想意识、策略毫不相干的因素似乎起了重要作用，走毛主义道路仅仅是一个口实。人们知道，有两个党内部存在着强大的亲华派，一个是委内瑞拉共产党，另一个是危地马拉劳动党。在六十年代的一段时期里，它们强调武装道路，避免了按中国和苏联的路线分裂为两个党。一般说来，它们在争端中保持中立，或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一下中国。^①

毛主义组织在青年、特别在学生团体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它们一般都控制着厄瓜多尔和秘鲁几个主要大学的学生联合会，它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颇有影响，在哥伦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里也时露头角。但从大多数亲华学生身上，几乎看不出对毛的理论或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有什么真正的兴趣。显然，他们不过是把“毛主义者”这个招牌看作是大体上相当于“超级革命派”（非贬义）的代名词。亲

^① 在 1966 年到 1968 年，就象在别处已经讨论过的那样，这些党按亲苏路线和卡斯特罗路线分裂成两个党。最重要的委内瑞拉共产党人道格拉斯·布拉沃在这段时间里变成了卡斯特罗分子。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他又越来越转向毛主义了。

华党建立了两个游击组织,即 1967 年在哥伦比亚成立的人民解放军,和 1969 年到 1970 年在玻利维亚成立的一个小组。1968 年,哥伦比亚党用人民解放军玛丽亚·卡诺部队组织了一个全由妇女组成的游击战线。1970 年,委内瑞拉几个小规模游击组织也带上了亲华色彩。

就象上面所讲到的那样,在六十年代结束到七十年代开始这个阶段里,中国共产党对拉美大多数亲华党的兴趣已经开始减退。在许多国家,毛主义的党和组织虽然仍旧存在,但已经越来越不稳定。它们对本国政府的敌视态度依然如故,坚持认为还没有什么革命是靠非武装道路获得成功的。它们还保持着一支热心于口号的骨干队伍,特别是在大学里。

战略和策略

亲华党提出的理论主张和批评意见很容易说明白,主要因为这些毛主义组织寿命短暂,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以外,都顽固地执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单一的革命战略。

毛主义组织全都号召分两个阶段进行革命。对于这个显然无关紧要的理论上的假设同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领导权及统一战线这些问题的相互关系,亲华派的文章比亲苏党的论著说得更清楚。毛主义者相信,只有在经历了爱国、反帝、反封建、反寡头的人民民主革命这几个阶段以后,才能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亲华党在所有其他问题上坚持的观点,都是以这个理论主张为依据的。智利革命共产党说过:“在人民民主阶段,革命的中心目标”是“联合其他反帝、反大庄园主

和反垄断资本力量,从最反动的阶层手里夺取政权,并建立某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① 敌人必须分阶段加以消灭,而首先要向主要敌人开刀。实行这种“色拉米策略”^②,必须要明确区分谁是主要敌人,谁是次要敌人和短期或长期的同盟军。在革命力量还很脆弱的时期,呆板的革命路线会把许多方面的人都赶到主要敌人的阵营中去,从而导致革命力量的失败。就象智利革命共产党 1967 年广为传播的一本小册子所说的那样,最要紧的是“不要让主要敌人把孤立于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阶级以外的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拉过去。如果因为推行诸如托洛茨基主义者鼓吹的宗派主义政策而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就不可能挫败〔主要敌人〕”。^③

因此,亲华的无产阶级政党总是遵循毛的方向——在一切无产阶级比较弱小、敌人十分强大的国家里,这个方向都是适用的——也就是说,亲华党总是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进步力量的支持上,同时争取中间力量参加革命阵线,并孤立顽抗的反动势力。在人民民主革命中击败主要敌人以后,立即就和反对这些敌人的反帝、反大庄园主、反垄断资本势力联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次要的压迫者和压迫行为。然后在临时政府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临时政府是仿效毛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的,是由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不支持反革命分子的部分

① 见《智利革命共产党纲领》(圣地亚哥),1969年第二版,第69—70页。

② Salami,意大利香肠,亦可译为色拉米香肠。“色拉米策略”意指分阶段进行革命、一个阶段消灭一个主要敌人的策略。——译者

③ 智利革命共产党:《小资产阶级路线与无产阶级路线》(圣地亚哥),斯巴达克出版社,1967年版,第30—31页。

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这些阶级将掌握一切政治权利,在国内强制推行社会主义秩序。^①

亲华组织一再断言: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即真正的马列主义党——领导下,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②在亲华的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看来:

必须建立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力量的广泛阵线,并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支持的统治者。民族解放斗争的唯一道路是武装斗争,而赢得人民战争的基本前提是坚决依靠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农民。

所以,在玻利维亚,就象其他地方一样,“工农联盟”被看作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柱”,又是由大多数玻利维亚人组成的广泛阵线的基石。玻利维亚的毛主义者的任务是以“农民问题”为重点按照一个“明确而肯定的纲领”“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军事工作”。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的《农民土地纲领草案》强调“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人民革命力量取得解

① 见加尔瓦里诺·格拉:“毛泽东思想”,载于《马列主义事业》杂志(圣地亚哥),第17期(1970年4月),第16—30页;《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三中全会关于群众路线政治决议的摘要》,同上,第67—68页;《革命共产党纲领》,第44—45、69—70页;厄瓜多尔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斗争及其与人民的团结”,载于《在前进》周刊(基多),1972年4月30日—5月6日;巴西共产党何塞·卡马戈访问记,载于《工人阶级报》,西班牙文版,可能出版于圣地亚哥,1971年12月。

② 见《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三中全会关于群众路线政治决议的摘要》,第74—75页;《革命共产党纲领》,第56—65页,智利革命共产党居然自称是智利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党;“智利革命共产党访问记”,载于《马列主义事业》杂志(圣地亚哥),1971年7—8月,第34页;《人民》(圣地亚哥),1972年5月1日。

放的道路，并对低估农民问题的严重现象提出了警告：“这支〔1967年由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的主要错误是没有看到农民的作用，游击队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没有在农民中抓紧做政治工作。”另一方面：“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和平手段”，它只能“使人民脱离自己的真正革命目标”。^①

有时候人们争论说，毛主义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是由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尽管有时大家承认小资产阶级并不那么愿意和无产阶级携手合作。毛主义组织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有时被称作中产阶级或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他们虽然依赖北美帝国主义并受其影响，同时又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束缚。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及一段时间里，他们有可能和无产阶级一起参加革命斗争。然而，他们害怕人民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前景，抵制无产阶级的领导，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对他们，毛主义者只能采取灵活态度，根据不同的时间和条件来决定是吸引还是排除他们参加统一战线。^②

从后面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到，大多数毛主义组织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一直鼓吹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更谈不上领导它

^① 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农民土地纲领草案》，载于《北京周报》，1969年6月6日。

^② 见“秘鲁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64年1月18日—19日），载于《红旗》（利马），1964年2月10日；《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三中全会关于群众路线政治决议的摘要》，第69—70页；《革命共产党纲领》，第24—26页；左派革命运动（乌拉圭）：“不要幻想资产阶级民主”，载于《马列主义事业》杂志（圣地亚哥），第13期（1969年11月），第10—11页；《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一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路线》（玻利维亚，亚亚瓜，二十世纪出版社，1965年版）。

了。在智利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智利亲华党是这样解释这种现象的：

妥善地建设统一战线，这本身是一个过程，必须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工人阶级及其最亲密的同盟军——农民还没有被发动起来，还没有开展反对主要剥削者的武装斗争的时候，这个联盟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所以，我们并不急于在目前建立这样的联盟，因为在现在这个时候，领导权必然会落到资产阶级或他们的代理人手里。我们相信，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能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党。只有当工人阶级在它自己的政党领导下以革命的姿态进行战斗的时候，只有当它已经把农民争取过来参加这个斗争的时候，它才有可能联合其他力量，同帝国主义、大庄园主和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阶层进行殊死的斗争。^①

亲华党声称要用“又团结、又斗争”的办法坚持原则和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线，特别对统一战线里的资产阶级各阶层更应如此。就象秘鲁的毛主义党在它的第一个主要的公开决议中说的那样，“对一切愿意进步、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作为，采取团结的态度，对屈服、叛变和投降的行为，采取公开的斗争”。^② 智利的亲华党对“斗争”要稍为谨慎一些，认为“对于非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有必要实行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政策，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根据他们的剥削程度、他们对主要敌人和对无产阶级的态度，并根据其他策略上的考虑，决定对他们进

① 《小资产阶级路线与无产阶级路线》，第27、28页。

② 《秘鲁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行不同程度的团结和斗争”。^①然而党不应该对动摇分子实行无原则的妥协,哪怕是暂时的同盟军也不行,因为这会使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本身遭到破产和失败。也不应该对并不完全赞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主张的暂时同盟军进行无节制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可能会把他们推向主要敌人的怀抱,从而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敌人的变化。毛主义者认为,这两种极端做法,是亲苏党这样的假革命组织采取的“右”的或“修正主义”的办法,以及卡斯特罗分子和有些托洛茨基分子采取的“极左”的办法。同时,毛主义者争辩说,主要敌人,如前面谈到的,只是首先要制服的那些人,在第一阶段革命完成之后,短期同盟军就成了打击的目标了。^②

最后,毛主义者坚持认为,只有在战争年代,才可能建立真正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他们一直把“人民战争”当作他们的头等大事之一来抓。玻利维亚毛主义领导人是这样来解释他们的战略的:

(1) 在人民战争中要把政治放在首位,也就是说,最根本的是要依靠马列主义的领导,消除所有反革命倾向,如现代修正主义。

(2) 人民战争是群众为了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武装的政治斗争。因为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工农中开展人民战争的政治工作,和人民战争的军事行动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种政治工作必须在武装斗争开始以前以及进行的过程中展开。

① 《小资产阶级路线与无产阶级路线》,第24页。

② 见例如《革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圣地亚哥),第23—26页。

(3) 人民战争是分下列三个阶段进行的：1. 和农民起义相关的游击战；2. 运动战；以及 3. 阵地战，或者叫做从农村夺取城市。^①

对马列主义对手的批判

由于亲华党本身就是中苏争端的产物，对于这些党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总声明中都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攻击“修正主义”就不足为怪了。亲苏党指责毛主义者故意分裂、削弱左派，亲华党的反应是（用智利一个毛主义者的话来说）：从亲苏党中分离出来“并不是工人之间的决裂，而是工人与钻入他们队伍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决裂”。^②

在某些情况下，毛主义者对政治选举的态度是灵活的。一般说来，党派组织被看作是一个组织的左派用作反对另一个组织左派的工具。然而，参加不参加选举，每次都必须从策略

① 见奥斯卡·萨莫拉·梅迪纳塞利：“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答菲德尔·卡斯特罗”，载于《马列主义事业》杂志（圣地亚哥），第5期（1969年1—2月），第36页。并见萨莫拉：“人民战争：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载于《玻利维亚在石油国有化后的政治思想》（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05—144页；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哥伦比亚人民战争的胜利》（蒙得维的亚），1969年版；鲁宾逊·罗哈斯：《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出现的第一个越南》（蒙得维的亚），纳蒂巴出版社，1971年版；革命共产党：“革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载于《斯巴达克》杂志，1966年7月下半月。

② 见“智利革命共产党访问记”，载于《马列主义事业》杂志（圣地亚哥），第3期（1968年9—10月），第10页；又见左派革命运动（乌拉圭）：“工人和学生的斗争：为什么？”，载于《工人之声报》（蒙得维的亚），1971年10月。关于典型的攻击，可参阅雷蒙多·莱昂：“哥尔瓦兰的‘和平道路’：反革命道路”，载于《马列主义事业》杂志（圣地亚哥），第17期（1970年4月），第3—15页；和“秘鲁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考虑作出决定。大多数亲华党鼓励参加学生选举以及(有时候)参加工人选举,但极不愿参加全国性的政治选举。六十年代后期,智利亲华党把议会选举看作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在修正主义分子参与下设下的骗局。对1970年9月使萨尔瓦多·阿连德当上了智利总统的“选举杂技表演”也是这么看的。^①乌拉圭亲华的左派革命运动对1971年11月总统选举也采取完全相同的立场。^②

一般说来,亲华派批判“修正主义”共产党的文章都指责它们:(1)把革命者的活动限制在“资产阶级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2)阻碍对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理论教育和实际训练,哪怕纯粹出于自卫也不允许;(3)把统一战线和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表,从而使群众处于无力的地位,它们这么做的借口是:必须拉资产阶级做同盟军,而资产阶级也只有在满足了这些条件时才肯当同盟军。

拉丁美洲的毛主义者对卡斯特罗的批判,比中国共产党的批判要公开得多。他们发表的很有文彩的长篇批判文章,有些是抨击雷吉斯·德布雷和他们本国的卡斯特罗分子的。^③在他们看来,卡斯特罗路线的根本错误在于:(1)根子是“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的、浪漫的、个人主义的、极左的、反马克

① 见革命共产党:《选举与我国人民的斗争》(圣地亚哥),1969年版和《打倒宗派主义让党领导群众斗争》(圣地亚哥),1970年版;以及“总统选举:旨在散布阻挡革命的幻想”,载于《马列主义事业》杂志(圣地亚哥),第16期(1970年2—3月),第2—6页。

② 见“11月对人民意味着什么?”,载于《工人之声报》(蒙得维的亚),1971年11月23日。

③ 如《菲德尔·卡斯特罗致巴西共产党的公开信》圣地亚哥,恩特雷塞罗斯出版社,1966年版。

思主义的思想 and 经验;(2)依靠的是非无产阶级领导人组成的小集团而不是群众,卡斯特罗分子害怕群众,也不怎么尊重群众;(3)决心同时对付所有的敌人,号召超越人民民主革命而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4)摒弃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列主义领导;以及(5)摒弃毛主义的基本思想——“党指挥枪”,也就是政治重于军事行动的思想。古巴领导人主要通过发行雷吉斯·德布雷写的《革命的革命?》一书,鼓吹在拉美实行这条冒险主义路线——“游击中心主义”路线。毛主义者认为,过去这条路线已一再遭到失败,今后也一定会遭到失败。即使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推翻了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但由于领导和方向都是非无产阶级的,这条路线不可能带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会使另一批人起来掌权,而这批人最终也必将演变成新的压迫者。^①

对一个毛主义党的散布得最广泛的攻击,要数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为古巴版的切·格瓦拉日记写的“必要的引言”中说的一番话了。据卡斯特罗说,亲华的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奥斯卡·萨莫拉,“曾经答应要和切合作,在玻利维亚组织武装游击斗争”,但临到“该行动的时候,他却自食其言,畏缩地袖手旁观。在切死后,他成了最有害的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批评家之一”。^②对此,萨莫拉于1968年7月在给卡斯特罗的一封长篇“公开信”中作了回答,这封信的要点是:(1)

^① 关于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路线的重要声明有:《革命共产党纲领》,第81—84页,和小册子《小资产阶级路线与无产阶级路线》。

^② 见《切·格瓦拉日记》,第14页;因蒂·佩雷多在《我同切在一起的时候》,布宜诺斯艾利斯,埃迪博尔出版社,1971年版,第47页中写道:萨莫拉和“其他自封的先锋分子一样投机、一样虚伪”。

格瓦拉在他的日记里，没有一处对萨莫拉或对毛主义的玻利维亚共产党提出过或暗示过这样的批评；(2) 1964年9月到10月，萨莫拉和其他一些玻利维亚人为了解放玻利维亚，决定成立一个脱离玻共的革命先锋队。同年年底，萨莫拉去古巴，取得了格瓦拉对这一冒险事业的支持；(3) 1964年11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举行的拉丁美洲共产党会议上“卖身投靠”“修正主义分子”，决定同拉美马列主义党断绝联系，并说服格瓦拉跟他走；(4) 从此以后，亲华党对古巴的有关玻利维亚的计划就一无所知，对派遣格瓦拉的决定、格瓦拉到达的时间和以后的行踪也毫无所闻。所以，萨莫拉说，他并没有撤销他对格瓦拉的支持，相反，是卡斯特罗把他关在大门之外，不让他参加这项行动。^①

毛主义者拒绝在农村和城市执行“游击中心主义”路线，也就是拒绝进行1966年到1967年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搞过的那种农村游击战，拒绝搞城市游击战和恐怖活动。农村游击中心的做法被说成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的表现。卡斯特罗分子不去争取农村人民的支持，从而使群众起来进行持久的解放战争，而是试图单独作战，以此来赢得群众对他们个人的支持。卡斯特罗分子不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去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水平，从而使他们能够建立一支自己的能攻能守的解放军，而是组织自己的小小的军事核心(中心)，用英勇行动来争取群众的支持。卡斯特罗派的这种做法，或者可能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使战斗象哥伦比亚民族解

^① 见萨莫拉：《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答菲德尔·卡斯特罗》，第30—37页。

放军那样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或者可能象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那样遭到复灭。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政府都可能出动军队镇压群众，而群众由于卡斯特罗分子的缘故没有受过训练，只能束手无策地听凭国家镇压部队的摆布。^①

毛主义组织对城市游击队持同样的批判态度。虽然它们并不机械地排斥城市斗争，但它们确实坚持认为农村是主要战场。卡斯特罗分子的城市游击战——其中干得最出色的是乌拉圭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或托洛茨基主义者（最有代表性的是阿根廷人民革命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乌拉圭左派革命运动对图帕马罗斯的批评最激烈。^② 1970年夏天，民族解放运动绑架并杀害了美国安全顾问丹·A·米特隆。数周之后，左派革命运动就发表了谴责卡斯特罗派图帕马罗斯的长篇文章，说它是“游击中心主义教条的自然表现”，主要是受了古巴革命的影响。图帕马罗斯的游击中心主义教条是以“被歪曲了的古巴经验”作为基础的，它的特点是冒险主义、主观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恐怖主义，所以“与马列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图帕马罗斯对人民和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的看法是错误的。^③

亲华的智利革命共产党曾总结过毛主义者的革命道路与

① 关于这条路线的典型的公开声明，可参阅《小资产阶级路线与无产阶级路线》。

② 在1960年到1976年这一段时间里，“左派革命运动”是拉丁美洲革命组织喜欢使用的名称。乌拉圭的左派革命运动是亲华的，但其他各地的左派革命运动则不是亲华的。卡斯特罗派组织一般都采用这个名称（如智利和秘鲁），尽管它们中有些是从主要政党中分裂出来的（如委内瑞拉和秘鲁）。

③ 见《图帕马罗斯，阴谋还是革命？——对乌拉圭马列主义者的答复》，蒙得维的亚，工人之声出版社，1970年版。

卡斯特罗分子的革命道路的区别：

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体现，就象“游击中心主义”和城市恐怖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一样。我们与左派革命运动〔智利的卡斯特罗分子〕的分歧，不是他们所说的由于追随或同情这个或那个国家而产生的分歧，而是我们所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非常深刻的分歧。^①

小 结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拉美追随者所强调的毛主义道路，在各个重要方面都与亲苏党和卡斯特罗派的游击组织提出的城市或农村道路有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丰富历史经验，对拉美革命者来说本来确实是很有教益的。但是，和中国人当时的说法相反，六十年代拉美毛主义道路并不是从这种丰富历史经验中正确地提炼出来的精华，它不过是对中国经验的一种歪曲（在理论上很吸引人，但在实践上却太狭隘，太呆板），其目的是为了在六十年代为占统治地位的中国领导人利益服务的——首先是用于与苏联的冲突中，后来又用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内部大动乱中。^② 在拉丁美洲，这条道路从来没有招徕到很多积极的追随者，尽管有许多拉美人同情它们的总的战略路线，但不加入亲华组织。

^① 《小资产阶级路线与无产阶级路线》，第47页。

^② 见拉特利夫：《中国共产党的国内统一战线及其在拉美的应用（1921年—1971年）》，第2章。

拉丁美洲出现亲华的共产党和亲华组织，主要是中苏争端的产物，无论在何时何地，这些组织从来不曾构成严重的政权争夺者。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些组织多半已经更加不行了，或者完全不见了，尽管在许多国家里有一小部分学生、工人和游击队员还在鼓吹一种总的说来难以名状的“毛主义”。

第五章 卡斯特罗主义： 农村游击战

如果说亲苏和亲华的共产党总的说来都分别地完全倾向莫斯科和北京的话，那末卡斯特罗派民族主义组织通常只是部分地倾向哈瓦那。这些组织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气质，但同时对于古巴革命及其领导人又十分敬慕。在我们这个世纪后期的年代里，他们大都认为必须在整个大陆范围进行革命。从1959年到1976年的整个时期，卡斯特罗分子都是罗伯特·J·亚历山大称作的雅各宾左翼的主要代表。他们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崇尚优秀分子主义，充满反民主的偏见，一心要摧毁他们本国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以便立即取得民族解放，实现社会主义。

背 景

在六十年代，卡斯特罗主义倾向在好几个党内滋长起来。这些党，其中包括乌拉圭和智利的社会党，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获得胜利以前很久就成立了。在1973年9月以前，智利社会党几十年来一直是智利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个党的党内有一个卡斯特罗派（由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领导），在党里居统治地位，在人民联盟政府（1970—1973年）执政

的大部分时间中，对国家事务也颇有影响。这点将在第七章加以论述。

然而，大多数卡斯特罗派组织是在六十年代才成立的。和古巴革命的领袖人物一样，加入这些组织的卡斯特罗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是各色各样的。有些人原来就是马列主义者，其中有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和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的著名领导人。还有许多人虽然在开始时并不是马列主义者，但到六十年代后期已经表示信仰马列主义思想了。这种现象无疑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7年3月13日作出下面的评论的部分原因：“今天自豪地称为马列主义者的许多人中间，有很多就是通过革命斗争才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①原秘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年轻领导人路易斯·德拉普恩特，是秘鲁第一个重要的卡斯特罗派组织的创建人。他在1964年初说：“真正的左派的思想意识——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与农民结成联盟、并能领导我国解放进程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②

好些卡斯特罗派组织都是拉美某些最重要的左派改良主义党党内紧张关系的产物，德拉普恩特的左派革命运动不过是其中之一。委内瑞拉左派革命运动，是从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总统的民主行动党中分裂出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建立的，

^① 《格拉玛报》（哈瓦那），1967年3月19日。德布雷写道：“马列主义最好的老师是面对面的敌人。”他又说：和古巴经验形成对照的是，在那些“造反军的思想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新的（游击队）指挥部的思想都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如指挥部想要进行的革命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一样”。德布雷：《革命的革命？》，西班牙文版，第94、90页。

^② 罗赫尔·梅尔卡多：《秘鲁的游击队》，（利马，人民文化基金组织，1967年版），第84页。

而智利的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和基督教左派运动则都是由基督教民主党党内持批评意见的人建立的。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无法容忍他们本党的改良主义倾向及其政策和活动，深信只有进行武装革命才有出路。在几个不同时期，他们都得出结论：卡斯特罗派阐述的马列主义，对他们国家以及整个拉丁美洲的现状作出了最好的理论上的说明，提出了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最有效的（他们常常坚持说是唯一的）指针。由于早就习惯于对待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教义，他们比许多不那么老练的人都更能够吸收并阐明卡斯特罗派的马列主义。这些不够老练的人中包括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等几个组织的领导人。这些组织显然是属于卡斯特罗派的，但是它们的领导人无论对卡斯特罗派的马列主义或其他类型的马列主义，多年来都表现出只有一些极其肤浅的了解。

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有几个卡斯特罗派组织采取的马列主义路线，掺有相当大成分的毛主义。正如上文所说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人和古巴人关于什么是拉美最好的战略和策略的分歧，尚未公诸于世。卡斯特罗派组织中最亲华的组织，或者说毛主义组织中最地道的卡斯特罗派组织，要数危地马拉的“11月13日革命运动”。从1959年到1976年，为数不少的卡斯特罗派组织，对来自几乎是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他们认为是真正革命的思想，都是能够接受的。似乎只有很少几个组织对学习古巴以外的任何马列主义经验嗤之以鼻。除了德布雷以外，谁也没有对古巴经验这么盲目崇拜。

卡斯特罗派组织的领导人都给自己的组织起了能够表达他们运动的宗旨和目标的名称。他们力图使自己的名称能反

映他们的民族革命立场，表明他们不受显然具有约束力的种种国际联盟的束缚。因此，大多数名称都用了革命、民族解放或革命武装部队这些字眼。他们为了把自己和老共产党区别开来，全都避免使用“共产党”这个词，因为他们越来越觉得这些老党（如果过去曾经有过革命性的话）现在已经不再是真正革命的了。他们也避免“马列”这样的字眼，因为到六十年代中期，这个词已经成为中苏争端中亲华组织的商标。用得最广的名称是左派革命运动（如在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和民族解放军（如在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①

大多数国家的卡斯特罗派组织规模都很小，据估计积极参加活动的成员很少有超过几百个的。象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和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这样的农村游击队，大部分成员通常都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化了的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很少有工人参加。城市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乌拉圭民族解放运动，即图帕马罗斯——或主要从事农村斗争的组织的城市小组，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无产阶级组成的。智利一位重要的卡斯特罗派组织的领导人曾公开承认，左派革命运动中占绝对优势的是学生和小资产阶级，但他又直率地说，俄国、中国和古巴的革命党开始时的组成情况大致也差不多。^② 一个国家的卡斯特罗派组织往往还有其他国家兄弟组织的成员参加，这反映了这些组织在整个大陆范围内的互相

① 只有乌拉圭一个国家的左派革命运动是公开亲华的。

② 见米格尔·恩里克斯访问记，载于《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68年4月23日。

支援和共同理想。卡斯特罗派组织成员的这种泛美性，从格瓦拉领导的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和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身上也可以看到。^①

毫不奇怪，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对游击队的支持比任何其他社会阶层都要大。所以时常出现一些短期的新兵——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的“周末勇士”，当然有时也出现一些长期参加斗争的战士。大学的校园，至少在那些按大学自治政策治理的大学里，有时成了游击队在城里的避难所。在1966年12月委内瑞拉总统劳尔·莱昂尼使加拉加斯中央大学“中立化”以前，七平方英里的校园为游击战士和恐怖分子提供了住宿、仓库和活动设备。

有时候，卡斯特罗派组织在大学政治活动中能起决定性作用。六十年代中期，卡斯特罗派的左派革命运动和委内瑞拉共产党一起，共同控制了中央大学的政治生活。在共产党人和卡斯特罗分子于1966年到1967年决裂以后，左派革命运动在梅里达的安第斯大学仍旧取得了大学中心联合会主席的席位。在智利，左派革命运动在各大大学都很活跃，特别是在它的发源地康塞普西翁大学。

战略和策略

到六十年代中期，卡斯特罗派民族主义组织的斗争，通常

^① 关于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可参阅格瓦拉日记中的评论。关于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可参阅帕特里西奥·加西亚的“委内瑞拉游击队中的智利人在战斗”，载于《终点》杂志增刊（圣地亚哥），1968年12月31日。

把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合在一起，这与亲苏和亲华党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对于加快革命时间表的必要性，切·格瓦拉和雷吉斯·德布雷曾经反复论证过，这点已经在前面说过了，拉美的几支游击队也一再论证有此必要。他们的这个信念，来源于卡斯特罗派对夺取政权的道路、领导权和革命统一战线组成的这些问题的看法，这种信念又使他们为实现这些看法而投入战斗。

本章讨论的卡斯特罗派组织所遵循的夺取政权的道路，其重要方面都是模仿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德布雷所解释的古巴革命道路的。其他卡斯特罗派组织主要奉行城市道路或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道路，这些组织将在以后几章里加以讨论。

以农村游击战为重点的夺取政权的道路，是1959年到1976年间典型的“卡斯特罗”道路。然而，就象第二章所讲的，甚至连这一点也远不是静止不变的。走这条道路的有许多最有名的拉美游击队领导人和游击队，其中包括道格拉斯·布拉沃、弗朗西斯科·普拉达、卢文·佩特科夫和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莫伊塞斯·莫列罗和委内瑞拉左派革命运动；路易斯·图西奥斯、塞萨尔·蒙特斯和危地马拉起义军；法维奥·巴斯克斯和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路易斯·德拉普恩特、里卡多·加迪和秘鲁左派革命运动；切·格瓦拉、佩雷多兄弟和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多年来，这些卡斯特罗派游击队领袖走的都是一条很相似的（尽管不是完全一样的）道路。这些人中，有的在六十年代已经被打死了，有的在六十年代末苏古和解后已经转而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那些到六十年代后期仍旧健在的大多数领导人对雷吉斯·德布雷关于卡斯特罗道

路的提法都持批评态度,此点在以后还要谈到。然而,总的说来,这些游击战士和他们的部队都是属于卡斯特罗派的。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都很尊敬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并和他们保持着接触;同时这也是他们自己对革命所持的基本态度所决定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简单地讲一下若干个上述卡斯特罗派组织的历史和立场,就可以说清楚。

委内瑞拉 从六十年代初期民族解放阵线成立那时起,这个阵线和它的军事组织民族解放军就成了委内瑞拉共产党领导的最重要的联合组织。但到1966年,事实证明委内瑞拉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的这种关系带来很多麻烦。当一些委共官员开始建议停止游击战,实行战术退却时,有几个游击队领导人转而反对委共。但是,委共通过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控制,对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游击队战士施加了压力。1965年4月22日,包括委共政治局委员道格拉斯·布拉沃在内的五个游击队领导人秘密集会,成立了控制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军的“统一指挥部”,从而把决策大权掌握在游击队自己手里。据当时的新指挥小组发表的文件说,指挥小组有布拉沃、格雷戈里奥·卢纳迪·马克斯、埃利亚斯·曼努伊特·卡梅罗、弗朗西斯科·普拉达和法夫里西奥·奥赫达五名军官,以及另外四个人,这四个人很快就洗手不干了。^①从此以后,出现了两个平行的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组织。一个是以布拉沃(1966年5月撤销委共政治局委员职务,1967年4月开除出党)为首的反对委共的卡斯特罗派组织;另一个则忠于委共,负责对委托给佩德罗·梅

^① 见《内幕新闻》(加拉加斯),第32期(1966年8月)。

迪纳·席尔瓦领导的越来越不活跃的部队进行全面指挥。佩德罗·梅迪纳·席尔瓦是1966年1月哈瓦那三大洲会议上的主要人物之一。

1966年，委内瑞拉共产党和民族解放军(布拉沃派)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加剧，终于在1967年3月公开爆发。3月初，一个前委内瑞拉政府官员、外交部长的兄弟被绑架处死。3月6日，古巴《格拉玛报》发表了埃利亚斯·曼努伊特的声明，他以卡斯特罗派民族解放军主席的身份承认，这个伸张“革命正义”的行动是他的组织搞的。此后几天中，这个谋杀事件和曼努伊特的声明，都遭到了委共领导人和以梅迪纳·席尔瓦为首的忠于委共的民族解放军的谴责。

3月13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以这一争论为主题，发表了一篇讲话，这是他那一年中发表的最长的讲话之一。他摘引了争论双方发表的一系列文件，攻击了委内瑞拉共产党的“民主的和平”思想，并得出结论说委内瑞拉共产党人对游击队已经犯下了“叛变”罪。从那时起，古巴原先对民族解放军的隐蔽支持变成了公开支持，争论公然带上了牵涉到整个大陆的色彩。卡斯特罗(以及雷吉斯·德布雷)认为，许多拉美共产党已经出卖了游击队，也就是出卖了他们本国的革命。委共和卡斯特罗派民族解放军的冲突就被说成是这种叛卖的一个例证。卡斯特罗没有邀请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忠于委共的民族解放军派代表出席8月份在哈瓦那召开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而卡斯特罗派民族解放军和左派革命运动则至少各有四名代表参加。大会以后，梅迪纳·席尔瓦代表忠于委共的民族解放军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指责参

加大会的民族解放军代表团是“篡权者”，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族解放军。

从1966年到1967年，卡斯特罗派民族解放军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自我批评，力图弄清并解释游击运动一向遭到失败的原因。民族解放军1967年11月发表声明说，问题在于“武装斗争运动的军事政策是根据错误的前提制订的，这就使运动无法利用战争开初几年出现的非常有利的条件。……军事行动……必须服从玩弄政治权术的需要。”民族解放军在—项卡斯特罗派组织与亲苏党发生冲突时发表的典型的声明中说：

两种绝对相反的思想尖锐地对立起来了：一种是真正的革命思想，另一种是号召取消武装斗争的投降主义思想。在整个斗争过程中，错误的思想和行动正在革命阵营里制造出两种不同的权力组织。真正的权力组织得到城市和农村武装部队的革命政策的支持，得到党员群众的拥护，而形式上的权力组织则得到各国党内官僚主义领导的反动的投降主义政策的支持。由于矛盾得到了有利于前者的解决（1966年成立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统一指挥部），就不但在组织上使大规模地执行真正的革命政策成为可能，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使执行这种政策有了可能。

斗争的策略性从来没有足够清楚地确定过，这就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有时充满着冒险主义的搞政变的想法，有时又憧憬通过选举获得胜利，忽而又想搞暴动，忽而又想从事长期斗争”。这反过来又引起了严重地“低估游击战和整个武

装组织”。没有一个严肃的进行大的战役的战略，党的机构和群众组织也没有能使自己适应武装斗争的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权力集中的司令部。^①

1966年12月，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制订了新军事政策的基本要点。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统一指挥部阐明了谁将是委内瑞拉人民继续斗争中面临的“主要敌人”。这个敌人是一股“孤单的力量”，尽管它有“好些特点，使它从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观点看来都不一样”。在政治上，从长远来看，这个敌人是“支持剥削阶级的控制全面的政府机构”，从目前来说，这个敌人只是民主行动党政府。军事上的敌人是全国武装部队（美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的主要突击部队），经济上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公司”。^②

1968年12月中旬，民族解放军杰出的游击队领导人弗朗西斯科·普拉达在会见记者时说：随着1968年年底拉斐尔·卡尔德拉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基督教民主党^③就成了主要敌人。美国垄断集团和克利奥尔^④寡头统治者“更换了他们的头头”，这是个次要问题；革命战争仍然是取得解放的唯一道路。普拉达还说，民族解放军正在继续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和一个各阶级的联盟”——一个真正的民族解放阵线，这个阵线将把“所有参加解放斗争的马列主义者”集结到“具有铁的纪律的中心中去”。加强各分队和各游击基地是

① 见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军统一指挥部的声明，载于《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第6期（1968年5月—6月），第14—16页。

② 同上，第16—19页。

③ 应为“基督教社会党”。——译者

④ 指生在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译者

革命运动的主要目标。^①

道格拉斯·布拉沃在会见墨西哥记者马里奥·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时发表的谈话中指出,民族解放军是由四种力量组成的:农村游击队、城市游击战士、警卫队中的爱国军官,以及市郊游击运动。^②民族解放军城市游击队的领导人内里·卡里略(在加拉加斯会见记者时)曾向梅嫩德斯解释说,当时的城市游击队肯定只是农村游击队的辅助力量。城市游击队之所以具有重要性,其部分原因是它在城市里牵制了相当一部分政府军。卡里略认为,城市游击队的行动必须“既快又猛,密切配合”。最后,他还补充说,城市游击队还必须在城市里组织群众起义。^③

据卢文·佩特科夫说,民族解放军原来主要是由城市居民、工人、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到1966年末,农民已经占了百分之九十。^④布拉沃在向梅嫩德斯发表的谈话中强调说,民族解放军的纲领“很广泛,不是宗派主义的”文件,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自各式各样的党派(包括民主行动党和基督

① 见弗朗西斯科·普拉达访问记,载于《终点》增刊(圣地亚哥),1968年12月31日,第3页。

② 这篇访问记曾于1966年12月24日和31日由哈瓦那电台分两次向拉丁美洲广播,是墨西哥《事件》杂志编辑梅嫩德斯写的一组文章中的一篇。这组文章登载在该杂志1966年12月10日、17日、24日、31日和1967年1月7日各期上。在这组关于民族解放军的文章以及后来写的一组关于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的文章中,有许多照片和长篇谈话,都是这位记者在游击队进行的长期采访中得到的。

③ 同上。见内里·卡里略访问记,载于《事件》杂志,1967年1月7日,第17—20页。

④ 和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的谈话。哈瓦那电台曾在1967年1月23日广播了这篇谈话。

教社会党)，但领导却是马列主义的。普拉达在 1967 年 8 月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上（他是会议的四个副主席之一）发表的演说中毫不含糊地宣布，“委内瑞拉的游击斗争是遵循马列主义原则的。”^①

在 1968 年到 1970 年间，一些大名鼎鼎的民族解放军游击队员（其中有委共领导人——后来成了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特奥多罗·佩特科夫的兄弟卢文·佩特科夫），与布拉沃决裂了，这是因为他们对武装斗争失去了信心，或者是不同意他采取的战术。1971 年，弗朗西斯科·普拉达被俘。在这一阶段中，布拉沃公开批判菲德尔·卡斯特罗抛弃国际主义革命义务，特别是抛弃了对委内瑞拉游击队的支持。^②从 1970 年到 1976 年，布拉沃对苏联的批判也越来越多，在中苏争端中公开站到中国人一边。据说他还建立并领导了一些小规模的亲华游击组织。

道格拉斯·布拉沃和弗朗西斯科·普拉达是最早严厉地抨击雷吉斯·德布雷的《革命的革命？》的一批人中的两个。在他 1968 年 12 月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普拉达（有时引用布拉沃的话）反对德布雷关于党的作用、革命阵线的组成和城市游击队的作用的提法。^③布拉沃 1970 年写的批判《革命的革命？》的文章，提供了他自己实行的政策的情况（布拉沃多年来一直是拉美最突出的卡斯特罗分子），并提出了来自卡斯特罗派游击队内部的对德布雷的有事实根据的批判，很有

① 引自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发布的普拉达发言的完整的正式文本。

② 见布拉沃在会见温贝托·索利奥尼时发表的谈话，载于《前进》周刊，1970 年 5 月 15 日。

③ 见《终点》杂志增刊（圣地亚哥），1968 年 12 月 31 日，第 5 页。

价值。^①

布拉沃赞同德布雷对拉美大多数所谓革命力量的“老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宗派主义”发动的正面进攻。但是很不幸，德布雷自己也跌入了这个陷阱。委内瑞拉游击队员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以及其他国家伙伴的经历中，深知这个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发表的看法常常是错误的。但是，布拉沃说，德布雷的观点是“得到古巴同志的完全同意的”，所以，这就只能加剧委内瑞拉游击队和古巴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布拉沃说：

古巴革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处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从根本上讲，古巴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反独裁斗争。因此，它的一套计划就不得不是独具特点的，因为这个革命和拉美其他国家在古巴胜利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那种斗争是完全不同的。由于这个原因，古巴的革命就能够集结起一大批人，包括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和学生，并使他们统统投入到暴力斗争中去。1960年开始的古巴革命第二阶段，带上了新的特性，即社会主义特性。但这种社会主义特性是在〔夺得〕政权之后才开始的，而这恰恰就是古巴革命和其他拉美国家正在发展的解放运动根本不同的地方。〔这些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斗争的联盟、集团和阶级都有所不同。这就是我们和古巴革命领导层的同志发生分歧的因素。

① 下面四段中的引文，引自布拉沃的谈话，载于《前进》周刊，1970年5月15日。

布拉沃坚持认为，德布雷的那本书不是根据拉美的现实写的。无论是拉美整个革命队伍还是各个国家的战士，都无法从中吸取重大教益，因为这本书本身就“堕入了另一种教条主义，它不是系统地提出深刻的分析，而是开出一些小处方，这些处方大抵都是另一种教条主义的翻版”。

布拉沃特别指责了德布雷制造少数传奇式人物的神话，夸大实际情况，把打仗、射击问题提到了每次斗争的中心地位，

同时却荒唐地低估甚至抛弃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阶级的组织，而这些阶级是必定会在消灭我们这些国家的寡头统治和帝国主义中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同样，德布雷还否定革命政党的作用，否定解放斗争最重要的工具——马列主义政党——的作用。不但如此，他还否定解放阵线的作用，使一些正确的论据，得出错误的结论。

例如，德布雷在《革命的革命？》一书中争辩说：只需几年时间，古巴革命的策略势必在拉丁美洲所有其他国家造成革命形势。他相信“山里的人必将不顾众多人口集中的城市、不顾其他各个‘核心’，将在数年之内凯旋归来，包围城市。”总之，布拉沃说，“我们可以说，德布雷主义的整个策略，或者说在拉美把这个主义付诸实践的古巴同志的整个策略，都是不正确的。它是‘游击中心主义’的策略，走捷径的策略，低估党、阵线、工人阶级和农民组织的策略。”

最后，布拉沃得出一个其他一些游击队员（包括危地马拉的塞萨尔·蒙特斯）无法理解的结论：实际上，古巴以前根本就没有实行过德布雷所说的那套策略。他所描述的策略是

“对古巴所发生的事情的歪曲，这种歪曲毫无疑问导致了拉美的几次惨败，最终还毁灭了玻利维亚的游击中心，尤其是造成了埃尔内斯托·格瓦拉司令的死亡”。

委内瑞拉的另一个组织——左派革命运动，是由多明戈·阿尔维托·兰赫尔和从贝坦科尔特总统的民主行动党中分裂出来的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在1960年建立的。在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支持武装斗争，1962年，它的合法地位还（象委内瑞拉共产党一样）被“暂时停止”过。在六十年代很长一段时期里，它是委内瑞拉主要的卡斯特罗派组织。左派革命运动有时和民族解放军对垒，有时又和它合作。到六十年代中期，它公开承认自己是马列主义组织。^①

左派革命运动在1964年以前从来没有采用过一套有条理的策略。^②那一年，它认真研究了能在本国应用的种种革命策略，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阶段，革命战争就是摆脱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和平斗争方式是从属于非和平斗争方式的。

为了能拖垮比较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并建立起革命武装，战争就不得不是持久的。这只有在下列基础上才可能做得到：扎实地开展战争；对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范围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使人民军队能够成长壮大；发展正确的军事战术和政治策略；不犯原则性错误；以及争取各阶层人民参加

① 左派革命运动：“什么是宣传？”，载于《内幕新闻》（加拉加斯），第9期（1964年9月15日），第2、3页。

② “左派革命运动第26号情况通报”，载于《内幕新闻》（加拉加斯），第23期（1965年6月22日）。

战争。^①

斗争锋芒应该指向主要敌人——文的和武的“猩猩主义”，^②而“贝坦科尔特主义”不过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仅仅把矛头指向贝坦科尔特，实际上是间接地帮助了其他“猩猩”，这些家伙妄图打垮革命运动，有些人比贝坦科尔特还要危险。必须反对两种极端——妥协(主要危险)和左倾主义。前者企图通过谈判重新取得合法地位，后者则反对所有合法斗争和群众斗争，总想挑起人为的对抗。^③

1968年初，卡洛斯·贝坦科尔特领导的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游击阵线(或称东方阵线)的一名官员，在填写在古巴出版的《三大洲公报》寄给左派革命运动总部的读者意见征询表中，概括地谈到了这个阵线的政策。关于左派革命运动应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他的看法在很多方面和上面谈到的观点非常相近，因为都是根据左派革命运动1964年和1965年的决议谈的。据这位官员说：

我们进行的不是随便什么战争，而是工人农民在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我国特定条件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人民大众的反帝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并不因为它是以内战的形式出现而有所改变。它只是向我们表明：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教

① “左派革命运动第12号情况通报”，载于《内幕新闻》(加拉加斯)，第11期(1964年11月2日)，第11、13页。

② Gorilla 是赤道西非的大猩猩。美国俚语中把强贼、流氓、恶棍都叫做gorilla。这里的gorillaism(猩猩主义)是指用暴力镇压人民的极端亲美的反动派所奉行的哲学。——译者

③ “左派革命运动第26号情况通报”，载于《内幕新闻》(加拉加斯)，第23期(1965年6月22日)。

育、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这就必须依靠这些群众，把民族解放战争和工农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这个阶级斗争的基础是当前委内瑞拉社会中存在的基本矛盾——以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为一方，以整个委内瑞拉民族为另一方的矛盾。……我们的战略——设法改变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战略，也就是设法把我们比较弱小的力量转化为金城铁壁的战略——我们的战略是：在分布各个辽阔地域的各条战线上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利用有利的地形特点，在那些敌人政治上和军事上最薄弱的地方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关于建立阵线的思想，是由于感到必须把农民群众的游击斗争联合起来，主要是从现阶段斗争向我们提出的战略目标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

这位游击队领导人进一步说，阵线是由两类分队组成的：“第一类是地区分队，每一个分队都在该阵线的一个地域作战，基本任务是组织和开展农运工作，对农民和新战士进行军事训练。第二类是机动分队，在全阵线范围内作战。”

左派革命运动自知无法阻止大选——1968年总统选举即将来临——便作出结论说：“对我们说来，这种选举——以及同时发生的与日俱增的政治危机——不过是人民革命战争漫长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究竟能给革命带来多少有益的结果，决定于我们如何利用这次选举来推进我们自己的战略目标。”^①

^① 路易斯·恩里克·巴尔访问记，载于《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第6期（1968年5—6月），第71、72、76页。

古巴政府在十年中始终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了左派革命运动。1967年5月，莫伊塞斯·莫列罗作为古巴——委内瑞拉游击队的一员在委内瑞拉海岸登陆。^①当莱昂尼政府用控告古巴人干涉委内瑞拉事务来作出反应的时候，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在上文中讲到过的支持各种革命运动的诺言：“我们被指控帮助了革命运动，十分正确，我们正在并将继续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所有革命运动提供援助，只要他们提出这种要求。”^②

应该指出，在这一时期的很长时间里，委内瑞拉没有一个政党象左派革命运动那样由于内讧而陷于如此严重的四分五裂的局面。这种内讧是由于个人之间的竞争、对武装的和和平的斗争形式的意见分歧，以及对卡尔德拉总统1969年3月实行的绥靖计划和大赦的种种不同反应而引起的。到七十年代中期，左派革命运动已经沿着一个圆圈整整走完了一圈；它又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在国家立法机关里也有了代表。

危地马拉 起义军是1962年12月建立的，成员包括三个危地马拉组织：亚历杭德罗·德莱昂——11月13日革命运动，危地马拉共产党人（劳动党）的“10月20日”游击队和“4月12日”学生组织。^③起义军的最重要早期领导人是马科·安东尼奥·容·索萨和路易斯·奥古斯托·图尔西奥斯·利

① 见《左派》杂志，1967年5月。

② 中央委员会声明见《格拉玛报》（哈瓦那），1967年5月21日。关于委内瑞拉的控告，见美洲国家组织新闻处电讯稿“背景材料”（Backgrounder）专栏文章：《外长们将着手处理委内瑞拉对古巴干涉的控告》，E-77/67（1967年9月12日）。

③ 指主要由学生组成的“4月12日运动”游击队。——译者

马,他们俩人都是 1962 年初成立的 11 月 13 日革命运动的创始人,都曾在危地马拉军队里当过军官,受过美国政府的训练。^① 1963 年和 1964 年起义军进行了一些战斗,这时候原 11 月 13 日革命运动成员和劳动党之间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11 月 13 日革命运动认为,虽然共产党人组织了统一抵抗阵线并支持“民族民主”革命,但实际上并没有全力以赴投入武装斗争;而劳动党则认为容·索萨和他的追随者是宗派主义者,处于托洛茨基派的影响之下。1964 年 12 月,路易斯·图尔西奥斯签署了《拉斯米纳斯山第一个宣言》,从而和容·索萨一起重建了 11 月 13 日运动,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但不久他又分裂出去,另外建立了埃德加·伊瓦拉游击阵线,后来又领导了老起义军,与劳动党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在 1966 年 1 月哈瓦那三大洲会议上,他相当活跃。1966 年 10 月他在一次车祸中撞死了。继承他的是他的副手塞萨尔·蒙特斯。起义军和 11 月 13 日革命运动于 1968 年重新合并,由容·索萨任最高司令,蒙特斯仍当副手。1969 年初,容·索萨和 11 月 13 日运动再次独立。这时候蒙特斯已经降了级,起义军由巴勃罗·蒙桑托和一个全国指导委员会领导。

劳动党对起义军的影响,一度造成紧张局面,1964 年年底,11 月 13 日革命运动因此而退出了起义军。1965 年,关系得到了修复。然而,在以后几年中,又产生了纠纷,结果在 1967 年末 1968 年初,劳动党分裂了,共产党人和起义军也决裂了。1965 年 5 月,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它认

^① 容·索萨去过巴拿马运河区的古利克堡,图尔西奥斯去过佐治亚的本宁堡。

为起义军是“在劳动党和接受马列主义基本思想的非党革命者领导下负责直接进行武装斗争的组织。它不是与劳动党平行的组织,而是在劳动党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组织”。^①但是,塞萨尔·蒙特斯在1967年4、5月间告诉乌拉圭记者说:

起义军中有一些共产党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运动是任何政党的武装组织。起义军不是劳动党的武装组织。我们的运动是一个广泛的爱国运动,我们的纲领很简单:我们危地马拉人要在没有外国军事、经济和政治干涉的情况下当家作主。我们正在为革命战争创建人民的组织;在游击队内部生长着伟大的人民军队的胚芽,这个军队最终必定能够带来一个现政治的替代物。^②

1965年起义军改编以后,危地马拉劳动党开始把年轻的游击队领导人提拔到党的重要岗位。劳动党1967年驻古巴代表奥斯卡·帕尔马在古巴共产党报纸上著文说,他的党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结构,包括党的领导机构,并正在抛弃“陈旧、狭隘的思想,去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法,把年轻、精力旺盛的新的一代马列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吸收到中央委员会里来”。^③这种做法,这个党在1968年3月发表的声明里说,是和游击队所赞同的“一体化领导”的概念相一致的。^④因此,德布雷在1966年写作《革命的革命?》一书时说危地马拉劳动

① 引自起义军1968年1月10日的宣言,载于《格拉玛报》(哈瓦那),1968年2月25日。

② 蒙特斯在会见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时的谈话,见《危地马拉:拉丁美洲的关键》(蒙得维的亚,Banda Oriental出版社,1967年版),第20—21页。

③ 见《格拉玛报》(哈瓦那),西班牙文版,1967年2月6日。

④ 见《情况通报》,第122期(1968年)。

党“得到了新生并恢复了活力”是可以理解的。^①可是，据蒙特斯说——他本人在1968年1月共产党和起义军决裂前一直是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的“恢复活力”不过是一个“花招，目的在于抵消那些最激进的建议，并使那些军事领导人陷到一个复杂的执行纪律的机构里”。^②被结合到劳动党领导机构中的游击战的坚决支持者究竟有多少人，从下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来：当起义军宣布独立时，大约百分之五十的劳动党中央委员和百分之四十的政治局委员辞去了他们的党内职务。^③其中许多人仍旧是或者变成了起义军的领导人，他们中有蒙特斯，书记处书记加夫列尔·萨拉萨尔，以及中央委员卡米洛·桑切斯和巴勃罗·蒙桑托。

劳动党和起义军实际上在1967年末就分裂了，但直到1968年1月才正式化，它们的分裂带有以前拉美亲苏组织和卡斯特罗派组织之间的分裂的同样色彩。^④起义军1968年1月1日的声明断言：“劳动党的政策总是企图确定谁是主要敌人，这并不是为了集中力量向主要敌人作斗争，而是为了与次要敌人做交易；这就是他们堂而皇之地称作‘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⑤1月10日的声明又谴责了劳动党“顽固地坚持‘其他形式的斗争’”。^⑥当起义军头子蒙特斯宣布退出共产党

① 德布雷：《革命的革命？》，西班牙文版，第34页。

② 见1968年1月21日的声明，载于《格拉玛报》（哈瓦那），1968年3月3日。

③ 见《三大洲公报》（哈瓦那），1968年10月。

④ 危地马拉劳动党1968年3月的声明中提到了分裂的日子，见《情况通报》，第122期（1968年）。

⑤ 1月1日声明载于《世界展望》（纽约），1968年3月8日。

⑥ 1月10日声明载于《格拉玛报》（哈瓦那），1968年2月25日。

时，他坚持认为争端是“对待战争、革命和人民的两种思想和两种态度的分歧，都是由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他还说：“一边是〔起义军游击队员们的〕革命思想……一种激进的观点，充满着大胆的革命精神，充满着朝气和活力；另一边是〔劳动党‘领导集团’的〕假革命思想……一种唯命是从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一种脆弱的、不适时宜的、被动的观点。”所以，他看到了“革命进程中两种互相排斥的倾向”以及“健康力量和邪恶势力之间的斗争”。^①

1968年初，劳动党和起义军刚刚分裂，便各自提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1968年3月的一个声明里讲得很清楚。声明说，当时的危地马拉革命是“土地、反帝、人民大众的革命”，它将为“今后建设社会主义铺平道路”。^②尽管声明断言“人民革命战争是危地马拉革命的道路”，它还是争辩说当前的主要战略问题是对这条道路下一个定义。三月声明显然是针对起义军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群众的参加，群众的积极投入武装斗争，对于革命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基本的游击分队网，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孤军作战的游击分队就很容易被击败或停步不前，以至灭亡。不应该把游击战和群众斗争对立起来，游击战应该是群众斗争的最进步的表现形式。……单让几个武装人员露露面是不能赢得群众的。

① 蒙特斯的声明载于《格拉玛报》（哈瓦那），1968年3月3日。

② 此段中摘引的声明，是从《情况通报》第122期（1968年）中找出来的。

中央委员会接着说明了为了支持武装斗争党应该做些什么：

同时，我们应当在两个方面加强政治斗争，第一个方面是在群众工作中，目的是最后把他们争取过来，另一个方面是在解决全国性问题上，要抓住现政权和现制度的罪恶行径进行斗争。我们应该在最低纲领的基础上在一切领域——经济、政治和文化——开展阶级斗争，这个最低纲领必须包括农民争取土地、反对收回租地的斗争，包括反对失业、争取普遍增加工资、反对昂贵的生活费用、反对国内危机、反对侵犯人权、争取社会自由、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我们应该支持妇女、学生和整个青年的具体要求，在发生冲突时支持人民大众。最要紧的是动员各阶层人民，把他们组织起来，吸收他们参加斗争。

劳动党领导人在接见智利卡斯特罗派《终点》杂志记者时发表的谈话中发誓说：劳动党靠着它的军事组织——革命军，定将把“我们早已血迹斑斑的危地马拉变成另一个越南”。^①对劳动党的这个誓言，起义军唯一感到不满的是他们不相信共产党人的这番话是认真的。起义军特别谴责了劳动党把很多时间和注意力放到非武装斗争上面。起义军的这个立场，在格瓦拉于1967年10月去世后和11月13日革命运动共同签署的联合公报里说得很清楚：

格瓦拉少校之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对整个拉美大陆运动来说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它是战斗的呼唤，是战争的宣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所有拿起武

^① 见《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68年9月10日。起义军和危地马拉劳动党决裂以后，劳动党仍保持着自己的游击队——革命武装部队。

器、随时准备把这种呼唤变成嘹亮的胜利号角的人必须重视。这种呼唤迫使我们明确立场，摒弃一切模棱两可的态度，摒弃一切犹豫和动摇。……

我们相信，武装斗争是我国人民取得彻底解放和独立的唯一道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不屈不挠地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觉得，持久战这一概念必须是包括整个拉美大陆。……^①

1月10日，起义军宣告：“就在现在，我们游击队的领导人已经成为我国革命斗争的政治领袖了。把‘大家都必须作好准备，随时都心甘情愿地投入战斗’的口号改为‘大家都必须立即投入战斗！’”^②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六十年代中期的游击活动主要是在农村搞的，范围包括从武装宣传到与政府和军队干架、绑架和暗杀。在城市里也搞一些恐怖活动，特别是在危地马拉城。从1968年到1970年，绑架和暗杀是针对外国人的，也包括危地马拉人。前一种的突出例子有谋杀美国大使（1968年）和西德大使（1970年）。^③由于缺乏有效的领导，由于政府和右翼警备部队对起义军游击队员们的强大的镇压，起义军的明显的活动在七十年代减少了。总的说来，右派和左派两方的恐怖活动和反恐

① 公报是由蒙特斯和容·索萨在1967年10月签署的，载于《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第4—5期（1968年1—4月）。

② 见《格拉玛报》（哈瓦那），1968年2月25日。

③ 起义军发言人说：约翰·戈登·米恩于1968年8月28日被杀，因为他当时拒绝和要绑架他的人合作。卡尔·冯·斯普雷蒂伯爵于1970年3月31日被绑架，4月5日被杀，因为游击队的赎身条件——交纳七十万美元赎金和释放二十二个“政治犯”——没有得到满足。

怖活动还在继续不断地发生。

当11月13日革命运动在1964年末作为一个单独的组织而重新出现的时候，它在中苏争端中毫不含糊地采取了亲华立场。它的国内政策反映出强烈的卡斯特罗主义、毛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国际书记处派）和容主义因素。在国际问题上，《拉斯米纳斯山第一个宣言》宣布：11月13日革命运动绝对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五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6月14日）。“二十五条〔是〕以最权威的马列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纲领和路线。……这个路线和纲领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①宣言一再以肯定的口气提到中国和中国的政策，并在几处赞扬了支持中国路线的“许多富于战斗性的劳动党党员”。^②

在国内问题上，中国的影响没有这么明显，尽管第四国际书记处的头头胡安·波萨达斯在1966年初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容·索萨的纲领就是“中国人的纲领”。^③11月13日革命运动存在的最后五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外界影响，它在理论上混乱不堪。（1970年5月容·索萨在墨西哥——危地马拉边境与墨西哥部队的一次遭遇战中被杀以后，11月13日革命运动已不再独树一帜。）它受到的主要影响有：（1）托洛茨基主义，特别在1964年到1966年间，来自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系的几位顾问；（2）卡斯特罗主义，1964年到1970年，来自古

^① 引自《拉斯米纳斯山第一个宣言》（蒙得维的亚），反帝斗争银行委员会，1965年版，第44页。

^② 关于后面一点，见《宣言》第26、27、29页。

^③ 胡安·波萨达斯：《游击队在争取工人权利斗争中的作用》（J. 利马，工人之声出版社，1966年版），第28页。

巴和起义军；以及(3) 毛主义，贯穿在整个阶段，来自中国，虽然看来不是中国直接、主动提出的。

只要稍为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交叉的影响和混乱状况。关于革命阶段问题，1964年的宣言声明说：“危地马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并不是说要立即建立社会主义，而是应该象1917年列宁领导下的苏联以及象中国或古巴那样，去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工人的政权，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专政。”^①实际上，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国和古巴政府是很不一样的。前面已经讲过，容·索萨拒绝了存在于劳动党内的“所谓‘民族民主革命’的错误看法”。然而，他所拒绝的联合政府，实质上正是中国人1949年采用的政府，也就是中国理论家们看作是他们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的最重大贡献之一的新民主主义政府，而容·索萨所建议的工农政府，至少在理论上和古巴政府非常相近。此外，虽然宣言强调了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但没有强调马列主义政党的先锋作用。这又是和卡斯特罗派的观点比较相近，而不那么象中国的或苏联的观点。另一方面，多年来容·索萨在建立根据地和进行武装宣传上作出的一些努力，则和毛主义的做法比较接近，而不那么象卡斯特罗派的做法。

哥伦比亚 民族解放军是1964年中在桑坦德省成立的。据该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法维奥·巴斯克斯说，民族解放军于1964年7月4日诞生于农舍，而由一个十八个农民组

^① 引自《拉斯米纳斯山第一个宣言》，第30页。

成的核心开始游击活动。^① 它第一次军事行动是在 1965 年 1 月。将近年底的时候，一位年轻的神甫卡米洛·托雷斯加入了民族解放军，由于他在学生和其他人中很有影响，民族解放军因此而得到了发展。1966 年 2 月，托雷斯被杀害，此后，他便成了许多人崇拜的偶像，成了一些人心目中“战斗的基督徒”的典范。^② 在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民族解放军的其他主要领导人有巴斯克斯的另外两个兄弟、安东尼奥和曼努埃尔、维克托·梅迪纳·莫隆、里卡多·拉腊和一度当过西班牙神甫的多明戈·莱恩。据报道，到 1975 年初，除了法维奥·巴斯克斯以外，他们都被打死、俘虏，或成了逃兵。不过，大家都知道，许多年来哥伦比亚关于游击队损失的报道都是不准确的。

据法维奥·巴斯克斯说，民族解放军是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它是由于农民需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产生的。饱受折磨、饥饿、疾病、不识字和压迫之苦的主要是农民，他们受到的种种苦难，迫使他们揭竿而起，反抗压迫制度”；实际上，人们也把这个组织叫做“农民的军队”。1967 年，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说，尽管农民在这个组织里占“很高的百分比”，工人、学生和自由职业者也起了“很重要的

^① 见法维奥·巴斯克斯访问记，载于《事件》杂志（墨西哥城），1967 年 7 月 1 日，第 20、22 页。本节有许多材料是从马里奥·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发表在《事件》杂志上的一组文章和访问记中转引来的。他是该杂志的编辑。见 1967 年 6 月 24 日，7 月 1、8、15 日各期。

^② 关于谈论托雷斯各种各样的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杰拉尔德·泰森写的“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案件”，载于《教会和国家季刊》1974 年春季号，第 301—315 页；约翰·杰拉西编的《革命神甫：卡米洛·托雷斯著作及书信全集》（纽约），兰多姆出版社，1971 年版。

作用”。形成这样组成情况的原因是：(1) 农村斗争的基本情况，(2) 哥伦比亚的无产阶级还不成熟，以及(3) 镇压部队的力量。所以，合乎逻辑的是，民族解放运动是在山里诞生，在山里成长，最后从农村发展到城市。^①

巴斯克斯详尽地论述了一个理想的游击队领导人必须具备的品质和承担的责任：他必须热爱人民和他们的事业；他必须在诚实、机智、性格、品质、牺牲精神、胆略和组织才能等方面都十分出众；他必须保证游击队的生存；他必须永远不进城。关于信奉马列主义和领袖在革命党中的作用问题，巴斯克斯没有谈什么。^② 在评论过委内瑞拉游击斗争以及暗示了委内瑞拉共产党“临阵脱逃”以后，巴斯克斯对于“真正的、人民的当之无愧的领袖”的产生，下了一个典型的卡斯特罗式的断语，他说：

人民在选择自己的领袖时，也许不明真相，也许会上当受骗，但是〔武装斗争的〕过程将揭去不够格的人的面具，而把杰出的人物推到上面来，这些人物就是那些没有丧失信仰的人，那些不是机会主义者的人，那些不把次要的、也就是个人的考虑放在斗争之上的人，那些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那些为了败坏运动而钻进来的人。^③

关于共产主义和革命政党问题，当时民族解放军的另一个领导人——第二流的维克托·梅迪纳·莫隆曾经相当详细地讨论过。据梅迪纳说，民族解放军被人扣上了“共产主义

^① 见法维奥·巴斯克斯访问记，载于《事件》杂志，1967年7月1日，第20、31、33—34页。

^② 同上，尤其见第34、37页。

^③ 同上，第41页。

者”的帽子，因为这些人想用这点来暗示游击队的国际联系。对这一点，他发表评论说：“并不一定要接受任何别国的指示，才能认清反对美国政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统治的斗争。同样，也并不一定要声明信仰马列主义，才能同控制〔哥伦比亚〕政府的一帮恶棍作斗争。”对成立政党的必要性，他说：“今天，我们认为哥伦比亚人民需要一个政治——军事组织，这种组织毫无疑问超出了我们惯常认为是政党的界线。这样一种由一支革命者的队伍作为基本核心的组织，就是我们目前正在〔民族解放军内〕建立的组织。”^①

在法维奥·巴斯克斯看来，从1967年起，民族解放军的政治——军事目标是：

把暴动作为基本斗争形式，为人民大众各阶级夺取政权，因为按照我们的人民战争思想——指由绝大多数被压迫者发起的反对一小撮剥削者的人民战争——我们认为，当一切合法的政治斗争的手段都已经采用过以后，武装的先锋队必将从群众中挺身而出，保证夺取政权的斗争能够继续下去。

更重要的是，因为现在人类已经十分了解那些与北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动寡头统治势力是贪得无厌、无比残暴的，所以我们肯定他们是不会允许人民通过和平手段起来掌握政权的。^②

巴斯克斯的结论是：尽管武装斗争必定是旷日持久、困难重

^① 法维奥·巴斯克斯访问记，载于《事件》杂志，1967年7月15日，第36、37页。

^② 这一段引文和下面一条简短的引文，是从法维奥·巴斯克斯访问记中摘抄下来的，访问记载于《事件》杂志，1967年7月1日，第27—28页。

重,但却是哥伦比亚人所能遵循的唯一道路。因此,发展游击部队对于建立民族解放军是非常重要的,这支民族解放军将为了“获得政权并建立一个民主的革命政府”而同寡头统治和北美帝国主义展开争夺政权的斗争。这里很清楚,民族解放军并不坚持要有一个政党或马列主义思想的领导,但同样真实的是,它确实号召农民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曼努埃尔·巴斯克斯在和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的谈话中争辩说,游击战是解决哥伦比亚问题的手段,也是拉丁美洲所有其他各国人民为了取得自由而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他特别强调甚至智利人民也不例外。他最后说,整个拉丁美洲迟早总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游击战前线”。^①

在1967年,民族解放军领导人都毫不犹豫地支持古巴革命,尽管有报道说,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法维奥·巴斯克斯和道格拉斯·布拉沃一样,对菲德尔·卡斯特罗越来越不支持拉美游击队员感到不快。由于政府的反暴动行动,由于内讧,民族解放军在七十年代初期(特别是1974年)遭到了惨重损失,但在法维奥·巴斯克斯领导下,它在1976年初又在好几个省继续活动了。

秘鲁 左派革命运动是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起义军——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的人民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小组织——发展起来的。它的根底和以后的成员织成情况,反映出它对青年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最近几年这个组织的领导人里卡多·加迪——切·格瓦拉前妻的兄弟——

^① 曼努埃尔·巴斯克斯的话,引自《事件》杂志,1967年7月8日,第31页。

在 1972 年说：左派革命运动不是也无意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而是一个扎根在群众之中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党。^①

六十年代初期，一些党的领导人，尤其是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已经深信只有武装斗争才能给秘鲁带来民族解放，这也是全党在六十年代中期采取的立场。德拉普恩特在一项非常详尽的声明中说：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从某些最低层的党组织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最差的地方开始，努力做好起义工作。因为我们相信，在游击区，在准备阶段就有可能建立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使群众觉悟起来并吸收他们参加武装斗争；在战斗打响以后，这些工作将更紧张地进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武装斗争这个群众斗争的最高形式开始，通过武装斗争，我们将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革命党，我们将能够把群众争取过来。

德拉普恩特接着说：

(1) 客观和主观条件都已具备，后者即使还没有完全成熟，它也将在斗争过程中成熟起来。

(2) 被剥削群众必须立即计划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3) 初期的战略战术必须采取游击战，然后再采用运动战甚至阵地战。

(4) 由于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以及由于我们的地理特点，起义必须首先在险山恶岭之中或东安

^① 见里卡多·加迪访问记，载于《假面具》双周刊（利马），1972年5月22日。

第斯山脉的悬崖陡坡之间发动。

(5) 根据我国的幅员,以及它在地理上不够完整,缺乏运输系统,并且有很多种语言、种族和文化这些情况,组织几个游击中心来发动和发展斗争的做法是可取的。

(6) 游击活动的影响,将有助于建立和发展党,有助于发动群众、激发他们的觉悟、并把他们结合到农村和城市的斗争中去。

(7) 由于我们是遭受大庄园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几重压迫的不发达国家,我们必须把被剥削阶层——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团结在统一战线中,这个统一战线是由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为代表的工农联盟领导的。

(8) 秘鲁的革命是本大陆和全世界革命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要求在每个方面和每个阶段都有越来越好的结合方式,以便打败那些正在整个大陆勾结在一起的寡头和帝国主义势力。^①

在1965年开始的武装斗争,大约有一百二十五名游击战士被打死,其中包括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德拉普恩特和吉列尔莫·洛瓦顿。这个组织的领导责任就由里卡多·加迪担任起来了,尽管他在起义之后就被关进了监狱。1967年,加迪把武装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多年的

^① 德拉普恩特:“秘鲁革命的思想 and 前景”,引自理查德·戈德的《拉丁美洲的游击运动》(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出版社,1971年版),第349—50页。这个纲领中毛主义色彩最浓的是第七点。还可参阅德拉普恩特1964年2月7日发表的声明,载于梅尔卡多的《秘鲁的游击队》。此书第84页上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比较接近毛主义的观点,而不那么象卡斯特罗派的观点。

改良主义和烦琐哲学影响下形成的教条和框框”对立起来。^①

左派革命运动并不支持在 1968 年年底的政变中上台的胡安·贝拉斯科左派军政府，虽然从它里面分裂出去的一个小组织——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很快就支持了那个政府。左派革命运动在 1969 年 7 月 26 日的宣言中说：“作为一个机构，武装部队总的说来不可能进到社会主义。……由于摧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柱，那武装部队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没有了。”宣言坚持认为：“革命暴力”，即“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武装力量”，仍将是“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绝对必需的”。^②这种对军政府的“卡斯特罗式的”反对，一直到 1976 年还在继续，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和古巴政府在贝拉斯科政府上台后不久就对它采取了友好态度。

秘鲁第二个也是比较次要的卡斯特罗派组织，是民族解放军。这个组织是由秘鲁共产党原来的一些党员在 1962 年建立的。1965 年它加入了游击运动，虽然它和左派革命运动并没有协同行动。民族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埃克托尔·贝哈尔——《1965 年的秘鲁：一次游击历险记》的作者——从 1965 年年底到 1970 年 12 月军政府大赦政治犯，一直被关在牢房里。^③虽然民族解放军继续反对军政府，贝哈尔却在 1972 年开始到政府控制的“声援社会动员全国组织”中去工作了。

玻利维亚 古巴和玻利维亚革命者在 1966 年末建立的

① 见《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第 4—5 期（1968 年 1 月到 4 月），第 52 页。

② 见《终点》杂志，1969 年 8 月 26 日。

③ 埃克托尔·贝哈尔的《1965 年的秘鲁：一次游击历险记》，在 1969 年得到了古巴美洲之家出版社的文章奖金，这本书是 1970 年由每月评论出版社用英文出版的。

民族解放军,在 1967 年由切·格瓦拉领导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67 年 3 月,这个组织在他领导下达到了最大规模——五十一人,其中有十八个古巴人,二十九个玻利维亚人,三个秘鲁人和一个德国人。一个月以后,只剩下四十三个人了,因为以胡安·阿库纳(“华金”)为首的十个人从格瓦拉领导的主力中独立出去了。华金的队伍在 8 月 31 日被美国训练的玻利维亚军队消灭了。格瓦拉的队伍在 10 月 8 日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幸存到年底的只有五个游击队员——两个玻利维亚人(包括吉多·“因蒂”·佩雷多)和三个古巴人(1968 年 2 月逃到智利,3 月 6 日到达古巴)。慢慢地,因蒂·佩雷多又把民族解放军重新组织起来了,并领导了这支队伍,一直到 1969 年 9 月他在拉巴斯一次交火中阵亡为止。此后,这支游击队就由豪尔赫·鲁伊斯·帕斯和奥斯瓦多尔·“查托”·佩雷多等一些次要人物来领导了。^①

格瓦拉领导的民族解放军,和大多数卡斯特罗派组织不同,它没有发表很多公开声明来阐述自己的目标和战略(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能投入战斗就被政府发现了),就连格瓦拉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这一点,人们也是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的。民族解放军的道路,在 1967 年的一个宣言——《告玻利维亚矿工们》中作了简单的说明。现在知道这篇宣言是格瓦拉写的。宣言说:

^① 佩雷多三兄弟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的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中十分活跃,就象巴斯克斯三兄弟在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里名噪一时一样。罗伯托·“科科”·佩雷多和格瓦拉一起在 1967 年 10 月被杀。他和因蒂都是玻利维亚共产党多年的党员。老四叫安东尼奥·佩雷多,1975 年末在科恰班巴被捕,对他提出的指控是进行颠覆活动。

在农业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不发达国家，群众斗争必须由在人民中建立起来的小规模的流动先锋队——游击队来承担。这个组织将在杀伤敌军装备自己中壮大起来，并象催化剂一样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直到造成这样一种革命形势，即在一个合适的时刻，只要猛力一击就能使国家政权土崩瓦解。^①

除此以外，民族解放军的战略，是从格瓦拉领导的游击小组的行动中，以及从玻利维亚当局 1967 年获得的格瓦拉和他的古巴同志们的日记中透露出来的。^②

从 1966 年到 1967 年，民族解放军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古巴人和玻利维亚人，虽然在不同时期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战士。这和格瓦拉在 1967 年“给三大洲团结会议的一封信”中发出的号召是一致的：要用“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待“国际无产阶级的军队”。^③ 民族解放军的成员要有国际性，这一点被认为是很可取的，因为民族解放军准备进行的战争，本来就超越了一国的范围。在这封信里，格瓦拉还谈到要在拉丁美洲制造第二个或第三个越南。卡斯特罗在给格瓦拉日记写的“必要的引言”中说：

切并没有把玻利维亚的斗争看作孤立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势将不停顿地向南美其他各国蔓延的革命解放

① 见《格拉玛报》（哈瓦那），1968 年 7 月 14 日；译文引自博纳奇和巴尔德斯的《切·埃尔内斯托·格瓦拉选集》，第 186 页。

② 关于格瓦拉、哈里·比列加斯（“庞博”）、埃利塞奥·雷耶斯（“罗兰多”）和伊斯雷尔·雷耶斯（“布劳略”）的日记，见詹姆斯编的《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全部日记及其他缴获文件》。

③ 见《格拉玛报》（哈瓦那），1967 年 4 月 23 日。

运动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个没有宗派主义情绪的运动，使所有那些愿意为玻利维亚和其他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拉美各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人都能参加进去。^①

美洲的越南和大陆革命的想法，在哈里·比列加斯(“庞博”)的日记中表露得非常清楚。他是在1966年——在格瓦拉之前——被派到玻利维亚去为后来的活动打基础的古巴人之一。1966年11月15日，庞博写道：亲苏的玻利维亚共产党总书记马里奥·蒙赫必须懂得，“玻利维亚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因为敌人必将竭尽全力扑灭这个斗争。玻利维亚必须牺牲自己，以便给邻国创造(革命)条件。我们不得不把美洲变成以玻利维亚为中心的另一个越南。”^②

玻利维亚的战斗，是由格瓦拉和古巴人而不是由玻利维亚人计划和领导的。这在格瓦拉的日记和其他文件中看得很清楚。格瓦拉在1966年12月31日的日记里，回顾了他那天和马里奥·蒙赫进行的讨论：

接待是热诚的，但气氛紧张。“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对这一问题大家不知如何是好。

和蒙赫的谈话，是从一些一般性的话开始的，但很快就转到了根本问题上，这可以归纳成基本的三条：

(1) 他将辞去党的领导职务，但他将争取使党至少保持中立，他还将为斗争提供干部。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必要的引言”，见《切·格瓦拉日记》(纽约，班塔姆图书公司，1968年版)，第14页。

② 庞博的日记见詹姆斯编的《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全部日记及其他缴获文件》，第286—287页。

(2) 只要革命是在玻利维亚进行,斗争的政治、军事领导对他就该是相宜的。

(3) 他将负责同其他南美政党的关系,使它们采取支持解放运动的立场(他举了道格拉斯·布拉沃的例子)。

我的回答是:第一点,他是党的书记,完全应由他自己作出决定,虽然我认为他的立场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摇摆不定、出于私利的立场,目的是维护那些由于采取了听人摆布的立场而应该受到谴责的人在历史上博得的美名。时间将证明我是正确的。

关于第三点,我不反对他去试一试,但是肯定会遭到失败。要求柯都维亚去支持道格拉斯·布拉沃,等于要求他去宽恕他自己党内发生的反叛行为。这里,时间也将作出判断。

至于第二点,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可以担任军事首脑,但对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我不能接受。讨论陷入僵局,谈话在恶性循环中结束。^①

根据因蒂·佩雷多写的关于蒙赫来访的记载,这位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坚持说,当玻利维亚人得知游击队是由格瓦拉——一个“外国人”——领导时,他们就会别过脸去,不理睬这个游击队,这就使它非失败不可。对此,佩雷多评论道:

^① 见《切·格瓦拉日记》,第43—44页。维多利奥·柯都维亚是亲苏的阿根廷共产党的首脑。他和他的党整个说来是格瓦拉战术难以动摇的敌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党,特别是它的青年组织,当时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号召而陷于四分五裂,他们提出的比较激烈的革命政策,对那些比较保守的党员,象柯都维亚那样的人是难以接受的。

“蒙赫的话使我们十分恼火，特别是在他给切扣上‘外国人’的帽子，从而愚蠢地否认了他的全大陆革命家身份的时候。”^①菲德尔·卡斯特罗更加直截了当地写道：格瓦拉不愿意“把游击核心的指挥权——这个核心将在它的最后阶段在南美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战斗——交给一个毫无经验、充满狭隘的沙文主义观点、头脑空虚的人。”^②

格瓦拉死后不久，因蒂·佩雷多——他自称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革命天才最后也是最宝贵的教导的意外继承人”——写文章向全世界宣告：“玻利维亚的游击战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他在1968年7月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批评玻利维亚左派人士在1966年到1967年期间只是在口头上表示要支持游击队而实际上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支持。他号召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帝战线”，并简要地列出了建立这个战线的办法：

我们并不为了实现改良或达到其他目的而反对人民的斗争。但我们深深感到，当他们反对的是一个已经被游击中心搞得惊慌失措、受到削弱的政府时，斗争一定更有成效。

这个游击中心将向人民——用事实——证明，对付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还能战胜它。^③

① 佩雷多：《我同切在一起的时候》，第40页。

② 卡斯特罗：“必要的引言”，第15页。

③ 这一段里的引文都是从因蒂·佩雷多的“玻利维亚的游击战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中摘抄来的。这篇文章载于《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的一期特别增刊上，增刊是1968年出版的，没有写明日期。

民族解放军不是任何政党的“战斗组织”，他写道，游击战也不是城市政治斗争施加压力的工具：

城市里的斗争，必须是对游击活动的一种支持；因此，城市不能领导游击队，而游击队则作为解放运动的武装的先锋组织应该领导运动。这是自然形成的。反过来干，就等于使游击队不起作用，陷入瘫痪。一句话，势必把它引向失败。

斗争本身会产生领袖人物。真正的人民领袖是在斗争中造就的。没有一个自认为是真正革命者的人会坚持要当领导人，或害怕自己的地位被人抢去。

佩雷多最后重复了格瓦拉把拉美变成新越南的号召，把它说成是“我们决不会推卸的光荣和责任”。

在拉巴斯省北部特奥蓬特地区的起义刚刚失败，在1970年10月7日发生把左派的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捧上台的军事政变以后，民族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说：就个人讲，有些军人具有“真正革命”的观点，但是作为一个组织，军方不可能对玻利维亚的结构进行真正的变革。接着，民族解放军阐明了自己的道路：

民族解放军之所以选择持久战战略，并不是出于任何浪漫的遐想，机械地抄袭他人的经验，或出于简单的教条主义。我们相信，一次真正的革命，是以通过武装斗争从肉体上消灭反动军队，或把他们驱逐出这个国家为前提的。这个任务只有在全体人民的觉悟和组织水平，以及政治和军事经验达到了一定程度可以这样干的时候，才能完成。人民大众夺取政权的能力，是不能象耍魔术

似的在一夜之间提高的，也不象许多赞成暴动的人所相信的那样是自发的结果。我们坚持认为，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道路是开展持久的革命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战斗的先锋队通过自己的表率行动，将使人民大众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有可能不断提高觉悟，投入斗争。^①

1971年8月22日右派军事政变以后，民族解放军参加了不起作用的反帝革命阵线，而在1972年和以后几年中，又在政府采取的武装行动中遭受了新的损失。1974年2月，民族解放军成了南美南部四个游击队共同成立的革命协调委员会（下面还要讨论）的成员。1974年11月刊登在该委员会的《切·格瓦拉》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期望分三个阶段进行“持久战”：（1）传统的游击运动，（2）暴动，（3）向进行干涉的帝国主义军队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文章攻击了玻利维亚“改良主义者”，因为他们抛弃了武装斗争，而赞成“单单搞些鼓动工作”或者“和资产阶级缔结盟约”。

1975年6月11日，革命协调委员会设在巴黎的拉美通讯社宣布：民族解放军已经建立了玻利维亚工人革命党，并指望它能成长为玻利维亚革命的先锋队。民族解放军不会消失，它是在新党的马列主义领导之下的“工人阶级和玻利维亚人民的军事力量”或“武装拳头”。玻利维亚工人革命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1975年9月1日刊登了一篇声明，声明说：这个先锋队将把玻利维亚无产阶级的斗争，提高到“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的水平”。声明承认，切·格瓦拉在

^① 声明载于《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第57期（1970年12月），第45页。

1966年到1967年期间犯了“策略上的错误”，但重申了它的信念：正如格瓦拉所说的那样革命必须用武装斗争来进行，必须是全大陆范围的。1975年12月中旬，玻利维亚政府宣布在二十世纪矿区逮捕了安东尼奥·佩雷多和许多玻利维亚人和外国人，据说这些人是玻利维亚工人革命党地区指挥部的成员。

尼加拉瓜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是从1958年开始的尼加拉瓜游击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卡斯特罗派小组织。这个名称是1962年正式采用的。^①用196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纲领》的话来说，这个阵线

是由于尼加拉瓜人民需要一个先锋组织而产生的。通过同敌人进行直接的斗争，它是能够夺取政权，并建立一个能够消灭我国一直遭受的剥削和苦难的社会制度的。

阵线是一个政治——军事组织，它的目标是通过摧毁独裁政权的官僚、军事机器而夺取政权，并建立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得到国内所有反帝爱国力量支持的革命政府。^②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规模一直很小，而且人数也总是变化不定，参加战斗的战士最多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超过一百个。学生一向都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同时也不时有知识分子、农民和城乡工人参加。有些成员似乎是从那个国家的共

^① 这是根据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缔造者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的话写的，见《直接来自古巴》杂志（哈瓦那），第29期（1970年11月）。这个阵线是以尼加拉瓜一名将军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的名字命名的，他曾发动游击战反抗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占领（1927年到1933年），这使他成了反帝抵抗运动的象征。

^② 见《纲领》，载于《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第17期（1970年3—4月），第61页。

产党——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来的，尤其是从那些对党的领导不满和对党的武装斗争犹豫不决的人中间来的。

六十年代中期和此后数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有几次几乎被全部歼灭。游击队领导人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在坐了几年牢之后，出席了1967年在哈瓦那举行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并在会上向尼加拉瓜政府提出了“宣战”。1969年8月，丰塞卡在偷越国境后在哥斯达黎加被捕。在他不在的时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就由一个叫埃弗拉因·桑切斯·桑乔的青年工人担任。1970年10月，游击队员劫持了一架哥斯达黎加飞机，迫使它改道飞到古巴。四个美国乘客被当作人质扣留了下来，后来拿他们和丰塞卡以及另外三个中美洲游击队员交换，释放了他们。丰塞卡获释后到了古巴，从表面上看，好象在七十年代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呆在那儿。在这段时间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只在尼加拉瓜搞一些有限的活动。1974年12月，这个组织在马那瓜袭击了一个圣诞节聚会，杀死了几个人，还绑架了十多个政界、商界要人，因而突然受到了国际上的注意。最后，那些被绑架的人全都释放了，换出了几个被关在监狱里的革命者。被释放的人和被绑架者都被安全地送到了古巴。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建立以来，总是对政治和军事官员以至平民百姓进行袭击和暗杀。这些行动以及零星的绑架、抢劫和其他行为，无论在城市或农村都没有为他们赢得多少尼加拉瓜人民的支持。当然，对阵线成员、甚至对被怀疑为支持这个组织的人所采取的严厉措施，也肯定影响了群众对阵线的支持。

丰塞卡·阿马多尔在1970年说：阵线将“继续在尼加拉瓜进行武装斗争，直到这个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并从美国及其傀儡索摩查手中夺回它的主权和自由为止。”^①1970年，阵线的执行书记处声明：“在物质资源方面，我们〔比政府〕差，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却有绝对的优势，这就使我们能够打下去，需要打多少年就打多少年，直到我们的事业，即人民的事业，取得最后胜利。”^②

1969年制订的桑地诺《纲领》说，阵线在进行“艰苦、持久的人民战争”的过程中，将要建立一个人民革命政府，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行广泛的计划。它要采取的措施是在这样几个总的方面之下提出的：革命政府，处理政治问题；一个基本的、独立的经济；土地革命；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险；大西洋海岸特别计划；妇女解放；行政的正直真诚；文化、教育革命；尊重宗教信仰；独立的外交政策；废除查莫罗——布赖恩条约^③；人民爱国军；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中美人民的团结；以及纪念死难烈士。^④

小 结

到1976年初，上面谈论到的以及没有提到的拉美卡斯特

^① 见《格拉玛报》（哈瓦那），1970年11月1日。

^② 引自“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人民战争在继续”，载于《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第52—53期（1970年7—8月），第34页。

^③ 美国和尼加拉瓜在1914年8月签订，1916年批准的外交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美国有权在尼加拉瓜国土上修建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租借科恩群岛99年，并在丰塞卡湾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译者

^④ 关于纲领的有限的细节情况，见《三大洲公报》（哈瓦那），1970年3—4月，第62—68页。

罗分子,大多数都已经被杀、被捕或退出游击生涯。这些卡斯特罗分子,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拉美各国内部发展和美国制订拉美政策中起作用的因素。有些国家的改良政策,是因为存在不满现状的情况——这在游击斗争中得到了特别生动的体现——才采用的。争取进步联盟(以及有关的计划)部分地也是对卡斯特罗派的斗争作出的反应——从更广泛的角度看,首先是对古巴支持这种斗争的反应——以及对未来可能到处蔓延武装暴力威胁的反应。然而,根据他们自己鼓吹的主张来看,卡斯特罗派的活动只能说是取得了部分成功。他们确实有一些国家激化了矛盾和冲突,并且使人们对于许多传统的革命组织的革命性发生了几分怀疑。同时,他们也没有进行他们所寻求的那种革命。在许多国家,面向农村的卡斯特罗派游击队,从事微不足道到轻度破坏的斗争,有几个游击队就这样拖延了十几年。但是,法维奥·巴斯克斯和道格拉斯·布拉沃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以及他们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发动的革命的一直没有成效,恰恰进一步说明面向农村的卡斯特罗分子整个来说都很不行。这些组织常常在形形色色具有改良倾向、反对暴力变革的组织中间形成一些利害相通的派别,同时也导致了右翼治安维持会的建立。

事实上,尽管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贫困状况是人人皆知的,但这些国家的情况和气氛,很少是对卡斯特罗派的农村革命运动有利的。在这个阶段里,马列主义者所说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在拉丁美洲是不存在的,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把这种觉悟培养到起作用的程度,只有七十年代初期的智利(在第七章中讨论),也许还有七十年代中期的阿根廷是例外。满足于今

天现状的拉美人是为数不多的，相当一部分人总觉得适当的变革正在来临，或者至少通过改良和逐渐的变化是有可能实行的。几百万所得无几或者一无所有（有时甚至连希望都没有）的人，并没有被游击队员们的先锋行动争取过去。“小马达”就是没有能使“大马达”发动起来。一般说来，最贫困的农民、工人和失业者都不信任游击队，他们肯定对游击队和它的胜利前景缺乏足够的信心，因而没有冒着遭受政府和军队对他们进行报复的危险去支持游击战。这种恶性循环多年来打翻了卡斯特罗派的计划，因为美好前景或胜利的出现，必须首先有（但是并没有）群众的支持。不但如此，甚至那些处境最为凄惨的人，也不愿故意寻求大规模的内战（或全洲战争），不愿为了实现几个三剑客式的英雄好汉（毛主义者对卡斯特罗分子的称呼）的含糊不清的诺言——这些人经常突然出没于城市——而立即拿全家和朋友的性命来冒险。

六十年代从古巴传出来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拉美游击队活动中的那条卡斯特罗路线，有它突出的特点：急性病、优秀分子主义和缺乏耐性。这些特点的形成，是由于年轻人血气方刚，心情压抑，意志消沉，以及可能还有点喜欢“强盗行径”的缘故，也由于他们相信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不可能逐渐改变，而必须立即彻底铲除现行秩序。（对于最后一条，相当多的反对或至少不参加游击先锋队的拉美人和其他人，都有这样的看法。）急性病使卡斯特罗分子无法进行费时的建设群众基础或分阶段进行革命的工作。由于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路线才是正确的，卡斯特罗分子不愿和大多数其他组织建立联系。主要的卡斯特罗派组织（如哥伦比亚的民族

解放军,委内瑞拉的民族解放军和左派革命运动)又常常因为思想上和个人之间的分歧而分裂成两个或者更多的互相竞争、有时甚至进行交战的派别。

第六章 卡斯特罗主义： 城市游击战

在 1959 到 1976 年期间，有一些卡斯特罗派组织在不同的程度上采用了城市游击战和恐怖主义。这些组织主要以农村活动而闻名（前一章对此已有论述），其中有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危地马拉起义军和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然而，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乌拉圭、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一些组织，由于各国的情况和经验不同而受到几种“主义”的激励和影响，使游击战在城市的变种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本章主要研究乌拉圭图帕马罗斯（民族解放运动）、巴西民族解放行动和阿根廷人民革命军的情况，而智利左派革命运动的情况则单独在第七章中讨论。^①

城市游击组织的战略和战术

乌拉圭 几年来，乌拉圭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

^① 查尔斯·阿·拉塞尔、詹姆斯·阿·米勒和罗伯特·埃·希德纳编写的《拉丁美洲的城市游击队：书目选》是一篇论述城市游击队的文献，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第 9 卷，第 1 期（1974 年春季号），第 37—79 页。蒙特内罗斯和人民革命军是阿根廷受卡斯特罗主义影响的两个最重要的城市游击组织，它们是分别根据庇隆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建立起来的（而在 1973 年以后又逐渐同这两种主义分道扬镳）。关于阿根廷的城市游击队，参看拉塞尔、米勒和詹姆斯·弗·申克尔编写的《阿根廷的城市游击队：书目选》，同前引刊物，第 9 卷，第 3 期（1974 年秋季号），第 53—89 页。

斯)①是拉丁美洲最重要和最富有战斗力的城市游击组织。建立民族解放运动这个想法是乌拉圭的一些左派、特别是社会党的一些成员在六十年代初提出来的。社会党战士劳尔·森迪奇 1962 年(在农村甘蔗工人中)第一次依据这个想法成立了组织。图帕马罗斯分子于 1963 年 7 月进行了第一次突然袭击, 并从一个农村射击俱乐部里抢走了大量武器。部分地由于与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夫拉姆·纪廉联系的结果(见下文), 图帕马罗斯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城市, 因为乌拉圭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集中在城市, 其中仅蒙得维的亚一地就占百分之四十五。显然,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规模在 1965 年、1969 年和 1970 年曾有显著扩大。1969 年 10 月, 图帕马罗斯为纪念切·格瓦拉逝世二周年曾一度攻占过潘多镇。在 1969 和 1970 年期间, 对执法人员的袭击严重地损害了这个组织最初几年在群众中所精心树立的那种罗宾汉形象。②

民族解放运动在 1970 年年中以后由于绑架在乌拉圭工作的外国人而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注意。在被绑架的人中, 最重要的有: 巴西外交官阿洛伊西奥·迪亚斯·戈米德(1970 年 7 月 31 日), 美国安全顾问丹·阿·米特里奥内(1970 年 7 月 31 日), 美国农业专家克劳德·弗莱(1970 年 8 月 7 日)和英国大使杰弗里·杰克逊(1971 年 1 月 8 日)③。在绑架杰

① “图帕马罗”(Tupamaro)这个名字可能从“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这个名字演变而来。图帕克·阿马鲁是印卡族人首领,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曾在秘鲁领导了反对西班牙人的起义, 但未成功。

② 英国民间传说中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译注

③ 米特里奥内在被绑架期间, 于 8 月 9 日被“处死”; 这件事在 1973 年成了有争议的影片《戒严状态》(“State of Siege”)的主题。关于对这部影片的近乎全面的剖析, 参看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欧内斯特·沃·利菲弗写的影评“恢复一部‘记录片’的本来面目: 电影与真相”, 载《国际恐怖主义》, 见众议院外

克逊之后，图帕马罗斯便把注意力主要转向绑架乌拉圭的著名人士。

长期以来，图帕马罗斯由于组织和安全保密工作严密有效而闻名于世，尽管它的那种不可战胜的形象由于1969年的大逮捕而遭到破坏。在1970年7月底8月初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绑架事件发生之后，乌拉圭警察逮捕了森迪奇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其他几位高级领导人。据报道，在两个月内，大约有二百名图帕马罗斯分子被关押。^①从1971年5月底到9月初发生的几起人数众多的越狱事件，使图帕马罗斯的声誉有所恢复。1971年7月30日有三十八名妇女逃跑，同年9月6日有一百零六人包括劳尔·森迪奇在内，通过地道逃跑。在同年11月全国选举期间，据报道，“3月26日独立运动”代表图帕马罗斯参加了广泛阵线。^②在广泛阵线参加选举失败后，民族解放运动（在1972年初）便决定提高斗争水平，直接袭击政府军队，公然任意杀害普通士兵。这种做法导致议会支持总统颁布处于“内战状态”的命令。这项命令限制了某些行动自由权，并将颠覆活动交付军法审判。军队第一次同警察一起镇压游击队，因此产生两个重要后果：（1）到1972年底，数千名游击队嫌疑犯被捕，二百多个游击队秘密据点和仓库被发现，若干“人民监狱”被打开。连图帕马罗斯分子自己都承

交委员会近东南亚小组委员会的证词记录（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74年），第207—219页；还可参看拉特利夫写的关于影片《戒严状态》的评论，载《帕洛阿尔托时报》，1973年8月3日。戈米德于1971年2月21日获释，弗莱于3月2日获释，杰克逊于9月9日获释。弗莱在《寄一切希望于上帝》一书（纽约：霍索恩图书公司，1973年）中叙述了他的经历；杰克逊在熬过了漫长的黑夜》一书（纽约：先锋出版社，1974年）中也介绍了他的经历。

① 《纽约时报》，1970年9月27日。

② 《洲际新闻》（纽约），1971年12月13日。

认，他们在人员、补给和士气方面遭到了严重挫折；(2)军队采取了日后一系列步骤中的第一步，而这些步骤在几年之内就把以前是民主的乌拉圭实质上变成了军事—政治独裁的乌拉圭。^① 1973年8月，民族解放运动曾提到游击队有必要在1972年“暂时失败”之后来一个改组，并把这次失败归咎于对敌人估计不足，对“人民”依靠太少，以及有一些人的背叛。^② 虽然某些个别的图帕马罗斯分子，以及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在以后几年中对其它国家的游击组织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到1976年初，游击队在乌拉圭这个日益关闭的社会里已经不再起任何重要作用了。

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思想体系是马列主义的。^③ 该组织在1970年发表的《致社会各界的宣言》中自称是一个“由学生、工人、雇员、农业工人、知识分子和失业者组成的武装政治组织。”^④ 一位只知姓名叫做“乌尔瓦诺”^⑤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在1970年一次长时间的会见谈话中特别提到要注意学生的作用，因为学生同“激进的中产阶级”的其它阶层一样，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物质力量”。他承认，在7—8月发生绑架事件期间和之后进行的一系列逮捕，特别是“一批重要的同志”(包括森迪奇在内)的被捕，对于该组织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总的来说，他注意到城市作战中的损失是“相

① 见《图帕马罗访问记》，载《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72年8月1日和29日。

② 见《拉丁美洲报道》(旧金山)，1973年8月。

③ 见《青年起义者报》(哈瓦那)，1970年6月8日。

④ 《格拉玛报》(哈瓦那)，1970年9月27日。

⑤ “乌尔瓦诺”(Urbano)为“城市的”意思。——译者

当大的”，并指出“补充游击组织的骨干力量”是图帕马罗斯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①

民族解放运动对国内的态度和政策是经过多年，特别是在1968到1971年该组织力量最强大的时期形成的。乌尔瓦诺说：民族解放运动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因为，“要推翻那些一旦发现他们的政权受到他们所压迫阶级的威胁而顽固地用武器去保住政权的人们，只有靠武装斗争这个法宝”。^②一位图帕马罗斯分子对智利卡斯特罗主义的《终点》杂志发表谈话时说：民族解放运动和所有“真正革命组织”的具体战略方针是：

尽可能快地建立一支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能够利用任何由于危机或其它因素所造成的有利时机；通过武装组织的行动或其它办法，使人民群众觉悟到不搞革命就不会有变革；加强工会工作，使工会的斗争激进化，并使其与革命运动相联系；建立物质基地，以便能够发展城市斗争和农村斗争；同拉丁美洲其它革命运动建立联系，以便采取全大陆的行动。^③

图帕马罗斯分子论证说，武装斗争促进并加速了群众运动的发展。他们列举了古巴和中国的例子，并从而得出结论说：“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任何人都提不出理由来反对这样的假定：不论一个武装组织它是多么小，但它总比一个仅仅只

① 乌尔瓦诺：《图帕马罗斯：要是没有一个属于大家的祖国，那么任何人也不会有祖国》，载《三大洲公报》月刊（哈瓦那），第57期（1970年12月），第58期（1971年1月）；引语见第58期第4页，第57期第17页，第58期第10页。

② 同前引刊物，第58期第7页。

③ 《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68年7月2日，增刊。

发表革命‘主张’的组织更有可能成功地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如果没有一个有充分准备的组织，那末有了好的革命形势也是徒然，而且也不可能利用这种好形势来进行革命……武装组织从一开始筹建的时候起，特别是从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起，就要去创造或帮助创造革命的主观条件。^①

乌尔瓦诺解释说：由于考虑到乌拉圭的具体国情，因此才在乌拉圭采用了城市游击战，而没有采用农村游击战。他指出，“在游击运动的现阶段，重要的是证明游击队的核心能够在城市活跃起来、生存下去和继续发展”。他谈到在城市进行活动时说：“分散独立活动（‘必须懂得这一点’），随机应变”，善于观察，足智多谋——这些对于城市游击队取得胜利至关重要。游击队的每个小分队都有各自的行动小组、后勤补给小组、下属机构以及联络小组，以便“各个小分队能够同时独立地进行作战”。^②

乌尔瓦诺简要地谈了1970年底图帕马罗斯所采取的三种（有时相互交错的）行动。它们是：“战术行动，目的在于获得补给”；“宣传行动，通过宣传明确运动的目的和行动方针”；“反对政权的行动，主要目的在于破坏政权本身的基础”，特别是“针对镇压力量”。他说，本来采取绑架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搞点钱，或使一些被关押的同志获释，并且也为了“破坏现有制度的基础”。他解释说：美国安全顾问米特里奥内被绑架后于1970年8月9日“处死”，如果当时政府满足了民族解放

① 译自卡洛斯·努涅斯的文章“图帕马罗斯：乌拉圭的武装先锋队”，载《三大洲公报》月刊（哈瓦那），第10期（1969年1—2月）第57页和56页。

② 《三大洲公报》月刊（哈瓦那），第58期第8—9页，11页，第57期第17页。

运动提出释放一百五十名“政治犯”的要求，米特里奥内本来是可以获释的。然而，政府却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为了使绑架交换法能继续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就不得不“让绑架交换法有它的必然后果”。^①

图帕马罗斯通常试图避免出现那种在其它许多国家引起左派分裂的论战。1970年12月，它宣布支持广泛阵线参加1971年11月的全国选举，而同时又重申了它关于通过选举不能达到革命目的的信念。民族解放运动之所以支持广泛阵线，是基于这样的谅解：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任务必须是动员劳动群众；它的群众工作既非从选举开始，也非随着选举而结束。^②

1971年3月20日，图帕马罗斯发表了“民族解放运动革命政府纲领”。这是拟建立的民族解放运动政府试图贯彻执行的第一个系统的政策声明，但是，根据纲领精神，这并不意味着图帕马罗斯已经不再支持“任何其它具有同样目的的过渡纲领，例如，全国工人大会和其它人民武装组织提出的纲领”。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对土改、工业、商业、信贷、城市改革、计划工作、外国投资、工资、教育、公共卫生、老弱病残、司法以及武装保卫革命等问题，作了具体而非常简要的论述。^③

早在1968年，民族解放运动就说过，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同拉丁美洲其它革命运动建立联系，以便采取大陆规模

① 《三大洲公报》月刊(哈瓦那)，第58期第3—4页，第57期第5—11页。

② “民族解放运动关于广泛阵线的立场”，同前引刊物，第62期(1971年)第44页；又见《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71年1月5日。

③ “民族解放运动革命政府纲领”，载《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第62期第46—48页。

的行动”。^① 据阿根廷保安部队透露，图帕马罗斯曾于 1970 年 5 月主持召开了一次“协商会议”（实际是 1967 年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的一次续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十个游击组织，其中，除图帕马罗斯外，包括有智利的左派革命运动，玻利维亚的民族解放军，阿根廷的蒙托内罗斯，巴西的民族解放行动，哥伦比亚的民族解放军和委内瑞拉的民族解放武装力量。^② 民族解放运动在国内丧失活动能力之后两年，即 1974 年初，便同玻利维亚的民族解放军、智利的左派革命运动以及阿根廷的人民革命军一起建立革命协调委员会。^③

巴西与卡洛斯·马里格拉 巴西一些革命组织所进行的城市游击战主要发生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本节将涉及两个最重要的游击组织，但主要着重谈巴西城市游击战的主要理论家和实践者卡洛斯·马里格拉的情况。马里格拉编写的《城市游击战手册》已成为 1959 到 1976 年在拉丁美洲发行的关于论述城市游击战这种革命斗争形式的最重要的著作。

民族解放行动由亲苏的巴西共产党中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于 1968 年在圣保罗建立，其中马里格拉是最重要的人物。在此之前，即 1967 年该党就已经发生分裂。^④ 据说，到 1969

① 见《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68 年 7 月 2 日增刊；又见《青年起义者报》（哈瓦那），1970 年 6 月 8 日和《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第 58 期第 14 页。

② 见唐纳德·卡·霍奇斯：《拉丁美洲的革命》（纽约：莫罗，1974），第 159—160 页，第 214—215 页。此后不久，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即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公开表示感谢；见《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70 年 8 月 18 日。

③ 见附录四。

④ 关于持不同政见者同巴西共产党决裂时的声明，参看“圣保罗共产主义小组宣言”，见卡洛斯·马里格拉：《为了巴西的解放》一书，英译者：约翰·巴特和罗斯马里·希德（伦敦：鹈鹕，1971 年），第 127—31 页。

年民族解放行动已在巴西二十二个州中的十八个州建立了分支机构。该组织在进行城市游击战时采取各式各样的行动，也许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9月4日绑架美国驻巴西大使，这次绑架是在另一个小组织“10月8日革命运动”^①的配合下进行的。后来用释放美国大使换取释放了十五名“政治犯”，其中大部分人释放后都到古巴去了。马里格拉本人于1969年11月4日被打死。他的接班人华金·卡马拉·费雷拉也于1970年10月23日丧命。因此，民族解放行动在失去它的两位重要领导人之后已不再是这个国家最活跃、最重要的游击组织了。1973年初，民族解放行动和其它几个倾向游击队的组织共同发表了一个文件，该文件承认，由于没有赢得人民的支持，他们在“政治上是孤立的”。^②

革命人民先锋在1971年9月17日卡洛斯·拉马尔卡逝世之前一直由他领导，同时他还领导了巴西共产党的一部分党员。革命人民先锋在1970年是非常活跃和富有战斗力的，同年3月、6月、12月它先后绑架了驻圣保罗的日本总领事、西德大使和瑞士大使。它用这些绑架的受害者换取释放了一百一十五名“政治犯”。拉马尔卡逝世后，革命人民先锋虽然仍然在巴西的一些州进行战斗，但是它的声望和重要性却大大降低了。

卡洛斯·马里格拉在六十年代中期从巴西共产党分裂出来以前的几十年中，一直是该党杰出的党员。1966年12月他在关于辞去该党执行委员会的职务的信中明确表示了他对该

^① “10月8日革命运动”取名于切·格瓦拉1967年10月8日在玻利维亚被俘的日期。关于民族解放行动的建立，见《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69年1月28日。

^② 文献摘要，载《世界报》（巴黎），1973年2月15日。

党政策的不满。他在评论巴西共产党关于巴西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幻想”之后，写道：

对巴西来说，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武装斗争。我们必须准备人民的武装起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全部含义……我们现在所必须说的是，“革命将促使它的分散力量团结起来，并使他们知道每前进一步都会使群众进一步觉悟；革命纲领将不可阻挡地把群众吸引过来，因为只有它反映了群众的真正利益，反映了群众的切身利益。”^①

然而，这不是号召人们进行城市游击战。没有几个月以前，他曾写道：“游击战并不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正确办法。”^② 1967年8月，在哈瓦那举行的拉丁美洲人民团结组织会议（马里格拉曾违抗巴西共产党的指示参加了这次会议）闭幕之后一星期，马里格拉便写信给菲德尔·卡斯特罗，表示“完全同意”会议代表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以及这位古巴领导人在会议闭幕词中所说的话。他在信中最后说，“游击战是团结巴西一切革命者并使巴西人民取得政权的唯一办法”。^③

1968到1969年是民族解放行动采取多次武装行动的两年。在此期间，马里格拉为巴西人民和其它各国人民详尽地阐述了游击战的目的、战略和战术，他第一次强调必须在巴西开始城市游击战。1969年5月，他在为欧洲革命同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民族解放行动的立场作了如下说明：

巴西的前途只有坚持长期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不可能有

① 马里格拉：“致执行委员会的信”，载《为了巴西的解放》一书，第187页。直到第二年底，马里格拉才退出巴西共产党。

② 参看“游击战及其运用”，同前引书，第179页。

③ “致菲德尔·卡斯特的信”，同前引书，第124、125页。

任何捷径，也不可能有任何期限。我们现在进行的革命斗争是从稳扎稳打的城市游击战开始的，其矛头是对准外国和巴西的大资本家的利益，因此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动荡不安，并使“大猩猩”的军队闻风丧胆。

从城市战线开始，我们将通过农村游击战把武装斗争的矛头指向大庄园。通过无产者、农民和学生的武装联盟采用分散而机动的游击战，我们将把我们的活动扩大到巴西内地的各个方面，最后建立一支同军事独裁常规军相匹敌的民族解放革命军。^①

虽然人们认为马里格拉主要是从事城市游击战活动并著有这方面的论著（下面将较详细地谈到），但是他还是常常把城市和农村的斗争作为革命战争的一个整体来正确地看待。1969年初，马里格拉在一座被缴获的电台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说：

如果不把农村游击战作为城市游击运动的一部分来进行并使城市和农村斗争适当配合，那末，农村游击运动将无法存在下去。我们说今年将是农村游击行动年，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城市地区的颠覆活动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独裁政权已遭到左派恐怖活动和一系列武力没收财产的打击。^②

然而，差不多在这同时，他写道，“整个城市斗争，不论是游击战或群众运动，都必须始终被看做是一种策略斗争……具有

① “论革命暴力的组织作用”，见《为了巴西的解放》一书，第44页。

② “论农村游击战”，同前引书，第99页。

决定意义的斗争将是在农村地区。”^① 马里格拉死后不久，古巴报纸便发表了华金·卡马拉·费雷拉写的一篇文章，该文说，农村武装斗争迟早将成为解放战争的基础。^②

1969年6月，马里格拉完成了他的著作《城市游击战手册》，该书主要阐明了1964年由于推翻前巴西总统若奥·古拉特而上台的军政府进行城市游击战的条件、特点、必要性和方法。该书不仅在巴西而且也在其它国家得到广泛发行，特别是由于古巴政府的促进，该书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已用数种文字出版了许多版本。^③

马里格拉在《城市游击战手册》一书中写道：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忠心耿耿的城市游击运动领导核心成员“要在思想上和纪律上用高瞻远瞩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武装起来，而这种思想又同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列宁主义和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是一致的，适用于巴西的具体情况。”他对城市游击战的目的作了以下说明：

在目前不可避免的必然激化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城市游击队的武装斗争要达到以下两个基本目的：

- (1) 肉体消灭政府军队和警察的头目及其帮凶；
- (2) 没收政府的资产和属于大资本家、庄园主和帝国主义者的资产，并从中拿一小部分来用作城

① “战略问题与战略方针”，见《为了巴西的解放》一书，第47页；又见“马里格拉号召人民参加斗争”和“向巴西人民发出的号召”，同前引书，第19—24页，第119—23页。

② 《格拉玛报》（哈瓦那），1970年1月4日。

③ 在下面一些页中，我用的译本载《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第16期（1970年1—2月）；该手册的另一个译本名为《城市游击战手册》，见《为了巴西的解放》一书，第61—97页。

市游击队员的生活费，而将其余大部分用来维持革命本身。

为使游击队获得活动经费，最普通的“没收”形式是“袭击银行”。破坏活动据说一般也有相同的目的：即损害、破坏、瓦解、摧毁敌人的要害部门。例如：

- (1) 国家经济；
- (2) 工业或农业生产；
- (3) 交通运输系统；
- (4) 军警系统及其机构和仓库；
- (5) 军警镇压系统；
- (6) 北美人在巴西的公司和财产。^①

城市游击队已经形成“一个工人、农民与学生、知识分子和牧师的武装联盟”，它有两种基本的不可缺少的必须具备的品质。一是，“政治革命激情”和“道德优越感”，前者是产生于个人经历和上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的训练，后者产生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在反对军政府的斗争中，“做一个袭击者或恐怖主义者是任何可尊敬的人所具有的一种高尚品德。”^② 二是，必要的革命的技术训练。既然“城市游击队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特点是，他是用武器战斗的人”，既然他“存在的理由……就是开枪射击”，因此，必须训练他使用各种手枪，自动武器，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筒，炸弹，燃烧瓶，而他的基本武器是轻机枪。同时，他还必须能够进行以下一些活动，例如：袭击，伏击，没收财产，杀人，绑架，破坏，神经

① 《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第 20, 37—39, 45 页。

② 同前引刊物，第 55, 19, 16 页。

战,以及恐怖活动。恐怖活动是“革命者决不可放弃的一种武器”,在进行这种活动时必须“极其残酷无情,极其沉着果断”。游击队必须利用他首先具备的出其不意和机动灵活等有利条件。^①

城市游击队可以组成一些小分队主动在当地开展活动,并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采取战略性的行动。他们有以下七个致命弱点:缺乏经验,吹嘘,自负(包括忽视农村游击战),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行动鲁莽,一怒而击敌,临时应付。^②

城市游击队坚决反对“选举骗局和所谓‘政治解决’那些机会主义响往的东西”。在机会主义面前,游击队员“必须变得更加勇往直前,更加凶狠,不停顿地进行破坏、恐怖、没收、袭击、绑架以及其它类似活动。从各方面来看,城市游击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显然是要与人民打成一片,为人民服务,以取得人民的拥护。”^③

阿根廷 人民革命军是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工人党的多数派的一个武装分支组织。它是根据1969年在欧洲举行的第四国际世界大会(联合书记处)的指示在(1970年7月29日)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工人党第五次大会上宣布建立的。人民革命军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形式的卡斯特罗主义、庇隆主义左派、阿夫拉姆·纪廉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各种革命思潮的强烈影响。到1973年,它仍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保持正式关系。

① 《三大洲公报》(哈瓦那),第20,23—25,37,47,46,30页。

② 同前引刊物,第27—28页;第53—54页。

③ 同前引刊物,第54,53页。

据该组织主要领导人马里奥·罗伯托·桑图乔说，人民革命军有了迅速的发展壮大，并在所有政治、思想和组织问题上严格坚持马列主义原则。^①一位人民革命军领导人1973年在对智利一家杂志发表谈话时说：“阿根廷工人和人民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坚持长期革命战争。”他还说，大多数人民群众，特别是他们的先锋队都知道，选举不会使他们获得解放。人民革命军将通过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来提高人民的觉悟，同时它认识到随着动员群众的工作取得进展，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将会增加（人民革命军将反对这种政变）。最后，人民革命军认为，只有阿根廷的革命成为大陆革命的一部分，阿根廷的革命才会成功。正如桑图乔所指出，这个论断说明了人民革命军完全同意切·格瓦拉的关于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创造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其中有一个或几个在拉丁美洲。^②

人民革命军从一开始就想同时在城市和农村开展活动。但是实际上，直到1975年在北方图库曼省建立一支重要的农村小分队时，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人民革命军企图发展一大批追随者，它提出了一个广泛的“民主反帝”纲领。该纲领要求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革命人民政府，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同美国签订的一切政治、军事条约以及同

① 《马里奥·桑图乔访问记》，载《图帕马罗杂志》（蒙得维的亚），第3期（1974年3月），转载于北美的拉丁美洲问题大会的出版物，并编入《阿根廷处于严峻考验的时刻》一书（伯克利：北美的拉丁美洲问题大会，1975），第101页。

② 《为了阿根廷，不胜利毋宁死》，载《今日智利报》（圣地亚哥），1973年5月11—17日，转载于《阿根廷处于严峻考验的时刻》一书，第100—101页。

“帝国主义资本控制的”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一切协定。^①一位没有透露名字的人民革命军发言人(早些时候曾援引过他的话)说:为了发展统一战线,人民革命军将号召所有左派、所有进步的革命的工人群众组织团结起来,互相支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以对付资产阶级以民粹派的镇压和欺骗的方式进行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方面的进攻。^②

在1970年到1976年初期间,人民革命军认为庇隆主义是一个有各阶层参加的运动,其中也有一些带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步阶层参加。1973年5月,一位人民革命军发言人说:

自从人民革命军建立以来,我们始终不断地要求各武装革命组织采取统一的作战行动,并希望建立一支坚强统一的人民军队,通过共同采取坚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方法,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使庇隆主义战士和非庇隆主义战士在这支人民军队中团结起来。^③

实际上,正如桑图乔在1974年3月所承认,人民革命军同庇隆主义武装运动的关系,其中包括同蒙托内罗斯和革命武装力量的关系,“时好时坏”,不大正常。^④的确,关于在人民革命军同庇隆主义左派和1973年选举的庇隆主义政府的关系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使人民革命军内部产生不和,并使几个少数派分裂出去。在1973年10月中旬胡安·庇隆就任总统前数星期,人民革命军即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当时桑

① 参看《基督教主义与革命》一书,(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年3月。

② 《为了阿根廷,不胜利毋宁死》第101页。

③ 同前引书,第100页。

④ 《马里奥·桑图乔访问记》第103页。

图乔宣称，庇隆是一个为资本主义效劳的反革命分子。在第二年中，庇隆主义游击队左派中的大部分人也对政府日益感到不满，特别是1974年伊萨贝尔·庇隆继任总统之后，他们便积极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当这些无组织的缺乏纪律性的庇隆主义游击队员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他们便分别通过下面两个组织同人民革命军取得了较多的联系，这两个组织：一个是1973年末同蒙托内罗斯合并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起义军，另一个是8月22日小组，这是从人民革命军分裂出去的并于1974年又重新加入这个老子党的一个组织。^①

在从1970年到1976年初的整个时期，人民革命军常常仿效乌拉圭图帕马罗斯的做法，采取了各种行动，例如，抢劫，绑架著名的阿根廷人士和外国人士（特别是商人）以勒取赎金，暗杀，同军队或武装警察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对抗等。其中最轰动一时的行动是，1972年8月15日二十八名游击队员（并不全是人民革命军的）从巴塔戈尼亚的罗森监狱逃跑，其中十名（包括桑图乔在内）乘坐一架劫持的飞机逃到智利，其余的人“在企图逃跑时”被政府当局打死在特雷利乌海军的空军基地。

像图帕马罗斯一样，人民革命军初期在各地的活动中也给人们以罗宾汉劫富济贫的某种形象。例如，1971年用释放被绑架的斯威夫特肉食罐头厂的经理换取该厂拿出价值五万七千美元的食品和其它生活用品分给阿根廷的一些贫民窟。其后，人民革命军的活动常常带有军事性质，往往把矛头指向

^① 参看肯尼斯·弗·约翰逊：“阿根廷的游击政治”，载《冲突研究》，（伦敦），1975年10月。

军警高级官员。在 1975 年期间，人民革命军的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北方图库曼省的农村地区。1975 年 12 月 23—24 日，人民革命军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其附近的一个陆军基地和其它目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协同作战的进攻，在进攻中有些游击队员躲藏到一个贫民窟里（在与政府军的交火中，那儿的许多平民被打死）。这件事说明了人民革命军离开它初期在群众中树立的那种罗宾汉的形象已经多么远了。1976 年 3 月，阿根廷军队推翻了庇隆政府，四个月之后桑图乔在一次交火中被打死，于是人民革命军受到严重削弱。

阿夫拉姆·纪廉的战略

阿夫拉姆·纪廉和阿尔维托·巴约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两名老战士，他们曾在拉丁美洲担任过游击队的教官，做过理论工作。巴约在美国比较有名，这是由于 1955 到 1956 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远征军在墨西哥受训时他担任过教官。巴约曾被切·格瓦拉称做“马埃斯特罗”，是《向一个游击队员提出的一百五十个问题》一书^①的作者。这本手册于 1955 年第一次在墨西哥出版，其内容是对游击队组织和活动的一百五十个通常很具体的问题的解答。后来该手册被各种游击组织翻印，有时书的作者不是用的巴约的名字；特别在六十年代

^① 参看休·托马斯：《古巴：追求自由》（纽约：哈珀和罗，1971），第 876—77 页，第 882 页。然而，据赫伯特·马修斯在他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书（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69）第 89 页上说，卡斯特罗曾“强调说他没有从巴约上校那里获得任何关于游击战的知识”。

初，该手册曾在加勒比及其周围地区得到广泛发行。^①

然而，纪廉是一个比巴约更严肃的思想家。他对拉丁美洲较多的游击队有过较大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据游击队、民族保安队等各种组织说，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采用的城市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有许多都是由纪廉的《城市游击队的战略》一书（1966年和1969年版）中系统地提出的。^②

在所有拉丁美洲游击战的鼓吹者中，纪廉用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正确地广泛地研究战略问题。纪廉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坚决认为，应该研究别人的著作和经验，只要它们与当代的情况有关，就应该加以吸收和利用，但决不能简单地照抄。他公开承认，象中国的军事理论家孙子（约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指挥官埃帕米农扎斯（公元前四世纪）等人以及许多近代和现代的革命家，如马克思、巴枯宁、列宁、托洛茨基、毛泽东等都给他以鼓舞或影响。到六十年代末，纪廉论证说，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已经到来。^③

他的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其中第一部于五十年代初问世）对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区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和所谓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进行了分析。这些半

① 哥伦比亚工人、学生、农民运动 1960 年出版的一个版本，署名为亚历杭德罗·赫内·巴。

② 纪廉本人也声称对这三国的城市游击队有巨大影响。唐纳德·卡·霍奇斯已经选译了纪廉的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手稿。同时并对纪廉的生平和著作作了介绍。见霍奇斯：《城市游击队的哲学：阿夫拉姆·纪廉的革命著作》，（纽约：莫罗，1973年）特别是第2—18页。

③ 阿夫拉姆·纪廉：《向五角大楼挑战》（以后简称《挑战》，蒙得维的亚，安第斯出版社，1969），第97页。

学究气的著作尽管往往内容重复、质量参差不齐，但有一个总的框框，他就在这个框框的范围内进行辩解，证明他坚持发动大陆规模的革命战争是拉丁美洲获得解放的唯一希望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的关于革命战争的著作既没有巴约或马里格拉的著作那样简明或专门，也没有德布雷的《革命的革命？》一书那样富于教条式的理论。

纪廉第一次提出进行大陆革命的主张是1966年，即在切·格瓦拉“致三大洲会议的电报”中发出关于采取这种战略的著名号召前一年。根据纪廉的说法，拉丁美洲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地获得真正解放，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单一经济，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假如人们企图只在一个国家内搞革命，那将会受到（象古巴那样的）孤立，受到（象1965年多米尼加共和国革命那样的）窒息，将会使经济受到（象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玻利维亚那样的）倒退，或者将会（象近几十年来墨西哥的革命那样）“资产阶级化。”^① 纪廉论证说：美国已经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共同体”，并制定了一个反对革命的国际战略，因此必须开展一个具有革命目的的大陆规模的运动来反对美国的这种做法。

一些采取强制手段的拉丁美洲政府企图建立一些美洲国家之间的经济组织，但是这种努力将不会使人民群众获得解放，而必须代之以全洲性的人民统一战线运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② 美国的“五角大楼战略”由于蚕食革命力量也被称为

① 阿夫拉姆·纪廉：《城市游击战的战略》，（以后简称《战略》，蒙得维的亚，解放出版社，1969），第57—58页，第75页。第一版于1966年出版。

② 同前引书，第57—58页，第68—69页。

“蓟战略”。^①要粉碎这种战略，游击队必须对美国在许多国家的设施同时进行袭击。^②为了做到这一点，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必须制定出一个科学的“作战方针”。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较详细地谈到。^③

有一些因素，例如，一般地说，时代的革命精神以及拉丁美洲的现状，有助于拉丁美洲革命事业的发展。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地区的人民受压迫，因此他们在苦难中团结起来，并希望获得解放。但是，拉丁美洲人民现在也由于他们共同的命运、宗教和(一般地说)语言而团结起来了。而且，拉丁美洲地区辽阔，有利于革命者们进行长期革命斗争。^④

依据纪廉的说法，革命战争“是一些阶级或民族的政治目的不能通过和平手段达到时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暴力行为”。纪廉还说，革命战争“是总体战争：在一场造成政治局势高度紧张的残酷斗争中，各国人民和军队(解放军)将团结起来反对本国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⑤在拉丁美洲的地形、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下，革命战争将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例如：(1)有一个幅员广大的新殖民主义控制区，在这个地区内可以骚扰和击败敌人；(2)有一些由五角大楼指挥的反动的国家军队；(3)有游击队；(4)有支持游击队的人民。^⑥

① “蓟”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嫩茎叶用开水烫洗后可蘸配料吃，吃时先将嫩叶一片一片地掰下来吃，然后吃嫩茎。所谓“蓟战略”意即蚕食革命力量的战略。——译者

② 纪廉：《挑战》，第69，100页。

③ 纪廉：《战略》，第185页，纪廉：《挑战》，第6页。

④ 参看纪廉《第三世界的造反》(以下简称《第三世界》，蒙特维的亚，安第斯出版社，1969)，第249页；纪廉：《战略》第25页；纪廉：《挑战》第63页。

⑤ 纪廉：《挑战》，第55页。

⑥ 同前引书，第56—65页。

革命战争必须由职业革命者组成的武装先锋队来开展，而职业革命者可以是工人、学生，或者是其它一些阶级的成员。^① 武装先锋队必须是游击队而同时又是“解放军和武装党”，它是由那些能够将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所组成。^② 武装先锋队的成员，不论来自哪个阶级，作为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纪廉确信人胜于技术，他同意毛泽东在谈到原子弹是“纸老虎”时所表示的观点。^③

游击党不应该是宗派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或者是一言堂的，而应该是灵活的，具有新的风格，不受任何主义的影响。它在进行政治活动时，要从人民的总的利益出发，以便争取全体被压迫人民。^④ 统一战线内应该容纳各种主义和派别，包括从马克思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到“非资产阶级化的”基督教和所有政治上摆脱了苏联官僚主义、美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控制的进步运动在内。^⑤

革命战争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反对地主、寡头、买办资产阶级、反动军队的领导以及其它伙同帝国主义者压迫群众的组织——所有这类人加在一起只占拉丁美洲人口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统一战线将吸收以下一些人参加：(1) 农民；(2) 产业工人；(3) 学

① “武装人民：革命的战略”一文的手稿载霍奇斯：《城市游击队的哲学》一书。又见纪廉：《挑战》，第 142 页；纪廉：《战略》，第 160 页。在 1969 年版的《战略》一书中，纪廉倾向于建立一个拉丁美洲学生先锋队，在书中有一处他把学生说成是“明天的无产阶级”；参看第 141, 158 页。

② 纪廉：《挑战》，第 73 页。

③ 同前引书，第 56 页；纪廉：《战略》第 21 页。

④ 纪廉：《挑战》，第 61 页。

⑤ 同前引书，第 75 页。

生,知识分子,技术治国论者,记者,作家以及其他知识界的代表;(4)中产阶级;(5)一部分倾向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6)一部分要求摆脱帝国主义者控制而独立活动的民族资产阶级;(7)军队中那些要求民族政治、经济独立的中下级军官。^①这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必须发展本大陆的工人、青年和农民的各种阵线,同时还必须建立一支拉丁美洲解放军。^②

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统一战线只能建立在一个非宗派主义的具有广泛性的纲领的基础之上。因此,依据纪廉的说法,革命必须首先要打倒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本国的同盟者,只有到那时,即第二阶段,才能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③这并不是说武装先锋队不应该隐瞒他们的政治方向。据纪廉说,革命干部应该经过社会主义训练,“但是,他们不应该公开谈论社会主义或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事”。斗争应该完全依据本国的情况进行,而不应该依据现有的意识形态:“如果菲德尔在马埃斯特腊山说他的目的是社会主义,那他可能打不赢这场战争。”^④

关于游击战是在城市或农村进行的问题,纪廉从1965年到七十年代初有几种看法。在1965年出版的他的《暴力论》一书中,几乎全是从农村的角度来考虑游击战这个问题的。例如,他写道:发动一场革命战争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人

① 纪廉:《战略》,第66页;又见纪廉:《挑战》,第163—164页;纪廉:《第三世界》,第246页。

② 纪廉:《战略》,第68—69页,第84页;纪廉:《挑战》,第121—124页。

③ 纪廉:《挑战》,第163页。

④ “武装人民”,载霍奇斯:《城市游击队的哲学》,第260页。

民支持,敌人有懈可击,丛林山区。^①但是,第二年他的这种看法即根本改变了,因为他的《城市游击战的战略》一书出版了,这是拉丁美洲出版的第一部认真详细论述城市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书。他在这本书中强调说:“革命的潜在力量存在于人民之中”,因此,在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城市的条件下,作战的中心应该在城市。例如,乌拉圭和阿根廷“应该进行长期的城市游击战争,这种战争是建立在许多小的军事胜利的基础之上的,而这许多小的军事胜利汇集起来将会导致取得最后胜利。”^②总的来说,自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纪廉一直认为斗争应该在城市同时在农村进行,问题是应该强调哪一方面,以及(在初期革命力量尚小的情况下)哪一方面应该居于首位。

纪廉并没有把亲苏的共产党或格瓦拉式的卡斯特罗主义的游击中心看作是他所想象的先锋队。他写道:共产党人已经变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他们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毫无贡献。^③他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德布雷所鼓吹的1966—67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所推行的游击中心,说那是一种“造反”的做法,与真正革命的做法显然不同。造反者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们常常把愿望误当成现实,事先不考虑周到就采取行动,没有适当准备就发动起义。对

① 《暴力论》(布宜诺斯艾利斯:哈姆卡纳,1965),第201页。

② 纪廉:《战略》,1966年版,引用于霍奇斯:《城市游击队的哲学》一书,第238,239页;《战略》,1969年版,第79页;又见纪廉为切·格瓦拉的《游击战》一书写的引言,(蒙得维的亚,普罗文麦斯—乌尼达斯),第15页;纪廉:《挑战》,第64—65页,第76页。

③ 纪廉:《挑战》,第74—75页。

比之下,革命者们在采取行动前则分析各种情况,仔细区分盟友和敌人,根据团结被压迫者打败压迫者的明确纲领建立革命组织。^① 纪廉 1972 年写道:游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搞堆积死尸的起义运动,因为它使五角大楼训练的镇压起义的将军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②

纪廉最后明确表示,他认为有一些著名的城市游击战士已经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例如,由于乌拉圭图帕马罗斯执行一种低劣的战略和成问题的政治手腕,^③ 它的所谓“超级战术”已经失灵。1972 年纪廉写道,更具体地说,图帕马罗斯主要在七十年代初期犯了以下一些错误:(1) 缺乏机动灵活性,没有可靠的安全保密措施;(2)在早期打了就跑的战术取得胜利之后没有使作战行动升级;(3)采用不必要的暴力,如打死一些普通士兵,从而把自己“降低到同反动军队一样的水平”;(4)延长人质在“人民监狱”的关押时间,不必要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平行的镇压制度”上;(5)被迫处死一名人质(丹·米特里奥内),在宣传上造成相反的效果;(6)过于专业化、军事化,脱离城市群众,主要仍然代表造反的小资产阶级;(7)“突然采取行动袭击新选举的博达贝里总统的政府,〔因此促使〕这个尚未经过实际检验的政府宣布处于战争状态,”当时如果让经济和社会危机使这个新政府垮台,那会比采取袭击行动好得多。

① 纪廉:《挑战》,第 92 页。

② 《武装的人民》,载霍奇斯:《城市游击队的哲学》一书,第 269 页。

③ 同前引书,第 274 页;下面对图帕马罗斯的批评也是摘自本书,第 263—277 页。

小 结

纪廉在他的《城市游击战的战略》一书中对于在拉丁美洲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广泛而长期地采用城市游击战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详细的论述，他是第一个对这个问题进行如此系统而详尽论述的人。他的著作和其他活动对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乌拉圭、巴西和阿根廷开展的城市斗争无疑曾产生巨大作用。然而，对于他的贡献应该给予全面正确的估量。甚至在古巴“美洲之家”出版德布雷的《革命的革命？》一书之前，在切·格瓦拉死于玻利维亚之前，一些国家的游击队和其他人就对这样一个论点（如果说他们曾经相信它的话）提出怀疑：农村游击战是否看来象古巴人和中国人所坚决主张的那样是拉丁美洲“解放”的基本道路。在纪廉的《城市游击战的战略》一书出版之后十年，现在可以说这种城市斗争形式对于已在进行这种斗争的国家的影晌比农村游击战对这些国家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虽然这种影响不会连续不断地给工人阶级带来眼前的利益，但游击队的斗争是意味着他们是为工人阶级而奋斗的。

马里格拉等城市游击战士主张全面瓦解或破坏国家经济和现有秩序，在理论上加剧人民群众同他们所认为的一小撮镇压人民群众的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以便进一步推翻旧的制度、建立一个革命政府。实际上，这种情况到写作本书时（1976年7月）并没有在中美或南美任何国家发生过。

巴西的城市游击队曾因进行绑架活动而赢得国际上一些

报纸的头条新闻,促进了一些右翼的反恐怖主义组织的发展;出版过一本关于游击战的手册,并使自己送了命。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什么也没有干。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过去在国内和国际上有着更为大得多的影响。在对付并非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时,他们无法获得人民对于他们克服危机的办法的重大支持,结果他们成了促使乌拉圭民主制度崩溃而代之以实际上为军事独裁的决定性因素。图帕马罗斯在它的全盛时期曾使乌拉圭成为城市游击战术的一个试验场,它所犯的一些错误后来在智利和阿根廷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避免。

1973年9月以前的智利左派革命运动(下一章将详细谈到)和阿根廷游击队(至少到写作本书时)都是非常富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它们比较成功地避免了纪廉指出的图帕马罗斯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见上文),例如,采取一些与其说得到不如说失掉群众支持的暴力行动。智利和阿根廷的游击队在工厂工人中得到巨大的同情和支持。智利左派革命运动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农民和农村其他人的少数派中的影响超过了阿根廷的人民革命军或蒙托内罗斯。然而,左派革命运动却成为智利民主制度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阿根廷游击队对于在他们的国家恢复军事统治也起了巨大的作用。鉴于在阿连德垮台之后的那一年里智利军队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左派革命运动,因此,阿根廷游击队的命运如何,现在还是个问题。

总的说来,农村游击队存在的许多问题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又重新出现了。城市游击队象农村游击队一样发觉要解决以下一些问题往往非常困难。这些问题是:(1)同其它

一些革命组织进行合作；(2)系统地制定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从而使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3)防止在战略和战术问题上出现不同看法，实际上这种不同看法已经引起内部不和，甚至造成组织的分裂；(4)争取全国各阶层大部分人的那怕是消极的支持，当然更不必说也要争取日益增多的个别人的积极支持；(5)判明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胁迫当前的政权机构而又不致引起一场游击队及其支持者尚未对之作好准备的反击。

在1974年革命协调委员会发表的纲领性声明中，谈到了游击队已经吸取的许多教训。革命协调委员会是美洲国家之间的一个游击组织，它是由南美四个具有丰富农村和城市作战经验的最重要的游击组织联合建立的。这四个游击组织是：智利左派革命运动，乌拉圭图帕马罗斯，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和阿根廷人民革命军。^①

这是一个比德布雷的“小处方”更通情达理而且在某些方面更为现实的声明。尽管人们可以看出这个声明是根据早期的卡斯特罗主义和类似的思潮写的，但是多年的理论探讨和惨痛经验已经使早期游击斗争的这种几乎是完完全全农村的特性有了削弱。（诚然，1974年的这个文件在很多方面更接近于六十年代末期的毛主义，而不是更接近于同一时期的卡斯特罗主义。）有一些拉丁美洲人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批评中的几个部分（例如，对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批评），虽然他们对于游击战或者对于由“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马列主义战斗党”来领导的要求并不同情。

^① 见附录三。

但是,批评的大部分内容是:严重的夸张(例如,说什么六十年代期间拉丁美洲“连续不断发生伟大的人民斗争”);过分简单化地曲解历史(例如,说什么统治阶级因为害怕“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可能把“法西斯政权”强加给乌拉圭和智利人民);教条主义的说法(例如,说什么只有在“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马列主义的战斗党”的领导下,拉丁美洲才能出现真正的变化);主观愿望和蛊惑人心的宣传(例如,说什么游击队将能“动员全体人民”,工人们“将会生产出极强大的不可抗拒的能量,从而造福于各国人民”);或者疯狂好战(例如,说什么“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很可怕、很严重的,必须发动一场席卷本大陆的“越南”战争来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

第七章 智利的卡斯特罗主义 和共产主义

在前几章中谈到的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政策，如同它们在其它几个国家一样，在智利也发生了冲突。但是，智利的情况却不一样，因为这种冲突已经不限于在一些不著名的理论杂志和报纸上进行论战，而且许多党派都卷入进去，它们对智利人民都有较大的影响。智利的亲苏共产党和卡斯特罗派组织之间的冲突虽然七十年代在总统府、工厂和农村结束了，但是它却对智利人民联盟政府及其许多反对者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智利每个人的生活也产生影响。

在人民联盟时期(1970—73年)开始之前不久，即六十年代期间，智利是拉丁美洲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拉丁美洲在许多方面富有政治经验的国家之一。六十年代的一些主要倾向给充满创伤的七十年代的一系列事件提供了背景。其中如：(1)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造成社会、经济混乱；(2)为提高智利穷人的生活水平，土改的进度增加了(但不快)，有时在这方面虽然作出最大的努力，但取得的成果很小；(3)根据法律，智利控制了本国的基本资源，特别是铜；(4)一些左派党发展壮大(包括智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等马列主义左派和比较温和的基督教民主党在内)，而一些传统的党的影

响则相应地削弱。进入七十年代后，智利有了一个总的说来行之有效的宪法、议会和司法系统，并有一个悠久的富有生气的民主传统以及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选举制度。智利产生过许多坦率的、能言善辩的领导人，他们持有各种不同的、对立的信仰，要求采取各种各样的政策，这些政策有时明显地带有蛊惑人心的宣传色彩。

在 1964 到 1970 年基督教民主党主席爱德华·弗雷进行“自由革命”期间，早已存在多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局势加剧了。然而，在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领导下的人民联盟期间，马克思主义者的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严格遵循阶级路线的斗争）有了非常迅速的发展。智利国内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国际上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有从拉丁美洲民族主义的普遍兴起到世界各国的政策。

在阿连德执政期间，有四个思想体系很不相同的主要政党，它们都有一批支持者，可以指望得到百分之十五到三十的选票。这四个主要政党是：国民党（是其中最保守的党），右倾改良主义的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和社会党。除了其它一些小党派以外，还有一些极右的和极“左”的组织，它们主要在法律 and 民主制度许可范围的边缘上或在这个范围以外进行活动。

智利共产党曾在 1969 年底建立人民联盟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个联盟是由以下六个左派党和左派运动组织联合组成的。它们是：智利共产党，智利社会党，激进党，社会民主党，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基督教民主党内持不同政见者退出该党

后成立的一个组织)和独立人民联盟。虽然人民联盟的组成在1969到1973年期间有所变化,但是,智利共产党和智利社会党仍然是该盟的领导力量。1973年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席位、并在人民联盟政府中经常掌管内阁各部工作的六个参加人民联盟的党派是:智利共产党,智利社会党,激进党,统一人民行动运动,独立人民联盟和基督教左派,后者是由基督教民主党和统一人民行动运动的另外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于1971年建立的。

总的来说,阿连德总统虽然身为社会党成员,但是看来他是同意智利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的。他无疑得到智利共产党党员及其青年组织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一些亲卡斯特罗派的势力强调同共产党人的分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对阿连德总统表示不满。这些势力主要包括“极左派”(这是智利共产党使用的字眼)和一些反对党。它们分属于六个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左派革命运动和阿连德所在的社会党的一翼。左派革命运动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卡斯特罗派组织,因此在本章中将比社会党更详细地加以论述,但是,社会党内部分裂的重要影响,无论对于国内政策和对外关系,怎样估价几乎也不会过高。这在后面将有论述。

共 产 党

背景与组织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智利共产党在拉丁美洲除古巴外是最重要的共产党。它从1959年的第四大党(在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共产党之后)到1973年发展为

最大的党。1969年底该党声称自1965年以来该党党员增加一倍，约达六万人；1973年该党声称拥有约二十万党员。^①即便后者近乎肯定是夸张的数字，该党的党员之多也许会超过南美其它各国共产党的总数，而它的积极分子之多则肯定超过这些国家共产党的积极分子的总和。1971年5月，该党的一位领导人对该党的党员成分作了如下的分析：工人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三；农民占百分之十三点六；职员占百分之八点九；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占百分之八点一；技工占百分之四点一。他还进一步把党员作了如下的分类：男党员占百分之七十；女党员占百分之三十；三十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三十点六；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的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一；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的占百分之二十点七；五十岁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点六。此后不久，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说，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党员出身于工人阶级。^②

智利共产党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由该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和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书记处和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管理。1969年11月，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从原来的五十五人增至七十五人；1972年3月，政治委员会

^① 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声称有二十万人，见《格拉玛报》（哈瓦那），1973年1月14日；《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月刊，第16卷，第7期（1973年7月）。必须以相当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数字，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数字有一些明显的夸张，而且也是因为该党所说的数字经常前后不一致。例如，1972年初路易斯·科尔巴兰声称有“二十五万左右共产党人”（《世纪报》，圣地亚哥，2月13日），这大概包括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在内；3个月后，奥兰多·米利亚斯的报告说有十二万党员（同前引刊物，5月21日）。

^② 参看马里奥·萨莫拉诺的文章，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14卷，第9期（1971年9月），和“对路易斯·科尔巴兰的评论”，载爱德华多·拉瓦尔卡：《科尔巴兰：27小时》一书（圣地亚哥，基曼图出版社，1972），第79页。

的委员从原来的十五人减至九人；1972年3月，书记处的成员从原来的六人增至七人。在党的领导人当中，除科尔巴兰以外，还有维克托·迪亚斯(副书记)、奥尔兰多·米利亚斯、马里奥·萨莫拉诺、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等人。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1969年11月即通过人民联盟纲领和提名萨尔瓦多·阿连德为总统候选人之前不久举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原定于1973年11月举行，但由于同年9月发生政变已无限期推迟。

智利共产党人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参加党派竞选活动。智利共产党早在1956年即该党恢复合法地位(1948年宣布为非法)前两年就协助建立人民行动阵线，1957年该党在议会中获得六个席位。在1959到1973年期间，该党逐渐增加了它在智利议会和市议会选举中的总选票的百分比，如表二所示。

表 二 智利共产党选票的百分比

年 代	选 举	百 分 比
1960	市 议 会	9.5
1961	全 国 议 会	11.7
1965	全 国 议 会	12.2
1967	市 议 会	15.1
1969	全 国 议 会	15.7
1971	市 议 会	17.0
1973	全 国 议 会	17.1

在人民联盟政府期间，共产党人在内阁中一直担任三个

通常是经济方面的职务。从1970年11月到1973年9月在不同时期内担任部长职务的人有：担任劳工部长的何塞·比亚尔塞，米雷娅·巴尔特拉，路易斯·菲格罗亚和豪尔赫·戈多伊；担任财政部长的阿梅里科·措里拉和奥尔兰多·米利亚斯；担任经济部长的米利亚斯和何塞·卡德马托里；担任司法部长的塞尔希奥·因松萨；担任公共部长的帕斯库亚尔·巴拉萨。奥尔兰多·米利亚斯并不是阿连德总统的第一个被指责为违反宪法规定的部长，但是他却是受到议会这样指责的第一个共产党人。由于这种指责，他被迫先后辞去财政部长（1972年12月）和经济部长（1973年7月）的职务；菲格罗亚也因同样情况而被迫辞去劳工部长（1973年6月）的职务。

智利共产党通过智利唯一重要的工人联合组织智利工人统一工会在工人阶级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71年12月，智利工人统一工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声称有一百万会员，虽然这肯定是夸大了的数字。在过去那些年代中，智利共产党在智利工人统一工会中的势力最大，尽管它对该会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削弱了。1965年，智利共产党在智利工人统一工会领导委员会中占有绝对多数的席位，而智利社会党则占有该委员会其余的席位。在智利工人统一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该委员会因吸收了少数几名基督教民主党成员和其他人士参加而扩大了，虽然在该委员会的二十七七个职位中智利共产党仍保留有十四个职位，智利社会党仍保留有七个职位。智利工人统一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使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增加到五十四人；1972年5—6月间经过广大工会会员投票选举

后，领导委员会的职位的分配情况是：智利共产党十八个，智利社会党十六个，基督教民主党十六个，其余党派四个。智利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对这次选举提出了抗议，基督教民主党声称，是一些不正当的行为使它未能在选举中获胜，而且一些独立的观察员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①在1970年11月萨尔瓦多·阿连德就任总统之前，智利工人统一工会积极反对弗雷政府的大部分经济政策和劳工政策。然而，根据1970年底签署的一个协议，智利工人统一工会在人民联盟执政期间曾协助制订和贯彻劳工政策。1972年，智利工人统一工会的两名领导人（包括三次担任该会主席的路易斯·菲格罗亚）被任命为阿连德政府的部长。1973年末，智利工人统一工会在智利被取缔，但是该工会流亡在外的个别领导人，特别是路易斯·菲格罗亚，曾在欧洲等地进行了广泛旅行，以便从执行苏联路线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等国际劳工组织那里发展反对军政府的力量。

智利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比本半球（除古巴也许还有委内瑞拉以外）的其它任何青年组织更加活跃，而且也更有成就。1964年基督教民主党控制了所有九个大大学生联合会，而到1970年年中即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前夕，人民联盟的各党派已在七个大大学生联合会中占统治地位。当时拥有约二万成员的智利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把持了包括圣地亚哥智利大学在内的四所大学学生联合会的主席职务。与此同时，它还领导了一些中学生联合会、智利工人统一工会青年部以及农民和印地安人的一个联合组织“郎基尔”的青年部。智利共

^① 例如，胡安·德奥尼斯，见《纽约时报杂志》，1972年12月17日。

产主义青年组织声称，1973年它的成员已增加到七万五千人。在1970到1973年期间，它是支持和捍卫总统候选人和总统阿连德的最富有战斗力的青年组织。智利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除了在大学进行活动外，还通过它的拉莫娜·帕拉^①战斗队、人民联盟青年指挥部以及其它一些组织进行一些全国性的活动。在七十年代，智利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积极参加智利的党派竞选活动。1973年3月，该组织的四个成员，其中包括该组织的总书记格拉迪斯·马林，被选进智利众议院。尽管该组织曾同智利政界的“极左分子”进行不懈的斗争，但是该组织的一些共产主义青年，特别是拉莫娜·帕拉战斗队中的那些人，也参与了街道战斗和没收私人财产的活动以及打入军队等秘密活动。阿连德政府倒台后，该组织的一些成员看来(至少在理论上)采取了比较好战的姿态。

智利共产党在促使人民联盟建立以及在人民联盟时期的总的方针政策是什么？而且，(经常与阿连德总统合作的)智利共产党和“极左派”之间，即人民联盟内部和外部的共产党人和卡斯特罗分子势力之间的重大意见分歧是由一些什么具体问题造成的？

战略和策略 1969年底，智利共产党在该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讲话中提出了该党以后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据大会的政治决议说：“今天智利最主要的革命任务是为消灭帝国主义和垄断的地主寡头势力而斗争，因为如果不完成这个任务，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前途。”^② 路易斯·科尔巴

① 一青年女英雄的名字。——译者

② 载《世纪报》(圣地亚哥)，1969年11月30日；摘译载《新闻公报》，第1—2期(1970年)。

兰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说：爱德华多·弗雷总统的“改良主义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又执政一年后便“为有权势的人效劳而反对人民”。虽然他说基督教民主党“正在走下坡路”，但是他指出，“改良主义在人民的某些阶层中有很大的市场，而且还可能在其他一些包括以前摒弃过它的人中找到市场。改良主义往往会以别的名目、在别的头衔下以及由别的穿着便服或军服的领导人出面的情况下，以新的劲头重新出现。”^①

在1969年4月举行的智利共产党的全体会议上，科尔巴兰说，1964年人民行动阵线“曾建议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府”，但当时全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评论说，到1969年全国仍然没有条件建立这样的政府，他建议智利共产党应该发起建立一个“人民运动和一个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的政府”。^②

因此，1969年11月，科尔巴兰欢呼人民联盟运动的建立，智利共产党在建立该联盟中曾起了主要作用。该联盟的宗旨是“开展人民群众的斗争，争取实现人民群众当前的要求，反对政府的反动政策，为人民群众的胜利铺平道路。”科尔巴兰援引1968年12月智利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对大会的代表说，智利共产党主张在智利建立一个“多党制的人民政府”。宣言中的这段话是：

智利需要建立一个反帝反寡头势力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并由同意制订一个革命改革纲领的各党派组成。在这个政府中必须有工人、农

① 《世纪报》（圣地亚哥），1969年11月24日。

② 同前引刊物，1969年4月14日。

民、雇员、妇女、青年和中小商人参加，这既可通过代表他们讲话的各党派也可以通过他们在相应机构中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和政府各级组织的代表来实现。

他继续说，这个政府将允许“反对党在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存在”。这种法律“当然是根据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根据特权阶级的利益制定的”。他最后援引大会号召的话说：

我们共产党人相信：在将来人民政府的统治下，以及随后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各种人民运动组织将保持自己的特性，各种宗教信仰将受到尊重，因此将同时存在多种政治意识形态，对各个组织宣传自己的主张不抱偏见。^①

智利共产党发表的一篇社论说，1969年12月“人民联盟的基本纲领”的签署标志着智利“政治上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② 该党发表的另一篇社论说，智利的政治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广泛的政治社会阶层从1938年以来就没有一起合作过。该党的一些领导人一再说明，多党制政府是智利走向社会主义的独有的特点，而且甚至也是智利巩固社会主义的独有的特点。^③

“人民联盟的基本纲领”是由六个参加该盟的党派在举行了一次会议之后签署的。这个纲领签署后便由智利共产党机关报《世纪报》迅速发表。^④ 智利共产党曾把这个文件作为该

① 《世纪报》(圣地亚哥)，1969年11月24日。

② 参看《方针报》(圣地亚哥)，1970年6—9月。

③ 参看奥尔兰多·米利亚斯的评论，同前引刊物，以及路易斯·科尔巴兰的评论，载《世纪报》，1970年12月2日。

④ 1969年12月23日；英译本载《三大洲公报》月刊(哈瓦那)，1971年3—4月。

党现阶段的纲领而予以通过。这个文件摒弃了弗雷政府的“改良主义”，保证清除智利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帝国主义剥削的影响，并许诺“开始在智利建设社会主义”。文件要求“设立人民议会”以取代现有的议会两院制，同时并要求各级政治程序的“民主化”。文件提出的其它目标包括有：（1）将外国资本和本国垄断集团所控制的基本资源国有化，而让绝大多数企业全部地或部分地保留私有制；（2）加快土改的进度，特别着重发展农业合作社；（3）大大加强国家对社会、文化和教育计划的控制。文件说，拟建立的“人民政府”将是“多党制”的，包括所有“革命的”政党、运动和派别在内；政府将“尊重反对派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行使的权利”。^① 据路易斯·科尔巴兰说，人民联盟的这个纲领就是“要把智利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摧毁寡头集团的权力中心，使智利摆脱不发达状态，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经济，创造一种新的公正而又比较民主的条件，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②

在1970年9月总统选举前后，智利共产党曾对它所认为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敌人（包括已经暴露的反动派和披着“极左”外衣的那些人）提出了警告（见下文）。同年年底，科尔巴兰写道：为了对付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威胁，必须使人民变成一支“真正不可战胜的力量”。“以智利人民及其政府为一方，

① 基本纲领中提出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包括有：实现智利政治、经济的完全独立；同一切国家保持关系而不考虑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同独立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那些正在为争取解放和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人民）保持友好团结；通过一种“人民的国际政策激发拉丁美洲反帝的强烈感情”。纲领把古巴称为“拉丁美洲大陆上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哨”。

② 《世纪报》（圣地亚哥），1970年12月2日。

以帝国主义和寡头集团为另一方，正在进入持续对抗的时期。”他得出结论说：

不能怀疑人民将来会被迫成为某种武装对抗力量的可能性。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孤立变化多端的敌人，束缚住他们的手足，给他们穿上紧身衣，以免国家发生内战，而他们是希望把国家拉入内战的。^①

智利共产党全国会议在 1971 年 10 月发表的《告全体智利人书》中对于对美国主要的铜公司和电话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实行国有化以及对于取消纺织品的垄断、实行国家对银行的控制、加速土改等措施特别表示赞扬。^②一年后据科尔巴兰说，国有化对“帝国主义的整个统治制度”是一个打击，土改取消了“大庄园主的无限权力”，国家对一些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大大地削弱了金融寡头的经济力量”，但是“还没有使它遭到完全破坏”。人民联盟（和智利共产党）的目标仍然是：粉碎反动派的抵抗，扩大国有化经济成分，推行土改，使所有国营企业自负盈亏，发展生产和生产力，开展经济计划工作，采取防止通货膨胀的措施，保证供给国家的必需品，改善劳动纪律，反对官僚主义，发展教育、住房和公共卫生事业。^③

科尔巴兰说，人民联盟的一些改革措施的显著特点是，这

① 《世纪报》（圣地亚哥）。该文曾译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 13 卷第 12 期（1970 年 12 月），第 5—12 页，该文的摘要载《真理报》（莫斯科），12 月 1 日。关于“紧身衣”和其它几种提法曾引起智利一些非人民联盟的力量的广泛批评。

② 《纪世报》（圣地亚哥），1971 年 10 月 4 日。参看《新闻公报》，第 21—22 期（1971 年）和《纪世报》（圣地亚哥），1971 年 9 月 4 日。

③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 15 卷，第 11 期（1972 年 11 月）；奥尔兰多·米利亚斯的谈话，载《世纪报》（圣地亚哥），1972 年 6 月 5 日。

些措施是“按照宪法并根据智利历史上形成的一些法律和秩序的原则”实行的。科尔巴兰继续说，这些措施“已经取得的许多成就是不容抹煞的”，剩下的任务就是“要使国家发展的整个进程不可逆转，并且要巩固这种进程，使它继续向前发展”。^①

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 1971 年 6 月在智利共产党中央全会上讲话时代表该党表示支持阿连德总统“五一”节的号召：“智利目前和今后的伟大斗争就是生产”。^② 智利共产党在 1971 年《告全体智利人书》中提出要在最近的将来采取以下一些具体行动：

- (1) 增加企业、矿山和农业生产的产量，改进服务行业；
- (2) 立即让工人有效地参与管理所有国营和公私合营的企业，参与管理经济、公用事业和政府机关；
- (3) 组织供给委员会，参加供给委员会的家庭主妇、工会、接生站、街道委员会和农村及街道商店的店主都要同投机商作斗争，保证主要必需品的正常供给；
- (4) 建立土改实验站，将所有被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 (5) 筹备智利工人统一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真正表示工人的统一意志；
- (6) 提高群众和委员会保护企业和公用事业机关的

① 《真理报》(莫斯科)，1972 年 1 月 2 日。

② 《世纪报》(圣地亚哥)，1971 年 6 月 25 日。

警惕性；

(7) 消除官僚主义，使所有具体问题获得真正有效的解决。^①

1972年1月，人民联盟选举失败后不久，智利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准备了一份秘密报告，但于同年2月初被一家反对党的报纸发表了。秘密报告不仅提到要同基督教民主党进行公开讨论，而且还提到由于智利社会党内部不和以及“极左派”的捣乱，人民联盟的政策受到了削弱。政治委员会建议该党应该通过人民联盟各党派促进对阿连德总统的集体支持。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在农村。智利共产党指出，尽管人民联盟“曾用比前几届政府快四倍的速度将没收的庄园土地分给了农民”，但是该盟并“没有成为农村中的一支较强的力量”。该盟的土改政策前后并不一致，而且包含有很多“极左派”的主观主义成分。^②

在1973年期间，人民联盟国内的主要敌人是右翼的反动保守势力和那些同国民党、祖国和自由组织的“法西斯分子”及基督教民主党的右翼勾结的反动派。据智利共产党说，这些组织的成员采用罢工、促使通货膨胀、进行黑市交易等手段在智利制造经济混乱，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想搞垮人民联盟政府。智利共产党认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包括内战或军事政变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从（人民联盟所代表的）“人民”手中夺回权力。据说，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组织曾任意破坏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智利共产

^① 《新闻公报》，第21—22期（1971年）。

^② 《信使报》（圣地亚哥），1972年2月3日。

党所认为的反动、过时的立法机构和司法系统以及总审计长。反动派特别是通过他们的喉舌《信使报》进行各种诽谤、挑衅和煽动闹事。一些极端分子还进行恐怖活动，并警告人民联盟的成员说：“雅加达的日子”快要到来了（指1965年印度尼西亚消灭了数十万共产党人和其他左派）。

为了击败这些反动势力，智利共产党公开号召进一步加强人民联盟内部的团结，改善同基督教民主党左派等其他没有加入执政的人民联盟的党派的关系。智利共产党首先谋求改善执政的人民联盟内部的关系。人民联盟的各党派同意1969年的共同纲领，并在1973年初进行了新的修订，但是它们常常对于在执行这个纲领中所采取的战略和策略提出异议。同年年初，围绕着智利共产党的经济部长奥尔兰多·米利亚斯提出的一个议案，在社会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及私营经济方面发生了一场重大的争论。智利社会党和人民联盟内的其它较小的左派组织都认为这个议案是一种背叛行径，结果各有关党派纷纷发表声明公开论战。^①

智利共产党和智利社会党在其它一些问题上也紧张，智利共产党同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及基督教左派的关系也紧张。智利共产党同人民联盟的其它党派之间的这些争端，并不亚于该党同没有加入人民联盟政府的左派革命运动和其它组织之间的冲突。

在1973年3月4日以前的数月中，智利共产党把注意力集中于击败议会选举中反对派的候选人。该党主张，“必须把

^① 参看科尔巴兰和智利社会党总书记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之间的往来信件，载《世纪报》（圣地亚哥），1973年2月8日和2月15日。又见下文。

伪君子、说谎者、伪善者和不法商人从议会中清除出去。”^①选举结束后，该党认为，阿连德总统、人民联盟和智利人民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该党控制的《纯洁智利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登出了这个胜利：“人民：百分之四十三；反动腐朽势力：百分之五十五”。^②

智利共产党在3月底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拟定的该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号召书，列举了选举后该党所关心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些主要问题是：防止内战；努力争取居民各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民；通过群众斗争，在社会、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发动攻势，解决全国性的一些问题；加强人民联盟的团结；统一经济管理，进一步强调为生产而战斗；扩大人民联盟政府和一些群众组织的作用；创造新文化；给各国革命人民以国际声援。^③

政变后的情况分析 虽然智利共产党承认人民联盟政府存在一些错误和缺点，但它却公开地认为，1973年智利发生动乱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反动派和外国帝国主义者过去长期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及最近进行颠覆活动的结果。智利共产党曾一再指责美国政府和美国一些垄断公司对人民联盟政府的敌视态度和颠覆活动。在1972和1973年期间，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象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样也经常受到智利共产党

^① 《宣言》，载《世纪报》（圣地亚哥），1973年1月21日，《方针报》（圣地亚哥，1973年1—2月，英译本载《新闻公报》，第3期（1973年）。

^② 《纯洁智利报》（圣地亚哥），1973年3月6日；参看罗伯特·莫斯：《智利的马克思主义实验》（纽约，霍尔斯特德出版社，1973年），第8章；还参看科尔巴兰：《为了我们的革命，继续前进》（圣地亚哥），1973年；科尔巴兰的讲话，载《方针报》（圣地亚哥），1973年3—4月。

^③ 《世纪报》（圣地亚哥），1973年5月13日。

的指责。

1974年，智利共产党在国内的和流亡在国外的一些领导人开始认真制定智利革命者所要遵循的战略和策略。他们当前和将来的计划想必主要是根据吸取人民联盟时期的教训制定的。雷内·卡斯蒂略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广泛详尽的分析性文章中承认，绝大多数智利人民并未准备好在1973年9月保卫阿连德政府。然而，军政府在六个月内已开始为人们所不能接受，早几年建立的反帝反寡头集团的阵线已成为反法西斯阵线。智利共产党和智利社会党参加这个阵线对于工人阶级、人民联盟各派力量和一般有政治见解的阶层的团结仍然是必要的。必须把倾向民主的基督教民主党人（那些不是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追随者的人）和一些独立的左派组织吸收到这个阵线中来。建立这个阵线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仅必须有一致的共同观点，而且还必须有解决各种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出现各种不同看法是自然的，但是一定不要使这些意见分歧成为对抗性的争论。必须努力分化军队，敦促“爱国”分子加入人民行列。最后，工人阶级必须执行独立的有原则的政策，避免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①

政变后发表的一些文章清楚地表明，智利共产党相信智利左派一定会从阿连德执政时期的一些失败中吸取教训。卡斯蒂略曾提到“外国资本和本国寡头集团”当时对人民联盟政府所进行的明显的抵抗，但是他强调指出，左派在许多方面不仅没有能够孤立反动派，而且甚至采取了这样一些有利于反动派的做法：（1）人民联盟在消灭各种旧的国家机构制度方

^① 《新闻公报》（布拉格），第19期（1974年）。

面行动太慢，以致当时反动派得以利用这些机构制度来重新建立它们的阵地；人民联盟各党派既没有从阶级斗争的实质方面来充分理解这些问题，也没有根据阶级斗争的实际含义来处理这些问题。(2) 人民联盟部分地由于丧失时机未能在报刊、电台、电视、电影和学校方面占据统治地位。如果控制了这些方面，它本来是可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人民群众产生深刻的影响的。(3) 人民联盟未能解决许多被反动派所加重的经济问题。(4) 人民联盟未能团结支持它的绝大多数人民，也未能孤立主要敌人。(5) “人民联盟的各党派认为，(人民联盟政府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缺乏一个执行有原则的政策、避免犯‘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统一领导。”右倾机会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在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工人中搞“经济主义”，即只乐于去获得经济利益，而不搞革命。(6) 存在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卡斯蒂略最后得出结论说：

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反政府的阵线，因此发动9月政变是可能的。这个阵线的阶级组成情况是：垄断资产阶级和地主寡头是它的核心，同时还包括有绝大部分中小资产阶级、大部分中间阶层以及其它一些社会集团的落后分子……我们认为，我们的失败首先是政治上的失败，其次才是军事失败。工人阶级失去它的同盟者而孤立，这使反动派得以发动政变，同时也排除了工人阶级拿起武器进行战斗的可能性。^①

智利共产党坚持说，1970到1973年的经验并没有证明

^① 雷内·卡斯蒂略的文章，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月刊，第17卷，第7期(1974年7月)。

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反动派及其应声虫小资产阶级革命论的代表”所持有的论点。尽管要通过非武装的斗争取得胜利比较困难,但是,该党在1974年拒绝坚持走任何一种夺取政权的道路。该党论证说,反法西斯阵线拒绝采用个人恐怖活动、冒险主义和阴谋的做法。当人民重新掌权时,他们将通过新的宪法和新的法律,并建立新的政府部门和机构。“新的反法西斯国家将保证建立多党制的政府,并保证各民主党派的正常活动。”这个新建立的国家将对“军队和警察部队实行根本改革”。到1976年,该党实际上还在执行上述这条路线。^①

从阿连德倒台到1976年初,智利共产党积极参与反法西斯联盟的活动,该盟主要由流亡在国外的人民联盟的一些党派及其成员组成。该盟每年在欧洲一些城市举行几次会议,同时并对这些会议进行了很好的宣传。该盟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政府和人民中促进反对智利政府的斗争。^②

左派革命运动

背景与组织 智利左派革命运动主要由社会党的一些持

^① 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月刊,第17卷,第8期(1974年8月);又见前引刊物,1974年3月和9月。以后发表的关于智利共产党立场的声明,见《新闻公报》(布拉格),第2期增刊(1975年);《新闻公报》第17期(1975年)。又见维克托·什拉京:《智利,科尔巴兰,斗争》(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75年)。

^② 关于阐述反法西斯联盟目标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声明,见《团结报》(罗马),1974年2月13日和《新闻公报》第16期(1975年)。关于改革智利人民联盟的声明,见《团结报》(罗马),1974年6月15日。

不同政见的党员(特别是康塞普西翁地区的一些青年)以及一些具有同样思想的非社会党的革命者于1965年成立。1967年12月,在左派革命运动领导发生一些变化之后,该组织根据同年7—8月在哈瓦那举行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的精神和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开创革命事业的精神,采取了一条比以前更富有战斗性的路线。^①由于左派革命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武装行动,因此,弗雷政府在1969年对该组织进行了镇压,结果该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在这以后两年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隐蔽状态或被关在监狱里。1970年11月萨尔瓦多·阿连德就任智利总统以后,在前几年弗雷政府对该组织成员的一切“政治”指责统统被推翻,许多被关押的人得到释放,于是该组织又再次露面。在1970年11月到1973年9月期间,该组织在人民联盟政府的最左边缘上或边缘以外的智利政治舞台上起了积极的有影响的作用,该组织从未在组织上加入人民联盟政府,并且还经常对它提出批评。在阿连德总统任职期间,尽管该组织和其它极左派组织的一些成员有很多时候同政府发生摩擦,但是他们仍然组成了总统私人警卫队,即“私人朋友小集团”。

左派革命运动成立初年和后期在大学生中特别活跃,它的活动中心是康塞普西翁大学。该组织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

^① 关于社会主义的由来,参看费尔兰多·卡萨努埃瓦·比和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卡:《社会党和智利的阶级斗争》(圣地亚哥,基曼图出版社,1973年),第213页。关于路线的改变情况,可将下文简略提到的1967年以后的政策同早些时候的路线比较,参看“《自由革命》的危机中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左派革命运动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提纲——1966年11月”,载《战略》杂志(圣地亚哥),1967年1月,第1—24页。

代初通过它的外围组织左派大学运动控制了康塞普西翁的大学生联合会，这种控制直到 1972 年 1 月该组织在同人民联盟激烈地竞选候选人中失败时才告结束。该组织还控制了圣地亚哥智利大学的革命学生阵线，相比之下，这个学生阵线取得的成就要小得多。在大学里也象在其它地方一样，左派革命运动几乎象谴责它宣称的右派敌人那样谴责共产党及其青年组织。

在人民联盟时期，左派革命运动曾在大学以外的其它各种为数不多但是活跃的外围组织中积极活动（并一般地说取得了控制地位）。这些外围组织中最重要的是：革命工人阵线，革命穷人运动和革命农民运动。这些组织在城市和农村人民（工人、穷人和农民）中进行各种活动，并建立了“群众基础”。

在智利工人统一工会的正式机构中没有革命工人阵线的成员参加。在 1972 年 5—6 月选举期间，革命工人阵线提名的智利工人统一工会主席候选人亚历杭德罗·阿拉尔孔只得到五十六万张选票中的一万张选票。确切地说，革命工人阵线的力量先是在一些孤立的工会中得到了发展和集中，然后更普遍地在圣地亚哥附近工厂区的工业地带的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突击队中得到发展和集中。在整个阿连德时期，左派革命运动和其它一些极“左”分子（特别是那些智利社会党人）使智利共产党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受到削弱。在阿连德总统任职的最后一年，特别是在 1972 年 10 月罢工以后，极“左”影响曾有显著增加。到 1973 年年中，那个替代政府的政权所采取的极“左”政策已经执行了相当时候（参看下文）。

革命穷人运动是从“无家可归的穷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派生出来的一个组织，这次大会于阿连德就任总统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圣地亚哥拉格兰哈区举行。革命穷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叫维克托·托罗，他是被提升到左派革命运动里担任重要职务的少数几个无产阶级成员之一。该组织在圣地亚哥各地建立了一些营寨，营寨四周有围墙或篱笆，上面写有“新哈瓦那”和“胡志明”等字样。进入这些新定居点是有限制的，而且里面通常还保持有严格的纪律。驻在这些营寨内的突击队有时到农村去非法夺地。^①虽然这些新定居点得到政府的一些援助，但是它们仍旧实行自治，而且国家警察对此很少过问。

革命农民运动相当于农村的城市革命穷人运动，是几个极“左”组织中最最重要的一个，这些极“左”组织从阿连德当选总统之前开始直到1973年9月曾负责组织了数百次非法夺地活动。革命农民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对阿连德所说的合法土改表示不能容忍，边区许多负责土改的政府官员也持有这种态度。他们曾在许多中小庄园，其中包括一些在前一阶段土改运动中不久刚得到土地的小庄园，进行非法夺地的活动。该组织在考廷省马普切印第安人中特别活跃，但也在其它一些省领导了数百次非法夺地的活动。该组织最著名的领导人是“科曼丹特·佩珀”和“科曼丹特·内尔松”。在人民联盟的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和社会党的一些成员以及其他一些非人民联盟的小组织或个人的合作下，非法夺地的活动不断增加。

在1973年9月政变后，左派革命运动实际上有许多个月

^① 参看“切·格瓦拉”营地副主席孔帕内拉·纳塔利亚会见记，载罗伯特·莫斯：《智利的马克思主义实验》一书，第115页。

没有露面。尽管有少数领导人被捕或被杀害，但是该组织看来并没有遭到破坏。然而，1974年9月底发生的一起银行抢劫事件，导致警察于10月5日发现该组织的一个重要的秘密据点，结果该组织在阿连德时期的总书记米格尔·恩里克斯被处死。在这以后的十八个月中，有几个恩里克斯的直接继承者其中包括前总统的侄子安德烈斯·帕斯卡尔·阿连德都到一些外国使馆避难或流亡外地。到1976年初，该组织的大部分领导人和成员在智利边境内的一次暴力斗争中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或被迫撤退。看来该组织已经完全陷于混乱状态，虽然不应该怀疑它最后仍有重新得到整顿的可能。

战略与战术 常常谈到的左派革命运动的目标是推翻智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该组织指责这种制度只为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它应该由为工人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代替。然而，该组织在智利左派中引起争论的主张并非产生于它的这个长远目标，而是产生于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正确道路的见解。

在切·格瓦拉逝世一周年时，该组织全国书记处号召在智利立即准备武装斗争。该组织的机关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切·格瓦拉的革命活动对整个拉丁美洲的所谓“基本教训”是：“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将是持久的游击战争，在这场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将会有很多人牺牲，在已经牺牲的人中切无疑是最伟大的，但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① 卢西亚诺·克鲁斯在1969年年中写道：左派革命运动曾对“建立武装斗争所赖以存在的政治机构和组织机构表示极为关注”。他

^① 《起义者报》(圣地亚哥), 1968年10月。

还说：“我们从历史上吸取了教训。我们决定以列宁、菲德尔和切为榜样。因此，让我们简单明确地说：我们将宣布进行武装革命。”^①数月后，米格尔·恩里克斯写道：作为一个革命组织，左派革命运动不仅执行了它应该执行的一切任务，而且还在学生、市民、农业工人、印地安人和工人阵线中进行“鼓动、宣传和政治活动”。他说，该组织没有参加的唯一活动就是“选举把戏”。^②

左派革命运动全国书记处 1970 年 4—5 月就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发表了长篇声明。声明说，选举程序“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比残酷镇压更为巧妙的手法”。左派革命运动论证说，选举“不是走向取得政权的道路”，同时该组织还预言：“即便人民能获得得来不易的选举胜利，统治阶级也将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军事政变。”该组织认为人民联盟的纲领“实质上是左派改良主义的”，但同时并保证说：“〔如果发生军事政变，〕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把我们日益扩大的武装组织，我们的部队和我们所有的一切用来保卫工人、农民的胜利。1970 年我们的基本任务将是采取“武装革命行动，对群众进行战斗动员”，以便保持和提高智利社会斗争的水平。”^③这条路线使左派革命运动同智利共产党经常发生冲突。

1970 年 10 月，左派革命运动全国书记处发表了一个关于选举结果的文件。文件承认左派革命运动过高地估计了右派对左派胜利的反应，而同时过低地估计了人民联盟在选举

① 《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69 年 7 月 1 日。

② 同前引刊物，1969 年 9 月 9 日。

③ 同前引刊物，1970 年 5 月 12 日增刊。

投票中保卫自己胜利的能力。该组织一方面认为选举只是推迟了武装斗争，但另一方面又保证捍卫阿连德政府，加紧动员群众。它警告说：一旦“由于胜利而产生的高枕无忧之感消失，人民联盟必须“具体地在短期内满足群众的愿望”。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战略是阻止人民联盟执行自己的纲领，使人民联盟威信扫地，从而为反动派接管政权开辟道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得到人民的支持。^①

1970年底，左派革命运动同智利共产党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造成左派革命运动一名战士死亡。随后，左派革命运动一般地说同人民联盟达成一项休战协议，这项协议一直持续到1971年4月左派革命运动所支持的市议会选举。但是，到1971年年中，左派革命运动又在指责人民联盟没有在智利搞革命。^②同年11月1日，米格尔·恩里克斯指责人民联盟在执行土改和其它纲领时行动太慢；同时还指责该盟忽视（有时甚至阻止）动员群众，因此在反对派“给一些阶层的人民群众造成混乱”而使它们的势力一般得到巩固时，该盟就丧失力量和失去支持。^③

在1972年1月补缺选举中人民联盟失败了。其后，人民联盟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日益严重，而反对派之间的分歧逐渐被置于一旁。据左派革命运动说，阿连德总统5月21日在国情咨文中提出这样一个“大问题”：目前的制度能够“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吗？”这位总统自己和共产党人领导的人

^① 《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70年10月13日增刊。

^② 参看内尔松·古铁雷斯和萨尔瓦多·阿连德之间的往来信件，同前引刊物，1971年6月8日。

^③ 《洲际新闻》（纽约），1972年1月10日。

民联盟的成员一般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而左派革命运动领导的一批更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却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这种分歧仅在两个月之后就明朗化了。

1972年7月，左派革命运动无视共产党人和阿连德总统而同人民联盟康塞普西翁省大多数支部一起成立“人民议会”以取代“反动的”国民议会。阿连德谴责这种行动是一种加强人民联盟的反对派的“异端行为”，同时圣地亚哥人民联盟各党派的所有总部也都指责这一行动，尽管有一些人持有异议。这个事件成了人民联盟政府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想同共产党人和阿连德总统的思想之间的巨大分歧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左派革命运动及其革命同志（至少暂时）已经建立了一个可以替代“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政权基础。在这以后的十四个月中，关于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替代政权”的努力已经成为左派革命运动的成员、许多社会主义者、（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和基督教左派内）大部分激进的基督教徒以及一些小组织公开奋斗的目标，这些目标非常吸引人，而且有一部分已经实现。正是使反对派力量得到加强的一些活动，例如1972年10月的罢工和对已经国有化或可能将要国有化的国内工业实行管制的争论，也使极“左”派得到加强并使它激进化，而使阿连德和共产党人在中间派中日益孤立和日益削弱。

左派革命运动扩大了对阿连德总统和他的一些部长的攻击面，特别是扩大了对共产党的经济部长奥尔兰多·米利亚斯的攻击面，攻击他们所谓对敌人让步和他们对左派革命运动的一些批评。左派革命运动感到特别恼火的是，政府秘书

长说：“祖国和自由组织以及极右分子已经打进”左派革命运动和革命工人阵线，人们指责这两个组织进行的一些活动目的在于“制造令人不安的气氛并对政府的稳固性提出怀疑。”^① 政变前一个月，《起义者报》的一篇社论的大字标题宣布说：“政府已经投降：群众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②

在1973年期间，左派革命运动多次发表“纲领”。同年2月27日，《起义者报》得出结论说，改良主义者“已经堕落到底”。该报号召全国依靠“人民政权”，依靠工农委员会和工农小组以及革命纲领。在一个有代表性的纲领中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将各种企业普遍实行国有化，建立工人管理；无偿地没收四十公顷以上的土地；通过物资与物价管理委员会和类似的组织由工人和人民控制商品的分配与供给；单方面停止偿还向“美帝国主义”借的外债；以及在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下采取其它保卫民族利益的行动。拒不相信目前“资产阶级”制度下的“和平”革命，这对于实行革命的变革至关紧要。人民确实必须建立一个自治的平行的政权。这个政权在人民联盟政府进行革命活动时将使人民联盟政府具有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坚实基础，但是当人民联盟政府采取“反人民”的行动时，这个政权也能够反对该政府。这个政策曾在全国工农委员会和突击队中得到了贯彻，而在首都周围的工业地带执行得最引人注目。^③

① 《起义者报》(圣地亚哥), 1973年4月18—24日。

② 同前引刊物, 1973年8月14—20日。

③ 参看同前引刊物, 2月27日到3月5日; 《左派革命运动宣言》, 同前引刊物, 6月19—26日增刊; 同前引刊物, 7月11—16日。

在“不妥协地前进”的口号下，“替代政权”及其主张在1972年底和1973年期间有了迅速的发展。“人民政权”运动以及在城市和农村的组织公社突击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了发展——前者的发展是在党的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中和政治论坛上取得的，后者的发展是在工业地带、新定居点和村社的组织活动中取得的。^①

军事政变前六个星期，卡斯特罗主义的《终点》杂志发表了一篇论述公社突击队的重要文章。该文指出，虽然有些组织坚持人民政权应该“在组织上服从政府的行动，但是左派革命运动重申了他们独立的历史必要性”，因为他们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替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这个政权将容许他们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一个新国家。因此，让突击队的行动服从于政府机关和官僚主义者，即便政府掌握在左派手中，也将意味着削弱突击队的性质并取消突击队的战略计划。^②符合要求的人民替代政权将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穷人、下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联盟，这个联盟采用的是一种自治组织的形式。据报道，在工人自己的带动下，5月23日

① 1972年末举行了两次重要的政治讨论会。参加第一次讨论会的有共产党、社会党、左派革命运动、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和基督教左派的高级发言人；参看他们的评论，载《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72年12月5日增刊，第21—48页。第二次讨论会共产党没有参加，也许没有被邀请。这次讨论会的参加者中包括有左派革命运动、社会党、基督教左派、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和社会主义基督教徒的代表；参看评论，同前引刊物，1973年1月16日增刊，第1—22页。还参看“劳动者与人民政权”，同前引刊物，1973年5月8日增刊，第2—16页。

② 参看“公社突击队：人民政权机构”，同前引刊物，1973年7月31日增刊，第3页。又参看维克托·托罗的评论，载《起义者报》（圣地亚哥），1973年2月27日。

在塞里洛斯工业地带开始采取了同工人和其他人联合的第一步。

军事政变之后，左派革命运动继续鼓吹走一条比智利共产党和其它左派组织所提倡的更富有战斗精神的社会主义道路。1974年年中，左派革命运动政治委员会曾派遣总书记的兄弟埃德加多·恩里克斯到国外去向世界人民解释左派革命运动的策略。同年6月底，他在古巴的一次会见时的谈话中说：只有靠“长期的、艰苦的、充满牺牲的人民战争，才能推翻军政府。”左派革命运动正在“为发动这种战争准备条件”。它当前的目标是：(1)建立一个人民抵抗政治阵线，这个阵线内包括人民联盟的各党派和进步的基督教民主党以及左派革命运动的成员；(2)“建立一个人民抵抗运动，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并作为政治阵线的基础，参加这个运动的是那些不属于任何政党而要战斗的工人；”(3)“建立武装抵抗组织人民革命军的第一支雏型部队”，这支部队应该征召所有愿意同现政权作战的人入伍。^①几天之后，巴黎《世界报》报道了关于同恩里克斯会见的情况，这位左派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在会见谈话时承认，截至会见谈话时，人民对军政府的抵抗看来是温和的，“但是不久将会采取引人注目的有效行动”。恩里克斯还说：不论联合阵线叫什么名字，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首先“迅速地进行武装宣传，然后在城市和农村进行武装斗争”。^②同年9月底

① 《格拉玛报》(哈瓦那)，1974年7月7日。

② 《世界报》(巴黎)1974年7月7日，转引自《洲际新闻》(纽约)，同年7月22日。

对银行的抢劫可能被认为是第一次采取的“引人注目的有效行动”之一。

社 会 党

同左派革命运动相似，智利社会党决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该党存在严重的不团结现象，主要分裂成以下两派：（1）以萨尔瓦多·阿连德为代表的那些人，他们谋求革命变革，但持慎重态度，基本上执行共产党的路线；（2）“卡斯特罗主义”派，该派在阿连德就任总统后不久在由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总书记领导的党内占优势，对人民联盟主席和该盟纲领常常只表示勉强支持，或给予明确反对。

虽然参议员阿尔塔米拉诺和他的社会党的追随者有时在一些策略问题上同左派革命运动的看法有分歧，但是他们在本章所提到的大部分问题上同左派革命运动的看法是一致的。在“整顿”（共产党爱用的一个字眼）、社会经济问题和动员群众的问题上，他们划清了卡斯特罗分子立场同共产党立场之间的界限。1972年年中，曼努埃尔·卡维埃塞斯在他的卡斯特罗主义的双周刊《终点》杂志的封面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整顿什么？”卡维埃塞斯是社会党的日报《最后一点钟报》的正式撰稿者，他认为智利共产党的奥尔兰多·米利亚斯的经济修正主义的产生至少部分地是由于他没有正确理解苏联历史的结果。智利共产党曾建议实行一种新经济政策，但它并不了解列宁是在无产阶级完全取得政权之后才实行这种政策的。只要智利反动派还处在掌权的地位，那么新经济政策

在智利是绝对行不通的。^①卡斯特罗派的社会党人同左派革命运动一样,经常要求不断地迅速发展革命的进程,并不停地巩固它,要求对反对派作出让步,或者要求减少下面的群众动员工作。更有甚者,许多社会党人不仅鼓励非法夺地,成立康塞普西翁人民议会,在工人、农民和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而且他们自己也参与这些活动,这完全超越了人民联盟政府政策的界限范围,因此常常与政府的政策发生冲突。

1973年初,参议员阿尔塔米拉诺在几个场合对1972年10月的罢工、米利亚斯关于经济的提案、军官参加内阁以及长期拖延帕佩莱拉造纸公司关于提高新闻纸价格的请求等问题作了同样的始终如一的说明。(帕佩莱拉造纸公司是智利仅有的一家重要的私营新闻纸供应公司,因此被反对派认为是新闻出版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该造纸公司由于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府规定的固定价格,几乎濒于破产。尽管阿尔塔米拉诺身为议会的一员,但是他认为帕佩莱拉造纸公司是一个过时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机构,一旦采取革命行动,它就会变成一只“纸老虎”。^②在阿连德时期,特别在1973年,阿尔塔米拉诺继续谴责议会、司法系统和总审计长是反动的,并说最高法院和大多数议员的行动已经超越了智利宪法所许可的范围。1973年初,他得出结论说:一个革命者决没有任何理由惧怕资产阶级或对它表示尊敬,“因为资产阶级随时都可

^① 曼努埃尔·卡维埃塞斯:“现阶段的革命任务”,载《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72年6月20日增刊,特别是第3页。

^② 参看阿尔塔米拉诺1968年的文章“议会是纸老虎”,载胡利奥·塞萨尔·霍贝特和亚历杭德罗·切伦:《智利社会党的政治理论思想》一书(圣地亚哥,基曼图出版社,1972年),第307—327页。

以不承担法律上的义务，只要它认为这样做方便。”^①

卡斯特罗派的社会党人 1971 年在确定美国和智利政府关系的发展方向时所起的作用，说明了他们在人民联盟时期的一些关键时刻所具有的重要性的非凡的影响。阿连德总统在任职第一年期间，看来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认为，立即同美国（不论政府或垄断企业）直接对抗是不符合人民联盟纲领的最大利益，即他的长期革命目标的最大利益的。虽然 1971 年初美国政府对智利的立场是“正确的，即保持尽可能少的接触”，但是美国驻圣地亚哥大使爱德华·科里出于对美国利益的考虑，也开始拟定了一项同智利政府和解的政策。正如科里大使在 1974 年 9 月的一次会见谈话时所说：“这个和解过程开始完全是探索性的，但到 1971 年 1、2 月突然开始定形；在同年 4 月和 5 月初这个过程真正开始了，但后来又突然停止。现在我们知道了阿连德博士之所以使这个过程中断，是因为当时社会党领导人阿尔塔米拉诺参议员使用了否决权。而且，阿连德博士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也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同时，科里还说明了 1971 年年中阿连德政府同塞罗铜公司之间通过认真谈判达成的一项协议突然告吹的情况，进一步支持了他的上述说法。科里在 1974 年 9 月的一次会见谈话中评论说：

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达成一项协议。因为我是调停人，阿连德曾亲自向我表示说，他对达成协议感到高兴。在这个协议将要签字并准备同时由

^① “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访问记”，载《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73 年 2 月 13 日增刊，第 4 页。

全国电视放映这一新闻的前一个晚上，〔智利五个谈判代表中有四人〕曾设宴招待塞罗铜公司委员会主席戈登·墨菲。然而，在协议将要签字前三十分钟，阿连德先生说，他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不得不将签字延期。他向我解释说，他的内部遇到“一点麻烦”。……他要我给他两周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并要我告诉华盛顿他一定会这样做。我说，“总统先生，这是你的国家。我不能给你两分钟，两周，或两年的时间，这完全要由你决定。我知道你们内部捣乱的是谁。”^①

阿连德总统要继续签订上述这类协议显然已经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使本来为避免智利和美国之间对抗而作的非常小心翼翼的试探性努力，更加难以继续进行下去。^②

共产党人和卡斯特罗分子之间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人们也许会问，智利共产党人和卡斯特罗分子之间是什么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对于1970到1973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什么影响？路易斯·科尔巴兰对1969年11月出席智利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说，一些极“左”派组织削弱了“人民运动”，它们的“特点是：急躁，在斗争

^① 引自《智利与中央情报局》一书的手稿，这是1974年9月20日录音的一篇关于爱德华·麦·科里的“前线”访问记，同年由南方教育联络协会出版，第6页和第8页。

^② 关于美国政府和垄断企业与阿连德政府的关系问题，参看保罗·西格蒙德等人写的文章，载弗朗西斯科·奥雷戈·比库尼亚编的《智利：全面的看法》（圣地亚哥，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75年）；以及载维·霍尔登：“阿连德与神话制造者”，载《Encounter》杂志（伦敦），1974年1月，第12—24页。

中不坚定,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信任群众,在斗争中缺乏镇静,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力量。”豪尔赫·因松萨在向这次大会讲话时引用了下面卡尔·马克思的几句话:“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①在1970年竞选运动期间,智利共产党把左派革命运动的成员说成是“恐怖主义者,冒险家、叛徒和阶级异己分子”。^②

然而,在阿连德总统就职后一个月,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在康塞普西翁大学打死左派革命运动的一名战士,当时智利大部分左派人士得出结论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是削弱了人民的事业,而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少表面上暂时开始改善。1970年12月13日,路易斯·科尔巴兰说:“我相信,人民联盟同左派革命运动之间,当然也包括共产党人同左派革命运动之间,将会达成一种谅解,因为左派革命运动正团结在以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为首的政府周围。”^③但是,这个和解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就结束了。

1971年6月,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说:马克思和列宁生前曾对极“左”派进行过“分析、斗争和揭露”,说“极‘左’派的精神分裂症是罪行和极端主义的混合物”。据泰特尔鲍姆说,“极‘左’派的冒险自杀行动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它对右派煽动闹事起了配合作用。”^④1972年智利共产党一些领导人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21页。——译者

②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月刊,第13卷第8期(1970年8月)。

③ 《世纪报》(圣地亚哥),1970年12月15日。

④ 同前引刊物,1971年6月26日。

有时认为,极“左”派曾受到舆论界太多的注意(如路易斯·科尔巴兰5月26日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但是事实上,在智利共产党发表的几乎所有关于国内问题的讲话和声明中都对极“左”派进行了谴责,而且这种谴责常常是长篇大论的。同年年中,豪尔赫·特克西埃尔详细阐述了智利共产党对左派革命运动的批评:

极“左”派的所谓“革命”活动在农村表现得尤其清楚。他们煽动农民夺地,干扰人民联盟规定的土改步骤。这种做法有助于把反寡头地主的措施变成对中小庄园主的无理攻击,并把政治上无知的农民引向邪路。由于政府的意图被曲解,反动报刊和反对党各派从中得到了一些对它们有利的论点,并确实在农村某些地区扩大了它们的社会基础。^①

同年8月初,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在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上说:每当人民取得一次胜利之后,左派革命运动总要采取一次挑衅行动,从而使右派得以继续进行攻击。他甚至指责说,有一些联系使得极“左”派和极右派之间“在态度上一致起来”。^②人民联盟发生的几次危机都与左派革命运动、社会党和其它组织的卡斯特罗分子有关,就在这几次危机中的第一次危机发生之后,即1972年5月阿连德总统第二次发表国情咨文的当天,智利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拿着横幅标语排列在

^①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月刊,第15卷,第7期(1972年7月);又见特克西埃尔的文章,载《方针报》(圣地亚哥),1972年5—6月。

^② 《世纪报》(圣地亚哥),1972年8月6日;又见同前引刊物,社论,1972年5月19日;智利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内部文件,载《信使报》(圣地亚哥),1972年2月3日。

圣地亚哥市中心的街道两旁，上面写着：“由于有阿连德总统和人民联盟的纲领，我们能够击败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挑衅。”^①在1973年期间，共产党对左派革命运动提出批评，指责它企图建立一个同阿连德总统领导的人民联盟政府平起平坐的唱对台戏的政府，从而分裂人民联盟和工人阶级。^②

1973年9月政变之后数月，智利共产党拒绝对阿连德总统任职期间左派的缺点作公开、严肃的分析。它争论说，作这种分析将“不利于人民联盟各党派的团结”，因为在政变后的这个时期团结是必不可少的。^③然而，在1974年期间，这种分析开始出现了，同时对智利政界卡斯特罗分子的批评也出现了，如果说这种批评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比政变前更为尖锐。雷内·卡斯蒂略曾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分两部分连载。他在这篇早些时候曾被引用过的文章中写道：人民联盟各党派认为，人民联盟政府的失败是由于缺少一个执行有原则的政策并能避免犯“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统一领导。一个妨碍统一领导的特别重要的因素是“极左分子不断地进行颠覆活动”，而这种活动“给人民运动带来严重危害”。极“左”组织挑起与可能的同盟者的冲突，并把他们赶到敌人的营垒里去；极“左”组织拒绝一切妥协，并抛弃一切同盟者；同时它们还拒绝同进步的基督教民主党或爱国的军人合作。在思想上，它们的教条主义表现为实

① 作者的观察报告。

② 参看科尔巴兰给智利共产党总书记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的信，载《世纪报》（圣地亚哥），1973年2月8日。

③ 参看《新闻公报》第20期，1973年。

际上无视人民统治的利益。因此，卡斯蒂略写道：“智利的经验再次肯定了极‘左’主义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有利。”^①

当然，左派革命运动对共产党也是不怀好感的。如上所述，左派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坚决否认依靠“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实现革命变革的可能性；因此，他们认为人民联盟的纲领以及共产党的一般政策是不折不扣的改良主义。看一看智利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之间的几次对抗，一些具体问题便可以在这儿得到澄清。

(1) 1972年1月16日，人民联盟在两个议员席位(牵涉到几个省)的补缺选举中败于反对派联合提名的候选人，这反映了人民联盟的选举力量每况愈下，从1971年4月到1972年1月，选票先后从减少百分之三到减少百分之十。智利共产党政治委员会的一个内部文件说，“选举已经证实了政府处境的恶化”。极“左”派的活动“无疑”是促使政府处境恶化的因素之一，因为反对派(经常被称为“敌人”)已经能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极‘左’派的暴行同政府的行动并无二致”。人民联盟在农村的地位由于极“左”派的影响而特别受到削弱。因此，智利共产党得出结论说，必须加紧反对极“左”立场的斗争，确实该党在选举后就是这样做的。最后，智利共产党人对于巩固国民党同基督教民主党的联盟表示严重关切。智利共产党政治委员会要求同容易接受意见的基督教民主党进行对话，以便孤立主要敌人。与此同时，该委员会指出，“基督教民主党人同右派托米奇及亚历山德里在总统选举中并不是团结一致的，这不是‘敌人估计的错误’，而是人民力量采取政治

^①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17卷，第7期(1974年7月)。

行动的结果。”^①

左派革命运动通过它的全国书记处发表了一个声明进行反击。据声明说，智利共产党对左派革命运动重新发动的一次攻势迫使左派革命运动不得不公开作出反应，而左派革命运动的成员说，他们本来是希望避免这样做的。选举结果对人民联盟来说是一“严重挫折”，但“不是工人的失败”。确切地说，这是“〔人民联盟〕在过去一年中所实行的政治战略的失败，而这个战略基本上是智利共产党的。”左派革命运动说，由于人民联盟对基督教民主党表示了思想上的摇摆不定，以及由于该盟明确拒绝宣布基督教民主党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地主和法西斯主义者利益的党，群众在认识上产生了混乱。因此，在人民联盟（直到选举前夕）一直称基督教民主党是“进步的和同盟者”的情况下，基督教民主党获得各阶层的选票是并不使人感到意外的。^②

关于土改政策，左派革命运动论证说，智利共产党错误地分析了农村的阶级构成情况，因而成了“经营农业的大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持者，该党把农业大资产阶级粉饰为“中等地主和富农”。智利共产党“反农民政策”的最严重的缺点是，没有考虑到“农业大资产阶级”同农村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是农村两个对抗的阶级。智利共产党的政策与帝国主义 1959 年以来在拉丁美洲所推行的政策完全一致。相反地，左派革命运

① 参看“共产党对政治时机的评价”，载《信使报》（圣地亚哥），1972年2月3日。

② “左派革命运动回敬共产党的攻击”，载《起义者报》（圣地亚哥），1972年2月1日。

动的政策目的在于动员群众，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摧毁大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基础。^①由于智利共产党(和人民联盟)的错误分析，结果制定了一个优柔寡断的土改政策，并让农村穷人去为自己而斗争。”当人民联盟拒绝领导农民的时候，左派革命运动的外围组织革命农民运动便插手领导。人民联盟的这个优柔寡断的政策使“一些农民在自发的斗争中错误地袭击了小庄园主。革命农民运动和左派革命运动从未动员农民去反对小庄园主，以及反对那些我们试图要保护的人。相反地，如果革命农民运动和左派革命运动对农民的这些自发的斗争不进行领导，那么农村的阶级斗争将会陷入混乱状态。”^②左派革命运动得出结论说：“鉴于智利共产党和人民联盟拒绝制定一个正确的土改政策，因此，农民运动将继续把非法的夺地斗争作为唯一的途径。”^③

(2) 1972年10月，发生了一次由商人、专业人员、卡车司机等发动的全国性大罢工，这次罢工造成的损失很大。阿连德政府在智利共产党的坚决支持下，同意成立一个包括军方三名军官在内的新内阁。同时，工人们自己采取行动或在左派革命运动、社会党和其他战士领导下接管了许多商店和工厂。左派革命运动认为，由军方和联盟组成的内阁是改良主义者的一次出卖，是给人民设置的障碍，也是妨碍人民战胜资产阶级政权的绊脚石。回敬这个新政府班子的唯一革命办

① 《关于左派革命运动的农村政策》(圣地亚哥，《起义者报》，1972)，其中大部分已译载《洲际新闻》(纽约)，1972年4月17日和5月1日。

② “左派革命运动回敬共产党的攻击”，载《起义者报》(圣地亚哥)，1972年2月1日。

③ 《关于左派革命运动的农村政策》，第38页。

法就是加紧动员群众和加强斗争。^①

(3) 1973年2月底,左派革命运动全国书记处对于智利共产党对“我们的政策和目的”进行的所谓“严重的诋毁、诽谤性的影射和惯常的丑化”给予了回答。^②其内容有以下七点:

第一,智利共产党之所以反对左派革命运动对“人民自治政权”的支持,是因为它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实行资产阶级法律的国家内通过议会行动进行争取改革的长期斗争,以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左派革命运动把这种社会主义称为“过时的改良主义”。然而,左派革命运动论证说:建立一个替代资产阶级和目前政府的政权是必要的。这个替代政权反不反对现政府将取决于现政府对群众的许许多多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及群众的需要采取什么政策。

第二,左派革命运动拒绝了共产党的经济部长奥尔兰多·米利亚斯所提出的有关三个经济方面的提案,认为这个提案是对资产阶级所有权本能的一次重大的、不可宽恕的让步。

第三,智利共产党对待经济任务和阶级斗争的整个态度是错误的。增强革命力量不是靠增加生产而是靠领导工人接管经济。

第四,在1972年11月以前,左派革命运动认为阿连德政府“主要是一个左派改良主义的政府,因为它扩大了智利的民主自由,为工人阶级制定了一个有限的改革计划。”这个政府

^① 左派革命运动全国书记处声明,1972年11月8日,拉丁美洲通讯社11月8日报道。

^② 下面七点摘自“左派革命运动回敬共产党的攻击”一文,载《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73年2月27日增刊,第1—8页。

尽管摇摆不定、对群众缺乏信任，但还是做了一些事情。11月以后，这个政府变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工人改良主义的一些阶层和武装部队高级军官的联盟。这个政府的行动中心不再是由工人阶级的一些政党所领导，而是由共产党人支持的阿连德和武装部队的联盟所控制。

建立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府将是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先奏，这样一个政府只有在广泛动员群众并按照自治政权的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府将有效地支持群众斗争，这个政府确保它的稳定性不是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官僚机构，而是依靠动员群众，使群众觉悟，并加入自己的阶级组织——公社突击队、工人和人民权力委员会等组织，同时靠军队的民主化。

第五，智利共产党把避免“内战”或“大屠杀”作为1973年3月议会选举中的中心问题是错误的。而应该强调的是，“先锋队如何能够通过正确的领导保证无产阶级和群众在阶级斗争的各种遭迁战中取得胜利，甚至在资产阶级的内战中保证他们取得胜利，如果这一战争是由于其特权和利益受到威胁的一个阶级进行反击而引起的话。”

第六，左派革命运动正在谋求革命团结，但唯一可能采用的办法是，揭露智利共产党和人民联盟内其它一些党派的改良主义和调和主义的面目。

第七，左派革命运动抵制智利共产党为制定一种使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联盟中起重要作用的政策所作的努力。

小 结

许多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卡斯特罗分子之间的争端只不过是小题大做,但 1970 到 1973 年智利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各左派党之间缺乏团结主要是阿连德和共产党人同卡斯特罗分子之间的分歧所造成的结果。这种不团结的现象是促使人民联盟政府垮台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

1970 年 9 月,萨尔瓦多·阿连德在选举中险些儿败于国民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候选人,所得选票约占总选票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六,与直接选举总统所需的绝对多数选票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结果,根据智利宪法,由议会在阿连德和豪尔赫·亚历山德里(获得百分之三十四点九八选票)这两个主要候选人之间作出最后的选择。因为人民联盟只控制了议会二百个议席中的八十个席位,所以阿连德不得不争取许多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支持,以便保证他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按照传统的做法,由立法机关选择在人民选举中选票领先的候选人。阿连德早就坚持说,这种传统的做法应该一如既往地受到尊重。虽然大多数基督教民主党人要仿效这个先例或者觉得必须这样做,但是许多人对人民联盟的长远目标深为忧惧。经过人民联盟和基督教民主党的议员之间的广泛讨论,阿连德同意支持一项“宪法保障法”,目的在于保证智利公民的自由并撤消亚历山德里总统候选人的资格。10 月 24 日,议会投票赞成人民联盟的候选人。11 月初,阿连德便就任总统。

不论是阿连德或者人民联盟都没有得到过大多数智利人

民的支持,虽然在 1971 年 3 月市议会选举中人民联盟获得百分之四十九点七三的选票。要是阿连德当时认为那怕只在一个重大问题,例如,用人民议会取代两院制议会的问题上,他能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话,他是会要求举行全国公民投票的。虽然阿连德一再说他打算这样做,^①但是公民投票却始终没有举行。在大多数时候,支持人民联盟的人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到百分之四十二。这个比例数对于一个普通的总统是一种相当好的支持,但是对于一个试图实行这样一个革命变革纲领的总统来说,则是不够的。

阿连德对于他缺少大多数人民支持一事本可以采用以下几种补救办法:(1)把所有倾向社会主义的组织团结在人民联盟纲领的周围;(2)放慢变革的速度,取得智利政界中、左阶层的进一步支持;(3)大大加快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速度。阿连德在任职三十四个月期间几乎经常试图采用第一种办法,对第二种办法采取时用时弃的态度,而对第三种办法则作了一些让步。对于人民联盟政府和一般智利人来说,如果始终如一地采用上述任何一种办法,也许会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更好一些。

要是大致按照阿连德和智利共产党建议制定的人民联盟纲领比较有条不紊地进行革命变革并使这种变革得到巩固的话,到 1976 年总统选举时革命也许很可能成为不可改变的事

^① 阿连德在就任总统之后三个月曾对雷吉斯·德布雷说:“我们提出一个提案,结果被议会否决了;我们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我将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建议取消两院制议会;但是被议会否决了;后来举行公民投票,我们获胜了。这样就结束两院制,我们必须实行我们建议的一院制。”见“阿连德同德布雷的谈话”,载《终点》杂志(圣地亚哥),1971年3月16日,第39页。

实。要是反对党各派的团结受到不是很明显的和直接的威胁，它本来是不会变得如此坚强的。同时，要是更多地尊重法律和政府的传统惯例（它们本身就能削弱反对党各派的团结），本来不仅可能使军队没有必要参与政治活动（事实上这是总统本人开的这个先例），而且也不会给军事政变提供任何明显的鼓励或借口。这条路线本来是谋求同美国的妥协，而且迹象表明这种妥协本来是可以达成的。但是执行这条路线事先需要左派有一定程度的团结，而这种团结从一开始就是很不可能的，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一些卡斯特罗派组织相信，国内和国际的势力将通过种种手段或借口来贬低或打倒这种革命的渐进主义。

人民联盟从 1972 年 1 月补缺选举失败后，即比较紧迫地在探索这条不排斥中左派的路线，以便争取基督教民主党的左翼。然而，这条路线从未真正实行过；如果真的实行的话，那么原来的人民联盟和阿连德自己的党几乎肯定会分裂成两派。其结果也许不会得到人民更多的支持，而是肯定会大大增加极“左”分子对阿连德纲领的反对。

虽然卡斯特罗分子的路线有时对阿连德有某种吸引力，但是在人民联盟执政期间，由于阿连德、共产党人和其他许多左派人士坚持，这条路线也许从未被认为是一条可行的路线。然而智利有一个坦率的有影响的人要求采取这条路线，这个人日益迫切地坚持认为，革命必须迅速地激进化，否则就要失败。米格尔·恩里克斯 1972 年 5 月 22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用简单明瞭的卡斯特罗派的语言解释说：智利左派中存在两条路线，即改良主义路线和革命路线，前者主要是智利共产党

的路线,后者是左派革命运动的路线。但是,在1970到1973年期间,智利发生的情况几乎并不是那么简单,关于这一点,阿连德总统比谁都知道得清楚。他对卡斯特罗派路线的让步,不仅使他同他的主要支持者智利共产党疏远了,而且增加了反对党各派的敌对情绪和军事政变的威胁。^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卡斯特罗派的路线同共产党的路线之间的分歧与其说在理论上不如说在实践上越来越大了。尽管公社突击队、替代政权这样一些复杂的思想是在斗争中形成的,但是卡斯特罗派的路线从一开始在理论上就有这种复杂思想的萌芽。并经常受到共产党人的谴责,事实上是卡斯特罗派路线的发展扩大了它同共产党路线的分歧,这不仅对一切所谓“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是一个直接的威胁,而且对一些工人政党和人民联盟政府也是一种挑战。左派内部存在着对立的路线斗争而每条对立的路线又派生出其他一些路线,这种情况在给阿连德政府制造政治、经济、宪法、国际等问题方面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后来使这些问题愈来愈难以解决。最后,阿连德政府垮台和人民联盟试验失败的原因也许不是别的,而是一些左派党和左派人士严重缺乏一致的、始终如一的立场。诚然,总统本人有时也有这种情况。^②

^① 阿连德逝世后,德布雷写道:关于阿连德为“赢得本大陆武装革命”所做的事情,总有一天会全部介绍出来,“这种武装革命曾经多么强烈地吸引着他,尽管由于意志衰退他拒绝了这种革命。”虽然这种革命表现出德布雷所谓的一种“光荣的不连贯”,但是阿连德认为帮助任何寻求他援助的拉丁美洲游击队是一种个人荣誉问题。见《新观察家》杂志(巴黎),1973年9月17日。

^② 关于阿连德的年代,参看莫斯:《智利的马克思主义实验》一书和奥雷戈编的文章汇编《智利:全面的看法》。

结 论

在 1959 到 1976 年期间，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分子和共产党人，只在必须清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等长远目标的最基本问题上，看法始终一致。他们对于各国国内情况的分析很不相同，同样，他们对于人民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的接受能力所作的评价，以及对于为培养群众的革命觉悟而采取的一些行之极为有效的办法的评价，也很不一样。他们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意见分歧。例如：(1)关于要不要建立包括有民族资产阶级成员或军方人士参加的统一战线；(2)关于打进和影响军队、政党、学生组织、工会以及类似这类组织的价值和办法；(3)在现有制度的范围内革命变革（即便是这种变革的初期阶段）的可能性；(4)关于在农村开展以城市为基地的武装斗争或非武装斗争的必要性，或者同时以农村和城市为基地开展这两种斗争的必要性。由于在这些问题和其它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许多组织对于它们的马列主义对手的革命性产生怀疑，或者公开拒绝相信。实际上，它们常常甚至不承认上述基本目标的共同基础，许多组织一再指责它们的对手把自己出卖给政府，出卖给修正主义者，出卖给小资产阶级，或者出卖给其它一些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势力。

在针对任何一国的具体情况决定采取什么最合适的政治

策略时，马列主义者之间常常发生争执，其激烈程度达到了他们同他们共同的敌人争吵的水平。革命斗争的三种基本形式是：(1)所谓“和平的或非武装的道路，这主要是包括(可能时)参加选举和在工人、学生中进行活动；(2)暴力的或武装的道路，其特点主要是在农村或城市进行游击战(或者在很少的情况下同时在农村和城市进行这种战争)；(3)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这两个重要方面的结合。^①经常同时采取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有些情况下对一些个别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这些国家还没有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一般只是共产党同卡斯特罗派组织之间争论的一个问题，因为实际上几乎很少有什么组织能够在采取重大武装行动的同时又积极参与公开的、非武装的政治活动。诚然，尽管有几个亲苏的党派(其中最重要的是哥伦比亚共产党)曾宣布走第三条道路，但是只有智利的卡斯特罗派和民族主义的左派革命运动在处于爆炸性局势之中的人民联盟时期(1970到1973年)，才有资格认真同时强调走这两条道路。世界强国，特别是苏联，在一定的时期内插手这方面的一切事情或者说保留作任何抉择的自由，几乎是非常可能的。它们的长远利益很少受到拉丁美洲个别国家各种力量经常彼此消长的复杂斗争的影响。

承认这些党派和组织同时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和非武装斗

^① 在政府当局破坏罢工或示威游行的时候，或者在马列主义者之间彼此对抗的时候，“和平”道路也包括采用暴力手段。1970年12月2日在智利康塞普西翁省曾发生一起马列主义者之间对抗的事件，当时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智共)的拉莫娜·帕拉突击队的成员同左派革命运动的成员在大学委员会选举期间发生冲突，结果打死一名左派革命运动成员。

争的道路有多么困难,是比较现实的(而且也是比较中肯的)。关于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及制度的斗争中,如何发挥重大作用(更不必说发挥先锋作用)这样一些复杂的令人沮丧的问题——其他大部分革命者和改革者也在热烈地辩论这个问题——常常出现几种完全不同的分析,这种不同的分析使对立的马列主义者之间发生冲突。在世界大国积极插手的时候,这种冲突便达到极其尖锐和白热化的程度。卷进这种冲突的大部分组织都说(无疑相信),由于缺乏团结,解放斗争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尽管它们也直接或间接地坚持认为,只有根据自己的条件才能实现团结,否则就一定是一种“出卖”。

很难确切地说,各种牌号的马列主义组织在大多数国家内有些什么影响。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其它几个国家的一些亲苏的党有时对左派的政治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常常同这些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纲领很少有什么关系。这些党大都利用国际发展趋势,特别是西半球事态的发展,而且也利用至少同样由于它们国家其它组织的活动以及它们自己的活动而产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诚然,这些亲苏的党取得的成功也许实际上起了促进作用,助长了当时政权内部的不满情绪,而又没有过分暴露它们自己在这方面的作用。1975年6月发表的二十四个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宣言(用典型的宣传词句)表示了七十年代中期许多拉丁美洲人对传统方式感到不满,而共产党对这种形势却感到满意。这个文件宣称,各国共产党应该在进一步开展斗争中起“决定性的历史作用”,但是文件承认,这种作用并没有因为各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道德和指导它们的正确理论而得到保证。

这种作用只有通过堪称榜样的领导和行动才会发挥出来。^①

卡斯特罗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传统秩序日益不抱幻想的倾向的发展,其中很多人有严重的理想主义、沮丧情绪或者冒险慾。然而,他们的暴力活动一般地说没有得到任何社会阶层的重大支持(有时除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外),相反地广大居民对他们的这种活动通常采取漠不关心或者断然拒绝的态度。结果,他们在一些偏僻山区进行的大部分游击斗争,有的被镇压下去,有的毫无结果地拖时间。有些游击队组织蜕变为对立的几派,它们之间的斗争,其激烈程度与它们同它们的马列主义对手,或被公开谴责的敌人的斗争一样。在大部分或全部城市游击队中,智利的左派革命运动,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可能还有阿根廷的一些游击队,曾一度最成功地得到各种社会、经济组织的重大支持。然而,尽管委内瑞拉(城市和农村)游击队可能在六十年代初加强了这个国家的民主,但是图帕马罗斯和其他大部分城市游击队最后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从1972到1976年初,他们先后促使乌拉圭、智利、阿根廷等国的民主政府部分地或全部地垮台。

在所有马列主义左派组织当中,卡斯特罗派组织在促使力量的两极分化方面以及在促使各政党和军队内部的那种被他们和共产党人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情绪的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大多数卡斯特罗分子曾坦率地认为,这种强化阶级斗争的做法对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一些卡斯特罗派组织所看到的,军政府的镇压必然迫使群众起来造反,并爆发有群众基础的革命。

^① 载《格拉玛报》(哈瓦那),1975年6月22日;参看附录4。

虽然到 1976 年初拉丁美洲马列主义者之间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但是,在理论上却出现一定程度的统一,同时党内斗争在过去十年中也处于最低潮。尽管七十年代初在乌拉圭和智利遭到重大挫折之后大部分亲苏的党仍在继续提倡走非武装的斗争道路,但是在受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进攻之后,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号召武装保卫革命的发展。大多数国家的亲华组织变得日益无关紧要,与其说它们忘记自己积极的历史范例,不如说它们把毛的理论教训置之脑后。一些卡斯特罗派组织声称,有时并表示出日益意识到,如果要得到群众支持并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话,必须在人民中耐心地做宣传工作(正如亲华派和其他一些人所早已建议的那样),其中多数卡斯特罗派组织更多地是指望彼此得到对方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而不是去依靠古巴给予这方面的支持。虽然卡斯特罗派的战略主要仍然是武装斗争,但是一般地说,他们(至少在理论上)已经认识到必须在城市和农村同时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和非武装斗争的道路。

目前拉丁美洲马列主义者之间的这种相对沉寂的状态,部分是由于三个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和总的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1976 年初,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并没有因为苏联、中国或古巴的侵略政策而象早些时候那样常常处于彼此竞争的状态。同样,拉丁美洲各种牌号的马列主义信徒之间的重大斗争现在也没有结束。那些重要的马列主义组织具有多年的斗争历史,但由于军队当权或支持当权者,或者由于事态的急剧变化,其中大部分组织至少暂时相对地处于不重要的地位。

然而,一些自称马列主义的组织将来在全国而且可能在

国际上制造混乱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果正在改善的话，那也是很慢的。除非在解决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迹象得到了明确的证实，否则目前的沮丧情绪将会增加，同时将准备好条件使这些组织或者具有类似思想的一些组织再次活跃起来，更不必说那些非马列主义组织了。看来似乎矛盾但确有道理的是，如果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本身会鼓励人们要求进一步变革，而这种变革将为本书中所谈到的那些组织及其后来建立的组织，提供新的机会。如果几个重要的共产党国家再次决定这种状态将符合它们的利益的话，拉丁美洲马列主义者恢复活动的可能性将会显著增加。1975年底和1976年初，古巴和苏联公然参加安哥拉内战，这使许多拉丁美洲人担心，在今后的年代里拉丁美洲将会被日益卷入国际事态的发展。

从1976年初开始，许多拉丁美洲的马列主义者看来已从激烈的派别斗争和不久前的惨痛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在今后的年代里，他们可能会比过去进行更多的合作，或者至少不会象过去那样对立。另一方面，派性是拉丁美洲一般政治的特点，同时也是近年来一些共产党组织的特点。将来当一种真正重要的革命形势出现时，马列主义者有可能再次发现他们彼此处于对立的状态，犹如他们同他们所宣布的共同敌人之间处于对立的状态一样。

附 录 一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会议

哈瓦那，1964年11月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于1964年11月在哈瓦那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苏联共产党曾派了观察员参加，但中国没有派。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1）在过去十年中，拉丁美洲最富有成效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对六十年代初所受到的挫折给予了特别注意）；（2）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同亲苏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3）中苏争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使古巴政府在苏中冲突中第一次站在苏联一边，虽然卡斯特罗曾一度继续自称中立。会议在同古巴革命领导达成某些妥协之后，看来还重申了莫斯科对于拉丁美洲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会议似乎一度成了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之间以及这些党同古巴之间进一步协调和合作的前奏。

会议没有发表任何文件，但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两个月发表了一项正式公报。公报全文如下：^①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在1964年末举行了一次会议，各党都派了代表参加。会议是在兄弟般的合作气氛以及对共同问

^①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会议公报”，载《社会主义古巴》杂志（哈瓦那），第5卷，第42期（1965年2月），第140—42页；由作者译成英文。

题抱着坦率谅解和了解的精神中举行的。在会上有益地交换了在本大陆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经验。

会议特别注意了声援古巴人民及其政府的问题。会议在决议中强调,必须推进全大陆声援古巴的活动,并使这种努力更加坚持不懈,更好地得到协调。各个组织、个人和政党开展这种声援运动,不仅是履行一种国际主义和拉丁美洲主义的义务,而且同时也是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自由、尊严和前途。

在声援运动的各种任务中,重点应该放在要求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为反对经济封锁、发展贸易而斗争;谴责反革命分子和中央情报局其他代理人的侵略预谋和活动;及时回击由美帝国主义组织和指导的对古巴人民及其政府的诽谤运动;发动一个宣传运动,广泛宣传古巴革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关于支持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问题,会议提出下列建议:

(1) 促进建立声援运动或委员会,使反对镇压的运动具有经常性,以便使这些活动不局限于时断时续的游行示威或发表孤零零的声明。

(2) 积极支持现在正在遭受残酷压迫的人们,譬如说,正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拉圭和海地进行战斗的人们。

(3) 推进本大陆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波多黎各和英属圭亚那的独立事业,支持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法属圭亚那争取自治,支持把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归还给

阿根廷,支持加勒比地区英属和荷属殖民地的民族要求。

(4) 在整个大陆范围组织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积极声援委内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

(5) 加强声援巴拿马人民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6) 推进争取释放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强大运动,这些领导人中有:委内瑞拉的赫苏斯·法利亚,古斯塔沃·马查多和庞佩约·马克斯;厄瓜多尔的佩德罗·萨德;海地的雅克·斯特芬·阿历克斯;巴拉圭的安东尼奥·迈达纳;巴西的马里奥·阿尔维斯,伊班·里贝罗和阿斯特罗希尔多·佩雷拉。要求释放所有被迫害的爱国者、工人战士和民主人士。

(7) 发扬拉丁美洲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精神,促进各企业的工人提出抗议,并把这种抗议提到世界工会联合会和拉丁美洲一切独立的工会组织。

会议还强调促进各党互相接近、交流经验和更好的相互了解的必要性。

会议认真研究了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分歧问题,并在这方面通过了一项决议,其要点如下: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在集会交流经验的时候,重申它们为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积极斗争的决心,这个团结是以马列主义的原则和1957年、1960年的纲领性的宣言为基础的。

各国共产党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我们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各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争取世界和平以及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取得胜利的

基本保证。

因此，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深为担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已造成分裂的危险，并为我们的敌人提供可乘之机，鼓励他们进行侵略。

各国共产党认为，迫切需要的是为团结铺平道路；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谅解和同情提供方便；避免做出任何事情，引起增大分裂危险，妨害兄弟般的建设性的对话，阻碍各兄弟党在一条战线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以便克服目前的分歧，集中自己所有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势力。

必须强调我们的共同观点，共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作一切必要的努力以取得最坚定的原则团结的胜利。

因此，由于论战过程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损害，会议要求立即停止公开论战，并强调需要找到适当方法，本着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相互关系准则的友爱精神，解决争论的问题。

同时会议认为，各党内部的团结是推进各国革命进程的必要条件。因此，一切派别活动（不管是哪一类的，或者什么原因引起的）都应该给予坚决反对。

会议认为应该采取坚决的步骤，切实保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此，必须发起举行双边和多边的会晤，并召开几次由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参加的必要的会议。

附 录 二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

1967年7—8月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 (Organiz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Solidaridad, or. OLAS) 由参加最近结束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组织会议(或称三大洲会议)的二十七七个代表团于1966年1月16日在哈瓦那建立。^①主持组织会议的有: 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的一位领导人佩德罗·梅迪纳·席尔瓦, 他曾在三大洲会议上任拉丁美洲付主席; 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八名委员中的七名委员, 其中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其它拉丁美洲代表团的著名成员包括有: 马里奥·蒙赫(玻利维亚); 萨尔瓦多·阿连德(任团长), 克洛多米罗·阿尔梅达和路易

^①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 阿根廷代表团(七人), 玻利维亚代表团(三人), 巴西代表团(七人), 哥伦比亚代表团(六人), 哥斯达黎加代表团(三人), 古巴代表团(四十一人), 智利代表团(九人), 厄瓜多尔代表团(二人), 萨尔瓦多代表团(二人), 瓜德罗普代表团(四人), 危地马拉代表团(五人), 圭亚那代表团(三人), 海地代表团(五人), 洪都拉斯代表团(三人), 法属圭亚那代表团(三人), 牙买加代表团(二人), 马提尼克代表团(二人), 墨西哥代表团(六人), 尼加拉瓜代表团(三人), 巴拿马代表团(四人), 巴拉圭代表团(五人), 秘鲁代表团(八人), 波多黎各代表团(四人), 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团(五人),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二人), 乌拉圭代表团(六人)以及委内瑞拉代表团(十五人)。

“奥拉斯”(Olas), 是拉美团结组织的缩写, 在西班牙语中这个字是“浪潮”的意思。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说:“‘奥拉斯’表示未来的浪潮, 象征着席卷一个大陆的革命浪潮。”《格拉玛报》(哈瓦那), 1967年8月20日。

斯·菲格罗亚(智利);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任团长,哥伦比亚);路易斯·图尔西奥斯(任团长,危地马拉);切迭·贾根(任团长,圭亚那);豪尔赫·特纳(任团长)和弗洛伊德·布里顿(巴拿马);以及莫伊塞斯·莫列罗(委内瑞拉)。

出席组织会议的代表同意各国建立委员会,同时并同意建立一个由巴西、哥伦比亚、古巴、圭亚那、危地马拉、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国代表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这个组织委员会分为两个小组委员会,一个负责定于1967年举行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另一个负责这次会议的宣传工作,并出版会议新闻公报《奥拉斯》(OLAS)。组织委员会仅有秘书长和新闻秘书两个常设职务,分别由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艾德·圣玛丽亚和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的米格尔·布鲁格拉斯担任。除上述活动外,组织委员会还负责发出所有参加1967年会议的请贴。1967年1月,组织委员会向各国委员会、二十五个国际组织和一百九十七个拉丁美洲研究所分别发了一份详细的调查表。由一千多名分析人员及其助手组成的六个特别委员会将调查表中搜集到的有关拉丁美洲的政治、社会、经济情况汇编成十四卷资料。在1967年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初期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选出大会主席以前,组织委员会一直保持领导作用。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第一次会议于1967年7月31日到8月10日在哈瓦那举行。根据会议参加者的正式名单,到会报到的正式代表共有一百五十八名。他们分别来自以下一些国家:阿根廷(六人),玻利维亚(四人),巴西(四人),哥伦比亚(五人),哥斯达黎加(九人),古巴(十二人),智利(八人),厄瓜

多尔(四人),萨尔瓦多(八人),瓜德罗普(四人),危地马拉(四人),法属圭亚那(四人),圭亚那(二人),海地(四人),洪都拉斯(六人),马提尼克(四人),墨西哥(六人),尼加拉瓜(六人),巴拿马(六人),巴拉圭(七人),秘鲁(八人),波多黎各(三人),多米尼加共和国(六人),苏里南(三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四人),乌拉圭(十人)和委内瑞拉(十一人)。另外,还有一名美国名誉代表。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有: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克洛多米罗·阿尔梅达和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智利);内斯托尔·巴列(团长)和奥斯卡·帕尔马(危地马拉);弗洛伊德·布里顿(巴拿马);胡安·玛丽·布拉斯(波多黎各);罗德内·阿里斯门迪(团长),阿列尔·科拉索和何塞·迪亚斯(乌拉圭);弗朗西斯科·普拉达(委内瑞拉);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美国)。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人士包括有三十八名观察员,他们来自一些国际组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组织,国际学生联合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拉丁美洲人联合会,拉丁美洲工人统一工会常设大会,拉丁美洲大陆学生组织,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三大洲支持越南人民委员会,国际战争罪行审判法庭,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以及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委员会)。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约二十五名观察员来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北越,北朝鲜,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蒙古,波兰,东德,罗马尼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七名观察员来自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苏联只派了两名正式观察员,虽然有迹象表明他们是被邀请参加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却没有派。南斯拉夫显然是

被有意拒绝参加的唯一的共产党国家。特邀外宾共有三十八名，其中有卡洛斯·马里格拉(巴西)，罗克·达尔顿(萨尔瓦多)和埃利萨贝·布尔戈斯，她后来成了雷吉斯·德布雷的夫人(委内瑞拉)。被邀请参加的外国新闻记者共一百五十七人，来自三十八个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人。

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代表都是极“左”分子和游击战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领导人弗朗西斯科·普拉达。有一些亲苏的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也出席了会议，虽然看来他们只在几个代表团中占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乌拉圭代表团。出席会议的还有几个亲华代表，虽然他们不是作为一些亲华党的正式代表参加会议。马塞尔·尼德尔冈8月2日在《世界报》上指出，大多数代表在他们本国都不是什么知名人士。南斯拉夫通讯社也指出了这种情况，它在8月1日宣称：“许多代表团都是由一些完全不知名的人士组成，他们所代表的一些团体和组织在他们本国并无影响。”^①

会议的四个副主席中有三个是倾向卡斯特罗派的，他们是：弗朗西斯科·普拉达(委内瑞拉)，内斯托尔·巴列(危地马拉)和赫拉尔多·桑切斯(多米尼加共和国)。第四个副主席是乌拉圭共产党总书记罗德内·阿里斯门迪，他是被安排在高级职位上的唯一亲苏的共产党人。阿里斯门迪也是近乎完全赞同会议采取倾向游击队路线的唯一亲苏的共产党人，

^① 智利参议员(后来为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没有出席会议，虽然他是智利组织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是在智利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发生许多争论之后于1967年6月建立的。

而且人们都认为他经常在幕后为消除古巴和苏联之间的分歧而进行努力。

正如 1967 年 8 月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通过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章程第一条所说,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宗旨是:

(1) 发展和促进拉丁美洲各国反帝运动和反帝组织的团结。

(2) 发展和促进本大陆各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和反帝组织的团结。

(3) 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支持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特别是那些从事武装斗争的人们。

(4) 协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便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大陆战略。

(5) 促进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声援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全世界的进步运动。^①

根据章程规定,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由以下三个机构组成: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常设委员会和各国全国委员会。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是“该组织的协商机构,拥有最高的权力”,它由各会员国的全国委员会组成,并规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在 1967 到 1976 年期间,并没有举行第二次会议。)

常设委员会是“执行机构,同时也是各次会议之间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的总部设在哈瓦那,由三分之一的会员国的代

^① 在本附录中的这段引语以及其它所有引语,如果没有加注,均系引自 1967 年 7—8 月会议期间油印的正式英文译本。《格拉玛报》(哈瓦那)英文版周刊登载的译本有些地方与上述译本略有出入。

表组成。它的职责是努力实现(上述)章程第一条中所规定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宗旨。它负责协调和指导各国全国委员会的活动,并监督这些委员会的组成。同时,它还负责每两年召开一次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并有权在必要时召开本大陆特别会议。

根据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章程,全国委员会是拉丁美洲各国“最积极的、反帝的并有深厚群众基础的人民组织”。它们必须是“反帝的,有代表性的并且是统一的”,必须“承认三大洲会议的总宣言和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第一次会议的总宣言”,同时还必须“承认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章程”。章程进一步说明,在“那些正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国家,一切有效地支持和参加这种斗争的组织和运动都将被认为是反帝的”。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群众组织可能成为全国委员会的组成部分,但是只要它们符合另外规定的条件。任何一个全国委员会都可以建议调整它的成员,但最后必须由哈瓦那常设委员会决定。全国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通过统一和协调它们本国的革命力量为实现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目标而努力。

会议的正式日程主要分为四项,头三项日程又分为十三小项。四项主要日程是:

(1) 拉丁美洲的反帝革命斗争。

(2) 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军事干涉和经济、思想渗透的立场和共同行动。

(3) 拉丁美洲人民声援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

(4)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章程。

为了讨论和发表有关上述四个中心议题的声明,专门成立了

四个工作委员会。虽然各次会议都是秘密举行，但是有些代表还是向记者透露了大部分会议进行的情况。菲德尔·卡斯特罗 8 月 10 日在提到这些代表时说：“有泄密问题，会议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或多或少地都给透露出去了。”^①

有三部分不同的参加者在会议上发了言，他们是古巴主人，出席会议的代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和特邀来宾。

古巴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 7 月 31 日晚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论述了他所谓的“帝国主义反对各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残暴的世界战略”。他断言，拉丁美洲人民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用武器回敬帝国主义的暴力挑战，要么放弃一切解放的希望。”^② 古巴共产党组织书记、古巴代表团团长阿曼多·阿特在会上对会议的主要目的作了一个简要的卡斯特罗主义的分析，即如何拟定“一项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同美国政府利益有着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寡头集团和大庄园主的共同战略”。^③ 菲德尔·卡斯特罗 8 月 10 日在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内容已在本书正文（第 44—45 页）中扼要地谈到。

在会上发言支持卡斯特罗派路线的代表中，著名的有：委内瑞拉的弗朗西斯科·普拉达，哥伦比亚的法维奥·巴斯克斯（他曾给大会一份录音的贺电），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秘鲁等国的代表团。在发言时对卡斯特罗

① 同 263 页注①，1967 年 8 月 20 日。

② 同前，1967 年 8 月 6 日。

③ 同前，1967 年 8 月 13 日。

派路线表现冷淡的代表中有：智利共产党的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和哥斯达黎加代表团。

美国“名誉代表”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比其他与会代表（除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外）受到特别是外国报刊的更多的注意。卡迈克尔8月2日的发言是会上所作的最长篇的发言之一。他说：“美国城市实质上居住的是第三世界的人民”，美国黑人为获得“解放”而需要进行的城市游击战仅仅是“第三世界”同“美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国际斗争的一部分。在底特律和美国其它城市发生暴力斗争之后不久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迈克尔说，美国黑人的这些“造反行动”应该同世界其它地区的斗争联系起来，因为“如果〔美国〕国内出现五十个越南、美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也出现五十个越南的话，那将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死亡。”^①

其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观察员根据他们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亲苏立场所作的大部分发言不仅较短，而且缺乏战斗性。但是，越南、朝鲜和叙利亚代表团的发言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组织执行书记处代表的发言是明显的例外。第一次全体会议于8月1日举行，会上并宣布“向越南人民表示敬意”。由八名代表组成的北越代表团团长优先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优先在会上第二个发言的是由七名代表组成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会上并宣读了北越胡志明主席和北朝鲜金日成主席的贺电，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贺电。

古巴代表团提交大会的长篇报告清楚地反映了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代表所讨论的和通过的决议的调子和内容。这

^① 同263页注^①，西班牙文本，1967年8月3日。

篇报告试图说明“干革命是每个革命者的义务”（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2年《第二个哈瓦那宣言》中所说），尤其是通过游击战干革命。报告论述了马克思和列宁以及革命的国际性质。报告特别着重论述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拉丁美洲的历史，以及从西蒙·博利瓦尔开始经过何塞·马蒂到切·格瓦拉时期的拉丁美洲的革命者。

在整个会议期间，因强调拉丁美洲“反帝斗争”的特殊性而常常将马列主义这个重要因素置于不顾，这在很多场合是显而易见的。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是在博利瓦尔的巨幅画像前致的开幕词，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会议闭幕式上是站在格瓦拉画像前讲话的。拉丁美洲的代表从多尔蒂科斯开始在发言中经常提到博利瓦尔、圣马丁、马蒂以及十九世纪一些英雄的名字，会议通过的许多决议也引用这些人的话，并列举他们的成就。

会议通过了一些决议，谴责美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宣布支持拉丁美洲的游击队，支持美国黑人和亚非各国人民，支持阿拉伯世界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欢呼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同时还宣布切·格瓦拉为拉丁美洲的名誉公民。^①

根据总宣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拉丁美洲反帝战士之间战斗团结的关系，制定开展本大陆革命斗争的基本路线。”会议通过的宣言最后部分是基本上属于卡斯特罗派路线的二十点纲领性的经验总结，并由代表们在会上宣布：

（1）干革命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权利和义务。

^① 关于四个工作委员会通过的一些决议要点，同前引，1967年8月27日。

(2) 拉丁美洲革命在反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和反对本世纪的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中，有着它极为深刻的历史根源。美洲人民的史诗和我们各国人民在过去数十年中同帝国主义所进行的阶级大搏斗，是对拉丁美洲革命运动产生历史性鼓舞作用的源泉……

(3) 拉丁美洲革命的实质性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寡头势力。因此，革命的性质是争取民族独立，摆脱寡头势力，争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4) 指导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

(5) 革命的武装斗争是拉丁美洲革命的基本路线。

(6) 其它一切斗争形式都必须为促进武装斗争这一基本路线的贯彻而服务，而不应当妨碍其实行。

(7) 对于本大陆大多数国家来说，组织、发动、开展和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是今天革命运动的迫切的、基本的任务。

(8) 然而，那些还没有提出这一任务的国家将把这一任务看作是他们本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前景。

(9) 每个国家的人民及其革命先锋队的历史责任是推动他们每个国家的革命。

(10) 在我们大多数国家中，游击队是解放军的雏型，游击战是发动和开展革命斗争的最有效的手段。

(11) 领导革命要求有一个政治和军事的统一指挥机构，并把它作为一个组织原则，作为成功的保证。

(12) 各国革命运动之间实行最有效的团结是推动并胜

利完成它们在本国所进行的斗争。

(13) 对古巴的声援以及同武装革命运动的配合和合作，是本大陆一切反帝组织刻不容缓的国际性义务。

(14) 古巴革命作为武装革命运动胜利的象征，是拉丁美洲反帝运动的先锋队。正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各国人民，跟随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也使自己处于先锋队的地位。

(15) 直接受欧洲国家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为获得解放，必须有一个当前的、基本的目标：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并将这种斗争同本大陆的总的斗争结合起来，以此作为避免被美国新殖民主义吞并的唯一方法。

(16)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反映了美洲历史上近一百五十年来的优秀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它是拉丁美洲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本大陆各国人民最近五年来又证实了这个文件，并使它的内容得到深化、丰富和激进化。

(17)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同世界其它任何国家的人民之间没有任何争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呼吁美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的镇压政策作斗争。

(18) 拉丁美洲的斗争加强着它同亚洲、非洲各国人民、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特别是美国黑人的团结纽带，美国黑人受到阶级压迫，同时忍受着贫困、失业、种族歧视之苦并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他们是革命斗争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19) 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向所有正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各国革命人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援助，是鼓舞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榜样。

(20) 我们通过了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章程,并成立了总部设在哈瓦那的常设委员会,拉丁美洲团结组织是鼓舞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榜样。^①

会议比原来预料的延长了两天,显然是因为工作委员会成员中的卡斯特罗分子和亲苏分子在对一些决议的措词上不能取得一致看法。最后在美洲问题和其它一些国际问题上反映了古巴的观点,虽然为避免同苏联发生公开冲突而作了某些微小的让步。在“关于声援委内瑞拉的决议”中,由于对亲苏的委内瑞拉共产党进行了攻击而引起一场争论。结果,有关上述决议中的这段文字,经过投票表决,以 15 比 3 (萨尔瓦多、玻利维亚和乌拉圭反对)通过,九票弃权。拉丁美洲团结组织谴责了“委内瑞拉共产党领导所采取的拙劣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该党放弃了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背叛了革命原则,为帝国主义和寡头集团的利益以及它们的压迫政策效劳。”^② 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关于谴责“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给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等国的“寡头独裁”政府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决议。这个决议是针对苏联和它的几个东欧盟国的,也以同样的票数通过(据报道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乌拉圭三国反对),但是这个决议从未发表。^③

① 见会议正式文件。

② 译自会议正式文件的西班牙文本。

③ 参看《纽约时报》1967年8月10日和《世界报》(巴黎)8月11日。

附录三

革命协调委员会的建立

1974年2月

这是越南的道路，这就是人民必须走的道路；这是美洲将要走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武装组织之间可以建立如同协调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以便使美帝国主义执行镇压任务更加困难而便于我们自己事业的发展。

切·格瓦拉：《致三大洲会议的贺电》

革命协调委员会由智利左派革命运动、乌拉圭民族解放运动（即图帕马罗斯）、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和阿根廷人民革命军四个武装组织组成，于1974年2月13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布成立。当时革命协调委员会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墨西哥左派杂志《为什么》周刊（1974年6月20日）称它是自十二年前《第二个哈瓦那宣言》以来拉丁美洲发表的最重要的政治文献。^① 宣言的全文如下：

乌拉圭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智利左派革命运动、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和阿根廷人民革命军签署了 this 宣言，向工人、贫苦农民、城市穷人、学生、知识分子、土著居民以及

^① 革命协调委员会的这个文件的全文由作者译自《为什么》周刊（墨西哥城），1974年6月20日。

我们长期蒙受苦难的拉丁美洲祖国的亿万被剥削的劳动者宣布，它们决定在一个革命协调委员会中团结起来。

采取这个重要步骤是出于这样一种迫切需要，即需要使我们各国人民在组织方面团结起来，需要使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敌人，更有效地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斗争。

这个重要步骤是使英雄、革命的象征、本大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切·格瓦拉司令的主要战略思想之一变成现实。它也是恢复我们各国人民被破坏的传统的一个重大步骤，我们各国人民曾经兄弟般地来到一起，为反对上世纪的压迫者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

我们的斗争是反帝的 世界各国人民现在经常处于最富有侵略性和最贪婪的帝国主义威胁之下。他们看到了在美帝国主义组织和指使下对英雄的越南人民进行的大屠杀，并且对此表示关切。在这场战火尚未扑灭的非正义的战争中，充分暴露了北美帝国主义阴险狡诈的好战面目。但是，这场战争也再次暴露了北美帝国主义制度的虚弱性，尽管它拥有它的一切军事力量，因为这种制度是反对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决心为自由而战的民族的。

自从上个世纪以来，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一直受着帝国主义者新老殖民枷锁的束缚。他们不断受北美军队和跨国垄断公司策动、进行的军事干涉和非正义战争之苦。

这些侵略行动包括掠夺墨西哥，占领波多黎各，干涉圣多明各和吉隆滩，以及其它许多我们美洲不会忘记而且将决不会宽恕的好战行动。在这些侵略行动背后起作用的是，壳牌

石油公司,埃索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联合果品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以及洛克菲勒先生和福特先生的金钱;同时还有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和“帕皮”·谢尔顿、米特里翁内、西拉库萨等人在美国对拉丁美洲人民运动的奴役政策和压迫政策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拉丁美洲朝着社会主义前进 1959年1月1日,由于古巴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终于开始朝着社会主义前进,朝着真正的民族独立前进,朝着各国人民的共同幸福前进。这是拉丁美洲被剥削人民向野蛮的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公开造反的正义行动。这个制度是美帝国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从上个世纪以来强加给拉丁美洲人民的,这些帝国主义曾经用武力、欺骗和收买等手段占据了我们的大陆。我们人民光荣的反殖斗争具有政教分离主义的革命传统,曾受到克里奥耳人^①的懦怯的资产阶级及其军队的尊敬。在博利瓦尔、圣马丁、阿蒂加斯等许多英雄的领导下,光荣的反殖斗争曾经赢得了独立、平等和自由。

统治阶级为维护其小集团的利益,同帝国主义者合伙勾结,以便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并逐步让贪得无厌的外国资本控制我们的经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控制导致了它们对我们政治和文化的控制,结果使我们处于任人摆布的从属地位。资本主义的新殖民制度就是这样开始的。一百年来,这种制度一直在剥削和压迫我们大陆的工人阶级,并一直在使他们蜕化变坏。

从本世纪开始,工人阶级开始奋起反对这种制度,他们打

^① 指生于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译者

着当时很少为人们所知的社会主义旗帜与民族独立的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努力启发农民、学生和我们各国人民所有的健康力量和革命者的觉悟。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曾在动员广大群众方面起过先锋带头作用,表现了旺盛的活力和英雄气概。它们是革命斗争中不可摧毁的里程碑。尼加拉瓜传奇式的领导人奥古斯特·塞萨尔·桑迪诺(金属制造工)1932年在他自己的小国家里领导了一次最为壮举的战斗,当时他的游击部队阻止并击败了北美的侵略军。在三十年代期间,整个大陆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曾一度制止世界各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建立新殖民主义的统治。

但是,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并没有取得胜利。美帝国主义积极进行的直接和间接、政治和军事的反革命干涉以及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各派和各国共产党本身存在的一些缺点,是造成这次群众运动暂时失败的原因。虽然各国共产党是这个时期最有觉悟、最言行一致和最有组织性的组织,但是其中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仍然犯了改良主义的错误。其中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如英勇的经过战斗锻炼的萨尔瓦多共产党,曾遭受多次失败,殉难者很多,甚至达数千人。由于这个原因,迅猛的群众运动偏离了它的革命道路而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和指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一种革命到头的思想,也是统治阶级通过欺骗用来延长资本主义新殖民制度寿命的一种巧妙的蛊惑人心的手段。

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一批马列主义领导者的英明领导下设法打败了巴蒂斯塔的军队,并在帝国主义者鼻

子底下的古巴岛上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取得了巨大胜利。此后，本大陆的人民便增强了他们革命的信心，并开始了一个新的深入的群众总动员。

尽管前进几步就犯错误，但是我们各国人民及其先锋队仍坚决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整个六十年代，伟大的人民斗争，游击队的暴力战斗和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连绵不断。4月战争是多米尼加人民的总起义，曾迫使美帝国主义直接进行干涉。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派去三万名士兵，企图用屠杀来扼杀这次伟大的起义。

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的传奇式的形象成了整个这个时期斗争的化身和象征，正如他的模范的一生和他的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指明了我们各国人民新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方向一样。这个运动曾经开始在工厂、农村和城镇日益发展壮大，日益团结，后来因失去控制而扩展到整个大陆。

这种情况确定无疑地说明了我们各国人民的觉醒。这种觉醒已经使千百万劳动人民站了起来，并使他们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争取第二次独立、争取最后消灭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争取群众运动领导权的斗争 但是，走这条革命道路既非轻而易举，也非不付出代价。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帝国主义野蛮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一些更狡猾的敌人和危险每时每刻都在埋伏着等待革命力量，它们企图阻止革命力量有效地胜利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今天，就本大陆革命进程的具体情况而言，我们必须提到两种积极图谋反对拉丁美洲人进行革命努力的思潮。一种是

作为敌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另一种是人民营垒里的错误思想，即改良主义。

这两种思潮有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现在它们正在企图乘各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前进，接过革命的领导权而实行它们自己的错误的和自私的主张，其结果必然是阻止和破坏革命的发展。因此，存在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即为夺回对广大群众的领导权，我们革命者必须同这两种思潮在政治思想方面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其目的是使我们各国人民有一个始终如一的革命领导，这个革命领导将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机智而有效地领导我们去夺取最后胜利。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所赞许的一种思潮。帝国主义之所以支持它，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其反革命暴力失灵时可以把它作为分散各国人民斗争的注意力并转移他们斗争视线的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社会细胞核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或者说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胚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通过它在人民中的影响和凭借它同群众运动谈判的资格，充当了扑灭革命烈火的消防队员，并企图以此在同寡头集团和传统的资产阶级的竞争中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从而使自己无限制地得到发展壮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执行他们的欺骗性政策时口头上表示反帝，但是却企图用他们偏爱的民族主义论点即第三种立场把群众的思想搞乱。实际上，他们并不反帝，而是在为外国以各种新的更加狡猾的形式进行经济渗透铺平道路。

另一方面，改良主义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一种思潮，反映了它害怕同小资产阶级阶层和工人贵族对抗。实际上它完

全拒绝把正义的和必要的革命暴力作为权力斗争的基本手段，因此它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改良主义在群众中散布有害的和平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美化民族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军队，并经常试图同它们结成联盟，同时还夸大法制和议会制的重要性。改良主义者爱谈的论点之一是，必须拒绝使用暴力而应当同资产阶级和“爱国军队”联合，寻求一条和平的途径，使群众不必流血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种循环论的说法，并受到事实的无情驳斥。凡是在改良主义能够实行调和的、和平主义政策的地方，阶级敌人及其军队都对人民实行了最残酷的屠杀。在邻近的智利两万多名男女工人遭受杀害，进一步说明了上述这种论调没有道理。

武装的人民奋起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改良主义和其它影响较小的思潮，经常在政治思想方面同它们进行斗争。武装的人民是革命的顶梁柱，他们在群众中的地位日益巩固，影响日益增加，同时他们的政治和军事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并日益成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真正决定性的因素。

正是为了有助于在整个大陆范围内加强这个革命的顶梁柱，我们签署这个文件的四个组织才决定成立目前的革命协调委员会。我们号召拉丁美洲人民和工人的所有革命先锋自己组织起来共同战斗。

当然，这意味着革命协调委员会的大门是对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组织敞开的。

我们各组织的经验 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左派革命运动、民族解放军和人民革命军四个组织在进行爱国的和革命的斗争过程中终于认识到团结的必要性，并根据自己

的经验确定了我们的国际主义思想,我们懂得,必须依靠我们各国人民的最坚强、最紧密的团结来对付统一的、有组织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敌人。

我们四个组织,基于斗争和路线相似,首先建立了兄弟般的联系并交流经验,然后积极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从而使我们今天有可能采取这个促进协调和合作的决定性步骤,而这种协调和合作对于我们人民正在同凶恶的共同敌人进行的残酷斗争,无疑将会产生更大的实际效果。

我们各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我们国际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加强,将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利用我们人民的潜力,以便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这支力量最后必能击败资本主义反动派,消灭反革命军队,把美帝国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一一从拉丁美洲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并开始在我们各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拉丁美洲的完全统一。

要实现这个神圣的目标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正如格瓦拉司令所预见,由于帝国主义的凶残和强大,有必要进行流血的长期革命战争,使拉丁美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或第三个越南。然而,拉丁美洲工人阶级将学习英雄的越南人民的光辉榜样,能够毫不灰心并日益有效地进行战斗。他们将努力使群众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发挥出来,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革命战争将使我们获得幸福,并大大有助于最后消灭国际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

我们的纲领 我们一致认识到,在拉丁美洲除了采取革命战争的战略外,没有其它可行的战略。这种革命战争是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和平的和暴力的群众斗争的一种交错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协调一致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但这些斗争要围绕着配合武装斗争这个中心进行。为了胜利开展革命战争的这个过程，必须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下动员全体人民。必须由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马列主义的战斗的党来对这场战争实行无产阶级领导。这个党能够集中和指导人民斗争，保证正确的战略领导，并把各方面的力量团结在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组织内。必须在这个党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革命力量的坚强核心——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这支同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由群众哺育的军队将从小到大，成为一道粉碎反动派一切军事阴谋的铜墙铁壁，而且这支军队还将具备保证全部消灭反革命军队的物质条件。同时，还必须建立一个由工人和人民组成的广泛的群众阵线，这个阵线能够动员一切进步的 and 革命的人民，独立的人民党派，工会以及其它类似的组织，总之，能够动员最广泛的群众。群众的斗争同人民军队的军事活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秘密的政治活动是相辅而行的，但又经常互相配合、集中于一个目标。

必须明确回答，不是别的斗争而正是武装斗争成为使敌人两极分化、焦虑不安并最后失败的主要因素。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利用一切可能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合法的和秘密的，和平的和暴力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根据每个地区和国家的具体情况，所有这些形式都是有效地为武装斗争服务的。

斗争性质的基本特点是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北美帝国主义正在实行一种阻止拉丁美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在一些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威胁着寡头政权稳定性的国家

里，实行法西斯统治决不是偶然的。为了回敬帝国主义者的国际战略，革命者们制定了本大陆的战略。

斗争的道路是漫长的。国际资产阶级决心采取一切手段阻止革命，即便革命在一个国家发生。国际资产阶级拥有一切用来反对人民的官方的和官僚政治的手段以及军事的和宣传的手段。因此，在我们能够建立一支比敌军更强大的人民军队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在第一阶段将是一场消耗敌人力量的战争。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然而似乎矛盾但确有道理的是，这在实现这些被剥夺基本权利的阶级的战略目标方面，也是一条最短的和付出代价最小的途径。

拉丁美洲人民，准备战斗吧！我们现在正生活在我们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因此，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左派革命运动、民族解放军和人民革命军号召拉丁美洲被剥削的劳苦者，号召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城市穷人，号召学生、知识分子和革命基督教徒，号召所有准备支持人民正义事业的被剥削阶级中涌现出来的那些成员，坚决拿起武器，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在格瓦拉司令的旗帜和榜样的鼓舞下，这个斗争现在已经在本大陆进行。

不自由毋宁死（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

为了阿根廷，不胜利毋宁死（人民革命军）

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左派革命运动）

不胜利毋宁死（民族解放军）

附 录 四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共产党会议

1975年6月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共产党会议于1975年6月9日到13日在哈瓦那举行，这是迄今为止在本半球举行的一次最大的同类性质的会议。选出的二十四个代表团代表着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以及波多黎各、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的共产党。它们是：

阿根廷共产党；玻利维亚共产党；巴西共产党；智利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古巴共产党；多米尼加共产党；厄瓜多尔共产党；萨尔瓦多共产党；瓜德罗普共产党；危地马拉劳动党；圭亚那人民进步党；海地共产主义者统一党；洪都拉斯共产党；马提尼克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巴拿马人民党；巴拉圭共产党；秘鲁共产党；波多黎各共产党；乌拉圭共产党；委内瑞拉共产党。

加拿大共产党代表团和美国共产党代表团（三人，以全国主席亨利·温斯顿为首）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一些对立的马列主义组织的代表因没有参加会议而引人注目，虽然事先已经预告。这些组织是：亲华的和托洛茨基派的党及其武装支队（如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卡斯特罗分子的组织（如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和智利左派

革命运动),其它主要执行游击队方针的组织(如阿根廷的蒙托内罗斯),以及委内瑞拉的独立的共产党,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先锋。

中美和墨西哥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九次会议于1974年5月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召开这次会议。由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等国的一些党签署的上述第九次会议的宣言,呼吁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筹备会议讨论召开区域会议的组织、议程和有关事项。宣言最后说:“我们相信,这样的会议将有利于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因为它将本着团结的精神召开,旨在澄清对一些问题的共同看法,例如,关于革命进程的现状,它的成就和挫折,各种力量目前的组合情况以及革命进程的各种形式和特点,同时并对我们各党和一切反帝力量采取协调行动的可能性进行科学的分析。”^①据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1975年6月14日)的报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曾通过一系列活动对这次会议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并组成一个委员会,拟定了这个文件作为会议讨论的基础。”报道继续说,会议显示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共产党的“坚强团结”,反映了“它们对国际形势、拉丁美洲形势、战略基础和策略思想的评价看法上基本一致,这种战略基础和策略思想是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共产党、所有革命者和爱国者反对主要敌人的斗争服务的,这个主要敌人被会议确定为美帝国主义。”^②

① 《新闻公报》(布拉格),第14期(1974年)第32—33页。

② 《格拉玛报》(哈瓦那),1975年6月22日。

6月13日签署的这个长达两万字的宣言在方针上完全是亲苏的，尽管它在有些情况下依据的是一些可以作各种不同解释的一般化的公式。宣言由九个部分组成，分析了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史，古巴革命的影响和重要性，自从巴蒂斯塔1959年倒台以来拉丁美洲革命形势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革命过渡时期”国际方面的问题，以及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今后年代的战略和策略。这个文件赞扬了厄瓜多尔、巴拿马、委内瑞拉、墨西哥和秘鲁（当时在胡安·贝拉斯科领导下）的政府，特别是秘鲁政府，同时并强调要在“争取经济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斗争”中同其它左派和某些“资产阶级阶层”一起采取统一的反帝行动。在人民力量充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参与下，民族主义思潮可以改变为反帝的革命的立场。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加强了革命者同教会中“改良主义的”、“进步的”那一部分人之间的合作。七十年代初期智利的经验表明，“革命运动不仅不能放弃民主取得政权的任何手段”，而且必须“充分准备好用武器保卫民主的成就”。文件要求召开苏联所企望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并“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背信弃义的”对外政策。文件中关于谴责中国的一大段话，与大多数亲苏的党十多年来所发表的谴责中国的那些话相比，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措词比1966年以来古巴支持的所有对中国的谴责更为强烈。会议标志着古巴共产党完全回到了拉丁美洲亲苏的共产党的行列之中。^①

^① 这个摘要中有几部分是根据我给1975年6月旧金山的《拉丁美洲报道》撰写的文章写的。

1975年6月签署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共产党会议宣言第六节到第八节中反映了七十年代中期亲苏的共产党关于拉丁美洲改革和革命的立场。宣言的这几节全文如下：^①

宣言第六节

拉丁美洲目前具有历史意义的形势决定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今后进行的大搏斗将成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独立斗争。

但是，拉丁美洲的独立现在不应该被设想为十九世纪初那些鼓舞各国英雄和人民的简单的继续，而这些目标过去显然并没有实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占人类大部分的人口已经走上通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苏联正在向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迈进；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现在面临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危机中已经受到致命创伤并陷入绝境的帝国主义企图保住正在摆脱它控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世界，采用新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将有助于减轻或推迟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拉丁美洲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如果只消灭他们本国的外国剥削，那还不能完全解决失业、苦难、低工资、愚昧、缺少土地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消灭了他们本国的一切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剥削之后才会开始获得真正解决，而在这些国家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同控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几乎是万能的帝国主义公司竞争的时候，他们

^① 这个文件引自《格拉玛报》(哈瓦那)，1975年6月22日。

本国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甚至更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

而苏联和古巴（仅就这两国的面积和地理位置各自不同的经验而言）却提供了经济不断发展的范例，尽管苏联曾经受到外来的侵略和封锁，尽管帝国主义企图使它处于技术落后状态。五十多年前，帝国主义曾企图利用这种落后状态来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而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帝国主义还企图用这种办法来阻止革命古巴的发展。在那些企图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的传统方式来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亚非拉国家中，现在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要是没有人民力量——工人、劳动农民以及城市和农村中等阶层——的决定性的参与，经济发展并不能使我们各国按照所必需的速度解决自己的落后、失业、灾难、文盲等严重问题。而且，正如古巴的范例所表明，只有通过深刻的改革，才能将我们各国人民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这种深刻的改革实际上是向农村和城市的工人、向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证明，革命是他们自己的事。

我们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能够真正保证拉丁美洲按照我们各国所要求的快速发展的唯一的制度。古巴已经向各国兄弟人民证明，在我们的时代，在美洲大陆现有条件下，不仅能够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能够显示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成果。社会主义是我们决不会放弃的目标。然而，我们共产党人懂得，为了克服帝国主义和寡头集团通过它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和教育在拉丁美洲人民力量的一些阶层中所造成的思想上的蜕变和混乱，只有经过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和根本变革的时期，经过一个工人阶级取得直接经验和所有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人的始终如一地顽强地进行思想斗争的

时期，社会主义才会成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立即执行的纲领。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不从政治上打倒那些同帝国主义勾结的阶级和阶层的代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将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进步；如果不战胜美帝国主义对我们各国的压迫，如果不取消跨国公司的控制，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也将不可能在我们各国实行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更不用说去实现社会主义了。

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争取政权机构尽快变革的斗争，以及争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斗争，都是同反对垄断公司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垄断公司和帝国主义除了控制着我们各国的财富外，还纵容和支持我们各国的寡头集团及其政府。

既然美帝国主义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主要的共同敌人，那么，对我们这些设想拉丁美洲革命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这场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必将是反帝的。因此，我们各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根据拉丁美洲其它势力对待共同敌人的态度来判断它们的政治立场。在不削弱我们各国争取民主权利斗争和争取建立新政权机构斗争的重要性的情况下，我们各国共产党人愿意支持并促进拉丁美洲国家政府采取那种可能构成保卫我们各国自然资源的立场，即为取消跨国公司控制我们各国经济并日益扩大这种控制的权利而努力。

确实，维护国内经济的措施并不是经常伴随着真正的反帝政策而来的。在有些情况下，就是严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也不会产生改革国内经济的愿望，同时，试图把这种愿望变成现实的政府，由于考虑到今天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也并非

是站在进步立场上。在人民力量决定性地参加斗争的情况下，在民族主义政府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民族主义的立场可以转变为反帝的、革命的立场。

有些国家维护国家资源和决心从跨国公司手中夺回经济控制权的斗争，是同社会改革纲领有效地联系在一起的。要是有些国家的政府不仅对帝国主义控制的财富实行国有化而且还象秘鲁那样实行发展国内经济的人民纲领，那么，各国共产党人就应该象秘鲁共产党人那样，可以给这些国家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以最真诚、最坚决的支持。共产党人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与指导那些纲领的观点不同，但这个事实将不会削弱共产党人对上述这种政府立场的支持，而且也不会成为共同对付今后问题的障碍。

反帝斗争将会使拉丁美洲最后获得独立，这种斗争允许并要求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工人阶级在这种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劳动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这些社会阶级渴望进行最深刻的改革。

尽管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处于依附帝国主义的从属地位，但是它的发展却使各个不同国家的社会构成情况发生重要变化。

城市和农村工人阶级的发展特别显著。今天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已超过五千万，占本大陆经济上有活力的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大约有一半的雇佣劳动者是农业工人。工人阶级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集中在大工厂的工人越来越多。所有这些现象都反映在无产阶级作为主要的生产力和社会政治力量的作用的提高上。

同时，工人阶级改进了它的组织，并使自己成为能够决定拉丁美洲各国政治面貌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也趋向于成为使其它民主的、反帝的社会阶层联合起来的主要因素。

争取民族彻底解放和经济完全独立的斗争是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剧烈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反对外国和本国垄断公司和大庄园的剧烈的阶级斗争互相联系在一起。在资本的桎梏下，工人阶级受到愈来愈沉重的剥削。难以糊口的低工资制在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盛行。工人阶级所得到的部分国民收入正在逐渐减少，实际工资由于通货膨胀和生活费用不断上涨而在减少。

拉丁美洲革命运动关于工人阶级采取英勇战斗行动的丰富经验清楚地表明，工人阶级在声援其他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革命胜利、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也表现了最坚定的原则性。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引起了社会后备军的增加，这支后备军是大量失业者和那些离开农村地区而在本大陆一些大城市流浪的无地农民组成的。

农业工人、半无产者、无地农民、小业主、佃农以及我们各国农村的所有贫苦阶层，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关心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同时也关心我们各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深刻变革。他们受剥削，生活在苦难之中，这种情况使他們要进行多种阶级对抗，而这种对抗构成了解放斗争的一部分。

农业经济落后和工业发展受到限制，妨碍了从农村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民中吸收新的劳动力。这种情况使无固定职业、无家可归以及缺乏生活资料的社会阶层不断扩大。他们

在所有大城市的贫民窟里过着呆板单调的生活。在许多国家，他们的人数增长已经无法控制。

这些人住的是分散的茅舍、偏僻的简陋小屋、贫民窟、蘑菇形的小矮屋和拥挤不堪的棚户区。他们的社会悲剧是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剥削和压迫本性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可以使这些群众中的大部分人免受小资产阶级头子和反动分子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影响，同时可以使他们组织起来，其目的不仅是要求解决他们的迫切问题，而且也是为了使他们对反帝的革命斗争作出贡献。

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结构已经造成了一个广大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不仅由手工艺者和小商人而且由本大陆各国经济中愈来愈重要的服务业的人员所组成。社会不稳定是驱使这个阶层同学生、知识分子、技术员等一样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因素。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先锋组织和民主、反帝运动；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自己成立一些组织，而这些组织明显地带有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色彩。同样，他们也成立了一些反动组织，中央情报局现在已经打进这些组织，寡头集团现在也把这些组织用来充当突击队。在智利，他们为法西斯政变效劳，起过重要作用。所有这些事实都着重说明，鉴于中间阶层在整个拉丁美洲起的所谓有力作用，如果要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那么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

今天拉丁美洲一些反抗帝国主义并试图实行真正民族复兴纲领的政府的范例表明，拉丁美洲的反帝解放斗争可以依靠其他一些社会力量和分子，这些社会力量和分子由于同帝

国主义有矛盾而成为进步势力不能不予以注意的同盟者。

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各国的大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依靠帝国主义来使自己发展壮大，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在它们国家的统治机器的一部分。过去古巴垄断糖业和进口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今天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巴西等国的大部分资产阶级也是这样，它们都处于垄断地位，同帝国主义垄断公司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的控制有着联系。那些非国有化的资产阶级维护它们对于帝国主义的依赖，反对反帝的进程。甚至在那些垄断资产阶级同它们的帝国主义伙伴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或冲突的情况下，前者出于本阶级利益的考虑也要通过和解的方式去解决这些分歧或冲突。同时，这些垄断资产阶级反对本国政府为冲破企图扼杀它们国家的外国统治的束缚所作的努力。这些垄断资产阶级中有些阶层由于在经济上同大地主有联系而彼此结合在一起，以便组成一个亲帝国主义的寡头集团，反对工人阶级、农民、中等阶级以及其它关心国内市场发展和国家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个历史现实并不意味着拉丁美洲资产阶级中没有这样的阶层：由于它们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而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获得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斗争中采取与无产阶级、农民和居民中非资本主义阶层一致的立场。因此，这些资产阶级的阶层可能同人民力量一道参加民主的、反帝的统一行动。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和其它一切反帝和争取社会进步的战士非常重视这种可能性，认为它是一种因素，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具有程度不同的力量和重要性，但它却构

成了上述这种错综复杂的艰难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但是,关于资产阶级参加反帝的过程,如果忽视它当中的那些阶层的局限性和动摇性,那将是错误的。在拉丁美洲,资产阶级早已丧失了起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可能性。它不可能将新开展的争取独立的斗争进行到底。把资产阶级这些阶层所代表的力量和组织合并到反帝、反寡头集团斗争的广泛的阵线中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在损害工人、农民和中间阶层的基本联盟的情况下,这种合并将决不可能实现,同时如果在为了暂时的妥协而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的情况下,这种合并也决不可能实现。

近几年来,在一些重要的势力之中发生了深刻的思想、政治和社会变化。这些势力过去是为寡头集团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工具,而今天却成为进步的因素,甚至成为革命潜在力量的因素。

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武装部队中可以察觉到这些变化。在秘鲁,在武装部队高级军官重要核心领导下,一个就其起因和内容来说是革命的运动,正在进行中;在巴拿马,由国民警卫队领导人发起的这个运动今天正在深入发展。这两个情况清楚地表明了帝国主义压迫制度总危机的加深和爱国意识的稳步发展。

帝国主义现在要使人们相信国内镇压与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关而与一小撮保持特权的本国人和外国人无关,那是比较困难的。美国及其美洲国家组织要象将近十年前美帝国主义干涉侵略多米尼加共和国时那样调动拉丁美洲一些

国家的军队，也将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侵略曾遭到多米尼加军队中拥护宪政的官兵的英勇抗拒。

武装部队中发生的这种变化的过程是复杂的。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加强它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其目的是利用反动分子在人民出身的军官中制造这样的幻想，即他们可以很快地变成资产阶级，从而企图收买他们。面对着人民斗争的发展，帝国主义鼓励一些国家搞军事政变，建立反动的或法西斯的独裁。他们更在武装部队中加强意识形态的斗争，解除武装部队的警备任务，使武装部队变为社会生活的仲裁者，使许多士兵的双手沾满了他们工农兄弟的鲜血，并使那些经过训练用武器保卫自己祖国的人成了它的打手。那些人民出身的军官感觉到现在掌握政权的寡头集团背叛了爱国的理想，而有许多人都曾受过这种理想的教育。这些军官正在了解到公理和正义不在那些维护自己特权的人一边。

武装部队由于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影响下通过驻地的训练而受到反共的毒害。生活的现实使拉丁美洲军队中愈来愈多的人识破了过去在他们中间散布的谎言，认识到反共思想和实践的破产。

基督教徒，特别是天主教徒，低级牧师，甚至他们最高的僧侣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代表，都日益积极地参加争取实现他们的要求和争取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各种人民斗争。如同在巴西等国那样，他们受到一个站在人民一边的教会的思想的鼓励。这个教会拒绝承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义务，它的一些代言人谴责法西斯恐怖，要求民主权利和社会进步。

对于工人问题和国家问题敏感的一些俗人和牧师运动，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这些运动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了解到采取一致行动反对共同敌人的必要性。它们有时以实际行动效法卡米洛·托雷斯令人敬佩的英雄榜样。托雷斯曾在一次游击行动中牺牲，他是反共产主义的公开敌人，也是主张人民团结的不倦的鼓吹者。

人民斗争的发展决定了拉丁美洲基督教徒中一般说来存在保守、改良主义和先锋三派。改良主义派和先锋派代表绝大多数基督教徒，在拉丁美洲各国同他们共事合作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基督教徒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正便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威胁，争取深入改革的斗争中推进统一行动，并为建立一个持久的联盟奠定基础，而这个联盟将导致一个新社会的建立。

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行战斗的具体情况下，保卫民主制度和人民权利具有特殊意义。民族彻底解放的含义就是击败并消灭当权的寡头集团，因此民族彻底解放不可避免地要同争取真正民主的努力联系在一起。

进步力量以及其中的共产党人一向为实行民主和代议制的可能性进行辩护。他们不顾欺骗和反动暴力而能够在某些国家使人民长期参加议会，这使人民得以利用议会这个讲坛，并参加超越议会的一些行动。智利的经验是，通过选举使人民联盟的各党派参加到政府中去。这个经验表明了工人阶级和人民可以发展民主形式，同时也证实了帝国主义和寡头集团完全不尊重各国人民的民主意志。

取消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利用军队镇压工

人运动，建立法西斯暴政——所有这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寡头集团在为保持其对本大陆统治的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过去几年中，工人和农民觉悟的提高，中间阶层的激进化，成员日益广泛的基督教徒左派同上述这些力量的联合，以及一些国家军队的成员日益拒绝继续为镇压他们兄弟的行径服务——所有这些都加深了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统治的危机，而这个危机从古巴革命时就已开始。在这种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各种形式的人民斗争增加了。因此，帝国主义及其思想家和拉丁美洲的奴仆一方面在仍然可能的情况下不放弃采用隐蔽的统治方式，另一方面试图采用日益残酷的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与他们在智利采用的一样残酷。美帝国主义是建立这类政权统治的策划者，它提供人员训练的镇压机构，负责采取最残酷的暴行。

美帝国主义对智利的罪恶打击，证实了拉丁美洲紧密地团结起来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威胁的紧迫性，同时并证实了这种斗争与反帝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详细阐述关于参加 1848 年欧洲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和 1851 年欧洲民主化革命和自由革命的这个理论问题以来，争取社会主义斗争和争取实现民主要求斗争的关系就清楚地存在。列宁光辉地发展了关于这两种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的论点，随后并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强调了这个问题。

我们拉丁美洲共产党人希望使我们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这是一种以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力量为基础的

民主，是一种以消灭基本生产资料方面的私有制而获得完全自由为基础的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然而，我们现在并不是不关心而且也不能不关心相对民主的命运，虽然这种民主可能与真正的最深刻的民主不相符合，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获得这种民主。

我们共产党人将永远同一切民主主义者、同一切反对皮诺切特、班塞尔、索摩查、斯特罗斯纳、劳赫鲁德、巴西的大猩猩派、杜瓦利埃尔或博达贝里之流残暴统治的人同心协力；同时，我们反对接受这种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法西斯威胁会导致放弃社会进步的看法，反对承认非正义的现状。

争取民主斗争的团结是同更大范围的反帝革命团结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拉丁美洲革命改革的道路是以进行一种经常的联合斗争为先决条件的。在这种联合斗争中，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保卫民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寡头集团的斗争，以及人民有效地参与决定他们政治生活的斗争，都是作为同一进程的一部分而展开的。

宣言第七节

当前不断进行的争取实现群众经济、政治和社会愿望的斗争是同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共产党人继续在工会运动中同群众保持联系，了解他们当前的需要，帮助他们系统地提出要求，使他们的斗争具有真正的阶级内容。

正如许多经验所证明，工会的团结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被认为是包括工会运动各种力量在内的斗争范围的扩大，这

种团结有助于使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大批工人新战士和其他新战士参加到这个争取社会进步的伟大的斗争中去。

工会运动是我们各国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力量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尊重工人阶级的权利就不可能有民主。工会的自由，罢工的权利，以及工会的民主和独立是一切民主和反帝力量共同关心的一部分。从工厂到可能最高的工会，建立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统一的工会力量是十分重要的。

行动统一是巩固工会团结的一个必要条件；通过所有那些关心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人的共同努力可以达到这种统一。克服分裂不仅对工人阶级而且对整个民主进步运动都极为重要，克服分裂的含义就是反共主义的失败。

争取民主土改的斗争在我们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内是同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斗争是整个民主革命运动的任务，同时也是工农联盟的基本因素之一。

民主土改的基本目标是：取消私人的大庄园和半封建的剥削形式，实行耕者有其田，采用先进生产形式，这种先进生产形式不仅使大批农民参加到经济生活中去，而且使工业化过程不可缺少的国内市场得到发展，而这种国内市场的发展又可能有助于独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政府关于通过赊销土地给农民的方式或者通过在一些荒芜地区“开拓殖民地”的计划来改变土地占有情况的纲领并不能解决土改问题，而相反地使这个问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垄断公司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成为挫败争取真正土改

斗争的一种手段。

保卫受到帝国主义思想压力侵袭和损害的民族文化传统同总的解放斗争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官方控制的文化是适应一小撮反动派的利益需要的，同美帝国主义所树立的文化样板有着密切联系。这种文化在智利等国法西斯政权统治下变得更坏了；在那里，一切人民的进步的文化表现形式都被取消。

在文化方面的民主要求，主张扩大教学、受教育和教育民主化的可能性，同时还主张扩大实现文化、科学、教育和艺术工作者愿望的可能性。

为了开辟这条通向建立一个新社会的道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利益是同深刻的民主改革和革命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这个新社会里教育将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而为全体人民所共有。

文化工作者由于意识到他们对人民的责任而推动他们统一地有组织地参加到拉丁美洲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的伟大主流中去，他们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是我们各国人民和民族获得精神独立和文化繁荣的唯一途径。

这些运动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表示了并且进行了相互声援，同时促进了对全世界所有反帝的人们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因此，这些运动构成了本大陆各国人民共同反帝斗争和争取社会进步斗争的基本部分。

宣言第八节

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是艰巨而复杂的。在这场斗争中，

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都有其自己的地位，因此，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应该采用各种很不相同的斗争方式，并根据时间和地点把这些斗争方式适当地应用于各国的不同情况。利用一切合法斗争的可能性是反帝力量不可推卸的责任，捍卫各国人民通过民主方法决定他们要求改革的权利是我们斗争的坚定不移的原则。

革命者并不首先使用暴力。但是，准备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准备通过各种手段开辟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人民行动的道路，即大多数人独立自主行动的道路，则是各国人民力量和革命力量的权利和义务。

在工人阶级基本利益中深深扎下根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现在起着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并在斗争中负有特殊责任。它们是一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政治力量，也是一支唯一能够在现代复杂的情况下制定适当方针的政治力量，因此，它们有可能在革命联盟内起这种作用。但是，仅仅依靠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和指导它们的正确理论，并不能保证它们起到这种作用。它们所能起的作用是，它们成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的最坚定的战斗者，在斗争中采取真正的先锋队的立场，并向各国人民说明它们的行动纲领，说明它们为团结一切反帝力量和确定最后革命改革进程的方针而采取的战略和策略主张。

我们共产党人有权利期望从那些在我们各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与我们采取联合行动的人那里得到对我们的政治立场和我们的意识形态的相应尊重，尽管当前存在纲领性的分歧和最后的目的不同。

各种运动的领导人，不论在不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政府里任职，今天都应该把争取他们本国人民的解放作为他们斗争的目标，他们完全有权提出他们非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奋斗目标。拉丁美洲的发展道路有几种抉择，究竟是谁已经作出了正确的抉择，历史将会作出裁决。我们共产党人毫不怀疑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做一个反共产主义者就意味着他是历史的盲目者，这不仅使那些患有这种症状的人走上与最坏的落后势力同流合污的道路，而且必然使他们遭致失败。反共产主义是一种反动的主张，也是我们时代一切反革命思想的核心。我们可以尊重那些非共产党人，但是我们决不能不对那些错误地把自己说成是反共的人提出批评，我们也决不能回避同那些自觉地采取反共立场人作殊死斗争。

如果说反帝团结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左派力量内部的团结则更是必要的。

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产生于苏联和其它欧洲及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改变的胜利，产生于对古巴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抱有一种坚强信心的范例，产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为一种唯一能够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理论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出现和积极活动。这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今天拉丁美洲除了容许各国共产党和早先成立的社会主义组织存在外，还容许其它形形色式的左派组织存在，其中有些组织自称是马列主义的，并宣布社会主义是它们的奋斗目标。

各国共产党在指出它们对于这些左派力量的战略思想或

策略手段持有异议时，将要考虑到其中有些左派组织的指导思想是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压迫，朝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立场前进。

各国共产党对于它们同这些左派之间的分歧不能表示沉默，但是它们将把错误的立场同它们所谴责的冒险主义的态度区别开来。反共反苏的左派是不可想象的，依据这个标准，共产党人将努力孤立那些采取这种态度的人。

左派力量之间的争论必须遵从共同的原则、目的和适合于共同斗争的情况和条件的策略，经常从团结的立场出发，并为团结服务。

我们共产党人确信我们所采取的立场，并愿意通过互相尊重的途径领导这种必要的讨论，以便让劳动群众看清问题的真相。这同公开的全面分析各种有争论的立场并不矛盾。我们必须努力加强左派的统一行动。在提出这种考虑和分析问题的要求时，我们拉丁美洲共产党人宣布我们愿意克服误解，以便推进统一行动。

虽然有些国家的共产党以认为自己是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的真正代表而自豪，但是它们仍然愿意同那些为目前同样目标而认真战斗的人一起参加斗争。在我们斗争的这个时期为拉丁美洲革命者开辟的这种可能性，以及同帝国主义敌人和支持这个敌人的寡头集团进行伟大的决定性的对抗时期的临近，要求为促进所有属于反帝力量一部分的那些人之间的团结和相互了解作出最大的努力。

各国共产党在决定全力促进拉丁美洲革命进程发展的时候，认为必须把它们的政治影响和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扩大

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扩大到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中去，扩大到劳动农民联盟、土改协会等组织中去；同时必须在城市和农村的中间阶层中加强思想工作，在学生、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和技术员中加强马列主义的传播，从而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够对我们各国的政策起决定性影响的巨大力量。

为强化共产党战士的思想，为进行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教育，以及为清除各种改良主义的或所谓“左”的倾向而进行顽强斗争，是使共产党队伍得到加强的基本因素。思想上日益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加强，以及对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和自由散漫现象的不断批判，将使各国共产党能够更成功地在思想方面指导反对帝国主义和寡头集团的斗争。

在反帝斗争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各社会阶层可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态度，或者受到调和的改良主义思想或狭隘的宗派主义思想的影响。不断反对这两种流毒的斗争将使统一行动在真正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加强，并愈来愈证实革命的无产阶级所起的独立的阶级作用。

当此评价、总结拉丁美洲反帝斗争之际，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举着我们的旗帜，向过去数十年中拉丁美洲各地为本国独立事业和为实现社会主义而牺牲的数以千计的共产主义战士表示敬意。我们向所有被关押的和正在被拷打、受迫害的共产主义战士致敬，在这些共产主义战士当中，我们特别想起路易斯·科尔巴兰、安东尼奥·迈达纳和海梅·佩雷斯同志，我们强烈要求释放他们。我们向所有被监禁、被折磨的革命者和爱国者（我们各国的非共产党人士）致敬，同时我们再次向在为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斗争中牺牲的那些战士表示敬意。

对爱国者和进步力量的残酷镇压，特别是对巴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残酷镇压（由于该党坚决反对巴西法西斯政权），以及对所有进步力量的残酷镇压，都证实必须继续和扩大拉丁美洲对巴西人民的民主反帝斗争的声援。

同样，我们对玻利维亚工人和人民对于在班塞尔独裁统治下蒙受苦难而奋起反抗表示声援；对巴拉圭受迫害和被监禁的爱国者表示声援；对受到可怖的独裁压迫的海地人民表示声援；对受到法西斯谋杀集团（所谓“三A”组织—Triple A）野蛮挑衅的阿根廷进步力量表示声援；对乌拉圭受到博达贝里法西斯迫害的那些人表示声援；对受到殖民政权迫害和监禁的波多黎各爱国者表示声援；以及对对我们美洲其它地区在独裁的、反民主的政府统治下所有受监禁和受折磨的人表示声援。我们批准了我们对危地马拉人民和危地马拉劳动党的支持，并强调了他们在面对着一个篡夺来的残暴政权、为争取危地马拉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所表现的果敢行动。我们对受索摩查政权各种迫害的尼加拉瓜的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表示声援，索摩查政权伙同危地马拉反动政府大肆干涉这个地区一些国家的内政。

我们对波多黎各爱国者洛莉塔·莱布隆表示我们特别的声援，她是本陆被监禁最久的政治犯，同时也是所有那些由于持有自己的主张而被监禁的人的象征。

在我们拉丁美洲共产党人宣布为共同的反帝斗争（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是这个斗争的坚实基础）而紧密团结起来的时候，我们重申我们每一个党必须遵循马列主义的原则，考虑到本国的具体条件，详细阐明自己的政策。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